民国奇才奇文





東方出版社

《民国奇才奇文》系列

蔡元培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苏曼殊	天涯红泪
陈独秀	我们断然有救
李叔同	禅灯梦影
胡　适	大宇宙中谈博爱
杨　度	旷代逸才
王国维	晚清的最后一个文人
章太炎	名师骑士
李大钊	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
宋教仁	护法使者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
于右任	黄帝子孙之元气
瞿秋白	多余人心史







民国奇才奇文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蔡元培 卷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丘桑主编
(民国奇才奇文系列:蔡元培卷)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6
ISBN 7-5060-1111-5
Ⅰ.黑…
Ⅱ.丘…
Ⅲ.蔡元培-文集
Ⅳ.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982 号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HEI AN YU GUANG MING DE XIAO ZHANG
丘　桑　主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05 千字　印张:13.75
ISBN 7-5060-1111-5/Z·88
定价:24.60 元



卷首语

不到四十春秋的民国在漫长的岁月洪流中不过是历史之一瞬，但它的兴起在中国文明史上却写下了爱国求变者的辉煌篇章。新旧时代更替，中西文化交融，离乱动荡，百废待兴，这就是这一时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它给人们以空前的磨难也给人们以难得的机遇。这是一个英杰倍出、群雄并起的年代，既有振臂一呼、万众影从的政治巨人，也有埋首书斋、著作等身的学术大师。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王国维、章太炎、苏曼殊、李叔同……这一个个至今听起来都令人激动的名字，无一不表现出卓然不群的真性情、超凡脱俗的真才华。对生活在太平盛世的现代人来讲，他们已成为永远无法复制的神话，仿佛殿堂中供奉的神像，只能于膜拜顶礼、赞叹感慨中摹想其风采和音容笑貌。离乱动荡的特殊历史环境给这些人的生平经历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奇色彩。不是吗？家赀万贯、寄情有声的风流公子转眼间弃贤妻、别娇儿，伴青灯黄卷，竟成中兴释门的一代高僧；不是吗？开一代学风，用西方理论观照中国文化的国学大师却匍匐于一个年幼废帝的脚下，以自沉湖底而终；不是吗？狂热的保皇分子，历经坎坷，最后竟修炼成虔诚的共产党员……这种比小说、戏曲情节还要曲折神奇的人生只能出现在这个时代。其人奇，其文

更奇。无论他们是新派博士，还是老式学究；是政坛领袖，还是释门高僧，无一不具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真才情。千字妙文，走笔而成；万言长卷，立马可待。这对他们来讲不过是日常小事。观其文，或怒目金刚、叱咤风云，或缠绵悱恻、凄惋欲绝；或如长江流水，滔滔不绝，或似山间小溪，空澈明丽。无论治国宏文，还是闲适小品，都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中国的文化史、文学史因此而丰富多彩，光芒四射。

有鉴于此，我们从民国众多奇人中选其品性独特、才情超群者，述其生平、粹其奇文，汇为一编，一并推出。既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自信，且可滋润性情，开启心智。相信会有沁人心脾，开人眼界的作用。对有关研究者，也有一定参考价值。该书系各卷传记或出传主之手，或由亲友、专家所写。正文选其才气、性情兼具，能体现作者风采者，以类相从。后附生平大事年表。阅读全书，可对其人其文有新的了解。倘读者诸君能有一二收益，则选编辛劳之余倍感欣慰。还愿高明之士多多指正。

编　者

一九九八年五月

目　录

面向新生活

优美与崇高

诗韵与人情

哀思与家事

蔡元培口述传略（上）

黄世晖记

其家世及其幼年时代

蔡氏以明季自诸暨迁山阴，其初以艺山售薪为业，至孑民之高祖以下，始为商。孑民之祖名嘉谟，字佳木，为某典经理，以公正著。其父名光普，字耀山，为钱庄经理，以长厚称，家中人至以"爱无差等"笑之。孑民之母周氏，贤而能。以民国纪元前四十四年（一八六七）一月十一日（即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生孑民。方孑民丧父时，仅十一岁。有一兄，十三岁。又有一弟，九岁。其父素宽于处友，有贷必应，欠者不忍索，故殁后几无积蓄。世交中有欲集款以赡其遗孤者，周氏不肯承认，质衣饰，克勤克俭，抚诸儿成立，每以"自立""不倚赖"勉之。常自言"每有事与人谈话，先豫想彼将作何语，我宜以何语应之。既毕，又追省彼作何语，我曾作何语，有误否？以是鲜偾事。"故孑民之宽厚，为其父之遗传性。其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焉。

孑民有叔父，名铭恩，字茗珊，以廪膳生乡试中式。工制艺，门下颇盛。亦治诗古文辞，藏书亦不少。孑民十

余岁，即翻阅《史记》、《汉书》、《困学纪闻》、《文史通义》、《说文通训定声》诸书。皆得其叔父之指导焉。孑民自十三岁以后，受业于同县王子庄君。王君名懋修，亦以工制艺名。而好谈明季掌故，尤服膺刘蕺山先生，自号其斋曰仰蕺山房。故孑民二十岁以前，最崇拜宋儒。母病，躬侍汤药，曾封臂和药以进。（孑民有叔父曰纯山，曾因母病而封臂，家中传说其母得延寿十二年，故孑民仿为之。其后三年，母病危，孑民之弟元坚又封臂以进，卒无效。）居母丧，必欲行寝苫枕块之制，为家人所阻，于夜深人静后，忽挟枕席赴棺侧，其兄弟闻之，知不可阻，乃设床于停棺之堂，而兄弟共宿焉。母丧既除而未葬，其兄为之订婚，孑民闻之，痛哭，要求取消，自以为大不孝。其拘迂之举动，类此者甚多。

旧学时代

孑民以十七岁补诸生，自此不治举子业，专治小学、经学，为骈体文。偶于书院中为四书文，则辄以古书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书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调，常人几不能读，院长钱振常、王继香诸君转以是赏之。其于乡会试所作亦然。盖其好奇而淡于禄利如此。然己丑、庚寅乡会试联捷，而壬辰得翰林庶吉士，甲午补编修，在孑民亦自以为出于意外云。

孑民二十岁，读书于同乡徐氏，兼为校所刻书。徐氏富藏书。因得博览，学大进。

孑民之治经，偏于故训及大义。其治史，则偏于儒林文苑诸传、艺文志及其他关系文化风俗之记载，不能为战史、政治史及地理官制之考据。盖其尚推想而拙于记忆。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于旧学时代，已见其端矣。

孑民二十四岁，被聘为上虞县志局总纂。因所定条例，为分纂所反对，即辞职。一生难进易退，大抵如此。

委身教育时代

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戊戌，与友人合设一东文学社，学读和文书。是时，康、梁新用事，拜康门者踵相接。孑民与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关系，而于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谭复生君。然是时梁、谭皆在炙手可热之时，耻相依附，不往纳交。直至民国七年，为对德宣战问题，在外交后援会演说，始与梁卓如君相识。其孤僻如此。然八月间，康党失败，而孑民即于九月间请假出京，其乡人因以康党疑之，彼亦不与辩也。

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

是时绍兴绅士徐君方经营一中学校，名曰绍兴中西学堂。徐君自为堂董，而荐孑民为监督。校中有英法两外国语，然无关于思想。孑民与教员马用锡君、杜亚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马君教授文辞，提倡民权女权。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竞争存之进化论。均不免与旧思想冲突。教员中稍旧者，日与辩论，孑民常右新派。旧者恨之，诉诸堂董。堂董以是年正人心之上谕送学堂，属孑民恭书而悬诸礼堂。孑民愤而辞职。

孑民为中西学堂监督时，丧其妻王氏。未期，媒者纷集。孑民提出条件，曰：（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取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媒者无一合格，且以后两

条为可骇。后一年，始访得江西黄尔轩先生之女，曰世振，字仲玉，天足，工书画，且孝于亲（曾因父病封臂）。乃请江西叶祖芗君媒介，始订婚焉。是时，孑民虽治新学，然崇拜孔子之旧习，守之甚笃。与黄女士行婚礼时，不循浙俗挂三星画轴，而以一红幛子缀“孔子”两大字。又于午后开演说会云以代闹房。

其时孑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义说进化论。又尝为三纲五伦辩护，曰“纲者，目之对，三纲，为治事言之也。国有君主，则君为纲，臣为目；家有户主，则夫父为纲，而妇子为目。此为统一事权起见，与彼此互相待遇之道无关也。互相待遇之道，则有五伦。故君仁，臣忠，非谓臣当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若如俗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于五伦，亦不合于三纲也。”其时孑民之见解盖如此。

庚子、辛丑之间，孑民与童亦韩君至临安县，为绍兴侨农设一小学校。又在浙江省城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未成。

辛丑，膺澄衷学堂总理刘君之请，代理一月。

是年，南洋公学开特班，招生二十余人，皆能为古文辞者。拟授以经世之学，而拔其尤保送经济特科。以江西赵从蕃君为管理，而孑民为教授，由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教授批改。每月课文一次，由教授评改。孑民又教诸生以读和文之法，使自译和文书，亦为之改定云。是时，孑民于日记及课文评语中，多提倡民权之说。学生中最为孑民所赏识者邵闻泰、洪允祥、王莪孙、胡仁源、殷祖伊诸君，其次则谢沈（无量）、李同（叔恫）、黄炎培、

项骧、贝寿同诸君。

是年之冬，蒋观云君与乌目山僧发起女学校，孑民与陈梦坡君、林少泉君赞成之。罗迦陵女士任每月经费之一部。建设后，名曰“爱国女学校”。由蒋君管理。及蒋君赴日本，由孑民管理之。

是时留寓上海之教育家叶浩吾君、蒋观云君、锺宪鬯君等，发起一会，名曰“中国教育会”，举孑民为会长。

南洋公学自开办以来，有一部分之教员及管理员，不为学生所喜。吴稚晖君任公学教员时，为组织卫学会，已起冲突，学生被开除者十余人，吴君亦以是辞职，赴日本。而不孚人望之教员，则留校如故。是年，有中院第五班生，以误置墨水瓶于讲桌上，为教员所责。同学不平，要求总理去教员，总理不允，欲惩戒学生。于是激而为全体退学之举。特班生亦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之资格，而相率退学。论者谓为孑民平日提倡民权之影响。孑民亦以是引咎而辞职。

南洋公学学生既退学，谋自立学校，乃由孑民为介绍于中国教育会，募款设校，沿女学校之名，曰“爱国学社”。以孑民为代表，请吴稚晖君、章太炎君等为教员。与《苏报》订约，每日由学社教员任论说一篇，（孑民及吴章诸君，凡七人，迭任之，一周而遍。）而苏报馆则每月助学社银一百元以为酬。于是苏报馆遂为爱国学社之机关报矣。吴君又发起张园演说会，昌言革命。会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十余人，亦来学社，章行严君其一也。于是请彼等教授兵式体操，孑民亦剪发，服操衣，与诸生同练步伐。无何，留日学生为东三省俄兵不撤事，发起军国民教育会，于是爱国学社亦组织义勇队以应之。是时，爱国学社几为国内惟一之革命机关矣。

方爱国学社之初设也，经费极支绌。其后名誉大起，

捐款者渐多，而其中高材生，别招小学生徒，授以英算，所收学费，亦足充社费之一部。于是学社勉可支持，而其款皆由中国教育会经理，社员有以是为不便者，为学社独立之计划，布其意见于学社之月刊。是时会中已改举乌目山僧为会长，而孑民为副会长与评议长。于是开评议会议之。孑民主张听学社独立，谓鉴于梁卓如与汪穰卿争《时务报》，卒之两方面均无结果，而徒授反对党以口实。乌目山僧赞成之，揭一文于《苏报》，贺爱国学社独立，而社员亦布《敬谢中国教育会》一文以答之，此问题已解决矣。而章太炎君不以为然，以前次评议会为少数者之意见，则以函电招离沪之评议员来，重行提议，多数反对学社独立。孑民以是辞副会长及评议长，而会员即举章君以代之。于是孑民不与闻爱国学社事矣。

方孑民尽力于爱国学社时，其兄鉴清亦在上海，甚危之。与戚友商议，务使孑民离上海。然孑民对于学社，方兴高彩烈，计无所出。及其决计脱离学社，于是由沈乙斋君从容劝其游学，孑民言游学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国不可，然费安从出。沈谓吾当为君筹之。其后告以汤、张、刘、徐等，均每月贷款若干，可以成行。于是探行程于陈敬如君，则谓是时启行，将以夏季抵红海，热不可耐。盍以秋季行，且盍不先赴青岛习德语。于是有青岛之行。

当孑民任南洋公学教员时，曾于暑假中，游历日本。到东京未久，适吴稚晖君以陆军学生事，与驻日公使蔡钧冲突，由日警强迫上船。是时，陆仲芬君等将伴送至长崎。相与议曰："万一所乘船直赴天津，则甚危，谁可偕去?"孑民以在日本无甚要事，且津京均旧游地，则曰："我偕去。"于是偕吴君归国。或疑孑民曾在日本留学者，误也。

张园之演说会，本合革命与排满为一谈。而是时邹蔚

丹君作《革命军》一书，尤持“杀尽胡人”之见解。孑民不甚赞同。曾于《苏报》中揭《释仇满》一文，谓“满人之血统，久已与汉族混合。其语言及文字，亦已为汉语汉文所淘汰。所可为满人标识者，惟其世袭爵位，及不营实业而坐食之特权耳。苟满人自觉，能放弃其特权，则汉人决无杀尽满人之必要。”云云，（其文惟从前坊间所印之《黄帝魂》曾选之。）当时注意者甚尠。及辛亥革命，则成为舆论矣。

孑民到青岛不及一月，而上海《苏报》案起，不涉孑民。案既定，孑民之戚友，以为游学之说，不过诱孑民离上海耳。今上海已无事，无游学之必要，遂取消每月贷款之议，而由孑民之兄，以上海有要事之电，促孑民回。既回，遂不能再赴青岛，而为外交报馆译日文以自给。

孑民在青岛，不及三月，由日文译德国科培氏《哲学要领》一册，售稿于商务印书馆。其时无参考书，又心绪不甚宁，所译人名多诘屈。而一时笔误，竟以空间为宙，时间为宇，常欲于再版时修正之。

运动革命时代

孑民既自青岛回，中国教育会新得一会员，为甘肃陈竞全君，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来沪，小有积蓄，必欲办一日报。乃由孑民与王小徐君、汪允宗君等组织之。陈君任印刷费及房费，而办报者皆尽义务，推王君为编辑。以是时俄事方亟，故名曰《俄事警闻》。不直接谈革命，而常译述俄国虚无党历史以间接鼓吹之。每日有论说两篇，一文言，一白话，其题均曰告某某，如告学生、告军人之类。此报于日俄战争后，改名《警钟》。其编辑由王君而嬗于孑民，又嬗于汪允宗、林少泉、刘申叔诸君。自王君

去后，均不免直接谈革命，历数年之久，卒被封禁云。

是时西洋社会主义家，废财产，废婚姻之说，已流入中国。孑民亦深信之。曾于《警钟》中揭《新年梦》小说以见意。惟其意，以为此等主义，非世界大多数人承认后，决难实行，故传播此等主义者，万不可自失信用。尔时中国人持此主义者，已既不名一钱，亦不肯作工，而惟攫他人之财以供其挥霍。曰"此本公物也"。或常作狭邪游，且诱惑良家女子，而有时且与人妒争，自相矛盾。以是益为人所姗笑。孑民尝慨然曰："必有一介不苟取之义，而后可以言共产。必有坐怀不乱之操，而后可以言废婚姻。"对于此辈而发也。

自东京同盟会成立后，杨笃生君、何海樵君、苏凤初君等，立志从暗杀下手，乃集同志六人，学制造炸药法于某日人，立互相鉴察之例，甚严。何君到上海，访孑民，密谈数次。先介绍入同盟会。次介绍入暗杀团。并告以苏君将来上海，转授所学于其他同志。其后苏君偕同志数人至，投孑民。孑民为赁屋，并介绍鍾宪鬯君入会，以鍾君精化学，且可于科学仪器馆购仪器药品也。开会时，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沥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乃教授制炸药法，若干日而毕。然能造药矣，而苦无弹壳。未几，黄克强、蒯若木、段□书诸君，先后自东京来，携弹壳十余枚。是时王小徐君、孙少侯君已介绍入会，乃由孙君携弹药至南京隐僻处，试之，不适用。其后杨笃生君来，于此事尤极热心，乃又别赁屋作机关，日与王、鍾诸君研究弹壳之改良。其时，费用多由孙君担任，而经营机关，则孑民与其弟元康任之。元康既由孑民介绍入会，则更介绍其同乡王子馀、俞英厓、王叔枚、裘吉生及徐伯荪诸君。徐君是时已联络嵊天台诸会

党，而金衢严处诸府会党，则为陶焕卿君所运动。孑民既介绍陶君入会，则乘徐、陶二君同到上海之机会，由孑民与元康介绍陶君于徐君，而浙江会党始联合焉。制弹久不成，杨君奋然北行，抵保定识吴樾君及其他同志三人，介绍入会，并为吴君介绍于孑民，言吴君将送其妹来上海，进爱国女学校。吴君后来函，言有事不能即来。未久而中国第一炸弹，发于考察宪政五大臣车上。孑民等既知发者为吴君，则弹必出杨君手，恐其不能出京。孙少侯君乃借捐官事北上，访杨君于译学馆。知已被嫌疑，有监察者。其后杨君卒以计，得充李木斋君随员而南下。

孑民既却《警钟》编辑之任，则又为爱国女学校校长。其时并不取贤母良妻主义，乃欲造成虚无党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识外，年长一班，则为讲法国革命史、俄国虚无党主义等，且尤注重化学。然此等教授法，其成效亦未易速就。其后，遂由中国教育会中他会员主持，渐改为普通中学校矣。

游学时代

孑民在上海所图皆不成，意颇倦。适绍兴新设学务公所，延为总理。丙午春，遂回里任事。未久，以所延干事受人反对，反又以筹款设师范班受人反对，遂辞职。

是时清政府议派编检出洋留学，孑民遂进京销假，请留学欧洲。无何，愿赴欧美者人数太少，而政府又拙于经费，悉改派赴日本。孑民不愿。而译学馆自杨笃生君出京后，尚未得适当之国文教员，章一山君延孑民任之，兼授西洋史。教授数月，颇受学生欢迎。

丁未，孙慕韩君任驻德公使，允每月助孑民以学费三十两。又商务印书馆亦订定，每月送编译费百元。孑民于

是偕孙君赴柏林。

在柏林一年，习德语外，并编书，又由孙君介绍，以国文授唐氏子弟四人。（每月得脩德币百马克。）第二年，迁居来比锡，进大学听讲，凡三年。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曾进实验心理学研究所，于教员指导之下，试验各官能感觉之迟速，视后遗象，发音颤动状比较表等。进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较文明史。又于课余，别延讲师到寓所，讲授德国文学。此四年中，编《中学修身》教科书五册、《中国伦理学史》一册，译包而生《伦理学原理》一册。

《中国伦理学史》，谓"《孟子》之杨朱即庄周，为我即全己之义，《庄子》中说此义者甚多；至《列子》"杨朱"篇，乃魏晋间颓废心理之产物，必非周季人所作。"又清儒中特揭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三氏学说，以为合于民权女权之新说。黄、戴二氏，前人已所注意，俞氏说，则孑民始拈出之。

孑民在来比锡时，闻其友李石曾言肉食之害，又读俄国托尔斯泰氏著作描写田猎惨状，遂不食肉。尝函告其友寿孝天君，谓"蔬食有三义：（一）卫生，（二）戒杀，（三）节用，然我之蔬食，实偏重戒杀一义。因人之好生恶死，是否迷惑，现尚未能断定。故卫生家最忌烟酒，而我尚未断之。至节用，则在外国饭庄，肉食者有长票可购，改为蔬食而特任，未见便宜。（是时尚未觅得蔬食饭馆，故云尔。）故可谓专是戒杀主义也。"寿君复函，述杜亚泉君说："植物未尝无生命，戒杀义不能成立。"孑民复致函谓"戒杀者，非伦理学问题，而感情问题。感情及于动物，故不食动物。他日若感情又及于植物，则自然不食植物矣。且蔬食者亦非绝对不杀动物，一叶之蔬，一勺之

水，安知不附有多数动物，既非人目所能见，而为感情所未及，则姑听之而已。不能以伦理学绳之也。”

教育总长时代

辛亥武昌起义，孑民受柏林同学之招，赴柏林助为鼓吹。未几，回国，于同盟、光复两会间，颇尽调停之力。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总长。是时，陆费伯鸿君方主任商务印书馆之《教育杂志》，曾语孑民谓：“近时教育界，或提倡军国民主义，或提倡实利主义，此两者实不可偏废。”然孑民意以为未足，故宣布《蔡孑民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谓“教育界所提倡之军国民主义及实利主义，固为救时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欲养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种哲学上之世界观与人生观。而涵养此等观念，不可不注重美育。”美育者，孑民在德国受有极深之印象，而愿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

孑民所谓公民道德，以法国革命时代所揭著之自由、平等、友爱为纲，而以古义证明之，谓“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孙中山既辞总统职，欲派员迎袁项城来南京就职，其资格须同盟会会员而又现任阁员者，以孑民为合格，故派之。此行人人知必不能达目的，然南京政府必须有此一举，遂往迎。及北京兵变，知袁氏决无南来之望，乃承认其在北京就总统职。孑民有宣言，见当时北京各报。

唐少川君在北京，拟南北混合内阁名单，仍以教育总长属孑民，而孑民力持不可，荐范静生君自代，已定矣。

范君时适在南京，闻讯，即行，并言决不承认。而外间不知因由者，且谓中山怪孑民不能迎袁来南，故褫其职。于是唐君仍商于孑民，孑民不能不承认矣。混合内阁中，总理已入同盟会，其他阁员，则自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四部外，皆非同盟会员也。同盟会员主用内阁制，以为事事皆当取决于国务院。而非同盟会员，主用总统制，以为事事须承旨于总统。于是最当冲之财政、军政大问题，皆直接由总统府处理，并不报告于国务会议。孑民愤然，谓不能任此伴食之阁员，乃邀王亮畴、宋遯初、王儒堂三君密议，谓宜辞职，仅由彼等组织一纯粹非同盟会之内阁。均赞成，乃以四人之公意告唐少川君，唐亦赞成。其后，唐君辞职，孑民等虽备受挽留，决不反顾。人或疑其何以固执若此，不知彼等已早有成约，且孑民为倡议人，决无唐去而独留之理也。孑民有宣言一篇，当时各报均载之。

孑民在教育总长任，于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外，特设社会教育司，以为必有极广之社会教育，而后无人无时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谓教育普及。又改大学之八科为七科，以经科并入文科，谓《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门，《诗》、《尔雅》已入文学门，《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门，无庸别为一科。又以大学为研究学理之机关，宜特别注重文、理两科，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云。

第二游学时代

民国元年夏，孑民既辞职。秋，遂偕眷属再赴德国，仍至来比锡，仍在大学听讲，并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二年夏，得上海电，以“宋案”促归国，遂归。奔走

调停，亦无效果，卒有赣宁之战。是年秋，孑民复偕眷属赴法国，住巴黎近郊一年。欧战开始，遂迁居法国西南境，于习法语外，编书，且助李石曾、汪精卫诸君，办理留法俭学会，组织华法教育会，不能如留德时之专一矣。

在法与李、汪诸君初拟出《民德报》，后又拟出《学风杂志》，均不果。其时编《哲学大纲》一册，都采取德国哲学家之言。惟于宗教思想一书，谓“真正之宗教，不过信仰心。所信仰之对象，随哲学之进化而改变，亦即因各人哲学观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谓信仰自由。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创之说也。

孑民深信徐时栋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随时考检，颇有所得。是时应《小说月报》之要求，整理旧稿，为《石头记索隐》一册，附《月报》分期印之。后又印为单行本。然此后尚有继续考出者，于再版三版时，均未及增入也。

其时又欲编《欧洲美学丛述》，已成《康德美学术》一卷，未印。编《欧洲美术小史》，成《赖斐尔》一卷，已在《东方杂志》印行。

为华工学校编修身讲义数十首，《旅欧杂志》中次第印行。

大学校长时代

五年秋，孑民在法，得教育部电，促返国，任北京大学校长。遂于冬间回国。六年一月，始任事于北京大学。其时北京大学学生，颇为社会所菲薄。孑民推求其故，以为由学生之入大学，仍抱科举时代思想，以大学为取得官吏资格之机关。故对于教员之专任者，不甚欢迎。其稍稍认真者，且反对之。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虽时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蔡元培口述传略

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而学生特别欢迎之，以为有此师生关系，可为毕业后奥援也。故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理，毫无兴会。而讲堂以外，又无高尚之娱乐，与学生自动之组织。故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堕落也。乃于第一日，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推广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之习。并延积学之教授，提倡研究学问之兴会。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以供正当之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讲演团等，及《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务社会之习惯。从前大学预科，自为组织，不求与本科第一年相衔接。于是第一步，解散独立组织，使分递各科。第二步，改为预科二年，本科四年，合六年课程，通盘计划，不使复重。

理科之门类既未全，设备亦甚单简，教室实验室，又无可扩张。而工科所设之门，与北洋大学全同，同为国立大学，京津相去又近，无取重设。于是商之教育部及北洋大学，以工科归并北洋，而以北洋之法科归并北京。得以所省工科之地位及经费，供扩张理科之用。

旧有商科，毫无设备，而讲授普通商业学。于是第一步，并入法科，为商业学门。第二步，则并商业门亦截止，而议由教育部别设完备之商科大学。

孑民之意，以为大学实止须文、理科，以其专研学理也。而其他医、工、农、法诸科，皆为应用起见，皆偏于术，可仿德国理工农、商高等学校之制，而谓之高等学校。其年限及毕业生资格，皆可与大学齐等。惟社会上，已有大学医科、大学工科之习惯，改之则必启争端，故提

议以文理科为本科大学，以医、工、农、法、商为分科大学。所谓分科者，以其可独立而为医科大学、工科大学等，非如文、理科必须并设也。（比较元年之见解，又进一层。）又现行之专门学校四年制，于适当时期截止。因日本并设各科大学与专门两种，流弊已见，我国不必蹈其覆辙也。在校务讨论会通过，教育部则承认此制，而不用本科分科之名。

孑民又发见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则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乃文科学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直视自然科学为无用，遂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各学，均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尤为自然科学之归宿，乃理科学生，以与文科隔绝之故，遂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又有几种哲学，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学，包有地质社会等学理。人类学，包有生物、心理、社会等学理。心理学，素隶于哲学，而应用物理、生理的仪器及方法。进化学，为现代哲学之中枢，而以地质学、生物学为根柢。彼此交错之处甚多。故提议沟通文、理，合为一科。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及教育调查会之赞成，由北京大学试办。

又发现年级制之流弊，使锐进者无可见长，而留级者每因数种课程之不及格，须全部复习，兴味毫无，遂有在教室中瞌睡、偷阅他书及时时旷课之弊，而其弊又传染于同学。适教员中有自美国留学回者，力言美国学校单位制之善，遂提议改年级制为单位制，亦经专门以上学校会议通过，由北京大学试办。

右皆孑民长北京大学博采众议励行革新之荦荦大端也。

国史馆停办后，仿各国例，附入北京大学史学门。孑民所规划者，分设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

国史两类。通史先从长编及辞典入手。长编又分政治史及文明史两部。政治史，先编记事本末及书志，以时代为次，分期任编，凡各书有异同者，悉依原文采录之，如马骕绎史之例。俟长编竣事，乃付专门史学家，以一手修之为通史，而长编则亦将印行以备考也。文明史长编，分科学、哲学、文学、美术、宗教等部，分部任编，亦将俟编竣，而由文明史家一手编定之。辞典，分地名、人名、官名、器物、方言等，先正史，次杂史，以次及于各书，分书辑录，一见，再见，见第几卷第几页，皆记之。每一书辑录竟，则先整理之为本书检目。俟各书辑录俱竣，乃编为辞典云。两年以来，所征集之材料及纂辑之稿，已粲然可观矣。

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之发刊词中详言之。然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遂有林琴南君诘问之函，孑民据理答之。其往复之函，具见各报，国人自有公评也。

蔡元培口述传略（下）

高平叔记

民国八年，青岛外交问题，激起空前之罢学风潮，首起于北京大学，次及于北京各校。五月四日，北大及北京各校学生有执旗示威举动，旗书“誓死争青岛”，“卖国贼曹、章、陆”等字样，并殴伤章宗祥，焚毁曹汝霖住宅。学生被捕者三十余人。北京十四校校长向警厅保释，先生以北大校长至〔自〕愿一人抵罪，均未允。五月九日，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历述伤人焚宅等事，且有将滋事学生送交法庭依法办理等语。先生颇愤懑，遂于五月十日上午八时出走天津，留递辞呈两件，一致徐总统，一致教育总长傅增湘，表明辞职之意，措词极为坚决，并在北京各报发表启事云“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惟知我者谅之！”

先生出京后，国人对上述启事颇误解，而于“杀君马”一语尤甚。有谓先生当段祺瑞内阁时代，有某种印刷物为段所忌；又谓先生主北大时，取学术自由主义，容纳新旧学派，为旧派所嫉；又谓学潮爆发时，政府有解散大学、罢免校长之主张，而一般旧官僚以此次学潮为北大倡导新学派之结果，咸集矢于先生；尚有望文生义者，谓“君”者指政府，“马”者指曹、章，“道旁儿”指各校学生。实则先生以为非自身离京不足以弥平学潮，外传云

云，均非事实。

先生离京数月，学潮方始平息。政府及北大教职员学生挽留函电叠至。彼时，先生在杭州，与北来友人等商定程序，先请蒋梦麟氏北上，继发表《告北京大学学生暨全国学生联合会书》。九月，返校。

九年十一月，教育部派先生往欧美考察教育，与罗钧任氏同行，罗氏考察司法。先至巴黎，法国教育部表示对于吾国学者之钦崇，特授先生荣誉学位，典礼极隆重。旋赴荷兰、瑞典、意大利、比利时、德、英等国。

黄仲玉夫人于先生抵巴黎次日在北京逝世，先生在瑞士撰祭文云：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得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如何耶！

我与汝结婚以后，屡与汝别，留青岛三阅月，留北京译学馆半年，留德意志四年，革命以后，留南京及北京九阅月，前年留杭县四阅月，加以其他短期之旅行，二十年中，与汝欢聚者不过十二、三年耳。呜呼！孰意汝舍我如此其速耶！

凡我与汝别，汝往往大病，然不久即愈。我此次往湖南而汝病，我归汝病剧，及汝病渐痊，医生谓不日可以康复，我始敢放胆而为此长期之旅行。岂意我别汝，而汝病转剧，以至于死，而我竟不得与汝一诀耶！

我将往湖南，汝恐我不及再回北京，先为我料理

行装，一切完备，我今所服用者，何一非汝所采购、汝所整理，处处触目伤心，我其何以堪耶！

汝孝于亲，睦于弟妹，慈于子女，我不知汝临终时，一念及汝死后老父老母之悲切，弟妹之伤悼，稚女幼儿之哀痛，汝心其何以堪耶！

汝时时在纷华靡丽之场，内之若上海及北京，外之若柏林及巴黎，我间欲为汝购置稍稍入时之衣饰，偕往普通娱乐之场所，而汝辄不愿。对于北京妇女以酒食赌博相征逐，或假公益之名以鹜声气而因缘为利者，尤慎避之，不敢与往来，常克勤克俭以养我之廉，以端正子女之习惯。呜呼！我之感汝何如，而竟不得一面以报汝耶！

汝爱我以德，无微不至，对于我之饮食起居、疾痛疴痒，时时悬念，所不待言。对于我所信仰之主义，我所信仰之朋友，或所见不与我同，常加规劝，我或不能领受，以至与汝争论，我事后辄非常悔恨，以为何不稍稍忍耐，以免伤汝之心。呜呼！而今而后，再欲闻汝之规劝而不可得矣，我惟有时时铭记汝往日之言以自检耳。

汝病剧时，劝我按预约之期以行，而我不肯，汝自料不免于死，常祈速死，以免误我之行期。我当时以为此不过病中愤感之谈，乃汝小愈，则亦置之。呜呼！岂意汝以小愈促我行，而意不免死于我行以后耶！

我自行后，念汝病，时时不宁。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舶中发一无线电于蒋君，询汝近状，冀得一全愈之消息以告慰，而复电仅言小愈，我意非全愈则必加剧，小愈必加剧之讳言，聊以宽我耳。我于是益益不宁。到里昂后，即发一电于李君，询汝近况，又

久不得复。直至我已由里昂，而巴黎，而瑞士，始由里昂转到谭、蒋二君之电，始知汝竟于我到巴黎之次日，已舍我而长逝矣！呜呼！我之旅行为对于社会应尽之义务，本不能以私废公，然迟速之间，未尝无商量之余地。尔时，李夫人曾劝我展缓行期，我竟误信医生之言而决行，致不得调护汝以蕲免于死。呜呼！我负汝如此，我虽追悔，其尚可及耶！

我得电时，距汝死已八日矣！我既无法速归，归亦已无济于事，我不能不按我预定计划尽应尽之义务而后归。呜呼！汝如有知，能不责我负心耶？

汝所爱者，老父老母也，我祝二老永远健康，以副汝之爱。汝所爱者，我也，我当善自保养，尽力于社会，以副汝之爱。汝所爱者，威廉也，柏龄也，现在托庇于汝之爱妹，爱护周至，必不让于汝；我回国以后，必躬自抚养，使得受完全教育，为世界上有价值之人物，有所贡献于世界，以为汝母教之纪念，以副汝之爱。呜呼！我所以慰汝者如此而已。汝如有知，其能满意否耶？

汝自幼受妇德之教育，居恒慕古烈妇人之所为，自与我结婚以后，见我多病而常冒危险，常与我约，我死则汝必以身殉。我谆谆劝汝，万不可如此，宜善抚子女，以尽汝为母之天职。呜呼！孰意我尚未死而汝竟先我而死耶！我守我劝汝之言，不敢以身殉汝，然我早衰而多感，我有生之年亦复易尽。死而有知，我与汝聚首之日不远矣。

呜呼！死者果有知耶？我平日决不敢信；死者果无知耶？我今日为汝而决不敢信，我今日惟有认汝为有知，而与汝作此最后之通讯，以稍稍纾我之悲悔耳！呜呼！仲玉！

先生在欧洲各国考察毕，于十年七月赴美国接受纽约大学哲学博士荣誉学位。旋遍游美国各大都市，为北京大学建筑图书馆向华侨募捐。是年十月，教育部电请过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会议，归国。

十一年，彭允彝氏长教育，时罗钧任氏忽以金佛郎案被逮，比开释，彭氏再请拘捕，罗氏又入狱，引起先生及蒋梦麟、邵飘萍诸氏不平。先生遂发表启事，表示与彭氏不能合作，悄然出京，住天津颇久，启事原文如左：

《易经》说："小人知进而不知退。"我国近年来有许多纠纷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酿成的，而且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势力。当民国七年南北和议将开的时候，北京有一个和平期成会，我也充作会员，会员里面有好几位任北方代表的，中有一位某君在会中发言道："诸君知道辛亥革命，清室何以倒得这样快？惟一的原因，是清朝末年，大家知北京政府绝无希望，激烈点的固然到南方去做革命运动；就是和平点的也陆续离去北京，那时的北京几乎没有一个有智识有能力的人，所以革命军一起，袁项城一进京，清室就同'摧枯拉朽'的倒了。现在的政府也快到末日了，且看他觉悟了没有？若是这一次他还不肯开诚布公与南方协议，那就没有希望了！我们至少应该相率离京，并家眷也同去。"我那时候听了这一番话，很为感动！当时的坏人，大抵是一无所能的居多，偶有所能，也是不适于时势的，他所以对付时局，全靠着一般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替他在衙署里面办财政、办外交等等，替他在文化事业上作装饰品。除了这几项外，他还有什么维持的能力呢？所以这般胥吏式、机械式的学者，只要有饭吃，有钱拿，无论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工具，如俗语说的"有奶便是娘"的样子，实在是"助纣为虐"，他们的罪，比当局的坏人还多

一点儿。

八年的春季，华北欧美同学会在清华学校开会，有一部分会员提出对于政治问题的意见，在会场上通过，我那时就问他们："我们提出去了，万一政府竟置之不理，我们怎么样？我个人的意思，要是我们但为发表意见，同新闻记者的社论一样，那就不必说了；若是求有点效果，至少要有不再替政府帮忙的决心。"我那时候就缕述某君的话告大家，并且申说："现在政府那一个机关能离掉留学生？若留学生相率辞职，政府当得起么?"此是我第一次宣传某君的名言。去年春假，教职员联席会议，因教育经费没有着落，请八校校长出席发表意见，我从前一年从欧美回来，不久即进病院，这一回算是第一次出席联席会议，我那时声明我的意见：说是教育费不发，教职员无论为教课上进行障碍，或个人生计困难，止须向校长辞职；若教职员辞职的多了，校长当然向政府辞职，我想这种辞职的效力，要比罢课包围教育当局还大得多。也缕述某君的一番话备他们参考，这是我第二次宣传某君的名言。但是我个人性质，是曾经吴君稚晖品评过，叫做"律己不苟，而对人则绝对放任"。我自己反省起来，觉得他的品评是很不错。我对于某君的名言，虽然是极端的佩服，但是除前说两次宣传外，偶然于谈话时传述过几次，却从没有用这种主张向何等人作积极的运动，不过自己向这个方面准备。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一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腾出一两点钟看看书，竟做不到了，实在苦痛极了！而这个职务，又适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所在的地方，止见他们一天一天的堕落，议员的投票，看津贴的有无，阁员的位置，禀

〔秉〕军阀的意旨，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选举是金钱的决赛，不计是非，只计利害，不要人格，只要权利，这种恶浊的空气，一天一天的浓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我们的责任，在指导青年，在这种恶浊空气里面，要替这几千青年保险，叫他们不致受外界的传染，我自忖实在没有这种能力，所以早早想脱离关系，让别个能力较大的人来担任这个保险的任务。

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的枝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几年来在校中设各种机关，完全以诸位教授为中坚，决不致因为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

到现在布置得如此妥当，我本来随时可以告退，不过为校中同人感情的牵率，预备到学期假中设法脱离。不意有彭允彝提出罗案再议的事件，叫我忍无可忍，不得不立刻告退了。罗案初起，我深恶吴景濂、张伯烈的阴恶，因为他们为倒阁起见，尽可用弹劾质问的手续，何以定要用不法行为，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剥夺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总统办事的糊涂，受一两个人的胁迫，对于未曾证明有罪的人草草的下令逮捕，与前年受张勋胁迫下令解散国会实在是同一糊涂。我那时候觉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要退的意思已经很急迫了。但是，那时候，这个案已交法庭，只要法庭能依法办理，他们倒阁的目的已达，不再有干涉司法的举动，或者于法律保障人权的主义，经一番顿挫，可以格外昭明一点，不妨看他一看。现在法庭果然依法办理，宣告不起诉理由了，而国务院乃竟提出再议的请求，又立刻再剥夺未曾证明有罪的人的自由，重行逮捕。而提出者，又非司法当局，而为我的职务上天天有关系的教育当局，我不管他们打官话打得什么样圆滑，我总觉得提出者的人格是我不能再与为伍的，我所以不能再忍而立

刻告退了"

先生以黄夫人逝世已逾期年，家庭状况不能不续娶，其择偶条件：（一）原有相当认识；（二）年龄略大；（三）须熟谙英文而能为先生之助者。先生属意爱国女学旧同学周峻（养浩）女士。周女士在先生主持"爱国"时，即来就学，又进承志、启明诸校；毕业后，服务社会多年，且素有出国志愿。先生当托徐仲可夫人介绍，（徐夫人前任爱国女学舍监，与养浩夫人善。）得夫人同意，遂于十二年七月十日在苏州举行婚礼。婚后，先生、夫人携同女公子威廉、公子柏龄同往比利时，夫人及女公子进不鲁塞美术学校研究艺术，公子入比国劳动大学研究工艺。

十三年春，夫人及女公子感于比利时研究艺术之不宜，改往法国，夫人进巴黎美专，女公子入里昂美专，公子仍留比学工。先生则往来于比、法两国间，照料夫人、女公子、公子学业，并襄助李石曾、吴稚晖诸氏办理里昂中法大学及华法教育事宜。

十三年秋，先生赴伦敦，与陈剑脩、黄建中、潘绍棠诸氏为退回庚子赔款之运动。旋得教育部电请赴荷兰、瑞典出席民族学会。该会专研讨哥伦布未发见新大陆前的美国民族问题。先生撰有论文一篇，由谢寿康氏译为法文送会。与会，遇德国民族学家但采尔教授，但教授为先生留来比锡大学时之同学，劝先生往汉堡大学研究（汉堡民族博物馆材料极丰富）。先生遂于十四年偕夫人赴德，在汉堡大学研究民族学。

先生于十五年二月依教育部电促返国。是时，先生尚未辞去北大校长。抵沪，适平津交通断绝，无法北上，乃留沪参加江、浙、皖三省联合会。该会系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之组织。浙江省科学院筹备处成立，推先生兼任正主任。是年冬，先生任浙江政治分会委员，赴宁波出席会

议。时北洋军阀在浙又占优势，分会委员分途暂避，先生与马夷初氏同往象山，又改往临海，再乘带鱼船往福州。

先生在福州及厦门两阅月，由集美学校借捕鱼船送至温州，又换船至宁波，再由宁波至杭州，参加浙江政治分会。国民政府成立，遂进京，参加中央政治会议，任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石曾、吴稚晖诸氏与先生提议设大学院以代从前之教育部，先生任大学院长，吴、李诸氏任大学委员会委员，试办北平、江苏、浙江三大学区。同年，先生又与李石曾、张静江诸氏提议设中央研究院及北平、浙江研究院，通过，由大学院呈准先设中央研究院，先生以大学院长兼任中央研究院长。

十七年五月，先生在大学院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集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人员、大学校长及专家七十余人，会期亘两星期，议案四百余事，凡教育上重要问题多得适当之解决。是年，政府改组，大学院改为教育部，先生不愿兼任部长，并辞去所兼任之监察院长及司法部长。辞函中有“去志早决，义无返顾”等语，先生一生难进易退，大抵如此。

先生自辞去大学院长、监察院长、司法部长，专任中央研究院长后，对国事仍异常关怀。二十年冬，与张溥泉诸氏赴粤，代表中央接洽和议，当邀同粤方代表孙哲生诸氏来沪，作进一步协商，结果颇圆满。二十一年，受教育部委托整理中央大学，叠次中央执监委员会全体会议，均出席发表意见。其它有关文化学术之重要设施，如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故宫博物院、北平及上海图书馆、伦敦艺术展览会，靡不参与，而于中央研究院，尤殚思竭虑，力图进展。二十四年九月，罗致全国学者组织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并举行第一次、第二次会议，规划推进学术

研究工作颇详。

先生“尚推想而拙于记忆，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颇欲研究民族学以终老，先生曾言：“我是一个比较的还可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自从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不知每天要见多少不愿意见的人，说多少不愿意说的话，看多少不愿意看的信，想腾出一两点钟看看书，竟做不到了，实在苦痛极了！”南来以后，烦杂更倍往昔，先生遂于二十四年七月，发表启事，声明三事：（一）辞去兼职；（二）停止接受写件；（三）停止介绍职业。抄录原文如左〔下〕：

> 以元培之年龄及能力，聚精会神，专治一事，犹恐不免陨越，若再散漫应付，必将一事无成。今自八月起，画一新时代，谨左列三项之声明，幸知友谅之。

一、辞去兼职

荀子有言：“行衢道者不至。”又曰“鼯鼠五技而穷。”治学治事，非专不可，余自民元以来，每于专职以外，复兼其他教育文化事业之董事及委员等，积累既久，其数可惊。“老者不以筋力为礼，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虽承各方体谅，不以奔走权门，创捐巨款相责，而文书画诺，会议主席，与及其他排难解纷，筹款置产之类，亦已应接不暇，衰老之躯，不复堪此，爰次辞去，略如左方，其所不及，以此类推。

中国公学校董兼董事长；
上海法学院校董；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董兼主席校董；

爱国女学校董兼主席校董；

苏州振华女学校董；

南通学院校董；

北平孔德学校校长；

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故宫博物院董事及理事长；

鸿英教育基金董事会及董事长；

环球中国学生会会员；

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

中国经济统计社社员；

中华慈幼协会会员；

国际问题研究会会员；

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

大同乐会董事长及副董事长；

音乐艺文社社员；

杭州农工银行监理；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监事；

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及董事长；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

二、停止接受写件

余不工书，而索书者纷至，除拨冗写发者外，尚积存数百件，方拟排日还债，而后者又接踵而至，将永无清偿之一日。今决定停收写件，俟积纸写完，再行定期接受。

三、停止介绍职业

事需人，人需事，谙悉两方情形者，本有介绍之义务。然现今人浮于事，不知若干倍？要求介绍者几乎无日无之，何厚于此，何薄于彼？一而二，二而三，以至于无

穷，偶有一新设之机关或机关之长官更迭时，则往往同时同处接到我多数之介绍函，其效力遂等于零，在我费无谓之光阴，在被介绍者耗无谓之旅费，在受函者亦甚费无谓之计较与答复，三方面损失，何苦而为之！近日政府有全国学术工作谘询处，社会有职业指导所，各报亦有“自我职业介绍”及“谋事者鉴”等栏，且现在各国失业调查及救济之方策，我政府亦必将采用，个人棉力，讫可小休！

二十五年冬，先生忽卧病，濒危者再，卒以诊治得宜，调养经年，渐告痊可，此后身体转弱，时愈时发。“八一三”沪战后，先生忧怀国事，每欲驰往国外，争取友邦同情。二十七年春，移居香港，二十八年迁往九龙柯士甸道新寓，又拟转入内地，襄理大计。笔者是年秋过港，先生犹殷殷以昆明相晤为期，言犹在耳！但以高年远行，不堪劳瘁，均未果行。同年，先生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撰会歌一首云：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

先生于二十九年三月三日在九龙寓所失足仆地，伤及内部，虽经输血手术，终以年高体弱，回天乏术，延至五日晨九时四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有四岁。遗夫人周养浩女士，子无忌、柏龄、怀新、英多，女威廉（二十八年逝世）、睟盎。先生得病经过有如王云五先生所述：

蔡先生年来息影香港，深居简出。去岁迁往九龙新寓后，更少来港。今年废历新正初四日，先生偕夫人公子等来港访谈，旋偕香港仔午膳，顺游浅水湾等处，游兴甚浓，精神亦健。本月（三月）三日先生在寓失足仆地，初

以为无碍，旋竟吐血一口，家人恐慌，即召医诊治，惟因时值星期假日，故所延西医朱惠康至午始到，并为加延马利医院内科主任凌医生会同诊察，认为先生年事已高，宜防意外，故即商定过海入养和医院，悉心诊疗。途中由朱医生及蔡夫人侍伴。入院后，详为诊察，脉搏如常，似无大碍，乃为注射止血剂及葡萄糖针。本人于蔡先生赴院前及入院后，均往探望，见精神尚佳，无可异状。四日晨十一时再往医院探望，闻蔡夫人言未续吐血，医师亦谓如不转变，或可出险。时蔡先生正睡着，故未与谈，即行辞出。

讵至午后二时，即接蔡夫人电话，谓先生病势转危，本人即往探视，知从肛门排血甚多，精神骤衰，且不甚清醒。急为先后延请李祖佑、李树芬及外籍医师惠金生、郭克等四医生，会同朱医生诊治，均认系胃瘤出血，恐难救治。初，各医均主施行输血手术营救，惟蔡夫人以先生年事已高，恐输血反应甚大，不能抵抗，故非至万不得已时，不愿施行。至是，以先生病势沈重，气息仅存，故不得已决定实行输血。惟时已深夜，原已验定之输血人遍觅不得，当时侍奉左右之蔡先生胞侄太冲及内侄周新，自愿输血，经赶往香港大学实验室检验，蔡君之血同型，乃即返院施行手术。在输血前，蔡先生已入极危险之状态，惠医生已断定无救。惟郭医生仍努力输血施救。输血后，经过良好，先生精神亦转佳，本人至今晨（五日晨）四时始辞出。当以输血收效甚速，故定今日（五日）再行二次输血。今晨八时，接医院电话知蔡先生又转危，本人即赶往医院，一面通知商务印书馆在职工中征求输血者，一面赶请医生急救，乃至九时四十五分，愿输血者数人赶至，未及施行手术，而先生已撒手长逝，痛哉！

科举时论

我不识能至否乎

疑大贤之至朝，欲证趋造之说焉。夫既曰趋，则孟子宜已至也；而直曰至，则孟子又未尝至也。此所以谓未识至否乎。意谓：我自见夫子之稍免于病，趋造于朝也，早知其有薄言至止者矣。顾程途可溯，知其一往不回，而迟速有分，未可悬揣而定，其已在廷耶，其尚在途耶，盖见在行者，固未见其止也。

病小愈而趋造于朝，夫子岂有不至者乎。

夫乘兴而来，尽兴而返，访友者既至而忽不至矣。兹也欲效王命，非同游目骋怀，则载欣载奔，何至自崖而反。

抑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求士者欲至而不克至矣。兹也欲造王朝，无虑途穷日暮，则时行时止，自将觌面相逢。

是夫子谅未有不至者矣，然当此之时，其果至乎否乎？使其在千里百里而遥，则悬而拟之，可识其不至矣。兹则地非极远也，接武布武，或已至殿陛之间。使其在十步五步之近，则悬而揣之，可识其已至矣。兹则地非甚近也，载驰载驱，或未至堂阶之下。

且使就道之时，去此不过顷刻，则此时之不至可识也。今也非为时无几，敢决其刺之未投。使遄征之候，到此已历留华，则此时之已至可识也。今也相去非遥，敢决其笏之已搢。至乎否乎，非我所得而识也。

如夫子而已至也，并坐鼓瑟，并坐鼓簧，固可幸其至

矣。然我则未敢决其至也。想人当跋涉道途，或遇信友而立谈，或过故家而入访，夫子其免此否乎？行止有殊，而情形难悉，我亦仅识其奔命之忱尔。

如夫子而早至也，以永今朝，以永今夕，固可乐其至矣。然我未敢决其早至也。想人当风尘奔走，或则间歇于半涂，或因困疲而缓步，夫子其异此否乎？早迟莫测，而意见难凭，我亦仅识其造朝之意尔。

若夫吾子反命之时，则夫子谅至于朝矣。

（1883年“山阴县”“二复”试卷）

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论

尝闻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斯固存诸心无待乎修，体诸身无所为悖，而以鬼神合其吉凶者也。乃圣人以下，有敬焉而几于圣人者，有肆焉而反乎圣人者。此其效判吉与凶，其功判修与悖，而其品本分君子与小人，如周子所谓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者是矣。试申论之。

或谓古之君子，履中蹈和，居仁由义，有凶而不吉者，夷齐饿于首阳之下，展禽终于柳下之名，颜渊好学，而贫而不富，夭而不寿，即如世之学问纯粹，而终身潦倒者，且至更仆难数也。天道福善，徒虚语耳。

且也，君子道消，斯小人道长，如春秋之盗跖，及后世贼民之相，篡国之臣，其邪僻则悖乎中，其暴戾则悖乎和，嗜杀则悖乎仁，妄取则悖乎义，而且得享其富，保其贵，以常生于天地间也。岂得谓悖之者之必凶耶？

而抑知君子修之，则后世必飨以俎豆，勒以碑铭，而即其人而想慕之，即其名而称道之，是千载流芳也。小人悖之，则人恨不得加以刀锯，刑以鼎镬，而特即其人而怨怒之，即其名而诟詈之，是万年遗臭也。穷君子者若以表其贤，福小人者若以厚其毒。盖君子不修，则穷不止于此；小人不悖，则福不止于此也。书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其谓是与。

（1883年“山阴县”“二复”试卷）

赋得弱冠弄柔翰得柔字五言六韵

弱冠才华具，毋将此笔投。读来书自富，弄去翰还柔。年尚垂髫也，人思脱颖不？生花时有梦，滴露节非秋。妩媚词应秀，纵横力自遒。挥毫歌史事，英气大冲留。

（1883 年“山阴县”“二复”试卷）

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穷理即以致知，致知诚在乎格物矣。夫物之理，必待乎穷也，穷理即以致知，不可释经之所谓乎。朱子补格致之传曰：吾所常接者物也，所欲知者理也。吾之知，在物之理而已。使不明物之为事，格之为至，而昧乎理之宜求，即昧乎知所由致，曾亦思理寓于物，而不得舍理以言知，所当因物以言致耶？

致吾之知，经所谓致知者也，然经必曰在格物者何哉？据以格为来之说，且谓物自来应，而理不待推矣。顾格物而解以坐致，则知先致，物后格，致与格且分两候也，安得谓之在也。据以格为去之言，且谓去其外物，以尽夫天理也矣。顾格物而解以物欲，则所致良，所格否，致与格且分两途也，安得谓之在也。

自吾思之，格者至也，物者事也，即物穷理，致知之功在是矣。

博雅者矜言考据，但有以稽其名，非所以穷其理也。苟吾而欲致其知，则不在繁称博引，而在乎致远钩深矣。物实焉而知以虚承，物散焉而知以一贯，是无时不穷其物，即无时不致其知尔。

训诂者自诩精深，第有以言其理，非足以穷其理也。苟吾而欲致其知，则不在浅尝浮慕，而在乎锤险凿幽矣。知不发而理感触之，知不广而理扩充之，是吾之知固在乎理，而吾之致，固在乎穷尔。

穷理而不知即物，几疑一物既穷，而他物可置矣。惟

切而指其所在，觉其物既接，即其理宜穷，随物而穷其理，随物而致其知也。纵物殊于吾，似理殊于知，而知属乎理，理属乎物，有不得舍物以言知者矣，而何勿念兹在兹哉。

穷理而不能即物，或恐万物是穷，而一物或遗矣。惟实按其所在，觉物无可遗，亦穷无可缓，物之理既可穷，而吾之知始可致也。纵理不在吾，似知非在理，而当知者理，寓理者物，有贵乎即物以求知者矣，而能不释兹在兹哉。

夫物者物有本末之物也，而知者知所先后之知也。穷理即以致知，经所谓致知在格物如此。

（1883年“山阴县”“四复”试卷）

赋得下笔春蚕食叶声得蚕字五言八韵

才士闱中集，淋漓兴正酣。生花方下笔，食叶拟闻蚕。响似承平奏，声疑雅颂参。雕虫当砚北，摛藻对窗南。战是文场竞，音宜绣阁谙。茧抽思欲苦，蠹饱味偏甘。共把蝇头写，谁将兔颖含。

（1883 年“山阴县”“四复”试卷）

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所为有未易言者，而使者足嘉矣。夫伯玉所为，几非伯玉所能言；而使者之言，乃不啻伯玉之言也，子固重许之。今夫形迹易见，心性难知，虽朋友犹多扞格也，况在载书赍币者乎。乃圣人知良友必有良使，而谘询者直勘诸性命之精；使者知传心贵揭深心，而奉答者直抉其精勤之志；一时问答周旋，觉圣人悬探而得者，使者以据实以陈，而结契之情，为之一快矣。

与之坐而有所问，子固知伯玉之使非常人也；不然，子岂以寻常使令之人可以语屋漏旦明之事，而贸贸然以何为问哉。

意以为知非之旨，生平共与观摩，今一旦介绍遥临，必有载惕厉之功，以期相质证者；赍币陈词，谅非徒奔走才也。使以性分之难窥，而不切谘诹，将我友之精神奚达。

阔别以来，功候久思进质，今一旦音书远寄，必有择贤明之士以代抉隐微者，日征月迈，度不难缕析陈也。试一叩以精神所专注，庶听其绪论，而故人之謦欬如亲。

何为一问？子固知使非常人也，而吾乃以观使者。

为著于同，为实据于独，倘使者掇拾浮言，漫夸时措，将所谓时然后言，义然后取，如公明贾之称文子者，未必非契慕之深情，而其言夸也，非伯玉命使者意也。

为见诸迹，为实根诸心，倘使者规摹迹象，而浑举名

称，将有谓言不离道，动不违仁，如宰我之论夫子者，未必非表章之至意，而其言浑也，非夫子问使者意也。

乃使者密勘其欲曰寡过，细审其欲曰未能，使乎，何善道伯玉乎！何善道夫子之所以望伯玉乎！

凡学问可以示人，而此欿然自视之心，独难窥测，使非积数年之气求声应，以直勘性情，终熟视无睹耳，而使者乃脉脉喻之也。纠虔何密，一举足如遇愆尤；策励何勤，一矢念常留缺陷，在伯玉冰渊夙凛，并未易告语同侪；而代白衷怀者，乃洞悉其曲折周旋之素，度非命使时所预为谆嘱者也，而不堪嘉许哉？

功业可以耀世，而独此退若不胜之意，不事张皇，使非积半生之惕厉忧勤而亲尝甘苦，亦淡焉若忘耳，而使者乃曲曲传之也。期复礼先以克己，注以全神；愈砥砺亦愈悚皇，断难满志。在夫子期望维殷，原以此悬为拟议，而代通欵曲者，已显揭其戒慎恐惧之衷，此并非询问时所可为骤料者也，而曷罄流连哉。

噫，何为一问？子固知其非常人也；特孰料其明敏之一至此乎，使乎！使乎！

（1889 年 9 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观圣人之言礼，不信之义益见矣。夫德如夫子，何难合夏、殷、商之礼而议之，乃以所用定所从，而不信之义益见。昔夫子教回为邦，行夏时，乘周辂，服周冕，说者谓因革损益，匹夫可以操南面之权焉。不知师弟之私言，制兼法古；而子臣之定分，义必尊王。试为追思遗训，觉往朝之制度渐湮，而昭代之声灵犹赫，虽欲不众趋则趋，而有所不能矣。

无德无位，不敢作礼乐，则从人之所作而已。顾吾思无德者，虽欲作而不能；恐有德者，因能作而妄作耳；亦思德莫盛于夫子乎。

夫子具内圣外王之学，材力远胜前人，使其酌文质之中，而特垂定制，有可自一世以至万世者，何事随时俯仰，读象魏而循束缚之规。

夫子承禹汤文武之余，法制既征大备，使其因沿革之失而略为更张，自必有尽美而又尽善者，何事与世推移，遵皇极而诵荡平之训。

然而夫子断断乎不信者，诚鉴于生今返古之弊也。盖曰者子言之矣，曰吾于夏、殷、周之礼，或说之，或学之，而不敢漫有所从也久矣。吾说夏礼，而贡赋之常经，会盟之遗制，大略犹可参稽，而欲其缕析条陈，则孙子已忘祖宗也，无可用，亦无可从也。

吾学殷礼，而贤臣之所献，彝器之所铭，古制犹存什

一，而实则人往风微，方策徒资诵读也，不足用，亦不足从也。

何也，夏殷已易为杞宋，而今所用者周之礼也，吾从周可矣。

使予生于夏而玉帛睹涂山之盛，生于殷而共球见下国之来，自必以夏礼尚忠，殷礼尚质，为循规蹈矩之常。而乃今之时何时也，禹甸畇畇，百亩已定成周之尺；汤孙赫赫，七庙已让后稷之灵；当王者贵，周室所以大一统也。使必异文雅之观，而漫敦古处，恐难免乎异言异服之诛。

使杞也未即东夷，关石和钧犹在；宋也尹兹东夏，象贤崇德依然；亦只以因于夏礼，因于周礼，为参互考订之资。而况今之势何势也，雅颂定于周制，而夏书惟传五子之歌；洪范附于周书，而商史不载九畴之训；功成者退，周家所以为独隆也。吾惟因风会所趋，而藉合时宜，庶咸遵乎无党无偏之道。

吁，赞易探乾元之旨，而连山归藏，系时不录；修史定春王之义，而夏时周月，聚讼无庸。观夫子之从周如此，而不信之旨益见矣。

（1889 年 9 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

有因卿相而动心者，反以疑大贤也。夫丑重视霸王，宜其动心于卿相也，而乃以之疑孟子乎！今夫游说之徒，贫贱则戚戚终身，富贵则扬扬自得，其心之倏忽变幻也，固无足怪；而一二敦笃者流，志愿虽大，学养未优，一旦居大官，膺大任，辄谓敢辱高位，以速官谤，而急遽张皇，莫之所措，亦所多有也。而公孙丑乃以疑孟曰，寻常酬酢之端，流俗亦能立决。而惟以目前之艰巨，猝焉相投，则苟非涵养在生平，鲜不震撼危疑，袖手而效旁观之状。

保障茧丝之任，圣贤素所鄙夷。而忽以意外之遭逢，脱然相赠，则虽经纶其素裕，鲜不忧勤惕厉，抚心而怀陨越之忧。

则请大其任曰齐卿相，大其志曰行道，大其效曰霸王，如是而夫子之心何如乎？

且夫隐士山林藏拙，明知此身一出，难为苍生仰慰仰望之心。故当谷有鸣驺，必欲以洗耳沈渊，预远他年之耻辱，此庸碌者之心也。不足以例夫子也。

英雄沈匿下僚，恒叹知我无人，难为虚士雪虚声之耻。苟或拔置钧轴，势必涕零感激，力抒夙昔之谋猷，此负才者之心也，更难拟夫子也。

丑所疑于夫子者，惟心之动否而已。

威武不屈，富贵不淫，夙昔久征抱负，卿相亦意中事

耳，何至张皇失措乎。而要其动吾心者非细也，纵横名法诸家，咸侧目而笑儒生之迂阔，倘一试不效，将愆尤丛集，欲补救而无从，此固奉令时所不觉踌躇者也。而夫子固无事踌躇乎？

饥易为食，渴易为饮，天下大有可为，霸王亦分内事耳，讵至迟疑莫决耶。而要其动吾心者甚微矣。燕赵韩魏诸国，咸举首而观新政之施行，倘必世后仁，将水火方深，恐挽回之不及，此又得志时所不禁顾虑者也。夫子固不至顾虑乎？

则动心否乎？

（1889年9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赋得涛白雪山来得来字五言八韵

忽讶山排雪，涛声入耳才。好将飞白拟，漫说送青来。所向天空阔，何从与溯洄。海门凭约束，地轴欲掀豗。浪孰乘风破，潮应带月回。喷时花皎皎，望去影皑皑。势欲吞沧海，音如听疾雷。曲江抒妙咏，谁是谪仙才？

（1889年9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道与器相因，而形上形下分焉，夫道即寓器，器必有道，然而道有立乎器之先者，形上形下所由分与。且古今惟太极之理为最先，而凡见诸阴阳卦画者，皆其后焉者也。是故浑沦磅礴，固难舍迹象以探性命之精，而发见流行，要必先气数而溯浑全之体，试一为对勘，而知连而属者，未尝不可分而观也。

易始乾坤，夫乾坤者器也，而所以为乾坤者道也，果何以谓之道而谓之器哉。

四象八卦之名，皆圣人所创造，而课虚叩寂，有不能无所凭藉者，一为推其缘起，而知苞符未泄，早有充塞于鸿濛开辟之时。

宇宙空气之境，皆至理所含濡，而气运发皇，有不能无所附丽者。一自衍为图书，而知精蕴所流，未必隐匿于拟议形容而外。

然则道也者，器之所从出也；器也者，道之所散著也；谓非一形而上、一形而下哉。

间尝习揖让之容，听瞽矇之奏，委曲繁重，初不解其防情节性之由。而一为推求，乃知性情之微渺，功德之高深，道固有据乎其先者，而节奏音容，皆其器之散见者也，而易可知也。

又尝探辅轩之什，考雅颂之音，博采兼收，初不信群怨兴观之益，乃一为寻绎，而知承平之气象，感慨之神情，道实有寓乎其间者，而连篇累牍，皆其器之见端者

也，而易何殊也。

*且夫屯蒙初辟，未有器，已有道，道与器岂无先后之分，而浑言上下者，以相为系属也。异学冥心坐照，几欲*舍名物象数，别探造化之菁英，而岂知离器言道，道且茫天津涯也，盖上与下固隐相贯注尔。

且夫制作既精，本道以为器，制器以载道，道与器似无彼此之异，而别言上下者，又难以浑同也。俗儒考据名家，几欲以摘句寻章，漫罄两间之秘奥，而岂知认器为道，道又涉于拘墟也，盖上与下又微分本末尔。

（1889年9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

观庶征之因时，泽及庶草焉。夫庶征者，阴阳之气，万物所托命也，备而有叙，虽庶草不亦繁庑乎。箕子若曰：今安得生逢隆盛，颂玉烛之和，占金穰之庆哉！想其时六府修，四时序，官阴阳者，既递嬗其长养生成之柄；托帡幪者，自遂其含和吐气之情；盖怨咨之声泯，咸若之化成焉。

既观稽疑，请陈庶征。

读封禅之文，茅三脊，木五尺，麦两歧，悉足以征治化，而其应无定也，惟即二气以定权衡，而消息往来，悉足为盛世验嘉祥之象。

考竹书诸纪，翠篁茁，丹萱生，屈轶指，亦足以征盛明，而其见犹后也。先即五行以分气候，而温舒惨肃，胥足为圣朝谱瑞应之图。

且夫庶征者，岂徒取一二不经见事，以涂饰后世人耳目已哉，必有为天地所由定，民人所由育，而万物之所由蕃昌者。是故优渥霑足，歌时雨也；（负暄献曝，爱冬日也；枯槁叶荣，燠即发也；蘼芑秬秠，寒则实也；）阜财解温，风之熏也。备当然之数，顺自然之时，而后和气协，嘉福臻，虽未尝承播种之力，经培植之功，如庶草者，已不禁曼衍而纵横也，而他可知矣。

夫蒹葭蒲苇，其生植类在湫隘之区，而协气所流，生机立应，况其在膏腴之土者也。想其时妇织夫耕，开农桑

之利；烹葵剥枣，采园圃之饶；丰亨豫大，气象可思矣。夫岂徒以雨属水、旸属火、燠属木、寒属金、风属土者，征顺应之序哉。

夫杜蘅芳芷，其秉质特偶分锺毓之灵，而天心既复，物力顿苏，况其秉二五之精者也。想其时介寿称觥，父老话桑麻之乐；呼群拾穗，儿童无夭札之伤；生齿殷繁，承平坐致矣。夫何妨以雨属貌、旸属言、燠属视、寒属听、风属思者，征天人之应哉。

（1889 年 9 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瑟彼玉瓒黄流在中

美与美合，可先观玉瓒之中焉。夫使非玉瓒，则其中非黄流矣。观诗所咏，不已见两美必合乎。且自凡物有贵贱，而人之授之者，第因物付物已耳。是故筐筥锜釜，盛之以蘋蘩；玉敦珠槃，奉之以璧币；授受之际，未有不如其分量者，窃因观裸体而有悟焉。

忆昔历下乡，过陇畔，见有饷东菑者，或寘诸囊橐，或携其箪瓢，或挈尔桮棬，问所饮食，大抵皆蒸梨炊黍之俦，其相与亦非偶然也。又尝登清庙，上明堂，见夫承祀事者，辨簠簋之数，登鼎俎之实，隆笾豆之仪，叩厥中藏，要无非酒醴牲牢之美，知相得乃以益彰也。

而不观玉瓒乎，韫于深山，锺毓既关天授；制其太璞，琢磨备极人工；玉之质，金之饰，抑何瑟然也。

于是有黄流焉，酒材辨五齐，馨香可格神明；柜鬯加一卣，明信可质祖考。流之黄，犹玉之瑟，宜在其中矣。

是不患无黄流之在中，特患非玉瓒也。且夫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世情多颠倒，安保无师心自用，漫以玉瓒为燕闲玩好之资。然而无是理也，冠虽敝必加诸首，履虽华必置诸足，特恐质本凡庸，遂一听其转移耳。不然，而责任既有专归，虽运会迁流，终难舍此他适也，而玉瓒其小焉者也。

且夫沈珠于渊，捐金于山，俭朴宗黄农，恐或有抱质以游，不复置玉瓒于荐币陈牲之列，然而有转机也，宝剑长埋，光气射斗牛之际；古书已烬，后儒多收辑之功，特

恐品非宝贵，将一听其捐除耳。不然，而精神不可磨灭，虽迭遇艰屯，断非一蹶不振也，而玉瓒其显焉者也。

嗟乎，君子当羑里弹琴，玉门演易，几如玉瓒之不遇黄流矣。然而岂弟者，未有不得福也。

（1889年9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公会齐侯盟于黄定公十有二年

记黄之盟，与齐睦也。夫夹谷之会，会而不盟，至盟黄而齐鲁睦矣，故美之。且定公时，鲁屡侵齐，鲁固不欲与齐睦也，齐亦不欲与鲁睦。自孔子用，而讲让型仁，文教达于四境，鲁人知构怨之非善策，而推诚相与也，于是乎有夹谷之会。孔子用而讲信修睦，义声达于四邻，齐人知观兵之难以制胜，而降心相从也，于是乎有黄之盟。

而或且贬之曰：叛晋。嗟乎，使晋不当叛，岂孔子而不直谏哉！使晋可称叛，岂孔子而无一言哉！斯时之晋，君弱臣强，柄政者叛大夫赵鞅耳。鲁不从晋，宜也，岂为叛。且使鲁必从晋，则将背夹谷之会，而修西鄙之怨，以致齐师伐我，我或不克，而晋救不至，遂将荡摇我边疆，焚掠我积聚，系累我人民，败坏决裂，不可复振，而犹鳃鳃然曰：我不叛晋，天下其孰谅之，后世其孰怜之。亦思黄之会，固大圣人忧深虑远而出此乎？

开国之初，同承王命，愿式相好耳，齐不吾仇，而我顾代为晋侵也，自离其咎也。乃夹谷之会，君有悔心矣。吾不乘转移之际而速之往会也，犹惧不终也，执玉敦而奉珠槃，庶矢勿谖乎？

争地之谋无益于事，徒苦吾民耳。吾欲求盟，而大国不吾许也，末如之何也。乃夹谷之会，齐有回心矣，君若惮跋涉之劳，而不与同盟焉，是启其疑也，执牛耳而载盟书，庶无相尤乎。

独是以齐之强，敌鲁之弱，而不亦欲盟者何哉？

中国有圣人，四夷重译而至；边庭有名将，敌人解甲而降，以境内之筹画周也。况夫子问政之对，获赞一辞，而一旦得假斧柯，既遥闻其移风易俗之才，复亲见其怀远招携之德，异闻创见，远胜于平仲无还之辈也。悔任用之不先，而愿结同盟，初岂怀文马舞衣之计。

少康之一成，鬲虞服命，文王以百里，虞芮质成，圣人之感应神也。况我鲁以同姓之宗，分封千乘，一旦更张繁弱，近则继夷宫之命，远则绍费誓之师，攘狄尊周，何足道齐桓晋文之略也。思效法而无从，而特为好会，犹是归龟阴郓讙之心。

自此终定公世，齐鲁不交兵，念此盟也，圣人之泽远矣。

（1889 年 9 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稷曰明粢稻曰嘉蔬

稷与稻之名，有取乎明与嘉者也。夫稷与稻，祭祀必需也，一正言粢，一借言蔬，非取乎明与嘉乎。且古来言黍必言稷，言粱先言稻，稷与稻亦祭祀所需也。乃因名缘饰者，既有取乎清洁之形，而假借形容者，若有取乎休祥之意，殊觉嘉谷告成，佳名肇锡，非沾沾于有铋其馨也。

则且由黍言稷，由粱言稻。

含中央之色，而备中和之气，其秉质有足贵者，故无论曰芦穄，曰蜀黍，曰红粱，无不可与以纯瘁精微之号。

秉太阴之精，而成南海之�，其赋性有足异者，故无论曰红莲，曰紫茎，曰青穟，几欲尽予以呈祥献瑞之称。

夫稷不曰明粢乎，顾或者谓粢与楶同，稷本别名为楶也；而实则粢之与楶，文固有小异者，意者纳禾则谓之楶，晶米则谓之粢，而所谓明者，从于豆于登后始见之也，未可知也。

夫稻不曰嘉蔬乎，顾或者谓蔬与疏同，稻之立苗欲疏也。而究之疏之与嘉，义有不相属者，意者陇畔或等于畦畔之疏，百谷遂偶厕于百蔬之列，而所谓嘉者，于绿葵红苋间特尊之也，未可知也。

而兹姑勿论，亦知其曰明粢曰嘉疏而已矣。

五谷皆历三时，而稷独经四时之久，雪霜之剥蚀，雨露之含濡，糟粕去，菁华萃矣。而况或舂或揄，或簸或蹂，洗濯更极人工也。食曰粢食，不凿者可嗤，盛曰粢盛，不洁者可恶，粢而先之曰明，直粃糠尘垢之无或留

也，祖考庶来格乎。

五谷恒喜高燥，而稻每生卑湿之区，汨没于泥涂，浸润于水泽，培壅厚，精力盛矣。而况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增益更多人力也。种曰嘉种，未成颖栗之形，禾曰嘉禾，偶见苯蓴之象，嘉而系之于蔬，觉硕大蕃滋之更可喜也，神明庶罔恫乎。

（1889年9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乡试第一问

论六经之用，礼乐为先，注三礼之功，康成为巨，其列学官有年矣，观其匡讹正谬，折衷古文，互证参稽，兼存旧注，精粹之说，有不啻孟子述井田之制，称班爵之规，足以为万世法者，非徒为训诂考据之学已也。至若许氏作五经异义，郑君驳之，不啻鍼墨守膏肓，而实则第五田税，第六天号，其篇次至今可考者，皆合礼制，不必有失而无得。杜子春为周礼大师，与郑司农并列，而考其遗说，郑颇不从，或各存其是，或互著其非，其梗概有可述者。礼经器物，周礼职官，多举汉仪以明周制。虽因秦制，或异成周，而诸所称述，尚未扞格，非以王莽之制，证周官之法者比也。明堂位夸于颂鲁，月令杂以秦制，非徒可疑者。然苟实事求是，果有可以考古制，诏后人，虽非经庸何伤乎。以郑注之精审，而时有未详未闻，是即多闻阙疑之例，盖奥义微言，非后学所能尽解；而方言古语，恐后世无可参求矣。至若明堂不只三名，禘祭或云七用，以及周礼之四声无商调，而郑注乃云三宫。或聚讼纷纭，或自相矛盾，所当一正其失者也。律有十二，还相为宫，则孔疏所陈，足伸郑义；律之度数，自起黄鍾，则康成所说，有异蔡邕，孰是孰非，可得而析矣。我国家考古礼，表绝学，通经之士，有不抗心而希古哉。

（1889年9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乡试第二问

闻史莫难于修志，班马所著尚已。嗣后作者踵兴，或因其制，或增其目，或异其名，或分而合之，或合而分之，欲以别创规模，自骋才力，而实则名异旨同，或反致繁复而可厌，且谲□而不经者。至若后世礼仪既备，史无不纪礼者，而迁《史》礼书，□亡而补以诸子。古时兵农不分，书无专言兵者，故班史兵志，大略仅附于他篇。范志阙而篇目可稽，袁志佚而篇目可引，至司马彪续志，荟萃众长，集前人之说，撷旧史之精，虽多阙佚，而其美乃时称于他说。考晋史十有八家，其有承遗佚之余，而尚可为收辑记载者，如王隐改志为记，何法盛易志为说，非等于疏佐循蜚之莫考也。守专门之学，杂采于记载之余者，如谢灵运之志职官，臧荣绪之志刑德，非若华黍由庚之无确证也。如《宋书》乐志，兼垂义训，若传赞之历论文人也。《齐书》州郡志，中有阙文，仅胜天象志之残阙无存也。《魏书》详于谱牒，则官氏之志，代北之姓宜搜；《隋书》出于名臣，则经籍之志，四部之分宜考。《新唐书》务为简古，其志较旧增多，而选举一门，语焉不详，失之太简矣。五代史记二考，甚多漏略，而职方一谱，因事分格，朗若列眉，其立例洵尽善也。至或书本无志，或志犹未备，苟得良史才以网罗补缀于其间，庶不悖知几言志之篇，而可与班马颉颃乎。我国家士风日上，宏博之士，经经者有不纬史哉。

（1889年9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乡试第三问

古者有国学，即有乡学。乡学者，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而惟周制为最著，教以三物，考其德行、道艺，三年则兴其贤能，自乡升之国，自国贡之天子，而天子又习之射宫，凡以化桀骜之气，兴礼乐之风，而以收得人之效者也。周之衰也，郑乡校虽不废，而青衿刺焉。逮战国，争攻击，尚游说，以及于秦，而凌夷极矣。汉兴，初未遑创制，及文翁建乡学，而武帝令天□郡国皆立学校。嗣后若何武、寇恂，若卫飒、任延，若李忠、秦彭，□所居民乐，所去民思，大抵以学校化民，继文翁之烈者，其事犹可举也。唐制，天下都督府生徒，各因州县之等第而定其数，想一郡一邑之人才，必有不止于此者，恐中的者少，点额者多。夫书院之设，于古未闻，宋兴之初，有白鹿洞、石鼓、应天、岳麓四书院，有司以上闻，辄为赐书赐额以优重之。然是时大兴学校，而天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员，殊非所以副振兴之意。考朱子白鹿洞揭示，有五教之目，为学之序，又有修身处事接物之要，道学诸儒，所相讲明而遵守者也。我国家尊儒术，重人才，凡列学校者，有不砥砺于廉隅哉。

（1889年9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乡试第四问

盖闻浙江开道学之传，源从关洛；周许实宏通之彦，派衍永嘉。其授受者有以继往，其创始者有以开来。嗣后若吴氏、薛氏、刘氏、戴氏，若林氏、郑氏，以及忠甫、居厚诸人，或父子，或叔侄，或兄弟，或师友，联镳接轸，源远流长。于是闻风起，接踵至者，如止斋潜室论学术，而绍危微精一之传；正则同甫论治术，而悉遵修齐治平之训，固非别参宗旨者也。他若横浦见讥朱子，慈湖本出象山，其言行何必非圣经贤传之遗。其流弊恐足为曲学异端之渐。惟倪思奉使、以过宫为请，樊光远上疏、以得地可忧，徐谊忤侂胄而贬官，徐侨斥弥远而见劾，忠谠之情，非叔孙之附汉武、马融之附梁冀者比也。若王自中、楼钥、林大中、袁燮之徒，或负奇气，或挺文辞，或著清操，或爱名节，其造诣有不朽者。东坡旧吟，伯厚尝诵；西山晚节，日抄所讥；大抵本前言以为后学之阶，即引往古以为来□之鉴。至于文安发奋，分义利于独行特立之交，阳明崛兴，□学问于经济文章而上。以徐横山之教良知，刘念台之讲慎独，无论陆朱之异旨，总期接洙泗之真传尔。我国家正学明昌，凡诸读圣贤书者，不皆证渊源而励气节哉。

（1889 年 9 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乡试第五问

夫汝渍被化，南邦擅风雅之才；泽畔行吟，屈子写离忧之作；或尊其名曰经，或据其体曰赋。诚不若扫除肤说，竟曰《离骚》。若夫合《九章》、《九歌》及《招魂》、《天问》诸篇，则注于王逸，是曰《楚辞》。嘉名锡以灵均，三后告以纯粹，训解虽纷，是非可辨。至若圜则九重，列星爰系，昆仑三角，阆风可登。至尊祀太乙之神，蕙肴兰藉；鼓乐记招魂之句，摇簴揳钟。他如岁纪摄提，周髀之遗经可考；形推南北，地形之顺椭堪稽。荃桡玉轪，舟车可以并称；紫坛药房，室宇何妨分解。靡蓱异形，岂仅琼支侑食；陆离异义，大抵玉佩锵衣。合袿结为双声，定调同为合韵，已开沈隐侯谐声琢句之风；知猖披为或体，读康娱为连文，可征许叔重会意象形之法。若乃蔓母托骚人之感，乃可征琱玉遗书；康回纪凭怒之词，遽载在兰台人表。改鹈鴂为鹎鹍，请注子云之句；编菉葹为菝草，允知仁杰之心。田堰祠荒，故宅起沧桑之感；搴兰揽茝，精英争日月之光。读者领略其曲折低徊之至意，有不徒过泥乎东涂西抹之寓言者矣。

（1889年9月浙江己丑乡试试卷）

廷尉天下之平论

盖闻《易》家之言曰：坎为法为罚为狱，兑为刑，夫辜略坎画右契水文，兑为坎象半见责义于泽，泽水所鍾也。孔子曰："水主量必平似法。"管子曰："水者，万物之準。"说者谓万物取平焉，故曰準。《说文解字》曰："法，平也；平之如水，从水。"又曰："準，平也，从水。"而《周书·立政》有准人，传家曰："準人平法"，谓士官撢捈赜动，稽课文字，祥刑要略，平而已矣。

汉张释之谓廷尉天下之平，洵饬法之格言、正本之谠论乎！寻尉之本义，从上按下，于文从又持火，申缯无所取之，盖取诸平。以巨为声，巨古夷字，夷有平义，亦合节也。夫郑国东鄙弊狱之官本曰尉氏，左氏所记，郦元所释，其义古矣。秦之廷尉，实胎郑义，汉氏仍之。景帝中年，更名大理。建元以后，遂复故称。

窃考汉世居斯职者，宣义、育围之属，昌嘉、信福之伦，并皆轶事无闻，法言鲜著，彼哉彼哉，何足选也。若张汤、朱博、杜周、王温舒之徒，又以武健严酷胜任愉快，匹由太师正律，司市谨权，而傎到重轻，以为标志；天下靡然从风，固其所也。惟孔光以练法令号称详平，而于定国决疑平法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由其洞明大体，子良心生，比事典文，便便无党。屠伯之流闻风而歛迹，端吏可为原心而定罪。言道德者遂以识职，释之曰：廷尉天下之平，壹倾则天下用法皆为之轻

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可谓言行合节，规墨亦世者矣。

客有谓杜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均廷尉也。"其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夫记刑之书，古名《八索》，索之言素也，空也，空设其法，无所用之云尔。出礼入刑，《春秋》大义；平国轻法，椇于《周官》。刑措不用，惟平之基。持刑枋者思释之言哉。

（1892 年 5 月清光绪壬辰科朝考卷）

审乐知政疏

臣闻巢襄以前，质素未九，士萌大朴，君相无为，官朝经论，寡可注录，烌雅百五，无闻焉尔。洎乎黄辛正位，伊姚嬗图，便章伦理，成相道宜，功兴万事，治周三世，旁和积顺，沂地昭天。遂乃声以同律，颂以行缀，匹膳合而能言，异重而邪许也。

天常帝功，葛天所为达，大化九原，夏道所由兴，七始五言，实会齐故之义，株离曼彧，乃宣在易之文，德广所及，陈南味于羽鞔，师儒得民，教国胄以德语，元委支根，察而可见。

至若步骤异道，驳粹殊方，山泽生龙，培娄无柏，度量远越，复不相蒙。是以端木论政，河间记乐，咸规斯义，斠量百王，而《小戴》裁曲台之礼，少孙补太史之书，重译曩言，广足余义，言之津津，勿可易矣。

彼夫道家者流，云曾李耳，墨氏之法，权舆尹佚，原出史官，多识故事，宜其老于觇国，知足睹微，而巨子传非乐之篇，庄生著乱律之语，殆由邹大无纪，籍谈忘祖者也。

夫三古盛时，乐章异重，五祀封禅，阳仪贡其正声，周官师胥，士夫任其专职，直宽刚简，乃申之以律永，和庸孝友，复道之以诵语，当王者贵，证明为易。

是以咸云章夏，图纬故其题目，风南雅颂，季子评其中失，晓泠神指，时邪名言。秦汉以后，经记不周，制窦所传，杜荀所定，见知见仁，未为中契。

大明大顺之作，高安理安之名，基命颂功，代有述造，核其本始，大都具文。谁复株春官之别子，阙治职之大经，匹由言为心声，仪以定命，此之不类，动生衅朕，斯先民之所详，近古之所忽也。而随文致鉴于陈词，平一腾讥于齐曲，和神定气，文中以颂昭德，金石谐婉，知古以占大庆，谈言微中，要为知音，今乐犹古，其揆一也。

圣朝治定功成，敦和章德，大蒙反踵，北户空桐，皆渐安乐之音，而湛con毚之化矣。臣谨疏。

（1892 年 5 月清光绪壬辰科朝考卷）

赋得江心舟上波中铸 得铜字五言八韵

舟放波心去，奇珍铸不同。长江澄作镜，造物巧为铜。鼓鞴烦苍使，张帆付碧翁。寒芒团雀舫，宝气烛鲛宫。竹箭流偏稳，菱花制倍工。金焦双影跃，水火一炉融。错道犀燃渚，何愁鹢退风。和鸣赓白句，陶冶荷恩隆。

（1892年5月清光绪壬辰科朝考卷）

殿试策论对

臣对：臣闻三代盛时，学昄于治，治派于官，官司职业，《周礼》备矣。帝王经论，于兹集成；诸子之书，权舆焉尔。楬橥山川，县土地域，以立城郭，是为形法家，出于职方形方之官。便章名位，课责实事，以定民志，是为名家，出于礼官。斢量道宝，要会政贡，以斛度支，是为农家，出于农稷之官。管钥权谋，稽检饵镶，以周武卫，是为兵家，出于司马之官。班固曰："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竟虑，以明其指，皆六经之支流。使其人遭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洵知言矣。

钦惟皇帝陛下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既以儒学为天下大经大本，而天网罗百家，以兴庶绩，诚所谓治无不贯矣。乃圣德质渊，符同道要，持帝典之克攘，益大易之嗛嗛。进臣等于廷，而策以地理、礼仪、食货、兵卫诸大政；如臣常桓，何足以备咫闻。顾惟小说家者流，闾里小知、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亦使缀而不忘；敢不一杼愚虑，敬傅刍荛狂夫之议乎？

伏读制策有曰："西藏屏蔽川、滇，为古吐蕃地，因地域广袤、考其山川道里。"臣谨案：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此形法家所长也。唐贞观八年，吐蕃弄赞遣使来朝，是为通朝贡之始。其地察木多曰康，为前藏。布达拉及大招寺曰卫，为中藏。扎木伦布曰藏，为后藏。极西曰阿里。是为四部。由中国入藏有三道，由打箭炉、内皆腹地外环土司为孔道。其幅员北界河源，南界大金沙

江，西距雪岭；东西六千余里，南北五千余里。元宪宗于河州置吐蕃宣抚司，于四川徼外置碉门等处宣抚司。世祖后置乌斯藏郡县，以吐蕃僧八思巴为大宝法王帝师领之，嗣者数世；弟子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明洪武六年以摄帝师为国师，给玉印。置乌思藏、朵甘二指挥司招讨使、万户所、千户所，以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领之。中藏今达赖所居，唐吐蕃建牙所也。其山冈底斯最大，在后藏达克喇城东北三百余里，即阿耨达山。《水经注》引《西域记》谓阿耨达即昆仑，杜佑云："吐蕃自云昆仑在其国中"，午相证明，斯不诬矣。其相近大山四：狼千喀巴布，达木楚克喀巴布，僧格喀巴布，麻布佳喀巴布。达木楚克喀巴布之阳，雅鲁藏布江出焉；而东南流入于南海。其西澜沧江有两原：一出格尔吉匝噶那山，一出巴喇克拉丹苏克山，会于义木多庙前，而东南流入于海。其西潞江出卫地喀萨北布喀鄂模，而南流入于海。由藏至天竺有两道：一自后藏西南经布鲁克至东天竺，一自阿里西南二千余里入厄纳特珂克，即中天竺也。我皇上功成度邑，典重厘方，固已作九共之书而陈盖地之图已。

制策又以五礼之目，宾居其一，因旁罗经记，以核其制。臣谨案：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名正言顺则事成，名家所长也。《周礼》大宗伯以宾礼亲邦国，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见曰会，殷见曰同，时聘曰问，殷頫曰视。朝、宗、觐、遇，则朝之别也。盖随其至之早晚而与为礼，故四时异名。旧说谓东方朝，西方觐，南方宗，北方遇，讹也。《书》云："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礼·王制》记云："五年一朝。"郑康成谓虞、夏之制，诸侯岁朝。《王制》所记，晋文、襄霸制也。《秋官·行人》六服与《周语》五服似异实同。说者曰：周之王畿，禹之甸服也。叙日以令祭，岁徧。侯服、甸服，禹

之侯服也，叙月以令祀，近者一岁，远者二岁，则徧。男服、采服，禹之绥服也，叙时以令享，近者三岁，远者四岁，则徧。卫服、要服，禹之要服也，叙岁以令贡，近者五岁，远者六岁，则徧。夷服、镇服，禹之荒服也，世一见曰王，此其义也。《郊特牲》旅币无方一节，为诸侯朝天子庭实之礼，他书可证，《左氏春秋》说庭实旅百，亦其一证也。至若朝位宾主之间，异说夥矣；以经记虒理之，古诸侯朝天子礼，《周官》以外，尚有遗篇，《大戴》记之。自秦罢侯置守，无复古仪。《通典》分为四目，通关古今，创立条流，于义当矣。我国家陈谟协虑，礼意周详，《王会》成书而旅巢作命，岂不祎与。

制策又以《周官》仓人主藏九谷，廪人主藏九谷之数，赒赐稍食，即今京通仓之制所昉，而详考其沿革。注谨案：秦有治粟内史，汉有治粟内史、大司农、搜粟都尉、治粟都尉。仓部郎之名始于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魏、隋皆有之。唐曰仓部郎中，五季宋同。明初置京通仓，以户部司员经理之。其时以尚书侍郎专督仓场，所属有坐粮厅之属。今制有总督仓场侍郎，其属有坐粮厅，以给事中御史各部郎中简用，二年而代。有大通桥监督，以各仓监督选充。有京通各仓监督，京仓十二，通州仓二，惟丰益、恩丰二仓由内务府遣官主之。余仓以内阁中书部院寺监属官选充，三年而代。官得其人，则夫偷漏之私，烂蒸之患，亦何难彻底清厘哉。皇上重农贵粟，卓跞汉京，太仓之粟充溢，而民人给家足也已。

制策又以三代之盛，寓兵于农，而以后世屯田之法为得其遗意。臣谨案：屯田之法，始于汉文帝募民耕塞下，武帝行之于西域，而屯田之名始立。车师、渠犁、乌孙、伊循之属，在今伊犁、辟展等处。武帝时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昭帝后又遣郑吉、田轮台并及车师，而都护之

名自吉始。傅介子屯于伊循，常惠则屯于乌孙，皆建奇功。而赵充国于神爵元年陈屯田便宜十二事，所云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居民不失农业，及省大费、戒不虞诸科，皆说论也。自是已后，六朝、唐、宋，或以民屯，或以兵屯。民屯者，规墨乎汉文；兵屯者，肇祖于武帝。语其治法，固皆有利而无弊也。皇上泽被垓埏，利详水地，将删商君之开塞，补《吕览》之审时已。

若此者，形法家不破碎；名家不謷；农家不鄙，兵家不变诈；诚升平之阶距，登咸之科律矣。窃惟诸家之书，宗义不同，而观其会通，百虑一致，相反而相成也。韩非子曰："君守始以知万物之源，治纪以知善败之端。令名自命，令事自定。有言者自为名，有事者自为形。形名参同，君乃无事。归之其情，群臣守职，百官有常，因能而使之，是谓习常。"臣伏愿皇上通万方之略，致知一之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因阴阳之大顺，因时为业，无所不宜。至于设官分职，各搴所长。习形法家言者，使之正方位，蠡华离。习名家言者，使之定考格，条家法。习农家言者，使之录民天，会国用。习兵家言者，使之经五事，度九地。康事兴功，布同日进。用以荡荷辛之失，农翼为之责，诒明㑇之义。会归有中，御衡不迷。则我国家亿万年有道之长基此矣。臣未学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不胜战栗陨越之至。臣谨对。

（1892 年 5 月清光绪壬辰科殿试策论卷）

面向新生活

我的新生活观

什么叫旧生活？是枯燥的，是退化的。什么叫新生活？是丰富的，是进步的。旧生活的人，是一部份不作工，又不求学的，终日把吃著嫖赌作消遣。物质上一点也没有生产，精神上也一点没有长进。又一部份是整日作苦工，没有机会求学，身体上疲乏得了不得，所作的工是事倍功半，精神上得过且过，岂不全是枯燥的么？不作工的人，体力是逐渐衰退了；不求学的人，心力又逐渐委靡了；一代传一代，更衰退，更委靡，岂不全是退化么？新生活是每一个人，每日有一定所作工，又有一定的时候求学，所以制品日日增加。还不是丰富的么？工是愈练愈熟的，熟了出产必能加多；而且“熟能生巧”，就能增出新工作来。学是有一部份讲现在作工的道理，懂了这个道理，工作必能改良。又有一部份讲别种工作的道理，懂了那种道理，又可以改良别种的工。从简单的工改到复杂的工；从容易的工改到繁难的工。从出产较少的工改到出产较多的工。而且有一种学问，虽然与工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学了以后，眼光一日一日的远大起来，心地一日一日的平和起来，生活上无形中增进许多幸福。这还不是进步的吗？要是有一个人肯日日作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人；有一个团体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日日求学，便是一个新生活的团体；全世界的人都是日日作工，

日日求学，那就是新生活的世界了。

（1920年10月《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上皇帝书

臣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臣非有言责也，而去已久矣，可以无言。虽然，臣有大惑不解者三，不白之而不快。敢贡其愚，请皇上有以解之。

传曰：得乎邺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国者，公司也，民者，出资本之股主也，天子者，总办也，诸侯也，官也，皆总办所自辟之分办也。彼股主者出资本以为公司办事之费，而总办之支应，分办之薪水，皆于是取给焉。秦汉以来，为总办者，日事乾没资本，笼络股主，而夺公司以为私业。及股主之稍黠而有力者出而恢复焉，大揉大搏，仅乃得之其于他股主焉，益巧其乾没笼络之术焉。转益多师，千障万翳，前之股主，固自居于总办之奴隶矣。皇上立二十有四年，而自悟总办之失职，乃于奴隶之中，择一二稍自知为股主者为分办，而商补过焉。不数月而忽请训于其母，其母而果知总办之职者与，请训可也。然而，其母者，不知有公司也，知有家业而已；并不知有家业也，知一身之娱乐而已。于是乾没不已而勒索焉，笼络不已而渔猎焉。以总办之贤若此，而忽欲借剑以杀人，此何为者也？臣所大惑不解者一也。

传曰：人臣无将，将则必诛，是何故也？曰：总办者，人人所托命也。彼谋杀总办者，殆欲绝人人所托之命，则人人得而诛之。若乃总办之父母，则犹是人耳。为股主者，以其重总办之故而推之于所自出，敬之爱之，是股主之优格也。其不及格而等夷焉，听之可也。其不但不

及格，而伤之杀之，则伤之杀之以偿可也。传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执之。夫杀人抵罪，则为人杀而亦抵罪已耳。前年八月，皇上所杀、所放、所锢、所追捕，不胜举矣。问何罪，则曰谋围怡和园也。夫怡和园者，岂公司机密之地、而公司人人之命所托与？乃总办之母之所居耳。夫总办之母之所居，则虽入其居，杀其人，则亦治以人与人相杀之律而已。未杀也而围，未围也而谋，而杀之、放之、锢之、追捕之，虽人与总办交涉之律，未有如此者也，而悍然为之，此何为者也？臣所大惑不解者二也。

传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又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盖前总办之卸其责于后总办也，问其能胜任与否而已，其人之与我为父子与，为兄弟与，为君臣与，皆不足问也。皇上自去年八月以后，既以病而旷职矣，欲有所卸，则择于其子，如禹之于启可也。皇上既未有子，则择之于兄弟，如挚之于尧可也；或择之于人人，如尧之于舜、舜之于禹，亦可也。乃不问有胜任之人否，而曰必归之穆宗毅皇帝之子，穆宗固无子也，乃曰吾取一兄弟之子以为之子，而使为总办也。其人而果胜任也，可也。然为九岁之童子耳，此股主之所必不信者也。且夫总办之父子相嬗，自夏以来，学禹而失之者也；虽不合公理，然而股主不责也者，曰总办之子，必其习惯于总办之事者也，如良弓、良冶之子之善为箕裘也是也，然而必问其贤否。我朝家法不立储，是也。若乃总办之接办者有人矣。因前总办之无子而为之立子，此一家之私事耳，不以干总办之职可也。然而为之立子、而必任之以总办，且必择其不胜总办任者而立之，又何为者也？此臣所大惑不解者三也。

此三惑者，非特臣不能解，盖我国人人所不能解者

也；非特我国，盖同洲之国，异种之国，亦无一人能解者也。敢请皇上明降谕旨，说其所以然，以排群疑，而坚圣□。则虽正臣妄言之罪而杀之，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1900 年 3 月）

夫妇公约

一、《礼》《中庸》记曰：君子之道，造端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大学》记曰：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夫妇之伦，因齐家而起。齐者何？同心办事者是也，是谓心交。若乃见美色而悦者，如小儿见彩画而把玩之，文士见佳作而赞叹之耳，是谓目交。心动而淫者，如饥者食，寒者衣耳，是谓体交。男子见美男，女子见美女，皆有目交也。两男之相悦，如娈童。两女之相悦，如粤东之十姊妹。皆有体交也。非限于男与女者也。然而，统计全球之例，目交之事，溥通也而无所禁。如握手、接吻之属，皆目交所推也。而体交之事，限于男与女者何也？曰男子之欲，阳电也；女子之欲，阴电也。电理同则相驱，异则相吸。其相驱也，妨于其体也大矣；其相吸也，益于其体也厚矣。相吸之益，极之生子，而关乎保家，且与保国保种之事相关矣。然而，异电之相吸也，必有择焉，何则？凡体者，皆合众质点而成者也。一体有一体之性质，虽析之极微，而一点之性质与一体同，此人与物之公例也。是故其体有强弱之差者，其所发电力有多寡久暂之差；其神志有智愚之差者，其所发电以成器之性，亦有灵蠢之差，此理之必不可易者也。其电力既有多寡久暂之差矣，而使之吸，则必有所不胜吸焉而驱之，其受驱之害也同。其所以成器者有灵蠢之差矣，而强合之，则必有纯驳之差。譬如熔两金而成器，其一金也，其一铁也，未尝不可范也，然而金者不易蚀，铁者易蚀，铁尽锈而金亦无以自立，即以

其金铁所占多寡之差为其器，坚□之差矣。合松与樗而构屋，松者不易朽，樗者易朽，樗朽尽而松不能支，即以其松樗所占多寡之差为其屋，久暂之差矣。是故男女质性不同者，其所生子亦与之为不同，及其所生子之生子也，又有不同矣。呜呼，此人之所以同种而渐趋于异者也。且也，驳性所生之子，其神志不完全矣，甚者，体魄亦不完全也。呜呼！体魄不完全，具耳目者皆知之；神志不完全，则我国所素不讲，而孰知夫弱国弱种之胥由于此也乎！世间夫妇，体交而已耳。目交而惬者，固已不多得矣。呜呼！家道之所以仳离，人种之所以愚弱也。男子之宿娼也，女子之偷期也，皆以目交始，而亦间有心交者也。野合之子，所以智于家生者，此理也。呜呼，世间男女，不遇同心之人，慎勿滥为体交哉。此关雎之所以求之不得而展转反侧者也。

二、既知夫妇以同心办事为重，则家之中，惟主臣之别而已。男子而胜总办与，则女子之能任帮办者嫁之可也；女子而能胜总办与，则男之可任帮办者嫁之亦可也，如赘婿是也。然妇人有生产一事，易旷总办之职，终以男主为正职。地球上国主，亦男主多而女主少。

三、既明主臣之职，则主之不能总办而以压制其臣为事者，当治以暴君之律；臣之不能帮办而以容悦为事者，当治以佞臣之律。

四、传曰：君择臣，臣亦择君。既明家有主臣之义，则夫妇之事，当由男女自择，不得由父母以家产丰俭、门第高卑悬定。

五、持戟之士失伍，则去之；士师不能治士，则已之，为其不能称职也。君有大过，反复之而不听，则去，为其不能称职也。既明家有主臣之义，则无论男主、女主，臣而不称职者，去之可也；主而不受谏者，自去可

也。

六、国例，臣之见去与自去者，皆得仕于他国。则家臣之见去与自去者，皆得嫁于他家。

七、所谓同心办事者，欲以保家也。保家之术，以保身以第一义，各保其身，而又互相保者也。

八、保身之术，第一禁缠足。

九、饮食亦保身之至要者也。当依卫生之理，不得徒取滋味而已。

十、衣服亦保身之具也。统地球核之，以满洲服为最宜，宜仿之。髻用苏式，履用西式。

十一、居处亦保身之要也，宜按卫生之理而构造之，且时时游历，以换风气。

十二、保家之术，以生子为第二义。

十三、生子之事，第一交合得时。

十四、生子之事，第二慎胎教。

十五、子既生矣，当养之，一切依保身之理。

十六、养子而不教，不可也。教子之职，六岁以前，妇任之；六岁以后，夫任之。

十七、教子当因其所已知而进之于所未知，以开其思想之路。

十八、教子当令有专门之业，以养其身。

十九、教子不可用威喝朴责，以养其自立之气。

二十、教子不可用诳语，以养其信。

二十一、教子当屏去一切星卜命运仙怪之谭，以正其趣。

二十二、保家之术，不可不谋生计。

二十三、有生计矣，不可不知综核家用，量入为出。

二十四、保家之术，当洞明我国现情及我国与外国交涉之现情，国亡家不能独存也。

二十五、保家之事，如此其繁也，则不可不惜时。男子之征逐也，女子之妆饰也，凡费时而无益者，皆撙节之。

（1900 年 3 月）

佛教护国论

孟子曰：人之为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国者，积人而成者也。教者，所以明人与人相接之道者也。国无教，则人近禽兽而国亡，是故教者无不以护国为宗旨者也。

我国之教，始于契，及孔子而始有教士。于时暴君代作，产国而奴人，恶教士之说护国而仇之，如陈、蔡、匡人、桓司马之属，其证也。孔子深循体合之义，乃危行逊言，取旧教之粗迹，略见真理端倪，以告于人人，而高等真理，则口授高第弟子，而不敢著于竹帛焉。及亡国，郁极而发，处士横议，民权萌芽，新学大兴，孟子乃敢以孔教第二真理大声而发挥之，而庄子亦以寓言道其第一真理焉。既皆不见用，而绝于秦，混于汉，孔子第二真理之徒，本体合之旨，以求容于世主，杂以当时俗学，如公羊、春秋是也。其后为利禄所扼，并旧教之粗迹而亡之矣。晋宋以后，郁极而又发，得所译佛经之助，畅述蒙庄，取其辨学而已，于真理未有得焉，此梁武王衍所以读庄、佛之书，仍背护国之理，以取灭亡者也。于时佛氏之徒，入君主之国，知真理之不见容，而思有以体合之也，乃造为布施功德之说，附以委巷不经之事，以求容于世之愚夫妇也。而后与扼于利禄之愚儒同，其差胜者，不臣于天子，而得自由已耳。然而为布施所扼矣，犹不能自存焉，乃造为经忏以市利焉，于是仍不得自由，而与愚儒同。而傅□、韩愈之徒，乃持愚儒所以媚君主者断断焉与

之争，而□□辈亦遂持愚僧所以媚君主者断断焉与之争，呜呼，真蛮触也夫！宋明之间，郁极而又发，儒者丙佛氏之心理以证孔教矣，然而见九牛之一毛耳，而又讳之深，以为不得于佛而自得于儒也。此陈恒之窃国也，知五百不知一十者也。终以不明，是以孔、佛并绝，而我国遂为无教之国，日近于禽兽矣。

然而吾读日本哲学家井上氏之书而始悟。井上氏曰：佛教者，真理也，所以护国者也。又曰：佛教者，因理学、哲学以为宗教者也。小乘义者，理学也；权大乘义者，有象哲学也；实大乘义者，无象哲学也。呜呼！何其似吾夫子与吾夫子之言。《论语》者，小乘也；《孟子》所推，权大乘也；《庄子》所推，实大乘也。《论语》、《孟子》、《庄子》所未详，吾取之佛氏之言而有余矣。且孔与佛皆以明教为目的者也。教既明矣，何孔何佛，即佛即孔，不界可也。井上氏又曰：纯一无杂者，佛教之种实也，以社会百般之文物为食，摄取于其体内，而变其种实中所包原形之质，而次第发育为数十丈之大干与几千万之枝叶也。此所谓进化而发达者也。

嗟乎！彼耶氏之徒，诮人之拜偶像，而不知其拜空气之同一无理也，袭君主之故智，称天以祸福人而恶哲学之害己也而仇之，是亦教之极无理者矣。然而耶氏之徒，能摄取社会之文物以为食，体魄甚恶，如猛兽也，脑质虽蠢，而逞其暴力，非寻常之人所能制也。况乎儒佛之脑质极灵，而又以文物为食者乎。痛乎哉，吾国儒佛之枵腹以死也。而耶氏者，以其电力深入白种人之脑，而且占印度佛氏之故虚也，浸寻而欲占我国孔教之虚矣。使其教而果真理与，则即耶即佛可也，即耶即孔可也，不界可也。然而耶氏之非真理，则既言之矣。

呜呼！儒佛之中，有能食文物而强大于体质以抵制之

者乎？儒之中，盖有知之者矣，然而儒者扼于世法者也，集网甚密也，资本无出也。譬之食也，设盛筵，张三席，耶也，佛也，儒也。其馔有美者焉，有益于体；有至美者焉，有益于脑。席各一豆也，耶者饱餐其美者而已，其至美者，不敢食焉。儒与佛之位，犹未有坐者，有无数恶犬焉，恐人食儒之食以饱心益力而制我也，则聚于其席之傍，伺来者而噬之；人或不畏其噬而来焉，则又无匕箸焉；佛之席则恶犬所不至，而匕箸又秩然焉。佛之教，昔所谓无君者。自唐以来，毁寺杀僧之举，未闻是恶犬不至之说也。恭读二十四年□月上谕，有因佛寺为学堂之议，是匕箸秩然之说也。学者而有志护国焉者，舍佛教而何藉乎？虽然，今之佛寺，则有不可不改革者焉。吾将游日本求导师而后从事焉。略举鄙见数事，以俟核定。

一、当删去念经拜忏之事，而专用意于教事。

二、当仿日本本愿寺章程，设溥通学堂及专门学堂。

三、当由体操而进之以兵学，以资护国之用。

四、禁肉食者，推戒杀义也，此佛教最精义也。何则？人之生本禽兽也，进化而已耳。人所以食禽兽者，岂不曰，彼愚而我知也，彼弱而我强也。然而，推此义也，则人与人固有知愚强弱之异矣，将亦智食愚而强食弱乎？呜呼，此白种之所以蹂躏异种人也。佛氏有见于此，故禁肉食。虽然，人固禽兽之进化者，而禽兽则植物之进化者也。植物不能动，而未尝无生性也。不食动物而食植物，非杀乎？且一滴之水，以显微镜视之，有无数微生物也，饮之者非杀乎？然则佛氏之不肉食，盖亦儒者远庖厨之义耳。既同此义，则不肉食可也，肉食亦可也。他日化学大进，能知动物益人之质皆可取之于植物矣，而后不食动物。厥后知植物若水之质皆可取之于空气，而后不食植物若水，则佛氏戒杀之义完全矣。今日者，虽援日本真宗之

例、而仍肉食焉可也。虽然，必依卫生之理，而不可苟以滋味为意也。

五、禁取妻者，乃迂僧恐生齿之繁，地力不足养之，唱此义以平争耳。不知社会进化，则生齿自减。观严幼陵所译斯宾塞氏之说可知也。他日进化之极，至于人纯以灵魂相接，无借乎肉体，成不生不灭之质，则无取乎男女之交，而取妻之风自绝矣。今日者，姑援日本真宗之例，不禁取妻焉可也。虽然，必依夫妇公约以从事而不可苟也。

（1900 年 3 月）

荀卿论

维周师儒，贤道得民，时无官表，名氏不彰。景敬之间，孔氏崛起，差等百王，译著六籍，揭日而行，亦世衷焉。七十二贤，颟若画一，绵褫六国，稍稍陵迟，邹峄老师，稷下祭酒，肇震董之，吾道干城，杰于华岱。孟纡救时之策，荀宏存古之烈，先后一揆，功足相埒，史公列传，各为题目，至精说矣。同门异户，伣于子云，择精语详，嗛于昌黎，孟书大明，而荀学绌焉。夫说诗逆志，丧礼末学，舜禹之事，理在不疑，班爵井田，闻其大略，孟氏所长，春秋而已，主于变文；从质为后，制作明经掌故，我则未暇乐正，孟仲厕名八儒，学派中辍。荀子极论礼乐，反复学修，大小戴记，资为邛靨，诗会韩毛，春秋左谷，推本兰陵，并有流别，赋篇成相，霧国风之附庸，脉京都之岷嶓，儒林文苑，是之自出，厥功巨矣。孟氏达情性之原，严义利之辨，操存梏，亡扩充，然达孔氏之门，功参殆庶。荀子以缮性为本，以隆礼为质，以积微为强，以解蔽为明，变化质气，克治私欲，有宋以来，儒先精语，多胎于是，说者谓陆王学派掇孟之真，程朱语录撷荀之粹，衡量功候，良非矫诬。而幡帑学案，拒陆之说，多于违朱。绳荀之篇，寂于申孟。乔抑无律，所未详也。诸子之原，推本官守，祖师著录，相生相成。及周之季，末流波靡，骜辟刻荡，蠭午并作，攻乎异端，先师所叹。孟氏立言，专辟杨墨，放豚入苙，归斯受之。荀子修儒效之本，推异家之长，正名议兵，富国天论，刑名从商，君

子必辨，固已括囊名法，陶铸兵农，而非乐诘墨应宋，非十子，解六蔽，正论世俗之七略，所云舍短取长，荀子有焉。夫其张皇经教则如彼，发挥道术则如此。此诚六艺之大师，百虑之要归也。而论者或摘其片言指为巨创，岂知韩婴外传不著非孟之辞，董生察名，未引性恶之说。流传别本，容有增加，韩非、李斯，固优为之。集矢本师，未为通论。若乃其父杀人报仇，其子行劫，苏子文致之辞，又其枝也，可无辨焉。

（1894 年据蔡元培手稿）

译　学

译学二别：一政界之事，一学界之事。周之时，有夷蛮戎狄之号，即有象寄译鞮之学，以任象胥掌客舌人之官，此政界之事也。孔子问官郯子而言天子失官守在四夷。《尔正》一书，或云托始周公，有释言一篇，而《论语》亦称雅言。雅者，夏也，此学界之事也。

政界之事，自汉以来，如南北朝，如宋辽金元，其尤著者，我朝开国即有俄罗斯之约，道咸以后，海口通商，交涉频繁，立总理事务衙门董其事，迭简出使大臣以驻于各国，而设同文馆于京师以储译材。盖前代外交极不平等，有岛夷索虏之诋，有输币称侄之嫌，一以为夷狄，一以为藩属，外信内虞，不能持久。至于今日，公法大明，苟其保自主之权，申善邻之义，国无大小，号曰对等。交涉上文野之程度，即为其国安危之所系。而我国职外交者，或通语言而昧政策，或究政策而绌语言，蛩驱相依，事多隔阂，此译学所以亟也。

学界之事，自汉晋以后，佛教西来，高僧大法，比肩接踵，缀文之士，靡然向风，译著经论，精微富有，而音义名义集诸书，亦复斟酌尽善，用能沾丐亦世，流布东邻。而孔孟遗书，智学一科，亦因是而发达。宋明诸儒，虽力讳自来，生木食木，而继迹俱在，不可掩也。自是以外，概乎未闻。有明之季，欧洲宗教流入中国，而挟测算之学以俱来。洎乎我朝，遂被简录，著之令申。近数十年，制造局、同文馆及广学会译印图书，而彼国理科法科

及历史之书稍稍传布。近五六年，侯官严氏译述西儒赫胥黎、斯宾塞尔诸家之言，而哲学亦见端倪矣。于时日本以同种同文之说强聒于我国，而和文汉读之法，适为我国学者之所知，于是理哲各学之书，博购广译，而国人思想遂非复向者骨董制造两派之旧矣。然而全国士流，能读和文书者，尚百不得一，能读西文书者，且千不得一，我国译学犹稚焉。且欧美各国传教于我者，皆学我国语言，日本近布佛教于各国，亦各以其国之语言译之。我以孔教立国，近有议设尊孔教会以布教于域外者，以宗教为学界之附庸，不尤重译学乎？

我国学者，类习英文，近则日文渐盛。其余国语，精者尟矣。要而论之，政界之事，既与各国交通，非分习各国语不可。学界之事，近虽以和文为捷径，然日本人所译西文书未为完备，近又在印权同盟之列，译本渐少，故彼国治专门学者，必须通外国语，以为研究参考之地。英文之书，视日本为备，然如科学、法律之类，亦有不及德、法者。惟是普通学校师资既寡，储费尤艰，且英、日两国之书，于我国普通学已有余裕。其专门外国语学，如国立同文馆、广方言馆，兼罗殊语，已见端倪。府县诸学，姑以英、日为界，亦因地而制宜者也。

（1901 年 11 月 11 日据蔡元培手稿）

释“仇满”

吾国人一皆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凡种族之别：一曰血液，二曰风习。彼所谓满洲人者，虽往昔有不与汉族通婚之制，然吾所闻见，彼族以汉人为妻妾而生子者甚多，彼族妇人密通汉人，及业妓而事汉人者尤多。江浙驻防，歼于洪杨之手，其招补者多习与彼族游处之汉人，此皆血液混杂之证据也。彼其语言文字，起居行习，早失其从前朴鸷之气，而为北方稗士莠民之所同化，此其风习消灭之证据也。由是而言，则又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然而“满洲人”之名词，则吓然揭著于吾国，则亦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纪号焉耳。其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额，一也；驻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之所生产，三也。其二其三亦在今日既为贫弱困苦、男盗女娼媒介，而亦适足为诊痴之荷，招怨之的。然自一方面观之，要不得不谓之政略上之特权。世界因果之应，不爽毫发，谚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也。其因之动力在政略上者，其果之反动亦必在政略上，故近日纷纷“仇满”之论，皆政略之争，而非种族之争也。

夫吾非谓最多数之汉族果无种族之见存也。所谓“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男降女不降”者，吾自幼均习闻之。而道、咸之间刻文集者，尚时存仇满洲之微文。粤西三点会以“洴”字为记号，示满清无主之义，持之已二百数十年，一泄于洪杨之事，而至今未已。此皆种族之见之

未泯者也。然洪杨之事，应和之者率出于子女玉帛之嗜好；其所残害，无所谓满汉之界；而出死力以抵抗破坏之者，乃实在大多数之汉族。是无足以证其种族之见之薄弱也。且往者暗于生物进化之理，谓中国人种，概由天神感生，而所谓蛮貉夷狄者，乃犬羊狼鹿之遗种，不可同群，故种族之见炽焉。自欧化输入，群知人为动物进化之一境，而初无贵种贱种之别，不过进化程度有差池耳。昔日争种之见宜若为之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者，则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盖世界进化，已及多数压制少数之时期；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此其于政略上，所以有“仇满”之论也。虽然，人之神经甚为复杂，被染于欧化者，非能尽涤其遗传性也，是以其动机虽在政略上，而联想所及不免自混于昔日种族之见。且适闻西方民族主义之说，而触其格致古微孔教大同之故习，则以“仇满”之说附丽之。故虽明揭其并非昔日种族之见而亦不承认也。然吾细剖解之，而见其重心乃全在政略上。何则，果其注重于种族上者，则其术不外两端：一曰暴动，二曰阴谋。暴动者，如义和团之恶洋人也，不问其为教士、为商人，见洋人则杀之。使以此术而仇满也，则今日之所谓“满”人者，自京师及东三省外，已殄芟无遗矣。阴谋者，如周之于殷，越之于吴。闻敌之治焉而忧，闻其乱焉而喜；遣谍者以间之，贻玩好以惑之。循是而论，则彼李莲英之惑溺，王文韶、张之洞辈之贻误；而各省官吏勒索赔款，公行贿赂，以为彼政府敛怨于平民者，皆足以动摇满洲人之基本，而为多数汉族之功臣！如张百熙之流，实心举行新政者，宜斥为助桀之民贼而诛之！至于满洲人中，如所谓光绪、肃王、醇王号圣明者，当行间而杀之！而如刚毅、荣禄则惟恐天去其疾，而图所以保护之！而汉族之稍有权

力者，宜遣辩士说以帝王之业，此皆阴谋 者之所有事也。要之无满不仇，无汉不亲；事之有利于满人者，虽善亦恶；而事之有害于满人者，虽凶亦吉。此则纯乎种族之见者也。而今之唱仇满者，其所指挥，所褒贬，一以吾前者云云相反。是非真仇满者也。

虽然，今之真仇满者，则有之矣。分为二党：甲党出于少数号为满人之中，袭“汉人强，满人亡”之论，而密图所以压制汉人者也。乙党出于多数汉族之中，欲请行立宪政体，奉今之朝廷为万世一系之天皇，而即满洲人以为贵族议院者也。乙党资章甫以适越，其售否固未可必。甲党之举动多类儿戏，其甚者为禁汉族学陆军于日本，如“杀一人，是一人”。是皆唤起多数汉人使之重入种族之梦者也。而两党相合之一点，在保守少数人固有之特权，此其仇满之策之中心点也。世运所趋，非以多数幸福为目的者，无成立之理；凡少数特权，未有不摧败者。且今日少数满人中，固有一、二开化者，然以与多数汉族中之开化者相比例，孰强孰弱，较然易睹。果率两党之策，是树此少数者以为众射之鹄，不使蹈法国贵族之覆辙不止也。

夫民权之趋势，若决江河，沛然莫御。而吾国之官行政界者，猥欲以螳臂当之，以招他日惨杀之祸，此固至可悯叹者也。而甲、乙两党又欲专其祸，以贻少数之满洲人，是岂非仇满之尤者乎？吾所谓仇满，固不在彼，而在此。

（1903 年 4 月 11 日《苏报》1903 年 4 月 11、12 日）

新年梦

公喜！公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真可喜！真可喜！这两句话，是一个支那人自号“中国一民”的，在甲辰年正月初一日午前六点钟，从床上跳起来对他的朋友说的。这几句话在这一日说的人不知多少，为何要记起来，这却有个缘故。原来那人是江南富家子弟，他自幼性情有点古怪，读书之外，喜学工艺，内地的木工、铁工都是旧法，无所不学，一学就会。到十六岁时，他就离家外出，把应得的家财产业，都任父兄料理，只带点川费，跑到通商口岸作工度日，兼学英、法、德三国文字。隔了三年，差不多三国的通行语都能说了。他又学了点西人的普通学，学了点西人的工艺，就要游历外国。他是最爱平等、爱自由的人，所以先到美国，又从美国到法国，因为专门学问德国最高，又到德国进高等工业学校，自己又研究研究哲学。那时候，俄国的民党在德国的很多，他时常与之往来，渐渐把俄国话学会了。卒业后，他到英吉利、意大利、瑞士等国游历过了，慢慢的到俄国去考察他们社会上的情形很详细，走西伯利亚回到东三省。又由北到南，循着几条河流，一处一处的考察过了，又回到从初次出门的通商场。那时候此人已经三十多岁了，他这十几年的旅费、学费，都是做工做出来的。从来不白要别人一个钱，从来不在无益的事情上白花一个钱。

他既然游历了许多地方，研究了许多年数，就下句断语道：“人类的力量，现在还不能胜自然，如瘟疫水旱的

事，终不能免。是因为地球上一国一国的分了，各要贪自己国里的便宜。国与国的交涉，把人的力量都糜费掉了，一国所以不能胜别国，不是土地失去，就是利权让人。因为一国中，又是一家一家的分了，各要顾自己家里的便宜，把人的力量都糜费掉了。如今最文明国的人，还是把他力量一半费在国上，一半费在家上，实在还没有完全的国，那里能讲到世界主义！先要把没有成国的人，都叫他好好儿造起一个国来才好。现在史拉夫人、支那人，都是有家没有国的，史拉夫人□造□国的，一天多于一天。支那人想的都少，还是天天自己说是中国人，中国人真厚脸皮吓！其实造个新中国也不难，只要各人都把糜费在家里面的力量充□公就好了！”他抱了这个主义，逢人便说。也□信的，也有不信的。

他到通商场，正逢日俄两国为着支那人的土地开战，一天总有许多警报到这通商场来。看这通商场的人，还是讨债的讨债，求人的求人，祭神的祭神，吃酒的吃酒，忙个不了，连那报纸都没有工夫看了。他问：“忙什么？”人家都说：“今天是除夕，明日是元旦，这是很大的节气啊！”他道：“呸！地球绕太阳一周，算是一年，不知道是那一天起的，这些三百六十五日里面，随便那一天，都可以当除夕、当元旦的，今天就值得这样看重么？况且闹的都是为一家起见，连那自己土地都送给别人做战场都不管，这真是家人罢了！要是有一天，从家人进一步到成了国人的资格，或者又有一天，从国人再进一步成了世界人的资格，有一番新局面，才可以有个新纪念啊！”他既然自己的思想与那外面的情形合不上来，他看着很不受用，长吁短叹的，跑回屋子里躺着了。

忽然听得很大的钟声，他就赶紧起来，跟着钟声的方向寻过去，寻到一所很大的会场，陆续有人进去。他到门

口，就有人问他姓名，把册子一查，请他进去，里边坐位是按着黄河、扬子江、白河、西江的流域分的，不过是河东、河西、江南、江北这些名目。约略把那语言风俗相近的合作一块，没有现在分省的话。每一标题总有几千或几百人先坐在那里，还有随时进来的。忽然钟声停了，就见有个人跑到坛上演说道："我们在这里的人，都叫做中国人，我们哪里配呢？我们意中自然有个中国，但我们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譬如日俄两国，把满洲做战场，我们算是'局外'。将来英、德把长江几省作战场，我们也是'局外'；英法、英日把福建、广东作战场，我们也是'局外'，'局外'到底了，连造新国的材料都没有了，那时候才是真绝望哩！如今第一次的'局外'，我们先打破了，以后就无可援例了，此次局〈外〉中立的宣告，何尝是我们的公意，不过几个糊涂东西，假冒我们的公意做的。现在世界自然还说不到全国一致，但多数人的主意总比少数人的主意强点。如今竟依着一两个人的主意，算做我们多数人主意，这仿佛一个店铺，被一个冒充管帐的人，私造印章，把货物盗卖给别人，等到别人来取货了，众人都知道了，哪里能答应呢？但是我们要不过打个电报，做篇文章，是不中用的。一定要有实力，把这冒充管帐逐了，还要与取货的评理。评理不下来，就要开战，开战也没有什么难处，要有当兵的人与那养兵的饷，还都是我们现成有的，不肯公出来罢了。所以不肯公出来的缘故，总是另外还有个家当，把他眼光打定了，看不到这个大家当啊！譬如一家人家，盗来打劫，就是把他们金银文契统统劫去，这些小孩子一定不着急，等到顶心爱的玩物要劫去了，他就拼命的要夺回来，殊不知道有了金银文契好买多多的玩物，兼且金银文契既然劫去，人也要饿死，那里还能玩这玩物呢！如今爱家不

爱国的，就是小孩子这般见识。况且他就明白一点，也说我就拼命，别人都坐视，仍然不中用。我就公财，反给别人做私财，我白白自家吃苦，所以不干啊！照此情形看来，并不能专说人心不好，实在有许多老法子，把他束缚住了！如今要把老法子统统去掉，另定一个章程：一个人出多少力，就受多少享用；不出力的，就没有享用。叫他那因果丝毫不差，那自然人人着力了。”说到这里，就有好几位干事发出许多小册子来，每人一册分给。坛上的人又说道：“诸位都是各地方公举的代表人来议法的，如今我们提出这个议案，诸位赞成不赞成？”这位“中国一民”也恍恍惚惚记得他的家乡果有公举议员的事，他果是代表着来的，就把这册子细细看下去。里边应办的事分作五纲：

（一）调查：又分作两款：

第一款是地：如山向河流晴雨气候这些，如地皮的物产，地心的矿产和那水流，空气里边可以化分的材料。

第二款是人：这地方年在七岁以下者若干人，七岁至十六岁者若干人，二十四岁至四十八岁者若干人，四十八岁以上者若干人（岁数皆以生后历地绕太阳一周为一岁），已受教育与未受教育者各若干人，有职业与无职业者各若干人，聋哑瞽目废疾病癫者各若干人。

（二）区划建筑：先划定铁道、航路，然后划种植场、畜牧场、学校、工厂、烹饪所、裁缝所、公众食堂、公园、医院、公众寝室、男女配偶室、孕妇胎教室、育婴院、养老院、盲哑学堂、盲哑废疾工厂、积货所、运货场、图书馆、歌舞场、议法院、统计所、公报馆、裁判所。

（三）职业：分作两款：

第一款，是普通职业，有变化原料的，如种植制造这

些事；有移动货物的、如开矿运货这些事。从精神上用变化移动等手段的，如教育书报歌舞这些事。有专门除害的医疗裁判这些事。

（四）每人一生的课程：七岁以前是受抚养的时候，七岁到二十四岁是受教育的时候，二十四岁到四十八岁是做职业的时候，四十八岁以后是休养的时候（但休养时亦可兼任教育等事）。

（五）每人一日的课程：二十四时间，做工八时，饮食谈话游散八时，睡散八时。

其中还说各种方法，各种子目，各种变通的手段，都载在册子上面。各人看了一遍，那坛上的人问道："诸位都看过了，有看得不妥当的，请表明意见。"就有一个人站起来说道："这个办法是好极了，但现在各人做的职业，都是为自己利益，所以最辛苦、最艰难、最危险的事有人肯做，因为做成了，他的利益比各种职业都大啊。如今一个人只要有一个职业，那利益都是一样。哪个人不挑着容易的做！从此最辛苦、最艰难、最危险的事，没有人干了，世界就怕没有进步了。"坛上人说道："这到不容虑，人的做工于他身体上、精神上不相宜了，才要偷懒。要是很相宜的，就硬阻止他也阻止不了。譬如眼是能看的，硬教他合着不看，可以么？耳是能听的，硬教他按着不听，可以么？呼吸是肺的利益，鼻子偏替他做工，食物是胃的利益，口舌替他效劳。我们国里面有这几等做工的人，就同身体上五官四支只要不误用，就好了。所以卫生部、教育部是最重要的，把身体上、精神上细细的检查，有从遗传性来的，有从习惯上来的。国里面有一种职业，总不怕没有相宜的人。至于工艺一门，最重的是制造机器。凡有危险的事，都可用机器代做，不过辛苦艰难是有的，照变通办法的条例，费力多的职业，每日并不必限定八时，这

就不相妨了。”于是满场的人都拍手赞成。又有一个人站起来说道：“事情是可以照办的，但怕现在还有点阻力，如从前在那里冒充管事的，与那有家私的不免执迷不悟，设法阻挠啊！”坛上人说道：“诚然，但诸君都是代表公众的，诸君赞成了便是公众的意见。现在办事总是多数的压制少数的，要是有人为一己的私计来阻挠公众的事业，这便是公敌了。古人说得好，‘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我们也只好下点辣手了。现在各地方的无线电报，都已造成，诸君既已赞成，我们就电报各地方，设起统计所、裁判所来，一切事都好着手了。但现在外交上却有特别的办法，也可以请诸君斟酌斟酌”。于是干事又发出一套小册子来，里边说的，分作三款：

（一）恢复东三省：支那的兵并非不能战，他们不知道是为自己战，单算是替雇兵的人战，所以有“养兵千日，用兵一朝”，还有“朝廷不使饿兵”这些话。偏偏粮饷很薄，统领又要刻扣他，这是难怪他不肯拼命。便是统领明白点的，也还有许多人牵制他。如今牵制的是去掉了，昧心的统领也换掉了。他们见了新定的国法，知道这个土地既就是自己的产业，自己担任了当兵的职业，不但粮饷无忧，就是从前须牵挂的父母妻子，也不要自己瞎操心，还有不拼命的么？兼且国法改变以后，马贼也来归附，居民都告奋勇，又有各地民兵，陆续可以接力，陆军势力很可打退俄兵。我们就应立刻与俄宣战。海军单靠几只老朽兵船，原不中用，但这时已有在英国海军卒业生回来，驾驶起来也可以捕拿俄国的商船，替日本做个声援。一面派外交家到日本订约，海战兵费统归我们济助，日本正苦经济困难，没有不乐受的。那就日本海战的功，我们分他一半了。一面派曾在俄国大学肄业的人，暗入俄国各地运动民党，推翻政府，三面夹攻，满洲还不能收回么？

（三〔二〕）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这件事，他们本来靠造铁路、开矿山两种手段。我们国法改变以后，国中的人彼此并没有尔我的分别，对了〔于〕外国，我国与尔国，到分得十分精细了。果然是外国人的资本，那就本地的小工都招不到一个，一面与那外人商量说："从前的合同，本不是文明办法，现在公众不答应，无可设法。"就还他资本，多贴利息。把从前的合同都废了。他们已经造的、开的，都用价购回了。

（三）撤去租界：国法既改，国中只有输运货物的一种职业，并无所谓营商。只有本国赢余的货物，要卖给外国人；国中缺少的东西，要向外国人买进，还有点通商的旧套。但也是一国公共的商店，与他们交涉。没有私人与他们营商的。他国人来往的货物，差不多每年都有定数，外商没有竞争的路。况且租界上住的支那人，不是回家乡，就是联合自己同国的人，照那国法办起来，只要有点力气，不愁没有事业，就不愁没有衣食，哪里还肯做买办、做通事、做西崽，仰外人的鼻息呢！外国人既不来，支那人文明程度又高了，外国领事竟没事可办。况且支那人在外国的，除了留学、游历与外交三项，知道新中国的国法，不是也照国法办，就是回国。在外国的领事，都用不着了。照这许多的方面看来，外国还能留个领事来占着租界么？我们也就给他几个钱，把租界赎回来。以后外国，除了游历、外交两项人外，那就要遵我们的国法，才准他住哩。

各人看了这几条，就有人站起来说道："他们外国人是讲强权，不讲公理的。对付俄国的法，倒罢了。后面两条，他们就执着从前的条约，说是你不承认接续下去，他们就不认你为国，就趁机会用兵力来压制，这什么好呢？"坛上人说道："这一层，我们也虑到，要讲军人，我们的

纯乎爱国心，他们的不过一半爱国心；讲技艺，我们有德国陆军学卒业生若干人，英国海军学卒业生若干人，他们各人都有练成党徒若干人，不怕落人后了。枪炮弹药我们从前预备的，与新制造的，也还够用。就是没有兵舰，自己虽有能造的人，怕赶不上。到外国去购，又是与俄国开战的时候，也办不到。打算派人到各国大厂，把他们将要造成的用重价购定，同日本购春日、日进的样子，到战事一了，就驶回来；要是再赶不上，那就没有法子。只好用点辣手了。现在我们造的水底潜行舰，空中飞行艇，不到三个月，就可用了，他们战舰来的时候，我们或从水底骤放潜雷，或从空中猛掷炸药，他们虽有多多铁甲，也都化作齑粉了。但此法太狠，他们舰中的人，一个不能生活。只好临时应应急罢了。平日我们还是主张用陆海军彼此攻击，伤人较少，所以特别课程，还有当兵一门啊！”说完了，又有一个人站着说道：“法子是都有了，我还怕一层，照这样办法，要花好多的钱，我们现在还赔款，行新法，不是处处都说没有钱，到处搜刮，还搜刮不出来么？如今又要助饷，又要购船，又要赎租界，这个钱止〔至〕少就是几千兆，请教你往那里筹呀？”坛上人说：“我们支那人并不穷，有许多人藏着钱，不肯拿出来归公中用，反要把公中的钱刮回家里去，公中不够用了，专向穷人搜刮，所以显得穷了，如今且阁着物产矿产不算，先将拿出来就可作钱用的说，凡有这些冒充管事的，号称富人的，他们藏在家里，窖在地中，存在外国银行，这些钱统统计算起来，照四百兆人匀派起来，虽然不能照英国的每人派到二千八百五十四元，或美国的二千二百八十二元，但是俄国的每人五百五十二元，日本的每人二百三十九元，我们总不见得比不上。那就不是五千垓，也就一千多垓。照现在的国法，国里面用不着金钱，这些钱都用在外交上面，还

怕不够么?”大家一想，果然有这个道理，就都表明赞成的意思。那个人就点首下坛。另有一个干事登坛声明，国法业已决议，就是此时散会。那会员就陆陆续续的散去。

这位“一民”先生也就出来了。他也忘了本来的寓所，随信步出去，不知不觉的到了一地，见有一所大房子，是题着中国各地方议员寓所，里面也是按着议场的区域分的，每一区域里面都有公园、食堂、寝室、书楼、阅报室、谈话室。这些与那小册子上说的差不多。便是议员在这时候，每日讨议国事，就是他的职业。所以有个讨议所。他的外面都有无线电报可以通到地方上统计所的，就渐渐得到各地方电报，报道新定的国法上，中流人是不用说的了，就是下等社会，他因为有许多小说、唱本、演说坛、戏院，都就他们平日顶羡慕的，顶嫌恶的，顶忧愁的，顶怕惧的，反反复复比较苦乐，联合因果，就他们知识，发见有一线光明的门径，尽力的感动他。又先造个模范村，先教上流最明白的人实行起来，给他们看，所以也没有一个人不赞成了。止有几个冒充管事的、向称富翁的，同发狂一样，硬要设法阻挠，开导他，也不理会。就在地方议会评品起来，断定是有罪。送个状子到裁判所去，等接到裁判所定罪的复书，各地街市就都揭着某人有某罪，即击死的宣告了。那时候某人也就立刻被雷击死，身上也印着“某罪某刑”这几个字，真是同俗间传说的雷公击人一样。这全是裁判所驾驭电气的手段，他没有定罪的时候查察很详细。也有情节可疑，与议会驳辨的，等到定罪就立刻宣告，立刻动刑。兼且神出鬼没，防也没法防，躲也没处躲，初初一个人死了，还说是偶然的；等到两个三个都是这个样子，那些反对党真是住在空屋子里，还是十目视他十手指他的样子，皇恐的了不得。听说守法的人，实在快乐，也就慢慢的投降了。统计从北到南，曾

受死刑的也不过一、二百人。因为内中有几个是顶有名的阔老，平日巴结他的、保护他的不知有多少人。等到裁判所定罪之后，竟没法免死，所以感化的很快，不到一年竟做到全国一心。一切办事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那些预定的事，竟是如心如意的办下去。这是说他究竟的话。并不是这位“一民”先生整年住在寓所，都从电报上得这种消息啊。因为“一民”先生从第一次会议后，不多几日，就被派到俄国运动民党。那个议员的位置，地方别举人补了。俄国的事，果然不出所料，在几个月内，他们民党也全胜了，满洲也收回了。

“一民”先生从俄国回来，就在他的家乡所设工厂办事。那时候因外交上第二、第三的两件事，果然有好几国不答应。他们平日看着支那这片大陆温和丰富，真同天国一般。住在上面，又是些劣等动物，好像犬马牛羊，不是替人代劳，就是受人宰割，只知道自己队里，你咬我，我咬你，从没有抵挡外人的力量。又巧巧碰着有一种冒充管事的人，好替他们做个牵犬马的绳子，宰牛羊的刀子，很受他们使唤，他们还有不趁这现成的么！不意事不凑巧，这些下等动物，竟能把绳子、刀子都毁坏了，竟自己想把个天国保守起来，他们那里甘心，内中只有俄国的民党，也是从绳子、刀子底下过来，新近脱了难，报了仇。自己象称心纵意的办起事来。究是公理战胜的时候，办的事情与我们新中国竟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他就先承认我们新国了。美国是民权最重，也就承认，其余各国不是有世袭的皇帝，就是有骄贵的政党，他们总舍不得这片好地方，想支那人是最怕受不忠、不孝、大逆不道这些名目。要是硬派着这种罪名了，就杀了他、剐了他，他还要三跪九叩头的谢恩。况且替他皇帝报仇，就可以做他们皇帝，这是有旧例的。我〔他〕们看着这个好瓜，几次商量着剖

分了，如今是机会了；他们又迷信了一种旧话说，军事是要专制的才会强，如今新中国讲共和，讲平等，讲到这个地步，这还有什么兵力，放心打他便了。于是各国约定日期，各统海陆军分道并进，海军有向香港的，有向厦门的，有向定海或上海的，有向燕〔烟〕台或天津或旅顺的；陆军有从朝鲜一面来的，有从印度一面来的，有从安南一边来的，或是一国单行，或是两三国联合，东鸣西应，真个展旗蔽日，植桅成林，比那战国时候，六国的合纵攻秦，与西历千八百十四年的联军破法，还要热闹。这一片支那大陆，定归要踏成白地了。那知道真金不怕火，竟不是讲多少的，大凡开战时候，守的本来比攻的容易，就只怕有奸细漏泄军情。这时候中国的人，就把中国作为自己的灵魂，除了这个，没有再找权利的地方，那里肯损害他一点呢！所以外国人用尽方法，想买个奸细，一个都买不出。连想买张详细地图，都不能到手。我们什么布置，他们竟一点不知道。他们外国，不论什么文明，总还是在生计竞争的圈子里，我们有的是钱，买通几个高等奸细，把他们怎样调度，怎样进军，都知道详细了。各地陆军交战，一则攻守势异，二则爱国心的程度不同，来的没有不打退的。海军呢，他们昼用远镜、夜用电光，不时四处探查，兼用灭鱼雷船在前试探，除了炮台上有几个守兵外，都没有什么。就放心进着港口去了。但等到与炮台上炮火相交以后，就不是半天坠来个霹雳，便是舰底着了鱼雷，没有一舰不击沉的，所以要等炮火相交，才下辣手。这可见事出不忍，为防护自己，不得不然了。他们既然买不到奸细，竟不知道我们的底细。后来经战线外的船上用远镜测见，又从被轰的地位与时候推想起来，也就知道是这两种机械。想抵制的法子，就想得出，一时也造不成，只好率几只残舰避开去了。

各国的海陆军，既然被中国击败。把从前叫做势力范围的，统统消灭了。兼且从前占去的地方，也统统收回了。中国竟又要锁港了，他们外国那里甘心，就在德国京城柏林开个大会，商量打破中国的法子，都说："中国的国民爱国心这么纯粹，怕没有法子打他，不如大家罢手与他讲和，还可以沾点通商的利益。"决定以后，就由俄、美两国介绍，与我们议和约。我们虽然战胜，但并不要借此占便宜，趁着各国军备零落的时候，就提出弭兵会的宗旨来。请设一万国公法裁判所，练世界军若干队。裁判员与军人皆按各国户口派定。国中除警察兵外，不得别设军备，两国有龃龉的事，悉由裁判所公断。有不从的，就用世界军打他，国中民人有与政府不合的事，亦可到裁判所控诉。那时候各国听中国的话，同天语一样。又添着俄、美两国的势力，没有敢不从的。既定了约，就立刻照办起来。从此各国竟没有战事，民间渐渐儿康乐起来，那中国人的康乐，自然更高几倍了。偶然想出个新法子，寻出个新利源，就大家合力的办去。从前那些经费不敷、人材不足的弊病都没有了。所以文明的事业达到极顶。讲到风俗道德上面，那时候没有什么姓名，都用号数编的。没有君臣的名目，办事到狠有条理，没有推诿的摩糊的。没有父子的名目，小的到统统有人教他；老的统统有人养他；病的统统有人医他。没有夫妇的名目，两个人合意了，光明正大的在公园里订定，应着时候到配偶室去，并没有男子狎娼、妇人偷汉这种暗昧事情。初初定了强奸的律，是重犯的处死。又有懒惰的罚，如不准游散，酌减食物等例。后来竟没有人犯的，竟把这种律例废掉了，裁判所也撤了。国内铁道四通。又省了许多你的、我的那些分别词，善、恶、恩、怨等类的形容词，那骂詈恶谑的话更自然没有了。交通又便，语言又简，一国的语言统统画一了；那

时候造了一种新字，又可拚音，又可会意，一学就会；又用着言文一致的文体著书印报，记的是顶新的学理，顶美的风俗，无论那一国的人都欢喜看，又贪着文字的容易学，几乎没有一个人不学的。从文字上养成思想，又从思想上发到实事。第一是俄国，第二是美国，后来传到印度，传到澳洲，又传遍亚、欧、非、美各国，不到六十年，竟把这个新法传遍五洲了。大家商量开一个大会，想把这些国□都消灭了，把那个虚设的万国公法裁判所、世界军也废掉了，立一个胜自然会，因为人类没有互相争斗的事了，大家协力的同自然争，要叫雨晴寒暑都听人类指使，更要排驭空气，到星球上去殖民，这才是地球上人类竞争心的归宿呢。这个大会的日期，恰恰选着后一个甲辰年的正月一日，这位中国"一民"先生已经九十多岁了。这一天预备着要去赴会，遇着一位朋友，他因为志愿已达，高兴的了不得，刚要对着朋友道喜，忽然又听得很大的钟声，竟把他惊醒了。他是在梦里对着那个朋友。所以在这个黑暗世界，还要说道：公喜！公喜！新年了，到新世界了！

（1904年2月17日《俄事警闻》第65、
66、67、68、72、73号，
1904年2月17、18、19、20、24、25日）

在信教自由会之演说

鄙人今日因信教自由会新年俱乐会之机会，得与国会及学界、报界诸君相聚一堂，诚为鄙人之幸。窃闻今日论者往往有请定孔教为国教之议，鄙人对兹问题，深致骇异。据鄙人观察，宗教是宗教，孔子是孔子，国家是国家，各有范围，不能并作一谈。

请言宗教。上古之世，草昧初开，其民智识浅陋，所见惊奇疑异之事，皆以为出于神意。如人之生也从何来，人之死也从何去，万物之生生而代谢也为之者何人，高山之崔巍，大海之汪洋，雨露之恩泽，雷霆之威严，日月之光华，即下至一草一木，一勺水，一撮土，凡不知其理由者，皆以为有神寓乎其间而崇拜之。此多神教所由起也。其后于经验上发明统一之理，则又以为天地间有大主宰焉，虽大至无外，小至微尘，莫不由其意匠之所造。此一神教之所由起也。既有宗教，而天地间一切疑难勿可解决之问题，皆得借教义以解答之。且推之于感情方面，而人类疾病死亡痛苦一切不能满足之心虑，皆得于良心上有所慰藉，与之以新生之希望。又推之于行为方面，而福善祸淫，有人人有天堂之歆羡与地狱之恐怖，以去恶而从善。此皆半开化人所信仰之主义，而无不求其主宰于冥冥之中者也。其后人智日开，科学发达，以星云说明天地之始，以进化论明人类的由来，以引力说原子论明自然界之秩序，而上帝创造世界之说破；以归纳法组织伦理学、社会学等，而上帝监理人类行为之说破。于是旧宗教之主义不

足以博信仰。其所余者，祈祷之仪式、僧侣之酬应而已。而人之信仰心，乃渐移于哲学家之所主张，所以各国宪法，均有信仰自由一条，所以解除宗教之束缚也。

不意我国当此时代，转欲取孔子之说以建设宗教。夫孔子之说，教育耳，政治耳，道德耳。其所以不废古来近乎宗教之礼制者，特其从俗之作用，非本意也。季路问事鬼神，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是孔子本身对于宗教，已不啻自划界限。且宗教之成也，必由其教主自称天使，创立仪式，又以攻击异教为惟一之义务。孔子宁有是耶？孔子自孔子，宗教自宗教，孔子、宗教，两不相关。"孔教"二字，当〔尚〕能成一名词耶？

至于国家，乃一政治的团体，以政治为其界限。换言之，即发源于某一土地之人民，于一定土地范围之内，集成一大团体，设立机关，确认相互遵守之约，举任共同信望之人，利行其团体之任务，克达生存之目的云耳。然所谓达其生存之目的云者，乃谓关于身体的，非关于灵魂的；关于世间的，非关于出世间的；关于人类既生以后未死以前之一段的，非关于人类未生以前既死以后的。其与宗教，可谓相反。所以一国之中，不妨有各种宗教；而一宗教之中，可以包含多数国家之人民。既以国家为界，即不复能以宗教为界；既以宗教为界，即不能复以国家为界。换言之，既论国界，即不论教界，故国家不干涉宗教；既论教界，即不论国界，故宗教亦不能干涉国家。国家自国家，宗教自宗教，"国教"二字，尚能成一名词耶？

孔教不成名词，国教亦不成名词，然则所谓"以孔教为国教"者，实不可通之语。鄙见如是，幸诸君教正之。

（1916年12月26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我之欧战观

——在北京政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

今日贵会开恳亲会，鄙人得随诸君子之后，躬逢其盛，欢欣莫名。鄙人对于政治方面，毫无经验，对于创造共和，亦未稍尽汗血之劳，欢迎两字，实不敢当。今日承贵会相招，命鄙人述欧战之情形。鄙人近从欧洲归国，自应略有见闻。但鄙人并无军事上之知识，对于此次战争，自不能发挥其真谛。又此次战争，一方系同盟国，一方系协约国。鄙人来自法国，对于同盟国一方面，自必大有隔阂。兹以管窥所及，略为诸君子陈之。

欧战持久之原因　此次欧洲战争，牵连之国甚多，除欧洲一二小国外，其余各国，尽牵连在内。至战争最激烈者，则属德、法、俄三国，而尤以德、法之战为最久。故鄙人所欲言者，为德、法二国所以能持久之原因。

科学之发达　据鄙人观察以为，第一因科学之发达，第二因美术之发达。骤聆此论，似近迂腐，然其中却有真理。何以谓由于科学发达也？战争要品，厥惟军械。世界日近文明，军械亦日新月异。比利时之列日（Liege）炮台，为世界最著名者，当造此时，以为无论何种炮弹，皆能抵御。而德国秘制之巨炮，竟攻破之。是其战胜实由军械进步；而军械进步，实由科学进步。又粮饷尤为军事上要品。然为地力所限，不能为无已之加增。德国虑粮糈缺乏，恃科学之力，制造种种代用品以济之。又战争之初，德军得势，亦半由于交通之便利。德国之交通计划，于无

事时预备已极周到，一值开战，则即为运输军队之用。其工程之完坚，组织之精密，无不源于科学。法为民主国，其军备不能如德国之强。故开战之初，不免失败。然以科学发达之故，军械之制造，饷糈之调度，交通之设备，尚足与德抗衡，故能持久不敝，与德互有胜负。至俄国则版图虽较德、法二国为大，而科学比较的不发达，军械不足，交通不便，遂一蹶而不振矣。

国民道德　然进而求之，战争以军人为主体。军备虽完善，交通虽便利，苟军人无舍身为国之公德，亦自无效。德国取侵略主义，法国取防御主义。主义虽不同，而为军人者，俱能奋勇前进，此由于国民之道德。俄国官吏有贪赃纳贿者，军官有私扣兵饷者，政治之腐败，已达极点，而国民教育，亦未普及。虽以德、法二国之精兵与之，亦万不能操必胜之权。

道德与宗教　至道德之养成，有谓倚赖宗教者，其实不然。以此三国比较之，俄国最重宗教，莫斯科一市，即有教堂千余所。国家以希腊教为正教，对于异教之人，不禁虐待。犹太人因保守犹太旧教，屡受俄人虐待。可见信仰宗教，实以俄人程度为最高。德国北方多奉耶教，南方多奉天主教。而德人对于宗教，并不极端信仰。即如星期日，各教堂虽均有教士演讲，而普通人不皆往听。至于大学生，则对于教士多非笑之。一元论哲学家如海开尔(Hecker)等，尤攻击宗教，法国人对于宗教，较之德人尤为浅薄，即如圣诞日，德国尚停市数日，饰树缀灯；法国则开市如常，并无何等点缀。至于教堂中常常涉足者，不过守旧党而已。自一八九二年至一九一二年，法国厉行政教分离之制，凡教士均不得在国立学校为教员，自小学以至大学皆然。此外反对宗教之学说，自服尔得尔(Voltaire)以来，不知有若干人。可见法国人对于宗教之

态度矣。俄人宗教上之信仰，较德、法人为高，而战争中之国民道德，乃远不如德、法，可见宗教与道德无大关系矣。

美术之作用 然则法、德两国不甚信仰宗教，而一般人民何以有道德心？此即美术之作用。大凡生物之行动，无不由于意志。意志不能离知识与情感而单独进行。凡道德之关系功利者，伴乎知识，恃有科学之作用；而道德之超越功利者，伴乎情感，恃有美术之作用。美术之作用有两方面：美与高是。

美与高 美者，都丽之状态；高者，刚大之状态，假如光风霁月，柳暗花明，在自然界本为好景。传之诗歌，写诸图画，亦使读者观者有潇洒绝尘之趣，是美之效用也。又如大海风涛，火山爆发，苟非身受其祸，罕不叹为壮观。美术中伟大雄强一类，其初虽使人惊怖，而神游其中，转足以引出伟大雄强之人生观，此高之效用也。

德法之民性 现今世界各国，拉丁民族之性质偏于美，而日尔曼民族之性质偏于高。德国鞠台（Goethe）之戏曲，都雷（Düror）与呵尔拜因（Holbein）之图画、克林格（Klinger）之造象，皆于雄强之中带神秘性质，此偏于高者也。法国语调之温雅，罗科科（Rococo）时代建筑与器具之华丽，大卫（David）与英格尔（Ingres）等图画之清秀，皆偏于美者也。凡民族性质偏于高者，认定目的，即尽力以达之，无所谓劳苦，无所谓危险。观德军猛攻凡尔登之役，积尸如山，猛进不已，其毅力为何如！凡民族性质偏于美者，遇事均能从容应付，虽当颠沛流离之际，决不改变其常度。观法人自开战以来，明知兵队之数、预备之周，均不及德，而临机应变，毫不张皇，当退则退，可进则进，若握有最后胜利之预算，而决不以目前之小利害动其心者，其雍容为何如！此可以见美术与国民

性之关系。而战争持久之能力，源于美术之作用者，亦必非浅鲜矣。

帝国主义与人道主义 又有一层，此次战争，与帝国主义之消长，有密切关系。使战争结束，同盟方面果占胜利，则必以德国为欧洲盟主，亦即为世界盟主，且将以军国主义支配全世界。又使协约方面而胜利，则必主张人道主义而消灭军国主义，使世界永久和平。何以言之？在昔生物学者有物竞争存、优胜劣败之说，德国大文学家尼采(Nietsche)遂应用其说于人群，以为汰弱存强为人类进化之公理，而以强者之怜悯弱者为奴隶道德。德国主战派遂应用其说于国际间，此军国主义之所以盛行也。然生物学者又有一派发见生物进化公例，不在竞争而在互助。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巴特金（Kropotkin）亲王集其大成，而作《互助论》。其出版时本用英文，亦有他国文译本，然未为多数人所欢迎也。自此次战争开始，协约国一方面深信非互助无以敌德。既于协约各国间实验之，而《互助论》之销数乃大增。此即应用互助主义于国际，而为人道主义昌明之见端也。吾人既反对帝国主义，而渴望人道主义，则希望协约国之胜利也，又复何疑！

（1917年1月1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同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必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更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而我不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

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任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　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于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时，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　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堂，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

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曰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1917年1月9日《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

在爱国女学校之演说

本校初办时，在满清季年，含有革命性质。盖当时一般志士，鉴于满清政治之不良，国势日蹙，有如人之罹重病，恐其淹久而至于不可救药，必觅良方以治之，故群起而谋革命。革命者，即治病之方药也。上海之革命团，名中国教育会。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故女校有爱国女学，男校有爱国学社，以教育会员担任办理之责，此本校名之所由来也。其后几经变迁，男校因《苏报》案而解散，中国教育会亦不数年而同志星散，惟女校存立至今。辛亥革命时，本校学生多有从事于南京之役者，不可谓非教育之成效也。当满清政府未推倒时，自以革命为精神。然于普通之课程，仍力求完备。此犹家人一面为病者求医，一面于日常家事，仍不能不顾也。至民国成立，改革之目的已达，如病已医愈，不再有死亡之忧。则欲副爱国之名称，其精神不在提倡革命，而在养成完全之人格。盖国民而无完全人格，欲国家之隆盛，非但不可得，且有衰亡之虑焉。造成完全人格，使国家隆盛而不衰亡，真所谓爱国矣。完全人格，男女一也。兹特就女子方面讲述之。

夫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最要之事为运动。凡吾人身体与精神，均含一种潜势力，随外围之环境而发达。故欲其发达至何地位，即能至何地位。若有障碍而阻其发达，则萎缩矣。旧俗每为女子缠足，不许擅自出门行走，终日幽居，不使运动，久之性质自变为懦弱。光阴日销磨

于装饰中，且养成依赖性，凡事非依赖男子不可。苟无男子可依赖，虽小事亦望而生畏。倘不幸地方有争战之事，敌兵尚未至，畏而自尽者比比矣，又安望其抵抗哉。是皆不运动不发达其身体之故，卒养成懦弱性质，以减杀其自卫之能力与胆量也。欧美各国女子，尚不能免此，况乎中国。闻本校有体育专修科，不特各科完备，且于拳术尤为注意，此最足为自卫之具，望诸生努力，切勿间断。即毕业之后，身任体操教员者，固应时时练习，即担任别种事业者，亦当时时练习。盖此等技术，不练则荒，久练益熟，获益非浅尠也。

次在智育。智育则属精神方面。精神愈用愈发达，吾前已言及矣。盖人之心思细密，方能处事精详。而习练此心思使之细密，则有赖于科学。就其易于证明者言之，如习算学，既可以增知识，又可以使脑力反复运用，入于精细详审一途。研究之功夫既深，则于处事时，亦须将前一事与后一事比较一番，孰优孰劣，了然于胸，而知识亦从比较而日广矣。故精究科学者，必有特别之智慧胜于恒人，亦由其脑筋之灵敏也。

更言德育。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今先言我国女子之缺点。女子因有依赖男子之性质，不求自立，故心中思虑毫无他途，惟有衣服必求鲜艳，装饰必求美丽。何也？以其无可自恃也。而虚荣心于女子为尤甚，如喜闻家中之人做官，喜与有势力人往还，皆是。故高尚之品行，未可求诸寻常女界中也。今欲养成女子高尚之品行，非使其除依赖性质有自立性质不可。然自立不可误解，非傲慢自负，轻视他人之谓，乃自己有一定之职业，以自谋生活之谓。夫人果能自谋生活，不仰食于人，则亦无暇装饰，无取虚荣矣。尚有一端，女子之处家庭者，大凡姑媳妯娌间，总

是不和，甚至诟谇。其故何在？盖旧时习惯，女子死守家庭，不出门一步，不知社会情状，更不知世界情状，所通声息者，家中姑媳妯娌间而已。耳目心思之范围，既限于极小之家庭，自然只知琐细之事。而所争者，亦只此琐细之事。若是而望女子之品行日就高尚，难乎不难！盖其所处之势使然也。虽然，女子之缺点固多，而优点亦不少。今举其一端，如慈善事业，恻隐之心，女子胜于男子。不过昔时专在布施，反足养成他人懒惰之习。今则当推广爱人以德、与人为善之道。凡有善举，宜使受之者亦出其劳力有益于社会，则其仁慈之心，为尤恳挚矣。女子讲自由，在脱除无理之束缚而已，若必侈大无忌，在在为无理之自由，则为反对女学者所借口，为父兄者必不喜送女子入学。盖不信女学为培养女德之所，而谓女学乃损坏女德之地，非女学之幸也。

又今日女子入学读书后，对于家政，往往不能操劳，亦为所诟病。必也入学后，家庭间之旧习惯，有益于女德者保持勿失，而益以学校中之新知识，则治理家庭各事，必较诸未受过教育者，觉井井有条。譬如裁缝，旧时只知凭尺寸剪裁而已，若加以算学知识，则必益能精。如烹饪，旧时亦只知其当然，若加以化学知识，则必合乎卫生。其他各事，莫不皆然。倘女学生能如此，则为父兄者有不乐其女若妹之入学者乎？夫女子入校求学，固非脱离家庭间固有之天职也。求其实用，固可相辅而行者也。美国有师范学校，教授各科，俱用实习，不用书籍。假如授裁缝时，为之讲解自上古至现在衣服之变更，有野蛮时代之衣服与文明时代之衣服，是即历史科也。为之讲解衣服之原料，如丝之产地，棉之产地等，则地理科也。衣服之裁剪，有算法焉。其染色之颜料，有理化之法则焉，是即数学理化科也。推之烹饪等科，亦复如是。寓学问于操作

中。可见女学固养成女子完全之人格，非使女子入学后，即放弃其固有之天职也。即如体操科中之种种运动，近亦有人主张徒事运动而无生产为不经济，有欲以工作代之者。庶不消耗金钱与体力，使归实用。此法以后必当盛行。益可见徒知读书，放弃家事，为不合于理矣。

（1917 年 1 月 15 日《东方杂志》第 14 卷第 1 号）

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

今之策国是者，莫不重教育；策教育，莫不谋普及。夫教育曷贵乎普及，岂不曰教育普及，则社会国家一切至重要至困难问题，根本上皆得缘以解决也。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尚有过于生计者乎！兴学二十余年，全国学校亦既有十万八千余所，何以教育较盛之区，饿莩载涂如故，匪盗充斥如故。更进言之，谓今之教育而能解决生计问题，则必受教育者之治生，较易于其未受教育者可知。而何以国中自小学以至大学，学生之毕业于学校而失业于社会者比比。此国人所谛观现象，默审方来，而不胜其殷忧大惧者也。

甲寅之秋，同人有考察京津教育者，某中学学生数百人，其校长见告：吾校毕业生，升学者三之一，谋事而不得事者二之一。乙卯、丙辰两岁，江苏省教育会以毕业生之无出路也，乃就江苏公私立各中学调查其实况。乙卯升学者得百分之二十三，丙辰得百分之三十九，以外大都无业，或虽有业而大都非正当者也。今岁全国教育联合会各省区代表报告，则升学者仅及十之一，或不及十之一。若夫高等小学，今岁调查江苏全省毕业者四千九百八十三人，而收容于各中等学校者，不及四之一，此外大都营营逐逐，谋一业于社会，而苦所学之无可以为用者也。

或曰：此之所云，普通学校耳。则试观夫实业学校、专门学校，有以毕业于纺织专科，而为普通小学校图画教员者矣；有以毕业于农业专科，而为普通行政机关助理员

者矣；甚有以留学欧美大学校专门毕业，归而应考试于书业机关，充普通编译员者矣。所用非其所学，滔滔皆是。虽然，此犹足以糊其口也。其十之六七，乃并一啖饭地而不可得。实业学校毕业者且然，其他则又何说。然则教育幸而未发达未普及耳，苟一旦普及，几何不尽驱国人为高等游民，以坐待淘汰于天演耶。曩岁同人鉴于教育之不切实用，相与奔走呼号，发为危言，希图教育当局之省悟。今则情见势绌，无可为讳，盖既不幸言而中矣。

简而言之，吾侪所深知确信而敢断言者，曰今吾中国至重要至困难问题，厥惟生计。曰求根本上解决生计问题，厥惟教育。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决无能解决生计问题之希望。曰吾中国现时之教育，不惟不能解决生计问题，且将重予关于解决生计问是〔题〕之莫大障碍。此而不思所以救济，前途其堪问耶！

救济之道奈何？或曰：此社会事业不发达之故。夫人才而有待夫现成之事业耶，抑事业实待人才而兴也？或曰：此用人而违其长者之咎。然吾闻农场尝用农学生矣，其知识其技能，或不如老农也。商店尝用商学生矣，其能力未足应商业用，而其结习，转莫能一日安也。吾侪所深知确信而复敢断言者，曰方今受教育者之不能获职业，其害决非他方面贻之，而实现时教育有以自取之也。

且教育曷贵也，语小，个人之生活系焉；语大，世界国家之文化系焉。今吾国文明之进步何如乎？行于野，农所服者，先畴之畎亩也。游于市，工所用者，高曾之规矩也。夫使立国大地，仅我中华，则率其旧章，长此终古，亦复何害。独念今世界为何等世界，人绝尘而奔，我蛇行而伏。试观美利坚一国，发明新器物，年至四万种。安迭生一人，发明新器物，多至九百种。我未有一焉。谁为为之，无新学识以应用于实际，无新人才以从事于改良，教

育不与职业沟通，何怪百业之不进步。由是吾侪深知确信而复敢断言，曰吾国百业之不进步，亦实现时教育有以致之也。

同人于此，既不胜其殷忧大惧。研究复研究，假立救济之主旨三端：曰推广职业教育；曰改良职业教育；曰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

依教育统计，全国中学四百有三所，而甲种实业学校仅九十有四，高等小学七千三百一十五所，而乙种实业学校仅二百三十。夫中学毕业力能升学者，或不及十分之一。高等小学毕业，力能升学者，或不及二十分之一。数若是其少，谋生者数若是其多。乃为学生升学地之中学、高等小学数若是其多，为学生谋生地之实业学校数若是其少，供求不相剂若此，职业教育之推广，其可缓耶！又况甲乙种实业学校，固未足以括职业教育，而尽给社会分业之所需也。虽然，属于普通性质之中学、高等小学数既若是其多，则一时欲广设职业学校，俾适合乎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中学、高等小学毕业生升学者与谋生者之比，不惟财力将有所不胜，即进行亦嫌其太骤。故同人所主张，一方推广职业学校职业补习学校；一方于高等小学中学分设职业科。谓惟此于事实较便，影响较广耳。

虽然，仅言推广职业教育，而谓足解此症结，则又何解于实业学校毕业生失业者之纷纷。盖吾国非绝无职业教育，其所以致此，亦有数原因焉：一曰其设置拘统系而忽供求也。美瑟娄博士有言，苟与我六十万金办中国职业教育，我必以二十万金充调查费。夫职业教育之目的，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所急也；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然则今时之社会，所需者何业，某地之社会，所需者何业，必一一加以调查，然后立一校，无不当其位置，设一科，无不给其要求，而所养人才，自

无见弃之患。今则不然，曰农，曰工，曰商，不可不备也。农若干科，工商各若干科，苟为法令所无，匪所宜立也。其所汲汲者，在乎统系分明，表式完备，上以是督，下以是报，而所谓时也，地也，孰所需，孰非所需，均在所不暇计。二曰其功课重理论而轻实习也。自《小学校令》有加设农商科之规定，各地设者不少，顾农无农场也，商无商品也，不过加读农商业教科书数册，其结果成为农业国文、商业国文而已。所谓乙种农、工、商学校，亦复如是。即若甲种，其性质既上近专门，其功课更易偏理论。今之学生，有读书之惯习，无服劳之惯习，故授以理论，莫不欢迎；责以实习，莫不感苦。闻农学校最困难为延聘实习教师。夫实习既不易求之一般教师，则所养成之学生，其心理自更可想。而欲其与风蓑雨笠之徒，竞知识之短长，课功能于实际，不亦难乎。三曰其学生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也。实习非所注重，则能力无自养成。然而青年之志大言大，则既养之有素矣。上海某银行行长，录用学校毕业生有年，一日本其经验语人曰：今之学生，学力不足，而欲望有余，不适于指挥，徒艰于待遇耳。夫银行，新式事业也，犹且如此。则凡大多数之旧式事业，学徒执役，则极其下贱，学成受俸，则极其轻微，其掉头不屑一顾可知。夫生活程度，必与其生活能力相准。办事酬报，必与其办事能力相当。若任重有所不胜，位卑又有所不屑，奚可哉！此第三病根，实于受普通教育时代种之。故同人所主张：改良职业教育，必同时改良普通教育。

救济之主旨如上述，其施行方法奈何？曰调查，曰研究，曰劝导，曰指示，曰讲演，曰出版，曰表扬，曰通信答问。其所注意之方面，为政府，为学校，为社会，而又须有直接之设施。曰择地创立都市式、乡村式男女子职业学校，日、夜、星期职业补习学校。而又须有改良普通教

育之准备。曰创立教育博物院。迨夫影响渐广，成效渐彰，又须设职业介绍部。其为事曰调查，曰通告，曰引导。

今欧美之于职业教育，可谓盛矣。德国一职业学校，分科至三百多种。美国黑人实业学校，凡房屋以及房屋之砖之瓦之钉，屋内一切家具，马车以及车之轮之铁之褥之油幔，马之缰及马之豢养，御者之衣及履，食物如面包、以及制面包之麦之粉，若牛肉，若牛油，若鸡蛋，若牲畜之豢养及屠宰，无一非出学生手。凡归自欧美者，莫不艳称而极道。然试考其发达之源，英仅自一九零八年苏格兰设教育职业局始。美仅自一九零七年波士顿设少年职业顾问所始。其后经舆论之赞成，极一时之响应，以有今日。可知谋事无所为难，作始不嫌其简。同人不敏，所为投袂奋起，以从事于本社之组织。十年而后，倘获睹夫欧美今日之盛，学校无不用之成材，社会无不学之执业，国无不教之民，民无不乐之生，乃至野无旷土，肆无窳器，市无游氓，因之而社会国家秩序于以大宁，基础于以确立，斯皆有赖夫全国同志群策群力之赞助，以底于成，而非同人一手一足之所能为役矣。同人所敢言者，矢愿本其忠诚，竭其才力，终始其事。一切组织，具如别订。盖诚目击夫现象之大危，心怵夫方来之隐患，以谓方今最重要最困难之问题，莫生计若。而求根本上解决此问题，舍沟通教育与职业，无所为计。惟我教育家、实业家与夫热心谋所以福国家利社会诸君子有以教之。

（1917年1月）

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演说词

两种感想　鄙人今日参观贵校，有两种感想：一为爱国心，一为人道主义。溯贵校之成立，远源于庚子之祸变。吾人对于往时国际交涉之失败，人民排外之蠢动，不禁愧耻，而油然生爱国之心，一也。美国以正义为天下倡，特别退还赔款，为教育人才之用，吾人因感其诚而益信人道主义之终可实现，二也。此二感想，同时涌现于吾心中。夫国家主义与人道主义，初若不相容者，如国家自卫，则不能不有常设之军队。而社会之事业，若交通，若商业，本以致人生之乐利。乃因国界之分，遂反生种种障碍，种种垄断。且以图谋国家生存、国力发展之故，往往不恤以人道为牺牲。欧洲战争，是其著例。吾人对现在国家之组织，断不能云满意，于是学者倡无政府主义，欲破坏政府之组织，以个人为单位，以人道为指归。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之不相容，盖如此矣。而何以在贵校所得之二感想，同时盘旋于吾心中？岂非以今日为两主义过渡之时代，吾人固同具此爱国心与人道观念欤？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之过渡，求之事实而可征。今日世界慈善事业，若红十字会等组织，已全泯国界。各国工会之集合，亦以人类为一体。至思想学术，则世界所公，本无国别。凡此皆日趋大同之明证。将来理想之世界，不难推测而知矣。盖道德本有三级：（一）自他两利；（二）虽不利己而不可不利他；（三）绝对利他，虽损己亦所不恤。人与人之道德，有主张绝对利他，而今之国际道德，止于自他两利，故吾

人不能不同时抱爱国心与人道主义。惟其为两主义过渡之时代，不能不调剂之，使不相冲突也。

对清华学生之希望 吾人之教育，亦为适应此时代之预备。清华学生，皆欲求高深之学问于国外，对于此将来之学者，尤不能无特别之希望，故更贡数言如下：

一曰发展个性 分工之理，在以己之所长，补人之所短，而人之所长，亦还以补我之所短。故人类分子，决不当尽归于同化，而贵在各能发达其特性。吾国学生游学他国者，不患其科学程度之不若人，患其模仿太过而消亡其特性。所谓特性，即地理、历史、家庭、社会所影响于人之性质者是也。学者言进化最高级为各具我性，次则各具个性。能保我性，则所得于外国之思想、言论、学术，吸收而消化之，尽为“我”之一部，而不为其所同化。否则留德者为国内增加几辈德人，留法者、留英者，为国内增加几辈英人、法人。夫世界上能增加此几辈有学问、有德行之德人、英人、法人，宁不甚善？无如失其我性为可惜也。往者学生出外，深受刺激，其有毅力者，或缘之而益自发愤；其志行稍薄弱者，即弃捐其“我”而同化于外人。所望后之留学者，必须以“我”食而化之，而毋为彼所同化。学业修毕，更遍游数邦，以尽吸收其优点，且发达我特性也。

二曰信仰自由 吾人赴外国后，见其人不但学术政事优于我，即品行风俗亦优于我，求其故而不得，则曰是宗教为之。反观国内，黑暗腐败，不可救疗，则曰是无信仰为之。于是或信从基督教，或以中国不可无宗教，而又不愿自附于耶教，因欲崇孔子为教主，皆不明因果之言也。彼俗化之美，仍由于教育普及，科学发达，法律完备。人人于因果律知之甚明，何者行之而有利，何者行之而有害，辨别之甚析，故多数人率循正轨耳。于宗教何与？至

于社会上一部分之黑暗，何国蔑有，不可以观察未周而为悬断也。质言之，道德与宗教，渺不相涉。故行为不能极端自由，而信仰不可不自由。行为之标准，根于习惯；习惯之中，往往有并无善恶是非之可言，而社交上不能不率循之者。苟无必不可循之理由，而故与违反，则将受多数人无谓之嫌忌，而我固有之目的，将因之而不得达。故入境问禁，入国问俗，不能不有所迁就。此行为之不能极端自由也。若夫信仰则属之吾心，与他人毫无影响，初无迁就之必要。昔之宗教，本初民神话创造万物末日审判诸说，不合科学，在今日信者盖寡。而所谓与科学不相冲突之信仰，则不过玄学问题之一假定答语。不得此答语，则此问题终梗于吾心而不快。吾又穷思冥索而不得，则且于宗教哲学之中，择吾所最契合之答语，以相慰藉焉。孔之答语可也，耶之答语可也，其他无量数之宗教家、哲学家之答语亦可也。信仰之为用如此。既为聊相慰藉之一假定答语，吾必取其与我最契合者，则吾之抉择有完全之自由，且亦不能限于现在少数之宗教。故曰信仰期于自由也。明乎此，则可以勿眩于习闻之宗教说矣。

三曰服役社会　美洲有取缔华工之法律，虽由工价贱，而美工人不能与之竞争，致遭摈斥，亦由我国工人知识太低，行为太劣，而有以自取其咎。唐人街之腐败，久为世所诟病。留学生对于此不幸之同胞，有补救匡正之天职。欧洲留学界已有行之者，如巴黎之俭学会，对于法国招募华工，力持工价与法人平等及工人应受教育之议。俭学会并设一华工学校，授工人以简易国文、算术及法语，又刊《华工杂志》，用白话撰述，别附中法文对照之名词短语，以牖华工之知识。英国留学生亦有同样之事业，其所出杂志，定名《工读》。是皆于求学之暇，为同胞谋幸福者也。美洲华工，其需此种扶助尤急，而商人巨贾，不

暇过问，惟待将来之学者急起图之耳。贵校平日对于社会服役，提倡实行，不遗余力，如校役夜课及通俗演讲等，均他校所未尝有。窃望常抱此主义，异日到美后，推行于彼处之华工，则造福宏矣。

（1917 年 3 月 29 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以美育代宗教说

——在北京神州学会演说词

兄弟于学问界未曾为系统的研究，在学会中本无可以表示之意见。惟既承学会诸君子责以讲演，则以无可如何中，择一于我国有研究价值之问题为到会诸君一言，即“以美育代宗教”之说是也。

夫宗教之为物，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问题。盖宗教之内容，现皆经学者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矣。吾人游历欧洲，虽见教堂棋布，一般人民亦多入堂礼拜，此则一种历史上之习惯。譬如前清时代之袍褂，在民国本不适用，然因其存积甚多，毁之可惜，则定为乙种礼服而沿用之，未尝不可。又如祝寿、会葬之仪，在学理上了无价值，然戚友中既以请帖、讣闻相招，势不能不循例参加，藉通情愫。欧人之沿习宗教仪式，亦犹是耳。所可怪者，我中国既无欧人此种特别之习惯，乃以彼邦过去之事实作为新知，竟有多人提出讨论。此则由于留学外国之学生，见彼国社会之进化，而误听教士之言，一切归功于宗教，遂欲以基督教劝导国人。而一部分之沿习旧思想者，则承前说而稍变之，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遂欲组织孔教，奔走呼号，视为今日重要问题。

自兄弟观之，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作用而构成。吾人精神上之作用，普通分为三种：一曰知识；二曰意志；三曰感情。最早之宗教，常兼此三作用而有之。盖以吾人当未开化时代，脑力简单，视吾人一身与世界万

物，均为一种不可思议之事。生自何来？死将何往？创造之者何人？管理之者何术？凡此种种，皆当时之人所提出之问题，以求解答者也。于是有宗教家勉强解答之。如基督教推本于上帝，印度旧教则归之梵天，我国神话则归之盘古。其他各种现象，亦皆以神道为惟一之理由。此知识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且吾人生而有生存之欲望，由此欲望而发生一种利己之心。其初以为非损人不能利己，故恃强凌弱，掠夺攫取之事，所在多有。其后经验稍多，知利人之不可少，于是有宗教家提倡利他主义。此意志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又如跳舞、唱歌，虽野蛮人亦皆乐此不疲。而对于居室、雕刻、图画等事，虽石器时代之遗迹，皆足以考见其爱美之思想。此皆人情之常，而宗教家利用之以为诱人信仰之方法。于是未开化人之美术，无一不与宗教相关联。此又情感作用之附丽于宗教者也。天演之例，由浑而昼。当时精神作用至为浑沌，遂结合而为宗教。又并无他种学术与之对，故宗教在社会上遂具有特别之势力焉。

迨后社会文化日渐进步，科学发达，学者遂举古人所谓不可思议者，皆一一解释之以科学。日星之现象，地球之缘起，动植物之分布，人种之差别，皆得以理化、博物、人种、古物诸科学证明之。而宗教家所谓吾人为上帝所创造者，从生物进化论观之，吾人最初之始祖，实为一种极小之动物，后始日渐进化为人耳。此知识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证也。宗教家对于人群之规则，以为神之所定，可以永远不变。然希腊诡辩家，因巡游各地之故，知各民族之所谓道德，往往互相抵触，已怀疑于一成不变之原则。近世学者据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之公例，以应用于伦理，则知具体之道德不能不随时随地而变迁；而道德之原理则可由种种不同之具体者而归纳以得之；而宗教家

之演绎法，全不适用。此意志作用离宗教而独立之证也。

知识、意志两作用，既皆脱离宗教以外，于是宗教所最有密切关系者，惟有情感作用，即所谓美感。凡宗教之建筑，多择山水最胜之处，吾国人所谓天下名山僧占多，即其例也。其间恒有古木名花，传播于诗人之笔，是皆利用自然之美以感人者。其建筑也，恒有峻秀之塔，崇闳幽邃之殿堂，饰以精致之造像，瑰丽之壁画，构成黯淡之光线，佐以微妙之音乐。赞美者必有著名之歌词，演说者必有雄辩之素养，凡此种种，皆为美术作用，故能引人入胜。苟举以上种种设施而屏弃之，恐无能为役矣。然而美术之进化史，实亦有脱离宗教之趋势。例如吾国南北朝著名之建筑则伽蓝耳，其雕刻则造像耳，图画则佛像及地狱变相之属为多；文学之一部分，亦与佛教为缘。而唐以后诗文，遂多以风景人情世事为对象；宋元以后之图画，多写山水花鸟等自然之美。周以前之鼎彝，皆用诸祭祀。汉唐之吉金，宋元以来之名瓷，则专供把玩。野蛮时代之跳舞，专以娱神，而今则以之自娱。欧洲中古时代留遗之建筑，其最著者率为教堂，其雕刻图画之资料，多取诸新旧约；其音乐，则附丽于赞美歌；其演剧，亦排演耶稣故事，与我国旧剧“目莲救母”相类。及文艺复兴以后，各种美术，渐离宗教而尚人文。至于今日，宏丽之建筑，多为学校、剧院、博物院。而新设之教堂，有美学上价值者，几无可指数。其他美术，亦多取资于自然现象及社会状态。于是以美育论，已有与宗教分合之两派。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盖无论何等宗教，无不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之条件。回教之谟罕默德，左手持《可兰经》，而右手持剑，不从其教者杀之。基督教与回教冲突，而有十字军之战，几及百年。基督教中又有新旧教之战，

亦亘数十年之久。至佛教之圆通，非他教所能及。而学佛者苟有拘牵教义之成见，则崇拜舍利受持经忏之陋习，虽通人亦肯为之。甚至为护法起见，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宗教之为累，一至于此，皆激刺感情之作用为之也。

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盖以美为普遍性，决无人我差别之见能参入其中。食物之入我口者，不能兼果他人之腹；衣服之在我身者，不能兼供他人之温，以其非普遍性也。美则不然。即如北京左近之西山，我游之，人亦游之；我无损于人，人亦无损于我也。隔千里兮共明月，我与人均不得而私之。中央公园之花石，农事试验场之水木，人人得而赏之。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罗马之剧场，瞻望赏叹者若干人，且历若干年，而价值如故。各国之博物院，无不公开者，即私人收藏之珍品，亦时供同志之赏览。各地方之音乐会、演剧场，均以容多数人为快。所谓独乐乐不如人乐乐，与寡乐乐不如与众乐乐，以齐宣王之惛，尚能承认之。美之为普遍性可知矣。且美之批评，虽间亦因人而异，然不曰是于我为美，而曰是为美，是亦以普遍性为标准之一证也。

美以普遍性之故，不复有人我之关系，遂亦不能有利害之关系。马牛，人之所利用者，而戴嵩所画之牛，韩幹所画之马，决无对之而作服乘之想者。狮虎，人之所畏也，而芦沟桥之石狮，神虎桥之石虎，决无对之而生搏噬之恐者。植物之花，所以成实也，而吾人赏花，决非作果实可食之想。善歌之鸟，恒非食品。灿烂之蛇，多含毒液。而以审美之观念对之，其价值自若。美色，人之所好

也；对希腊之裸像，决不敢作龙阳之想；对拉飞尔若鲁滨司之裸体画，决不敢有周昉秘戏图之想。盖美之超绝实际也如是。且于普通之美以外，就特别之美而观察之，则其义益显。例如崇闳之美，有至大至刚两种。至大者如吾人在大海中，惟见天水相连，茫无涯涘。又如夜中仰数恒星，知一星为一世界，而不能得其止境，顿觉吾身之小虽微尘不足以喻，而不知何者为所有。其至刚者，如疾风震霆，覆舟倾屋，洪水横流，火山喷薄，虽拔山盖世之气力，亦无所施，而不知何者为好胜。夫所谓大也，刚也，皆对待之名也。今既自以为无大之可言，无刚之可恃，则且忽然超出乎对待之境，而与前所谓至大至刚者肸合而为一体，其愉快遂无限量。当斯时也，又岂尚有利害得丧之见能参入其间耶！其他美育中，如悲剧之美，以其能破除吾人贪恋幸福之思想。《小雅》之怨悱，屈子之离忧，均能特别感人。《西厢记》若终于崔、张团圆，则平淡无奇；惟如原本之终于草桥一梦，始足发人深省。《石头记》若如《红楼后梦》等，必使宝、黛成婚，则此书可以不作；原本之所以动人者，正以宝、黛之结果一死一亡，与吾人之所谓幸福全然相反也。又如滑稽之美，以不与事实相应为条件。如人物之状态，各部分互有比例。而滑稽画中之人物，则故使一部分特别长大或特别短小。作诗则故为不谐之声调，用字则取资于同音异义者。方朔割肉以遗细君，不自责而反自夸。优旃谏漆城，不言其无益，而反谓漆城荡荡，寇来不得上，皆与实际不相容，故令人失笑耳。要之，美学之中，其大别为都丽之美，崇闳之美（日本人译言优美、壮美）。而附丽于崇闳之悲剧，附丽于都丽之滑稽，皆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则其所以陶养性灵，使之日进于高尚者，固已足矣。又何取乎侈言阴骘、攻击异派之宗教，以激刺人心，而使之渐丧其

纯粹之美感为耶。

（1917年4月8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中国大学四周年纪念演说词

今日为中国大学成立四周年纪念之期，又更名纪念会之期，及专门部、中学科举行毕业式之期，关系最为重要。鄙人不敏，聊贡数言。今日鄙人来此地方，生有一种感想，因中国大学与他校不同，实有一种特性。此种特性，实与社会及吾人大有关系。

吾人自出生以至于死，可分三时期：第一预备时期，即幼年。第二工作时期，即壮年。第三休息时期，即老年。良以社会既予吾人以大利益，则吾人不可不预备代价，以为交换之具。吾人所受社会之利益，与同人缔有债务与契约无异。既欠人债，即不能不想还债。故少年预备时期，亦即为少年欠债时期；而工作时期，即为中年还债时期。然吾人一至中年，即距老不远，故不能不储蓄，以为第三期休息之预备。而老年苟有能力，仍为社会服务，不过不及壮年之多耳，止可谓之半息，而不能谓之全息。尝见外国之实业家、教育家、著作家，老而治事，至死后已，即其义也。吾人在校肄业，即为预备及欠债时期，毕业即入还债时期矣。专门部诸君，明日在社会即担任有还债之义务。换言之，即是脱离第一时期，而入第二之工作时期。虽中学科毕业之后，有入大学部或专门部深造者，然亦有在社会上作事者。在社会上作事，亦是入于工作时期。故吾人一生，实以第二时期为最重要。

然此种工作，亦不能不有预备。此种预备有二：一、材料之预备，如学生之课程是也。二、能力之预备，即以

学校为锻炼吾人体力、脑力之助，又以职教员之训练及其所授于吾人之模范为修养之助。中国大学职教员有两种特性而又为吾人模范者：

一、坚忍心，如学科之编制及经费之筹备。中国大学之成立，固已四年于兹，然此四年中，艰难困苦，实已备尝。在创办者原想设立一完全大学，故有大学预科之编制。然大学年限过长，设备又须完全，而校中经费，诸多支绌，故不能不退一步而有专门部之编制。此种事务，如在他人，必畏难而不办矣。然中国大学之职教员，则虽艰难困苦备尝，而其初心不少更易。暂时固因经费支绌之关系，而不能大遂所志，但总希望完全办到。故中国大学职教员之坚忍心，可谓吾人模范也。

二、即本校职教员富有义务心，即责任心。何以见之？各职教员有兼任两校功课者，若因甲校之报酬较乙校为厚，遂勤于甲校而怠于乙校，其鄙陋之心，影响于学生最大。而中国大学之职教员，则绝无此状。虽因本校经费支绌，报酬较薄，而训导学生，勤恳无比，其义务心尤足为吾人之模范也。是以中国大学毕业诸生，多杰出之才，实校中职教员兼有以上两种特性有以成之。

今则毕业诸生，已入工作时期，以后服务社会，应守母校之模范，历久勿失，莫惧艰难，莫忧烦琐，一以坚忍耐劳出之，无不成者。且勿以毕业生自负，一经任事，先计报酬。试思我国经济，困难已极，人人以报酬为先务，势必穷于供给，而各事将无人过问。毕业诸生，当明斯理。以后处世，即使毫无权利，则义务亦在所应尽。以义务为先，毋以权利为重，庶足符母校之精神矣。鄙人际兹盛会，无任欢忻，谨竭诚祝曰：

中国大学万岁！

中国大学毕业诸生万岁！

（1917年4月29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

余自归国以来，居京瞬将一稔。虽经贵校数约来津，只以事冗，未获践诺，深以为恨。兹者承贵校励学、敬业、演说三会约邀，来与诸君为学术上之讨论，并可请益于诸君，是诚可欣喜者。既来兹，复蒙贵校董严先生、校长张先生殷殷招待，开会欢迎，得与全校诸君共话，感激实甚。

贵校为国中知名之学校，鄙人闻名久矣，深以未得参观为憾。今兹之来，未得有所预备，姑取各学校普通注重之德、智、体三育，为诸君言之。三育之重，各国学校殆莫不皆然，在国中则有名无实者犹居多数，此实大可商榷者也。

今请首言体育：古之所谓勇夫、侠士，君子称之，此即体育之发端。逮汉，人民犹有佩剑之遗风，久之，则此俗渐失，人人习于颓靡，身体柔弱，腰弓背屈。群以为知识发达，道德增加，便足为毕人生事，于是，囚首垢面者，反目为是，雄躯壮干者，鄙为不足道。殊不知有健全之身体，始有健全之精神；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或曰，非困苦其身体，则精神不能自由。然所谓困苦者，乃锻炼之谓，非使之柔弱以自苦也。今之学校中，盖咸知注视体育者，但国人之惰性甚深，致学生仍不得充量以提倡。贵校连捷华北，体育已臻佳境。东亚虽败，然断不可视为败兴之举。以体育之提倡，贵乎全体四万万人中。设尽四万人体育发达，余者仍颓唐故我，则全国体育

依然列于软弱之类。矧东亚与赛诸君，尽属之学校，其数不过有数十人，即胜亦不得便以为荣；故此次之败，乃锡我良机，俾体育发达者不以是自满，且因之愈倡练习之风。而贵校体育号称发达者，大望始终勿怠，为国人倡焉。

次言智育：学校中之智育，多不外乎教科书。顷闻贵校教科书大都以英文充用，此法甚善。盖贵校非他校比，贵校学生大多数为将来升学研究之人，而他种学校尚多急于生活之学生。昔黄韧之先生主张职业教育，即本此故。原中国今日之学生，受国家之影响，家庭之阻挠，所志多不能遂，转而入于谋生自活之途，此职业教育所以急待注意者也。若诸君者，则升学乃唯一之方针，固无须谋及职业矣。但升学亦有二种方向：一即倾向于研究，一即得有普通专门学术。二者乃此后升学必由之径，愿诸君审察之。教授假诸外人，此乃藉径熟习外国语言，以备研究各种科学。英文科学高于他国，固无论矣；若德若法，要亦可资溢助。吾国学规，有英、德文之须习，而各国亦以多习他国语言为则。若贵校既习英文，复新增德文。此后吾甚盼法文、义大利文亦靡不增加。盖学校范围小者，其力不充，不得不因陋就简。至贵校则数达千人，前程方兴未艾，扩而大之，固甚易易也。

论德育，在国中甚属难言。旧日道德，隐然有一种魔力，法规所定，无论当否，无丝毫违抗改变余地。国之君主，家之家长，私塾之师，其令之严，被动者惟有服从，无所谓自由其思想，使居于判断是非之地。此种思想之箝制，积数千年，至今日学校校长犹存此风。其是也，全校是之；非也，全校非之。于是，校风播荡，国风斯成，国中思想之不自由，较之各国思想发达者，有霄壤之别矣。然贵校于斯，殊异于众。贵校董严先生于旧道德素称高

贵，而校长张先生又属基督徒；但二先生决不因己之信仰强诸君以为从。校中各会会章不一，入者纯属自由择选，无丝毫信仰之束缚。此种自由足为未来之道德开一新径。吾甚愿诸君守此勿变，以养成此种优美之习惯焉。

（1917年5月23日南开学校《校风》第67期）

在南开学校敬业励学演说三会联合讲演会上的演说词

兄弟今日承姜先生之介绍，得与诸君相晤，谈话一堂，甚幸甚幸。惟兄弟虽蒙诸君之约，冀有所贡献，然以校事羁身，急待归去；且欲一听李先生之演说，故遂不得作长谈，仅择其精者简略言之，愿诸君一垂听焉。

讲题之采取，系属于感想而得。顷与全校诸君言道德之精神在于思想自由，即足为是题之引。（先生于三会联合演讲之先，复由全校欢迎大会，并丐先生演说，蒙先生首肯，乃以德、智、体三育为同学谈〔讲〕演，词已载入《校风》报。兹以不忍割爱，故复移录之于是篇后，以公同好焉。）

当兄弟未至贵校之先，每以贵校与约翰、清华、东吴诸大学相联想。今亲诣参观，略悉内情，始知大谬。盖贵校固一纯粹里〔思〕想自由之学校。继以各会宗旨，谅大都一至〔致〕为〔无〕疑。乃闻之姜先生，复知各会宗旨各异，万象包罗，任人选择。若青年会属于宗教的，而敬业乐群会则以研究学术号召，励学会亦复以演说讲演为重。此外各专门学校〔会〕亦各精一术，毫不相妨。此诚可为诸君庆，而兄弟遂亦感而言此矣。

人生在世，身体极不自由。以贵校体育论，跃高掷重，成绩照〔昭〕然。（本岁远东运动会，本校同学以跃高、掷重列名，故先生言如此。）然而练习之始，其难殆百倍于成功之日。航空者置身太空，自由极矣，乃卒不能

脱巨风之险。习语言者，精一忘百，即使能通数地或数国方言，然穷涉山川，终遇隔膜之所。是知法律之绳人，亦犹是也。然法律不自由中，仍有自由可寻。自由者何？即思想是也。但思想之自由，亦自有界说。彼倡天地新学说者，必以地圆为谬，而倡其地平日动之理。其思想诚属自由，然数百年所发明刊定不移之理，讵能一笔抹杀！且地圆之证据昭著，既不能悉于〔以〕推翻，修取一二无足轻重之事，为地平证，则其学说不能成立也〔宜〕宜〔也〕。又如行星之轨道，为有定所，精天文者，久已考明。乃幻想者流，必数执已定之理，屏为不足道，别创其新奇之论。究其实，卒与倡天地新学说者将同归失败。此种思想，可谓极不自由。盖正〔真〕理既已公认不刊，而驳之者犹复持闭关主义，则其立论终不得为世人赞同，必矣。

舍此类之外，有所谓最自由者，科学不能禁，五官不能干，物质不能范，人之寿命，长者百数十年，促者十数年，而此物之存在，则卒不因是而间断。近如德人之取尸炸油，毁人生之物质殆尽，然其人之能存此自由者，断不因是而毁灭。在昔有倡灵魂论，宗教家主之，究之仍属空洞。分思想于极简单，分皮毛于极细小，仍亦归之物质，而物质之作用，是否属之精神，尚不可知。但精神些微之差，其竟足误千里。故精神作用，现人尚不敢曰之为属于物质，或曰物质属之于精神。且精神、物质之作用，是否两者具备，相辅而行？或各自为用，毫不相属？均在不可知之数。如摄影一事，其存者果为精神？抑为物质、精神两者均系之？或两者外别有作用？此实不敢武断。

论物质，有原子，原子分之又有电子。究竟原子、电子何属？吾人之思想试验，殊莫知其奥。论精神，其作用之最微者又何而属？吾人更不得知。而空中有所谓真空各个以太，实则其地位何若，态度何似，更属茫然。度量衡

之短而小者，吾人可以意定，殆分之极细，长之极大，则其极不得而知。譬之时计，现为四句钟，然须臾四钟即逝，千古无再来之日，其竟又将如何耶？伍廷芳先生云，彼将活二百岁。二百岁以后何似？推而溯之原始，终不外原子、电子之论。考地质者，亦不得极端之证验。地球外之行星，或曰已有动物存在，其始生如何，亦未闻有发明者。

人生在世，钩心斗智，相争以学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亦无非争此未勘破之自由。评善恶者，何者为善，何者为恶，禁作者为违法之事，而不作者亦非尽恶。以卫生论，卫生果能阻死境之不来欤？生死如何，民族衰亡如何，衰亡之早晚又如何，此均无确当之论。或曰终归之于上帝末日之裁判，此宗教言也。使上帝果人若，则空洞不可得见，以脑力思之，则上帝非人，而其至何时，其竟何似，均不可知，是宗教亦不足征信也。有主一圆〔元〕说者，主二圆〔元〕说者，又有主返原之论者，使人人倾向于原始之时。今之愿战，有以为可忧，有以为思想学术增进之导线。究之以上种种，均有对待可峙，无人敢信其为绝对的可信，六〔亦〕无有令人绝对的可信之道也。

是故，吾人今日思想趋向之竟，不可回顾张皇，行必由径，反之失其正鹄。西人今日自杀之多，殆均误于是道。且至理之信，不必须同他人；己所见是，即可以之为是。然万不可诪张为幻。此思想之自由也。凡物之评断力，均随其思想为定，无所谓绝对的。一己之学说，不得束傅〔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傅〔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

（1917年5月23日《敬业学报》第6期）

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开学式演说词

今天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行开学式，鄙人愿为诸君略陈同人所以组织斯会与建设斯校之用意。

盖世界动力之公例，常趋于力简而效速之方向。自然现象，两点之间，以直线为最短，故物体之下坠，光线之注射，苟非有特别阻力，必循直线而进行。社会之状态亦然。取火之法，自钻燧而击石，以至于火柴；交通之法，由推轮而大辂，以至于汽车，其用力愈简，其收效愈速，人故乐用之。人类进化之速率，远过于他种动物者，恃乎能学。使吾人生而在一未开辟之孤岛，如鲁滨逊然，则吾人虽终身劳动，亦仅仅能维持原人之生活而已。今在开化社会，前人之所经验，悉以其成效留贻吾人，使吾人得据以为较进之研究，而有较新之发明，如是吾人其所致力，或仅及前人，或且不及前人，而所得之效果，乃转视前人为胜，恃有学也。

顾吾国固有学校矣，何以本会必劝人游学于外国？是亦有故。吾国学校之数，尚不足满愿学者之需。小学毕业者，或欲受中等教育而不得；中学毕业者，或欲受高等教育而不得，一也。吾国各学校之设备，尚不完全，亦不能悉得适当之教员；毕业之学生，仍不能与外国同等学校毕业生相较，二也。学校以外之设备，如藏书楼、博物院、动植物园、农场、工厂之属，吾国多未建设，不足以供学者之实习而参考，有事倍功半之虑，三也。故吾人不能不

劝人游学。

顾吾国游学之风，自曾文正派遣华童百人赴美留学以来，各著名之国，几无不有我国留学生者。同人独提倡留法何故？曰：同人均经留法，于法国教育界适宜吾国学生之点，知之较详，则举所知以介绍于国人。其他留美、留德诸君，各介绍其所知，并行不悖，一也。同人之意，以为绅民阶级、政府万能、宗教万能等观念，均足为学问进步之障碍。所留学之国，苟有此种习惯，亦未始无影响于吾国之留学生。惟法国独无此种习惯，二也。欧美各国，生活程度均高，率非自费生所能堪。法国自巴黎以外，风气均极俭朴，其学校之不收学费、及所取膳宿费极廉者，所在多有。得以最俭之费用，求正当之学术，三也。吾国人恒言各国科学程度，以德人为最高。同人所见，法人科学程度，并不下于德人。科学界之大发明家，多属于法。德人则往往取法人所发明而为精密之研究。故两国学者，谓之各有所长则可，谓之一优一劣则不可。吾国学者颇有研究之耐心，而特鲜发明之锐气，尤不可不以法人之所长补之，四也。

至于留学法国，何以必用俭学之法？则因普通留法学生，率循每月四百佛郎之例；而自费生中能出此费者盖寡；即使能出此费，而用俭学法每月仅费一百佛郎，即可以其余三百法郎供其他三学生之用，费少而成学益多。且不俭之学者，易驰心于外务，以耗其学力；律之以俭，而学益专。此则本会提倡俭学之意也。

至本会所以必设预备学校者，以到法之时，苟于最浅法语，尚未涉及，则起居饮食，诸多不便。又依入境问禁、入国问俗之义，能于未入彼国以前，略谙彼国风习，必有便利之处。又在法虽云至俭，一年尚须费五六百元，而在本国，则在三分之一以下。于预备学校中耗至少之

费，而可以得入法时必需之知识，亦计之得者也。本会并已商订同志，于预备学校课程以外，为定期之演讲，将以国语演述学理，而随时写示法语中之专门名词，亦足为到法后读专门书之预备也。

凡同人之所以组织斯会及斯校者，均以力简而效速之主义为准如是。至预备学校之创设，实始于民国元年。其时教育部曾拨借方家胡同一校舍；二年，部中欲以校舍供京师图书馆之用，本校始迁四川会馆；未几，因不堪袁政府之干涉而停办。今幸得民国大学诸君之赞成，而得在此开学，同人深所感谢。适京师图书馆有移往午门之筹备，本会已呈请教育部，仍以方家胡同校舍拨归本会。俟迁入方家胡同后，本会并拟于预备学校以外，更组织一华法中、小学校，按部定中、小校令及规程办理，而外国语则用法语。毕业者，或进本国大学，或赴法留学，均形便利。此又本会已定之计画，可以报告于诸君者也。

（1917年5月27日《东方杂志》第14卷第9号）

教育工会宣言书

凡人以适当之勤劲，运用其熟练之技能，而所生效果确有裨益于人类者，皆谓之工。我国自昔分职业为士、农、工、商四类，实则工以外三者，亦得以工赅之。农者，树艺之工也；商者，转运之工也；而士，则为教育之工。古之言士者，亦多歧义，如曰学以居位曰士，或曰以才智用者谓之士，皆若以士为仕之预备也者。故汉之经术，唐之诗赋，明清之经义，凡自命为士者，悉借是以为弋取功名之具。其有益于人与否，非所闻也。若是者，不特无关于教育，而亦不得谓之工。

至若士之任教育者，远若孔、孟，近若朱、王，彼其授徒讲学，著书垂后，固不得不谓之教育家。然其本意，在得位行道，以政治家自见，既不见用，不得已而言教育，犹且自居于宾师之位，以大人之学自命，而鄙农圃为小人，此可谓之教育矣，而不得谓之工。

若乃吾侪之所谓教育，则即认为专门工业之一种，习之有素，持之有恒，量所任之职务以取其所需，与其他之工业同例。故吾侪不谓之士，而谓之教育工。

教育既为工业之一种，则不能自外于世界工业进化之通例。工业之进化也，其始有工会，同业之中所借以互相研讨、互相扶植，而使之进步者也。其从有一国之总工会，则始有以抗资本家若政治家之压制，而伸其自由权；其从有国际总工会，则足以为人道主义之保障，而渐达于理想之世界。此欧美各国工业家之成绩也。而我国诸工不

特总工会尚未成立，无以参于国际工会之列，即一种之工、能组织为适当之工会，以为总工会基础，亦尚未有所闻。吾侪乃集同志之教育工，而组织此会以为倡。

是故，吾侪之责任，不独在本会，而尤在各种理想中之，盖吾侪所操之业，无不与各种工业有关系。其为普通教育与，即各工业家之预备也；其为专门教育与，则各工业家练习技能或研求理论之所也。故吾会而不发展则已，及其发展，则必有以促各工会之成立，以集合为总工会，而参加于国际工会。

（1917年7月15日蔡元培手稿）

说俭学会

——在北京留法俭学会上的演说词

今日为俭学会中演讲会开讲之第一期，鄙人欲先说“俭学会”三字，以为诸君顾名思义之助，虽大半老生常谈，然正以为常谈，故不得不时时谈之耳。

请先说“学”字。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学与思相对，偏重经验一方面。自汉以后，学者偏重读书，如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皆为人所艳称。使人以此为学，真古人所谓专己守残者耳。鄙人尝思，一种民族，不能不吸收他族文化，犹之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之空气及饮食，否则不能长进也。我国先秦时代，诸子九流，颇具科学途径，治哲学者有道学，治道德政治之学者有儒家，治伦理学者有名家，治法学者有法家，治词学者有纵横家及小说家，治农学者有农家，治理工之学者有墨家，其学说皆有独到之处，足与希腊学者抗衡。其时是否以巴比仑、叙利亚诸国之文化为基本，今日尚未论定也。汉尊儒术，他派渐微。汉末，佛说输入，是为有史以来吸收外族文化之第一期。自汉迄唐，历六百余年，经多数华梵高僧之翻译及研究，而始有千余部之经论，始产出宋明诸儒之道学。盖吸收外族文明而消化之，如是其繁难也。至于今日，为吸收外族文明之第二期。所欲吸收者，为欧洲科学，其科目之繁多，既与印度经论之仅关哲理者不同。其

学术之重实验而循秩序，亦非如释典之可以译读而毕业。故当时研究释典而亲历印度者，仅蔡愔、元奘等数人。而今日留学欧洲者千余人，犹患其少。盖今日我辈之所谓学，其内容与方法，均当有一种狭义之界说，以别于古人泛称之学字也。

学者何以当“俭”？一方面因为易于游学计，一方面实尚有进德之关系。盖自生理上及伦理上考之，俭胜于奢，历有明证。《吕氏春秋》曰：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极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言奢之为害如此。以今世卫生之道证之，如蔬食主义，如戒烟、戒酒之会，何一非崇俭而黜奢者。至于道德要义，曰自由，曰平等，曰博爱。习于奢者，一衣一食，必求精美，一举一动，辄需仆御，一旦境遇变迁，虽普通人所能受者，彼将不胜其苦。习于俭者反之。古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即自由与不自由之别也。

俭者常得大多数之同等，而奢者常得少数。俭者之心理，乐与人同，如齐俗奢，晏平仲示之以俭；蜀俗奢侈，董和躬率以俭，是也。奢之心理，则务与人异，如石崇、王恺，以豪侈相尚。崇以饴澳釜，恺以蜡代薪，是也。北魏高阳王，厚自奉养。李崇谓人曰：高阳一日，胜我千日。明太祖尝谓散骑舍人曰：制一衣五百贯，此农夫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物产之数，与人类之数有比例，此有所赢，则彼必有所绌，知平等之义者，其忍奢乎？博爱者，由平等而推暨之者也。不承认平等之义者，即不能再望以博爱。稽之历史，好奢之人，常有违反博爱之行为，如王武子所蒸之豚，常以人乳饮之；孙晟饮宴，使女妓各执一器，环列其侧，谓之肉台盘；苻朗当宴会时，唾小儿口中，使含而出，谓之肉唾壶等，皆是也。禹卑宫菲食，思

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墨翟尚俭而兼爱，近世如俄之陶斯道，屏贵族之奉，而躬耕陇亩，欲毁家以济其采地之农人。惟俭故能博爱，亦惟博爱，则不能不俭也。

二十年来，我国学者，耳食一种倒果为因之经济学，反对古代崇俭黜奢之说，至以西洋物质文明之发达，归功于侈靡，如谭复生《仁学》中，即有此说。不知物质之作用，必普及于各阶级之人，而后谓之文明。如汽机、电机、驰道、公园及公开之大建筑等皆是。其他供少数富豪挥霍之奢侈品，如巴黎之时装、香滨之美酒，初不在物质文明之内。又我国人常疑法人为世界上最侈靡之民族，不知法国侈靡之习，不过巴黎。近有意大利贝左里尼Prerrolini著《二十世纪之法国人》一书，谓巴黎为世界之都市，其习尚由各国民族辐辏而成之，不得以是概法人。统巴黎以外各省之法人而观之，实为世界最善储蓄之民族，可谓之经济界平民制，以其全国富力，全操于农人及小康家也。国民储蓄之增率，每岁不下于二千兆云云。可以知法人之尚俭，而法国良为适于俭学之地点矣。

至于俭学设会，则为推广人数之一作用。日本大学生，常有售报纸、曳人力车以自给者。留学美洲之东亚人，常有为人洗杯盘以筹旅费者。以伦敦生活程度之高，而江西徐子鸿君，常居每周七先命之膳宿舍。个人俭学，本无不可，惟此等艰苦卓绝之行为，不可悬为常格。且如内地之外国语预备学校，外国学校之专班，及此间新设之游艺会、演讲会等，皆非合多数人之力，而又得谙悉情形者为之经理，则无自而成立，此设会之所以不可少也。

鄙人所见俭学会之关系如此，如有不然，请诸君教正之。

（1917年7月15日《旅欧杂志》第23期）

在育德学校演说之述意

鄙人耳育德学校之名，由来已久，今乘大学休假之际，得以躬莅斯地，与诸君子共语一堂，甚属快事。因贵校以育德为号，而校中又设有留法预科，乃使鄙人联想及于法人之道德观念。法自革命以后，有最显著、最普遍之三词，到处揭著，即自由、平等、友爱是也。夫是三者，是否能尽道德之全，固难遽定，然即证以中国意义，要亦不失为道德之重要纲领。

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失〔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孟子所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此也。准之吾华，当曰义。所谓平等，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孔子所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此也。准之吾华，当曰恕。所谓友爱，义斯无歧，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张子所称"民胞物与者"，是也。准之吾华，当曰仁。仁也、恕也、义也，均即吾中国古先哲旧所旌表之人道信条，即微〔徵〕西方之心同理同，亦当宗仰服膺者也。

是以鄙人言人事，则必以道德为根本；言道德，则又必以是三者为根本。盖人生心理，虽曰智、情、意三者平列，而语其量，则意最广，征共〔其〕序则意又最先。此固近代学者所已定之断案。就一人之身而考三性发达之迟早，就矿植动三物之伦而考三性包含之多寡，与夫就吾人日常之识一物、立一义而考三性应用之疾徐，皆有其不可掩者。故近世心理学，皆以意志为人生之主体，惟意志之所以不能背道德

而向道德，则有赖乎知识与感情之翌〔翼〕助。此科学、美术所以为陶铸道德之要具，而凡百学校皆据以为编制课程之标准也。自鄙人之见，亦得以三德证成之。二五之为十，虽帝王不能易其得数，重坠之趣下，虽兵甲不能劫之反行，此科学之自由性也。利用普乎齐民，不以优于贵；立术超乎攻取，无所党私。此科学之平等性及友爱性也。若美术者，最贵自然，毋意毋必，则自由之至者矣。万象并包，不遗贫贱，则平等之至者矣。并世相师，不问籍域，又友爱之至者矣。故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也。

今闻贵校学风，颇致力于勤、俭二字。勤则自身之本能大，无需于他；俭则生活之本位廉，无入不得，是含自由义。且勤者自了己事，不役人以为工；俭者自享己分，不夺人以为食，是含平等义。勤者输吾供以易天下之供，俭者省吾求以裕天下之求，实有烛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真谛，而不忍有一不克致社会有一不获之夫，是含友爱义。诸君其慎毋以二字为庸为小。天下盖尽有几多之恶潮，其极也，足以倾覆邦命，荼毒生灵，而其发源，乃仅由于一二少数人自恣之心所鼓荡者。如往者筹安会之已事，设其领袖俱习于勤俭，肯为寻常生活，又何至有此。然则此二字者，造端虽微，而潜力则巨。鄙人对于贵校之学风，实极端赞成矣。惟祝贵校以后法文传习日广，能赴法留学者日多，俾中国之义、恕、仁与法国之自由、平等、友爱融化，而日进于光大。是非党法，法实有特宜于国人旅学之点：旅用廉也，风习新也，前驱众也，学说之纯正，不杂以君制或宗教之瑕也，国民之浸淫于自由、平等、友爱者久，而鲜侮外人也，皆其著也。

（1918年1月5日《北京大学日刊》第72号）

游保定日记

保定离北京甚迩，有一二故人在彼中学校任事，屡以演说相招，因彼中各校每星期六有演说会也。平日羁于校务，不能往，及年假时践约，以一月五日早车行，十二时抵保定，即赴育德中学校。午后参观省立第六中学校，演说中学校学生，当以科学、美术铸成有自治能力之人格，庶升学后、受放任之待遇而不致堕落。晚间在育德中学演说，提出自由、平等、友爱为德之大纲，而所以育之者，仍不外科学、美术。又以育德中学校学风，尤重勤、俭二字，并说勤、俭之风与自由、平等、友爱尤有密切之关系焉。

六日，午前参观直隶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演说世界大势，将由都市的工商联合政策，而转为乡村的农工联合制度，于人类之体魄及品性，皆大有关系。故农业学校学生，当知农业为平民的而非贵族的，实践的而非理论的，进化的而非保守的。故学生在校时，当注重实习，留意普通农人之习惯，庶毕业后得实地施行，而不至以农商部或各省实业厅职务为归宿。

是日，李石曾君亦演说，大意谓：农业之进化与全世界之进化有重要关系；而中国农业之进化，尤与世界农业进化有重要关系。姑举两端言之：（一）生理上之关系。人类当以蔬食为正轨。中国人多蔬食，故农业偏重种植而不尚畜牧，与欧美之务肉食而重畜牧者不同，将来必可推行于世界。（二）组织上之关系。农业非用机械不能进步，

而机械非大地主不能置，是一困难。今欧洲各国，有农业组合，既得机械之益，又不受大地主之害，为我国所宜取法云。

午后参观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因校长见告，此校以造就"良妻贤母"为鹄，以"诚、敬、勤、俭"四字为校训，故演说时提出"勤、谨"二字。"勤"字分为勤于学及勤于事两项；"谨"字则为不敢放肆、不敢奢华、不敢骄慢三项：无非申明校训以坚学生之信而已。晚游保定公园，即莲池书院旧址。在园中晚餐，座间商定在保定设华法教育会支部。夜回育德中学校，复为高等留法预备班（中学毕业生所组织）说俭学会及勤工俭学会之概略。

七日，七时三十分行，十二时抵北京。

鄙人在保定之经历如此。而七日之《民强报》所载，有所谓"中央政闻社"者，谓鄙人以秘密事件赴保定。不知参观与演说，何所容其秘密也。谨布右之日记以释疑。

蔡元培志

（1918 年 1 月 11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43 号）

北大进德会旨趣书

今人恒言：西方尚公德，而东方尚私德；又以为能尽公德，则私德之出入，不足措意，是误会也。吾人既为社会之一分子，分子之腐败，不能无影响于全体。如疾症然，其传染之广，往往出人意表。昔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遂疏仪狄而绝旨酒。司马迁曰："夏之亡也以妹喜，殷之亡也以妲己。"子反湎于酒，而楚以败；拿破仑惑于色，而普鲁士之军国主义以萌。私德不修，祸及社会，诸如此类，不可胜数。又如吾国五六年来，政治界、实业界之腐败，达于极端。而祸变纷乘，浸至亡国者，宁非由于少数当局骄奢淫佚之余，不得已而出奇策以自救，遂不惜以国家为牺牲与？《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勿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勿以小恶为无伤而为之。"鄙人二十年前，鉴于吾国谈社会主义者之因以自便，名为提倡，实增阻力，因言"惟于交际之间一介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共产；又惟男女之间一毫不苟者，夫然后可以言废婚姻。"(见《民国野史》乙编《蔡孑民事略》)正此意也。

民国元年，吴稚辉、李石曾、汪精卫诸君，发起进德会于上海。会员别为三等：持不赌、不嫖、不娶妾三戒者，为甲等会员；加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三戒，为乙等会员；又加以不作议员、不食肉、为丙等会员。当时论者颇以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条为疑。然题名入会为甲等会员者踵相接矣。未几，鄙人以事由海道北行，同行

者三十余人，李、汪二君亦与焉。舟中或提议进德会事，自李、汪二君外，同行者率皆当时之官吏若议员，群以官吏、议员两戒为不便，乃去此两戒，别组一会，即以同舟之三十余人为发起人，而宋遯初君提议名为“六不会”，众赞成之。又同时发起一“社会改进社”，所揭著者凡三十六条，第一曰不狎妓，第二曰不置婢妾，第十九曰不赌博，第二十九曰戒除伤生耗财之嗜好，犹六不会意也。其后为政潮所激荡，“六不会”若“社会改良社”之发起人，次第星散，未及进行；而进德会之新分子，则间见于上海之报纸焉。

北京自袁政府时代，收买议员，运动帝制，攫全国之公款，用之如泥沙，无所顾惜，则狂赌狂嫖，一方面驱于侥幸之心，一方面且用为钻营之术。谬种流传，迄今未已。鄙人归国以后，先至江、浙各省，见夫教育、实业各界，凡崭然现头角者，几无不以嫖、赌为应酬之具，心窃伤之。比抵北京，此风尤甚。尤可骇者，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份之清流，与敝俗奋斗，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现象也。曾于南洋公学同学会（中央公园）及译学馆校友会（江西会馆）中，提议以嫖、赌、娶妾三戒编入会章，闻者未之注意也。其后见社会实进会规则，有此三戒；而雍君所发起之社会改良会，则专以此三者为条件。吾道不孤，助以张目。惜其影响偏于一隅。既承乏北京大学，常欲以南洋同学会、译学馆校友会所提议而未行者，试之于此二千人之社会。会一年来鞅掌于大体之改革，未遑及此。今改组之议，业已实行。而内部各方面之组织，若研究所、若教授会之属，体育会、书画研究会之属，银行、消费公社之属，皆次第进行。而进德会之问题，遂亦

应时势之要求，而不能不从事矣。会中戒律，如嫖、赌、娶妾三事，无中外，无新旧，莫不认为不德，悬为厉禁，谁曰不然。官吏、议员二戒，在普通社会或以为疑，而大学则当然有此（法科毕业生例外）。教育者，专门之业；学问者，终身之事。委身学校而萦情部院，用志不纷之谓何！且或在学生时代，营营于文官考试、律师资格。而要求提前保送，此其燥进，与科举时代之通关节何异？言之可为痛心！古谚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加特力教之神父，佛教之僧侣，例不婚娶；西洋大学问家，亦有持独身主义者。不婚尚可，不宦何难？至于烟、酒、肉食三戒，其贻害之大、虽不及嫖、赌、娶妾，其纷心之重，亦不及官吏、议员，然而卫生味道之乐，亦恒受其障碍，故并存之。春秋三世之义，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粗恑，及历升平而至太平，用心乃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今仿其例，而重定进德会之等第于左：

甲种会员　不嫖，不赌，不娶妾。

乙种会员　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　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入会之条件：

（一）题名于册，并注明愿为某种会员。

（二）凡题名入会之人，次第布诸日刊。

（三）本会不咎既往。《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袁了凡曰："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凡本会会员，入会以前之行为，本会均不过问。（如已娶之妾，亦听之。）同会诸人，均不得引以为口实。惟入会以后，于认定之戒律有犯者，罚之。

（四）本会俟成立以后，当公定罚章，并举纠察员若干人执行之。

入会之效用：

（一）可以绳己。谚曰："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吾国人在乡里多谨饬，而一到都会租界，则有放荡者。欧美人在本国多谨饬，而一到外国，则亦有放荡者。社会之制裁，有及有不及也。今以本会制裁之，庶不至于自放。

（二）可以谢人。欧美之学者、官吏、商人，均视嫖、赌、娶妾为畏途；偶有犯者，均讳莫如深。而我则狎妓征优，文人以为韵事；看竹寻芳，公然著之柬帖；官吏商贾，且以是联络感情之一端。苟非画定范围，每苦无以谢人。今以本会为范围，则人有以是等相嬲者，径行拒绝，亦不致有伤感情。

（三）可以止谤。《语》曰："止谤莫如自修。"吾北京大学之被谤也久矣。两院一堂也，探艳团也，某某等公寓之赌窟也，捧坤角也，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也，皆指一种之团体而言之。其他攻讦个人者，更不可以偻指计。果其无之，则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然请本校同人一一自问，种种之谤，即有言之已甚者，其皆无因而至耶？既有此因，则正赖有此谤以提撕吾人，否则沦胥以铺耳！不去其因而求弭谤，犹急行而避影也，其又何益？今以本会为保障，苟人人能守会约，则谤因既灭，不弭谤而自弭。其或未灭，则造因之范围愈狭，而求之不难尽多数之力以灭之，岂无望耶？

（1918 年 1 月 19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49 号）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

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作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但我们的演说大会，何以开在这个时候呢？现在正是协约国战胜德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人都高兴的了不得。请教为什么要这样高兴？怕有许多人答不上来。所以我们趁此机会，同大家说说高兴的缘故。

诸君不记得波斯拜火教的起源么？他用黑暗来比一切有害于人类的事，用光明来比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所以说世界上有黑暗的神与光明的神相斗，光明必占胜利。这真是世界进化的状态。但是黑暗与光明，程度有浅深，范围也有大小。譬如北京道路，从前没有路灯。行路的人，必要手持纸灯。那时候光明的程度很浅，范围很小。后来有公设的煤油灯，就进一步了。近来有电灯、汽灯，光明的程度更高了，范围更广了。世界的进化也如此。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国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所以全世界的人，除了德、奥的贵族以外，没有不高兴的。请提出几个交换的主义作个例证：

第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 从陆谟克、达尔文等发明生物进化论后，就演出两种主义：一是说生物的进化，全恃互竞，弱的竞不过，就被淘汰了，凡是存的，都是强的。所以世界止有强权，没有公理。一是说生物的进化，全恃互助，无论怎么强，要是孤立了，没有不失败的。但看地底发见的大鸟大兽的骨，他们生存时何尝不强，但久已灭种了。无论怎么弱，要是合群互助，没有不能支持的。但看蜂蚁，也算比较的弱极了，现在全世界都有这两种动物。可见生物进化，恃互助，不恃强权。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商国，互相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商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

第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 德国从拿破仑时受军备限制，创为更番操练的方法，得了全国皆兵的效果。一战胜奥，再战胜法。这是已往时代，彼此都恃阴谋，不恃正义，自然阴谋程度较高的战胜了。但德国竟因此抱了个阴谋万能的迷信，遍布密探。凡德国人在他国作商人的，都负有侦探的义务。旅馆的侍者，菌圃的装置，是最著名的了。德国恃有此等侦探，把各国政策军备，都知道详细，随时密制那相当的大炮、潜艇、飞艇、飞机等，自以为所向无敌了，遂敢唾弃正义，斥条约为废纸，横行无忌。不意破坏比利时中立后，英国立刻与之宣战。宣告无限制潜艇政策后，美国又与之宣战。其他中立等国，也陆续加入协商国中。德国因寡助的缺点，空费了四十年的预备，终归失败。从此人人知道阴谋的时代早已过去，正义的力量真是万能了。

第三是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 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后，世界已增了许多共和国。国民虽知道共和国的幸福，然野心的政治家，很嫌他不便。他们看着各共和

国中，法、美两国最大，但是这两国的军备都不及德国的强盛，两国的外交，又不及俄国的活泼。遂杜撰一个“开明专制”的名词，说是国际间存立的要素，全恃军备与外交。军备与外交，全恃武断的政府。此后世界全在德系、俄系的掌握。共和国的首领者法若美且站不住，别的更不容说了。不意开战以后，俄国的战斗力，乃远不及法国。转因外交狡猾的缘故，貌亲英、法，阴实亲德，激成国民的反动，推倒皇室，改为共和国了。德国虽然多挣了几年，现在因军事的失败，喝破国民崇拜皇室的迷信，也起革命，要改共和国了。法国是大战争的当冲，美国是最新的后援，共和国的军队，便是胜利的要素。法国、美国都说是为正义人道而战，所以能结合十个协商的国，自俄国外，虽受了德国种种的诱惑，从没有单独讲和的。共和国的外交，也是这一回胜利的要素。现在美总统提出的十四条，有限制军备、公开外交等项，就要把德系、俄系的政策根本取消。这就是武断主义的末日，平民主义的新纪元了。

第四是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　野蛮人只知有自己的家庭，见异族的人同禽兽一样，所以有食人的风俗。文化渐进，眼界渐宽，始有人类平等的观念。但是劣根性尚未消尽，德国人尤甚。他们看有色人种不能与白色人种平等，所以唱黄祸论，行“铁拳”政策。看犹太、波兰等民族不能与亚利安民族平等，所以限制他人权。彼等又看拉丁民族、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又不能与日耳曼民族平等，所以唱“德意志超过一切”，想先管理全欧，然后管理全世界。此次大战争，便是这等迷信酿成的。现今不是已经失败了么？更看协商国一方面，不但白种的各民族，团结一致，便是黄人、黑人也都加入战团，或尽力战争需要的工作。义务平等，所以权利也渐渐平等。如爱

兰的自治，波兰的恢复，印度民权的申张，美境黑人权利的提高，都已成了问题。美总统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义，更可包括一切。现今不是已占胜利了么？这岂不是大同主义发展的机会么？

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著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1918 年 11 月 15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260 号）

劳工神圣

——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上的演说词

诸君!

此次世界大战争，协商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谘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1918 年 11 月 16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260 号）

在杭州方言学社开学日演说词

今日为学社开学之日，我所演说者，即是表明学社命名之义及一切课程之关系。学社品格，当属于通俗语所谓学堂一类。学堂本吴中学塾之通名，而近则以为分班教授诸院塾之大别名，盖分班教授法，始于上海西人之学塾，故从吴语而他处借以为分别文耳。

学塾繁多，不可具数，今最著者，为学官、书院、学堂三大支。学官最古周制，与西人同，其后流为史官素餐之地，于是矫之以书院。自宋以来，颇持清议，其后又流而师生牟利之地，于是矫之以学堂。然而学官如故，书院如故，则我国恋旧之习太深也。因旧属之颓败，而改造者不尽撤蠹蚀之料，则蠹必传。因旧肆之折阅，而改为者不尽去舞弊之人，则弊愈广。夫是以书院之起，非不与学官竞争，不久而与之俱化。今学堂之起，其将竞而存与，抑亦与之化与？是无他责，责主持学堂者而已。

夫主持学堂者之宗旨，恒见于其所系之专名。善乎许秋帆先生之设学堂也，名之以崇实。孔子言政，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也。齐景公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无实也。彼夫学官、书院之弊，岂非师不师，弟不弟，教非教，学非学，以致此与？善乎先生之言崇实也。先生之学堂以绌费中止，而诸弟子持先生之宗旨不变，相与立学社于此，以学会之体，举学堂之实，复延先生而教授焉，顾谦其名曰方言。

方言者，语言文字之学耳，而影响于我国者甚大。譬

之家也，其祖宗之世，治生计，驯伦理，教诲子女，防御盗贼，皆中律令，其家之职业日兴，名誉日盛，乃记其已行之事以为法，记其所发明之理以为训，以传之子孙。子孙之不肖者，易大功同财之制，为族长专利之私，利族人之愚弱以自便也。取所谓家法、家训者一切摧烧之，凌虐刻剥，惟所欲为，乃者既以族人之公愤而逐之矣。后之继起为族长者，曰：其专利是也，其所以行之之术未善，吾将委曲以达其志。于是集族之可以道古者而噢咻之，使出祖宗法训于遗烬之中，而窜补傅会，以铸成族长专利之范围，亦世相传，用为衣钵。族之椎鲁者，无论其稍有才智，足窥见阴谋者，啖以利，不从，啖以名，不从，则胁之以死，务使一族之人，咸局脊于其范围之中而不悟，曰：吾祖宗之法若训，固如此也。是以有觊觎族长之大盗，而必无讨论公益之罪言，各图其所能焉，而不以一族之盛衰为意，积馁积愚，积私积惰，积贫积弱，并族长所专之利，亦将无所出。而东西诸邻乃烂然，职业日隆，名誉日盛，如吾祖宗时。其内容之余，辄为吾族所需要，而一操一纵，足以制吾族之死命；其知虑强权，又足以凌驾吾族而有余；而又以吾族不肖之为大有害于风俗，而以夺易之为己任；则吾族之资产安得不出卖，而子侄安得不为所佣奴乎？然而吾祖宗之时，固不如是，则吾亦图复吾祖宗之所行而已。虽然，徒记本草之文者，不可以采药；仅读天官之志者，不能以名星；传闻者难为详，目见者易以悟也。是以春秋著三世之异辞，孙卿法后王之粲。然欲复吾祖宗之法训，其必取资东西邻矣。

虽然，东西邻者，言语不通，文字不同，吾欲叩其所以而不得，则语言文字之学，其锁匙也。彼泰西传教之士来我国者，无不学官话，其来各府州县者，甚且学方言，以彼之自信所得而欲传于人者，尚不惮为此，况吾之取资

于彼者乎？学社所以有英国语言文字学。语言文字，不能无所附丽，有丽于酬应者，有丽于学理者。必通西国文字，而后及普通学。然则亦必通我国文字而后明理义乎？此必无之理也。学社是以有西国普通学，如算术、格致之类是也。然则习西文，通西学，将使学者一切如西人而后已乎？曰：果如是，仍无益于我国。何则？国体、地势、风俗习惯不能无异同也。是故如我国探理之学，由六经、诸子以推于名臣硕儒论议语录之属，抉择而演绎之，而后证之以西国理论，则无方凿圆枘之患。而我国探迹之学，由现行事例以追溯国初掌故，与夫历代制度之沿革，事变之孳乳，知其流弊之所由，而后矫之以西国政治，则无胶柱鼓瑟之患。而我国修辞之学，于百物之定名，文白之成法，篇章之熔截，有以达意叙事，使观听者无所眩，而后持以译西国之书，则无节书燕说之患。三者，吾国旧学之菁英也，学社是以有经史辞章之学。戊戌大学堂章程，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以语言文字为门径，不以语言文字为极功。学社宗旨犹是也，曰方言者，谦词焉耳。

吾闻学校之事，与国宪之变迁有关系。国宪三变：曰专制，于春秋为据乱世；曰立宪，为升平世；曰共和，为太平世。学校亦然。专制体为学堂，为初学导门径者也。其总理谙于学问之事，管理之法，延访教习，进退学生，皆符公理则效，否则脂韦敷衍，为学官、书院之附庸而已。共和体为学会，为成学结团体者也。其会友皆有确实坚忍之气，相借相长，以求进步则效，否则剽窃时论，苟以哗众榜名，则亦征逐嬉游之变相而已。若乃立宪体，则以学会之体，举学堂之实，议事取公论，治事有专责，既不阏自由之权，又不为无法之形，舍短取长，殆无遗憾。论者谓今世界政体，惟立宪最宜，吾于学校亦云。

顾甲午以来，吾国学校，颇见改革之象，而所举者专

制为多。立宪体则自京师通艺学堂外，无闻焉。迩者，武进刘君、镇海郑君、茶陵谭君、嵊袁君创立方言学社于浙江省会，延丹徒许先生秋帆为教习，四君者率诸弟子而受业焉。复公举谭先生建侯为总理，而刘君、郑君、〈袁君〉、〈谭君〉复各膺社长、理事之举。学社之事，弟子年十五以上，皆得参议，盖纯乎立宪体者。开学之日，同志毕集，演说者□人，致颂辞者□人，咸以及时厉学保权任事为勖，咸无背宗旨。呜呼，我国苦专制久矣，诚以诸君宗旨之正而引而申之，扩而充之，以灌输立宪思想于国民之脑中，则政体改革之机，必有影响于是者。敢记之以为息壤。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

山阴蔡元培记

（1901 年 4 月 19 日蔡元培手稿）

贫儿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

——在北京青年会演说词

贫儿院的历史同成效，刘景山先生已讲得很详细了。鄙人对于贫儿院，有一种特别感想，并且有一种特别希望。所以看得这一次的募捐，比较别种慈善事业尤为重要。请与诸位男女来宾讲讲。

贫儿是没有受家庭教育的机会，所以到院。这原是他们的不幸。但鄙人对于家庭教育很有点怀疑。第一层：教育是专门的事业，不是人人能担任的。譬如诸位有一块美玉，要琢成佩件，必要请教玉工。又如有几两黄金，要炼成首饰，必要请教金工。断不是人人自作的。现在要把自家子女造成适当的人物，敢道比琢玉炼金容易，人人可以自任的么？第二层：有子女的人，不是人人有实行教育的时间。男子呢，莫不有一定职业，就每日有一定作工的时间。作工完毕了，还有奔走公益的，应酬亲友的，随意消遣的。请问每日中有多少时间可以在家与他的子女相见？妇人呢，或是就职业，或是操家政，也有讲应酬好消遣的，请问每日中有多少时间可以专心对付他的子女？所以有钱的就把子女交给没有受过教育的仆婢，统统引诱坏了；没有钱的就听子女在家里胡闹，或在街上乱跑。父母闲暇了，高兴了，子女就有不好的事，也纵容他；忙不过来了，不高兴了，子女就有好的事，也瞎骂一阵，乱打几拳。这又是大多数父母的通病了。而且现在的家庭对于儿童可以算好的榜样么？正经的父母不知道儿童性情与成人

大有不同，立了很严规矩，要儿童仿作，已经很不相宜了。还有大多数的父母夫妇的关系、兄弟妯娌的关系、姑嫂的关系、主仆的关系、亲戚邻居的关系，高兴了就开玩笑，讲别人的丑事；不高兴了，相骂相打。要是男子娶了妾，雇了许多男女仆，那就整日的演妒忌猜疑的事，甚且什么笑话都可以闹出来。这可以做儿童的榜样么？兼且成年的人爱看的书报与图画，爱听的笑话与鼓词，不免有不宜于儿童的，父母看了听了，可以不到儿童的耳目么？有许多儿童都是受了家庭不好的教育，进学校后很不容易改良。所以我对于家庭教育很有点怀疑。

我们古代的大教育家，要算是孔子、孟子。孔子有一个学生叫陈亢，疑孔子教训儿子总比教训学生有特别一点的。有一日问着孔子的儿子伯鱼。照伯鱼对答的：有一次遇见了他的父亲，问他学了诗没有。他说没有学。他的父亲就说了不学诗的短处。又有一次遇见了他的父亲，问他学了礼没有。他也说没有学。他的父亲就说了不学礼的短处。陈亢恍然大悟，知道君子是疏远他的儿子呢。孟子有一个学生，叫公孙丑，有一日问道："君子为什么不亲自教他的儿子？"孟子答道："办不到。教他必用正道。教了不听，必要怒。怒了便伤了父子的感情。万一儿子想着父亲教我的，他自己也还没有作到，这更是彼此互相责备，更坏了。所以古人用交换法把自己的儿子请别人教，反替别人教他的儿子呵。"照此看来，圣如孔子、贤如孟子，尚且不敢用家庭教育，何况平常人呢？

所以我的理想：一个地方必须于蒙养院与中小学校以外，有几个胎教院、几个乳儿院，都由专门的卫生家管理。胎教院的设备，如饮食、器具、花园、运动场、装饰的雕刻与图画、陈列的书报，都是有益于孕妇的身体与精神的。因为孕妇身体上受了损害，或精神上染了汙浊，

都要害及胎儿的。乳儿院的设备，必须于乳儿的母亲身体上、精神上都是有益的。要是母亲有了疾病，或发了邪淫、愤怒、悲愁的感情，都是害及乳儿的。有了这种设备，不论那个人家，要是妇人有了孕，便是进胎教院；生了子女，便迁到乳儿院。一年以后，小儿断乳，就送到蒙养院受教育，不用他的母亲照管。他的母亲就可以回家，操她的家政，或营她的职业了。

现在还没有这种组织，运动别人，别人也不肯信。我想先从贫儿院下手。要是贫儿院试办这种事情很有成效，那就可以推广到不贫的儿童了。这是我的第一种希望。

美国大教育家杜威博士，不久要来中国。他创了一种很新的教育主义，是即工即学，是要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密接。曾在雪卡哥大学附设一个学校试验过，很有成效。我于民国元年在南京发表一篇《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曾于实利主义一节中介绍过。去年在天津青年会演讲《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又介绍过一回。他的即工即学主义，是学生只须作工，一切学理就在作工的时候指点他，用不着什么教科书。我但用贫儿院已设的烹饪、裁缝、木器与地毡四项工作做个比例，就容易明白了。这四项的原料都是动植物，便可以讲生物学。这四项的工具都是矿物作成的，便可以讲矿物学、地质学。作这四项工作的时候，或用热度，或用手力，或用机械，或用电磁，就可以讲物理学。食物的调和，衣服的漂白与渲染，木器的油漆，都与化学有关，便可以讲化学。食物的分量，衣服的尺寸，木器各方面的比例，地毡与房屋的配合，各种原料与工具的购入，各种成绩品的出售，都要计算、记录，便可以讲数学与簿记法。指明原料出产的或成绩品出售的地方，比较各民族饮食、衣服、器具的异同，便可讲地理学与人类学。比较古今饮食、衣服、器具的异同，便可讲历

史学。作工要勤，要谨慎，要有进步，要与同作的学生互相帮助。这四项工作以外，有休息，有共同的运动，又有洗濯食器与衣服、整理被褥、洒扫堂室、应对宾客等杂务，便可以讲卫生与修身。就食物的装置、衣服与器具的形式与色彩，可以讲美学与美术。就贫儿已往的苦痛，现在的安乐，将来的希望，也可以讲点哲学。把一切经过的情形，或教习的言语叫各人写出来，便可以练习国文或外国文。诸位看！照此办法还要用什么教科书么？还要聚了几十个学生在教室里面，各人对了一本书，听教习一句一句的呆讲么？但这种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密接的组织，不但我们中国人没有肯办的，就是办了，也怕没有人肯送他的子弟来。因为中国人现在还叫进学校作读书，要是到校以后，止有工作，没有读书，就一定不赞成了。现在贫儿院既有工作，何不把上午的读书省却，匀派在工作的时间，来试试杜威博士的新主义呢。要是试了有成效，就可以劝别的学校也来试试。这是我第二种的希望。

我国人不许男女间有朋友的关系，似乎承认"男女间止有恋爱的关系"，所以很严的防范他。既然有此承认，所以防范不到处，就容易闹笑话了。欧美人承认男女的交际，与单纯男子的或单纯女子的，完全一样。普通的交际与友谊的关系隔得颇远，友谊的关系与恋爱的关系，那就隔的更远了。他们男女间看了自己的人格同对面的人格，都非常尊重。而且为矫正从前轻视女子的恶习，交际上男子尤特别尊重女子，断不敢稍有轻率的举动。即如跳舞会是古代传下来的习惯，也是随时代进化，活泼中仍含着谨严的规则。不是为贫儿院筹款，曾在迎宾馆举行一次，诸君曾经参与的么？近来女权发展，又经了欧洲的大战争，从前男子的职业，一大半都靠女子来担任。此后男女间互助的关系、无论在何等方面，必与单纯男子方面或单纯女

子方面一样。我们国里还能严守从前男女的界限，逆这世界大潮流么？但是改良男女的关系，必要有一个养成良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是学校了。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是大多数男女同校。我们现在除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若要试办，最好从贫儿院入手。院中男女生都有，但男生专作木工、毡工，女生专作烹饪、裁缝，划清界限，还不是男女同校的真精神。最好破除界限，不论何等工作，只要于生理上心理上相宜的，都可以自由选择，都可以让他们共同操作。要是试验了成绩很好，那就可以推行到别的学校了。

还有一层，中国的戏剧不许男女合演，用男子来假装女子，这是最不自然的。所以扭扭捏捏，不但演剧时不合女子的态度，反把平日间本人的气概都改变了。我不喜观旧剧，对于学生演新剧亦不大欢迎，就是为此。但现在男女尚不能同校，若要合男女学生试演新剧，学生的父母不是要大不答应的么？我以为此事也可由贫儿院先来试办。先就译本的西剧中，选几种悲剧来试演，演得纯熟了，要是开筹款会就可以演给来宾看看，不专靠现在男生的唱歌，女生的跳舞了。要是有几个学生演得很好，就可以作为改良戏剧的起点，不是很有关系么？

以上三端，都想借贫儿院试试男女共同操作的习惯，是我第三种的希望。

我有上述的特别感想与这三种希望，所以看得贫儿院非常重要。尤希望男女来宾竭力替他筹款，不但帮他维持，还要帮他发展呵！

（1919年3月15日《北京大学日刊》
第359、361、362号）

科学之修养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修养会演说词

鄙人前承贵校德育部之召，曾来校演讲；今又蒙修养会见召，敢述修养与科学之关系。

查修养之目的，在使人平日有一种操练，俾临事不致措置失宜。盖吾人平日遇事，常有计较之余暇，故能反复审虑，权其利害是非之轻重而定取舍。然若至仓卒之间，事变横来，不容有审虑之余地，此时而欲使诱惑、困难不能隳其操守，非凭修养有素不可，此修养之所以不可缓也。

修养之道，在平日必有种种信条：无论其为宗教的或社会的，要不外使服膺者储蓄一种抵抗之力，遇事即可凭之以定抉择。如心所欲作而禁其不作，或心所不欲而强其必行，皆依于信条之力。此种信条，无论文明、野蛮民族均有之。然信条之起，乃由数千万年习惯所养成；及行之既久，必有不适之处，则怀疑之念渐兴，而信条之效力遂失。此犹就其天然者言也。乃若古圣先贤之格言嘉训，虽属人造，要亦不外由时代经验归纳所得之公律，不能不随时代之变迁而易其内容。吾人今日所见为嘉言懿行者，在日后或成故纸；欲求其能常系人之信仰，实不可能。由是观之，则吾人之于修养，不可不研究其方法。在昔吾国哲人，如孔、孟、老、庄之属，均曾致力于修养，而宋、明儒者尤专力于此。然学者提倡虽力，卒不能使天下之人尽变为良善之士，可知修养亦无一定之必可恃者也。至于吾

人居今日而言修养，则尤不能如往古道家之蛰影深山，不闻世事。盖今日社会愈进，世务愈繁。已入社会者，固不能舍此而他从；即未入社会之学校青年，亦必从事于种种学问，为将来入世之准备。其责任之繁重如是，故往往易为外务所缚，无精神休假之余地，常易使人生观陷于悲观厌世之域，而不得志之人为尤甚。其故即在现今社会与从前不同。欲补救此弊，须使人之精神有张有弛。如作事之后，必继之以睡眠，而精神之疲劳，亦必使有机会得以修养。此种团体之结合，尤为可喜之事。但鄙人以为修养之致力，不必专限于集会之时，即在平时课业中亦可利用其修养。故特标此题曰：“科学的修养”。

今即就贵会之修养法逐条说明，以证科学的修养法之可行。如贵会简章有“力行校训”一条。贵校校训为“诚勤勇爱”四字。此均可于科学中行之。如“诚”字之义，不但不欺人而已，亦必不可为他人所欺。盖受人之欺而不自知，转以此说复诏他人，其害与欺人者等也。是故吾人读古人之书，其中所言苟非亲身实验证明者，不可轻信；乃至极简单之事实，如一加二为三之数，亦必以实验证明之。夫实验之用最大者，莫如科学。譬如报纸纪事，臧否不一，每使人茫无适从。科学则不然。真是真非，丝毫不能移易。盖一能实验，而一不能实验故也。由此观之，科学之价值即在实验。是故欲力行“诚”字，非用科学的方法不可。

其次“勤”：凡实验之事，非一次所可了。盖吾人读古人之书而不慊于心，乃出之实验。然一次实验之结果，不能即断其必是，故必继之以再以三，使有数次实验之结果。如不误，则可以证古人之是否；如与古人之说相刺谬，则尤必详考其所以致误之因，而后可以下断案。凡此者反复推寻，不惮周详，可以养成勤劳之习惯。故“勤”

之力行亦必依赖夫科学。

再次“勇”：勇敢之意义，固不仅限于为国捐躯、慷慨赴义之士，凡作一事，能排万难而达其目的者，皆可谓之勇。科学之事，困难最多。如古来科学家，往往因试验科学致丧其性命，如南北极及海底探险之类。又如新发明之学理，有与旧传之说不相容者，往往遭社会之迫害，如哥白尼、贾利来之惨祸。可见研究学问，亦非有勇敢性质不可；而勇敢性质，即可于科学中养成之。大抵勇敢性有二：其一发明新理之时，排去种种之困难阻碍；其二，既发明之后，敢于持论，不惧世俗之非笑。凡此二端，均由科学所养成。

再次“爱”：爱之范围有大小。在野蛮时代，仅知爱自己及与己最接近者，如家族之类。此外稍远者，辄生嫌忌之心。故食人之举，往往有焉。其后人智稍进，爱之范围渐扩，然犹不能举人我之见而悉除之。如今日欧洲大战，无论协约方面或德奥方面，均是己非人，互相仇视，欲求其爱之普及甚难。独至于学术方面则不然：一视同仁，无分畛域；平日虽属敌国，及至论学之时，苟所言中理，无有不降心相从者。可知学术之域内，其爱最溥。又人类嫉妒之心最盛，入主出奴，互为门户。然此亦仅限于文学耳；若科学，则均由实验及推理所得唯一真理，不容以私见变易一切。是故嫉妒之技无所施，而爱心容易养成焉。

以上所述，仅就力行校训一条引申其义。再阅简章，有静坐一项。此法本自道家传来。佛氏之坐禅，亦属此类。然历年既久，卒未普及社会；至今日日本之提倡此道者，纯以科学之理解释之。吾国如蒋竹庄先生亦然，所以信从者多，不移时而遍于各地。此亦修养之有赖于科学者也。

又如不饮酒、不吸烟二项，亦非得科学之助力不易使人服行。盖烟酒之嗜好，本由人无正当之娱乐，不得已用之以为消遣之具，积久遂成痼疾。至今日科学发达，娱乐之具日多，自不事此无益之消遣。如科学之问题，往往使人兴味加增，故不感疲劳而烟酒自无用矣。

今日所述，仅感想所及，约略陈之。惟宜注意者，鄙人非谓学生于正课科学之外，不必有特别之修养，不过正课之中，亦不妨兼事修养，俾修养之功，随时随地均能用力，久久纯熟，则遇事自不致措置失宜矣。

（1919年4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60号）

杜威六十岁生日晚餐会演说词

今日是北京教育界四团体公祝杜威博士六十岁生日的晚餐会。我以代表北京大学的资格，得与此会，深为庆幸。我所最先感想的，就是博士与孔子同一生日，这种时间的偶合，在科学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正值博士留滞我国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相同的一点，我们心理上不能不有特别感想。

博士不是在我们大学说：现今大学的责任，就该在东西文明作媒人么？又不是说：博士也很愿分负此媒人的责任么？博士的生日，刚是第六十次；孔子的生日，已经过二千四百七十次，就是四十一又十个六十次，新旧的距离很远了。博士的哲学，用十九世纪的科学作根据，用孔德的实证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詹美士的实用主义递演而成的，我们敢认为西洋新文明的代表。孔子的哲学，虽不能包括中国文明的全部，却可以代表一大部分；我们现在暂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孔子说尊王，博士说平民主义；孔子说女子难养，博士说男女平权；孔子说述而不作，博士说创造。这都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孔子所处的地位、时期，与博士所处的地位、时期，截然不同；我们不能怪他。

但我们既然认旧的亦是文明，要在他里面寻出与现代科学精神不相冲突的，非不可能。即以教育而论，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平民教育家。他的三千个弟子，有狂的，有狷的，有愚的，有鲁的，有辟的，有喭的，有富的如子贡，

有贫的如原宪；所以东郭、子思说他太杂。这是他破除阶级的教育的主义。他的教育，用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作普通学；用德行、政治、言语、文学的四科作专门学。照《论语》所记的，同仁的有若干，他的答语不一样；问政的有若干，他的答语也不是一样。这叫作是"因材施教"。可见他的教育，是重在发展个性，适应社会，决不是拘泥形式，专讲画一的。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经验与思想并重的意义。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这就是试验的意义。

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说，很有相同的点。这就是东西文明要媒合的证据了。但媒合的方法，必先要领得西洋科学的精神，然后用他来整理中国的旧学说，才能发生一种新义。如墨子的名学，不是曾经研究西洋名学的胡适君，不能看得十分透澈，就是证据。孔子的人生哲学与教育学，不是曾研究西洋人生哲学与教育学的，也决不能十分透澈，可以适用于今日的中国。所以我们觉得返忆旧文明的兴会，不及欢迎新文明的浓至。因而对于杜威博士的生日，觉得比较那尚友古人，尤为亲切。自今以后，孔子生日的纪念，再加了几次或几十次，孔子已经没有自身活动的表示；一般治孔学的人，是否于社会上有点贡献是一个问题。博士的生日，加了几次以至几十次，博士不绝的创造，对于社会上必更有多大的贡献。这是我们用博士已往的历史可以推想而知的。兼且我们作孔子生日的纪念，与孔子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作博士生日的庆祝，还可以直接请博士的赐教。所以对于博士的生日，我们觉得尤为亲切一点。我敬〔谨〕代表北京大学全体举一觞，祝杜威博士万岁!

（1919 年 10 月 20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446 号）

义务与权利

——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演说词

贵校成立，于兹十载，毕业生之服务于社会者，甚有声誉，鄙人甚所钦佩。今日承方校长属以演讲，鄙人以诸君在此受教，是诸君的权利；而毕业以后即当任若干年教员，即诸君之义务，故愿为诸君说义务与权利之关系。

权利者，为所有权、自卫权等，凡有利于己者，皆属之。义务则凡尽吾力而有益于社会者皆属之。

普通之见，每以两者为互相对待，以为既尽某种义务，则可以要求某种权利，既享某种权利，则不可不尽某种义务。如买卖然，货物与金钱，其值相当是也。然社会上每有例外之状况，两者或不能兼得，则势必偏重其一。如杨朱为我，不肯拔一毛以利天下；德国之斯梯纳(Strne)及尼采（Nietsche）等，主张惟我独尊，而以利他主义为奴隶之道德。此偏重权利之说也。墨子之道，节用而兼爱。孟子曰：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此偏重义务之说也。今欲比较两者之轻重，以三者为衡。

（一）以意识之程度衡之。下等动物，求食物，卫生命，权利之意识已具；而互助之行为，则于较为高等之动物始见之。昆虫之中，蜂、蚁最为进化。其中雄者能传种而不能作工。传种既毕，则工蜂、工蚁刺杀之，以其义务无可再尽，即不认其有何等权利也。人之初生，即知吮乳，稍长则饥而求食，寒而求衣，权利之意义具，而义务之意识未萌。及其长也，始知有对于权利之义务。且进而

有公尔忘私、国而忘家之意识。是权利之意识，较为幼稚；而义务之意识，较为高尚也。

（二）以范围的广狭衡之。无论何种权利，享受者以一身为限；至于义务，则如振兴实业、推行教育之类，享其利益者，其人数可以无限。是权利之范围狭，而义务之范围广也。

（三）以时效之久暂衡之。无论何种权利，享受者以一生为限。即如名誉，虽未尝不可认为权利之一种，而其人既死，则名誉虽存，而所含个人权利之性质，不得不随之而消灭。至于义务，如禹之治水，雷绥佛（Lessevs）之凿苏彝士河，汽机、电机之发明，文学家、美术家之著作，则其人虽死，而效力常存。是权利之时效短，而义务之时效长也。

由是观之，权利轻而义务重。且人类实为义务而生存。例如人有子女，即生命之派分，似即生命权之一部。然除孝养父母之旧法而外，曾何权利之可言？至于今日，父母已无责备子女以孝养之权利，而饮食之，教诲之，乃为父母不可逃之义务。且列子称愚公之移山也，曰："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虽为寓言，实含至理。盖人之所以有子孙者，为夫生年有尽，而义务无穷；不得不以子孙为延续生命之方法，而于权利无关。是即人之生存，为义务而不为权利之证也。

惟人之生存，既为义务，则何以又有权利？曰：盖义务者在有身，而所以保持此身，使有以尽义务者，曰权利。如汽机然，非有燃料，则不能作工，权利者，人身之燃料也。故义务为主，而权利为从。

义务为主，则以多为贵，故人不可以不勤；权利为从，则适可而止，故人不可以不俭。至于捐所有财产，以

助文化之发展，或冒生命之危险，而探南北极、试航空术，则皆可为善尽义务者。其他若厌世而自杀，实为放弃义务之行为，故伦理学家常非之。然若其人既自知无再尽义务之能力，而坐享权利，或反以其特别之疾病若罪恶，贻害于社会，则以自由意志而决然自杀，亦有可谅者。独身主义亦然，与谓为放弃权利，毋宁谓为放弃义务。然若有重大之义务，将竭毕生之精力以达之，而不愿为室家所累；又或自忖体魄，在优种学上者不适于遗传之理由，而决然抱独身主义，亦有未可厚非者。

今欲进而言诸君之义务矣。闻诸君中颇有以毕业后必尽教员之义务为苦者。然此等义务，实为校章所定。诸君入校之初，既承认此校章矣。若于校中既享有种种之权利，而竟放弃其义务，如负债不偿然，于心安乎？毕业以后，固亦有因结婚之故，而家务、校务不能兼顾者。然胡彬夏女士不云乎："女子尽力社会之暇，能整理家事，斯为可贵。"是在善于调度而已。我国家庭之状况，烦琐已极，诚有使人应接不暇之苦。然使改良组织，日就简单，亦未尝不可分出时间，以服务于社会。又或约集同志，组织公育儿童之机关，使有终身从事教育之机会，亦无不可。在诸君勉之而已。

（1919年12月7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演说词

今天承诸君邀来演讲，但是这几日很忙，没有时间预备，恐怕说来没有系统，先请诸君原谅。

今日既是国文学会开会，我提出三个问题：第一，高等师范国文部的国文是什么性质？第二，国文和外国文有什么关系？第三，国文和各科学有什么关系？

国文分二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上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

实用文又分两种：一种是说明的。譬如对于一样道理，我的见解与人不同，我就发表出来，好给大家知道。或者遇见一件事情，大家讨论讨论，求一个较好的办法。或者有一种道理，我已知道，别人还有不知道的，因用文章发表出来，如学校的讲义就是。一种是叙述的。譬如自然界及社会的现象，我已见到，他人还没有见到的，因用文章叙述出来，如科学的记述，和一切记事的文章皆是。

美术文又分两种：一种有情的，一种无情的。有情的文章，是自然而然。野蛮人唱的歌，有自然的音调，同说话截然不同；并且混了多少比喻形容的词，决不能拿逻辑去范围他的。后来慢慢发达，就变作诗词曲等等了。无情的又分数种：一种是客套的。我和那个人实在没有什么感情，可是在同一社会，不能不表示同情。如初遇见一个

人，不能不说几句客气话。遇见人家有婚丧的事，不能不贺吊几句。中国尺牍上什么“辰维……”“敬请……”等等，就是此类。一种是卖钱的，如寿序、墓志铭等，作的人同那生的、死的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为自己生活问题，不能不说几句好话。蔡中郎、韩昌黎和现代古文大家的文集里，就有许多是这类的文章。又如书契师爷的笔墨，也是此类。一种是技巧的。作一篇文章，满纸的奇字奥句，故意叫人不认得，不理会。我听人说：有人作文章，作好了以后，拿《说文》上本字去改他。我有一时作八股文，很喜欢用《经传释词》上的古字，《古书疑义举例》上的古句，好像同人开玩笑一样。又譬如作“五言八韵”的律诗，故意用些不容易对的联子取巧，其实一句同一句全不相联。如“月到中秋分外明”，只许用一个“月”，一个“中秋”，又拉了多少“月”和“中秋”的典故填进去。又譬如诗钟，出一个“粉笔”和“袁世凯”，一个“菊”字和一个“静”字，或则分咏，或则嵌字。这种并不是应酬文章，实在不过一种技巧。好像象牙上刻得很精细的花纹，或者一个图章上刻一篇《兰亭序》，实在没有什么好看，不过知道他不容易就是了。

以上所说种种，那一种合于高等师范国文部的国文性质呢？国文部的毕业生，是教中学校或师范学校学生的，这些学生若是专要做文学家的，我们就教他有情的美术文。若是要做技巧家的，我们就教他技巧的文章。若是要学文章卖钱的，我们就教他谀墓文怎么做，寿序怎么做。可是这些学生都是研究学问的，是将来到社会上做事的，因研究学问的必要，社会生活上的必要，我们不能不教他实用文。

学生的国文既应以实用为主，可是文体应该用白话呢？或则用文言呢？有许多原因，我们不能不主张白话。

譬如现在作一篇寿序，自然要做文言，并且要作骈文才好。不然就觉得不容易敷衍了。若是要发表自己的思想，叙述科学的现象，那就是白话有什么不可呢？吴稚晖先生说："文言比白话容易。白话一定要联络，要有条理。若文言，因有一种读惯的腔调，只要读得顺口，便有一种魔力，把似是而非的都觉得是了。"譬如"五言八韵"的试帖诗，可以说是不通的文章；但是我们接着"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的念去，不觉不通了。又譬如用人名对人名，颜色对颜色的文章，好像美术上图案一样。我们撇兰画竹，不能一笔挨一笔，或者二三笔相同。若是图案就不然，如窗户两扇，一定相同；这边有一盆花，那边一定也要一盆花。北方糊房子的花纸，外国制的地毯，不都是重复的么？从前有一个考试的笑话：一篇文章，从头至尾，都写"之"字。图案的文章，就同这个差不多，所以他没有内容。若是我们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叙述科学的现象，那自然不能用没有内容的图案文章了。

并且文学用白话，不是现在中国才发生的。欧洲十六世纪以前，都用拉丁文。就是主张实用科学的培根，也还用拉丁文著书，其他可想而知了。从宗教改革时代，路德等用国语翻译《新旧约》，后来又有多数国民文学家主张国民文学，便一概用国语了。又如德国十八世纪以前，崇尚法语，几乎不认德语有文学上价值；后来雷兴等提倡德语著书，居然自成一种文学了。所以现在科学，就只有动植物、医术上的名词是拉丁文，其余一概不用。我们中国文言，同拉丁文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不改用白话。即如我们中国的司马迁，是人人很崇拜的。假使现在有一个司马迁，人就佩服的了不得。可是他作《史记》，不抄袭《尚书》，《尚书》上"钦"字他改作"敬"，"克"字他改作"能"，又改了他的句调。因为他作《史记》是给当时人看

的，所以一定要改作当时的白话。后来如程、朱、陆、王的语录，完全用白话，不像扬雄模仿《论语》的样子。因为白话实在能够发表他自己正确的意见。又如后来施耐庵的《水浒》、曹雪芹的《红楼梦》，都不模仿唐人小说，可是他的价值还是不错。所以我们现在不必模仿古文，亦不必作那种图案的文章；凡是记述说明，必要用白话才对。虽现在白话的组织不完全，可是我们决不可错了这个趋势。现在高等师范联合会通过“用国语”一条；这边高师亦有国语班；听说教育部决定中学国文兼采白话文。将来白话文的发达，很有希望了。

第二问题，是国文和外国文的关系。严又陵作《天演论》的序，曾说道：“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文字、语言者不能也。”这可见研究外国语，是很有益于国文的。治国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字源流。试问文字都是从简单的起，为什么“一”“二”“三”的古文，反作“弌”“弍”“弎”呢？我从前也很不明白，后来在法国贝尔惹所著的《古代文字史》中看见秘鲁的绳文，才恍然大悟。他摹了两种绳文：一是在一根木棍上挂了许多平行的绳子。其中几根是有结的，结有大有小。我国《易经》说：“上古结绳而治。”郑康成的注，说是“大事大结其绳，小事小结其绳”，就是这个绳文的样子了。一是在一根带着粗枝的木棍上挂了许多丝束。丝有红、黄、蓝、绿、紫各种颜色，也有一束中用两种颜色的。有挂在棍上的，也有挂在枝上的。这带着粗枝的木棍，我们叫作“弋”。“弌”“弍”“弎”等字，就是弋上挂一束、两束、三束的样子，这就是我国的绳文。那时候或者也有画到十几束的，和秘鲁一样。但流传到许叔重时代，止有这三个，所以“四”字下止有古文“𦉭”的籀文“三”，便没有从‘弋’的了。又

如治国文的人，不能不研究文法。但是国文的第一部文法书，便是二十年前马眉叔先生著的《文通》，以前是没有的。马先生因学了法文和拉丁文，把那种文法应用在国文上，才能著这《文通》。要是学国文的人永远不学外国文，怕就永远没有文法书。这不是国文和外国文很有密切的关系么？

第三问题，是国文和科学的关系。我知道高等师范学校，除国文和外国语外，尚有史地、数理、化学、博物等部，这都是科学，都是和国文有重要关系的。我不是说实用文有记述和说明两种么？记述什么？就是科学的现象。说明什么？就是科学的理论。照旧法学国文的人，若是单读几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便止能作几篇空架子的文。要是多读了《史记》一类的史书，《水经注》一类的地理书，《周髀》一类的数学书，《考工记》一类的理学书，《尔雅》释草、木、鸟、兽、虫、鱼等篇和《本草纲目》一类的博物书，便能作内容丰富的文了。何况新出的科学书、和研究科学的方法，比古书丰富得多，岂不更有益于国文么？况科学的作用，不但可以扩充国文的内容，并且可以锻炼国文家的头脑。近代文学家查拉（Zola）主张科学的文学，他因为科学本有两种：一是观察的，如星学等；一是实验的，如化学等，而断定文艺的性质，与实验的科学一样。又如英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是莎士比亚（Shakespeare），但有人考出，这些戏剧，全是实验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作的。德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是鞠台（Goethe），他是治哲学和植物学、动物学、发明生物进化公例的。文学和科学的关系，不是很有证据么？

高等师范学校分了国文、外国语、科学等部，是分工的意义，也是通力合作的意义。既不是互有高下，譬如眼、耳、鼻、舌，各有各的能力，血脉自相贯通，价值也

是平等。若说会了国文，就可以菲薄外国文和科学，难道有了眼，就可以菲薄耳、鼻、舌么？我想国文部诸君必不如此，我不过说个笑话罢了。

（周蘧笔记）

（《蔡子民先生言行录》）

在燕京大学男女两校联欢会上的演说词

今日我承司徒校长招与男女两校联欢会。我知道这个会，是为要实行男女同校的预备，我得参与，甚为荣幸，甚为感谢。但秩序单上却派我作北京男校的代表。我要说句笑话，我似不好承认。为什么呢？因为我有几个关系的学校，都不是专收男生的。如在法文专修馆，我是挂名的馆长，馆中有女生两人。在孔德学校，我是挂名的校长，校中一百多学生，女生比男生占多数。我所专任的是国立北京大学，现在也有女生九人。这几个学校，可以叫作男校么？

从前常常有人来问："大学几时开女禁？"我就说："大学本来没有女禁。欧美各国大学没有不收女生的。我国教育部所定的大学规程，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不过以前中学毕业的女生，并不来要求，我们自然没有去招寻女生的理，要是招考期间，有女生来考，我们当然准考。考了程度适合，我们当然准入预科。从前没有禁，现在也没有开禁的事。"那时考期已过，有各处女生要求到校旁听。我们审查资格后，允许旁听的，已有九人。今年暑假招考，如有女生来应试，一定照男生一样办理。

所以我的本意，似乎不必有男校、女校的分别。但燕京大学，历史的演进，校舍的限制，尚然男女分校，就是北京的学校，事实上大多数是男女分校的，况且今日代表北京女校的毛夫人，已经演说过了。我的不肯承认男校代

表，只好算一句笑话。我现在仍遵司徒校长之命，代表北京男校敬致祝贺之意。

（1920年10月《蔡孑民先生言行录》）

在中国科学社公祝蔡元培七秩寿宴上的演说词

今天承诸位社友赐予盛宴，并致祝词，实不敢当。

诸君今年大家多一岁，都应当庆祝。人生在世，一百二十岁为上寿，一百岁为中寿，八十岁才称下寿。只有社会的寿最长，可以祝万岁。中国科学社到现在虽只有二十多岁年龄，但外国学会在百年以上者很多，法兰西学院已到三百年，故学会也是万寿无疆的。今以长寿的团体来祝个人，真是荣幸。

我幼时读孔子七十岁时的生命叙述，倘使与他比较，真是惭愧。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我十五岁还在私塾读书，当时考得取秀才叫做进学，所谓志于学只好算志在进学而已。"三十而立"，不知何解。有一位八股先生说："圣人至两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敢坐者也。"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只好坐坐冷板凳，适与孔子相反。"四十而不惑"，也不知作何解，孟子解释为不动心。记得清曾国藩在治军时，幕府中有一位风流秘书李次青，甚为曾所赏识。一日，李在签室，偶见案头置一册，信手翻之，首列一题曰《不动心说》，盖幕宾所做的。中有曰："今使置吾于曼妙娥眉之前，越女在左，燕姬在右，当此之时，动心否乎？曰不动。今使置我于红蓝大顶之旁，锦绣在前，刀锯在后，当此之时，动心否乎？曰不动。"李阅至此，不觉大笑，取笔题其后曰："曼妙蛾眉侧，红蓝大顶旁，此心都不动，只想骗中堂。"我四十岁是到德国

的第一年，还在求学，红顶花领当然谈不到。“五十而知天命”，孟子解释为莫之致而致，莫之为而为。我五十岁是在民国五年，当时在欧洲，得教育部电报，嘱我回国办北大。因为我领用教部官费，不得不回，乃于〈民〉六春在北大任事。在欧洲时实想不到办北大，真是所谓莫之致而致，莫之为而为了。“六十而耳顺”，元朝施耐庵解释为顺风耳，或者就是德律风之类。我六十岁时在上海，奉到南昌行营之命，赴宁波开政治分会会议，上海预备去的有七八人。那时浙江风声很不好，蒋梦麟、陈独秀等都劝我勿去，但我一切已预备好，仍然动身。后来到底从宁波雇了渔船亡命到福州，一切消息都不通。这都是因为没有顺风耳的缘故，否则宁波也不去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解释是，一有念头，随便可以行动，做得总是对的。孔子是圣人，做得到。我是决做不到的。

马先生的勉励，敬谨接受，并祝大家新年康乐！

（1936年1月19日中国科学社《社友》杂志第53期）

在上海各界庆祝蔡元培七旬寿庆宴会上的答词

今日承上海行政界、金融界、教育界、美术界诸位名人在此聚餐，说为鄙人祝寿，实在不敢当得很。当前一个月刘海粟先生来约期时，鄙人曾经力辞，而刘先生称已有多人约定，不敢取消；鄙人不敢不参加，谨先向诸位名人致谢！

祝寿的话，最古的恐就是华封人祝尧“多寿”，但庄子多寓言，未足为尧时已有祝词之确证。惟《诗》三百篇，始有“万寿无疆”、“万寿无期”、“俾尔寿而臧”、“俾尔寿而康”等语，而周代鼎彝，亦常有“用蕲眉寿”等语，与殷虚甲骨的直叙卜词不同，但商颂却也有“绥我眉寿”、“寿考且宁”等语，不见得是商代的遗诗，可见祝寿的风习，大约起于周朝。这是后世用诗文祝寿的起源。到了周季，遂有神仙家杜撰长生不老的术来骗人，秦皇、汉武等既得富贵，又要寿考，遂大上其当。又有无聊文人，造了列仙传等书，是后世祝寿引用神仙故事的起源。

我们现在若去掉这些迷信的关系，而观察希望长寿的心理，在主观上，也不必都同。在普通人固然多有“百年偕老”、“五世同堂”等幻想，但如南齐初年的百姓语，有“可怜石头城，宁为袁粲死，不作彦回生”等语，其实袁粲死时年已五十八，褚彦回死时不过四十八，彦回若与粲同死，亦不过早了四年；在彦回心中必觉得不值。又如吴梅村临死作词称：“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沈吟不断、草间偷活。”又说：“脱屣妻孥非易事，更一钱不值何须

说。”他的内疚如此。查梅村死时六十三岁，若在清顺治十年应诏入都时便死，也不过少活十八岁，所以悔恨得很。至若宗汝霖临死时大呼“渡河者三”，这是觉得尚有应尽未尽的责任。而诸葛孔明《出师表》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又是活一日做一日的精神。

若在客观上，对于别一个人的生命，也有点不同。例如夏民对桀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孔子说原壤壤“老而不死，是为贼”；并普通骂人说“该死”；“恶之欲其死”的一类。又对于无甚关系的人，除了博爱主义者外，抱着听其自生自灭的态度的也很多。惟对于有益社会的人，希望他多活几年，再为社会尽几分力量，这是比较有意义一点。

今日诸位名人祝鄙人长寿，当然含有尽力社会的责任。但鄙人自省一回，就惭愧一回。从前蘧伯玉生五十年，知道四十九年的非，鄙人到七十年，不能不知道六十九年的非了。回忆从前经过，可为而不为，与不可而为的，不知多少；多一年，就增了一年的悔恨，较之蘧伯玉要增加二十年悔恨，不是罪孽深重吗？若是年富力强，还可徐图补救；但七十岁了，余年有限，还来得及补救么？所以鄙人自己不敢高兴，反觉得危惧了。但鄙人也不是妄自菲薄的人，既承诸位名人的责备，鄙人也不敢推卸。鄙人是一个拿笔杆的人，所敢夸口的也只能在笔杆上多尽点力。“假我数年”，鄙人想把刘先生寿文中道及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张，著一本书；还想编一本美学，编一本比较民族学，编一本“乌托邦”；胡适之先生常常劝鄙人写自传，如时间允许，鄙人也想写一本。愿心许得太多了，不敢再说下去了。谨谢谢在座诸位名人的盛意，永不敢忘！

（1936年2月9日蔡元培手稿）

复兴民族与学生

——在大夏大学学生自治会演说词

我们为什么要复兴民族？

复兴民族的意思，就是说，此民族并不是没有出息的，起先是很好的，后来不过是因为环境的压迫，以致退化，现在有了觉悟，所以想设法去复兴起来。复兴二字，在西方本为 Renaissance 一字，在西洋中世纪以前，本有极光明的文化，后为黑暗时期所埋没，后来又赖大家的努力，才恢复以前的光明，因而名之曰复兴。中国古时文化很盛，古书中常有记载，周朝的文物制度与希腊差不多，周季，有儒、墨、名、法、道家的哲学，此后如汉、唐的武功，也不能抹煞的。但到了现在，我们觉得事事都不如人，不但军事上，外交上不能与列强抗衡，就是所用的货物也到处觉得外国的物美价廉，胜于国货，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的劣点。然而我们不能自认为劣等的民族，而只认为民族的退化，所以要复兴。

民族乃集合许多分子而成，现在欲复兴民族，须将民族全部分子提高起来，提高些什么呢？我们的答案是：

第一，体格——中国民族为什么不中用，第一步乃是身体不健全，死亡率、病象、作工能力、体育状况，无论哪一种统计，都显出我们民族的弱点，所以要复兴民族，第一步是设法使大家的身体强健起来。我闻张君俊先生说，中国民族衰老的现象，南方人智力较胜于北方人，而体力都较逊于北方人；北方人体魄强壮而智力远逊于古

人，因北方常有黄河之灾，且常为游牧民族所侵略，因而民族之优秀者均迁南方，此为历史证明的事实。如南北朝时代，如辽金元时代皆是，但南方气候潮湿，多寄生虫，不适宜优秀民族的发展。为复兴民族计，宜注重北方的开发。我以为北方固要开发，而南方亦可补救，我们若能发展北方人之智慧，增加南方人的体力，何尝不可用人为的力量，来克服自然呢？巴拿马旧以多蚊而不能施工事，后用科学灭蚊法而运河乃成。我们欲使民族强健起来，一定可用人力来做到。

第二，知识及能力——中国人的智能，并非不如外国人。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演讲中说："恢复中国固有的智能"，足以证明，如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的发明，长城、运河等建设，素为外人所称道，但到现在，科学的创造、建设的能力，各民族正非常发达，而我民族则不免落伍，然我们追想祖先的智力与能力，知道我们决非不能复兴的。例如波兰，虽经亡国之惨变，今仍能恢复，即有民族文化之故：远之如哥白尼之天文，近之如居礼夫人〈之〉化学，及其他著名之文学家、美术家，都是主动力，可以证明固有的知能足以兴国的。

第三，品性的修养——民族之文化，一面在知识之发展，一面则赖其品性优良。向来称优良之品性为道德。道德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是因各地方各时期的不同而定的。不过其中有一抽象的原则，是不可不注意的。此原则即为"爱人如己"。他的消极方面即为"己所勿欲，勿施于人"；其量则"由近而远"，初则爱己、爱家，继则爱族、爱乡、爱国，而至爱世界的人类，此种道德观念，与其用信条来迫促他，还不如用美感来陶冶他。我们看美术的进步，亦是由近而远，初用以文身，继用以装饰身体，或装饰花纹于用品上，远则用以装饰宫室，且进而美化都

市，其观念渐行扩大，由近而远，正与道德观念相应。

总之，复兴民族之条件为体格、智能和品性。这种条件，是希望个个人都能做到的。目前中国具了这三条件之人，请问有多少？可说是少数。但我们希望以后能达到。不过如何去达到呢，还不能不有赖于最有机会的人——学生，尤其是大学生，先来做榜样了。

大夏大学设在郊外，早已采取了牛津、剑桥大学的导师制，更有做榜样的资格。故如欲复兴民族，应由你们做起。在这里，我得介绍一位章渊若先生，他是提倡自力主义的，就是说人人都要从自己做起来再说。我现在就要劝诸位自己先做起来。学生自治会，就是促进各人自己努力的机关。

第一，以体育互相勉励——提倡体育是一个改进民族的很好的办法。日本人提倡体育，很有进步，就影响到了全体民族，所以，我们不能不有认识，体育乃是增加身体的健康，同时谋民族的健康，而非为出风头。以前的选手制，常犯了偏枯的毛病，根本失却了体育的本意，因而，常会发生下面的几种错误：（一）不平均——体育为少数人所专有；（二）太偏重——一部份选手则太偏于运动，牺牲了其他功课。今后对于体育之认识，则为根据于卫生的知识，不一定要求其做国手。听说贵大学现在实行普及体育，学生自治会又在促进普及体育的成功，这是可喜的。

第二，以知识及能力的增进互相勉励——大学内天天有教师讲授，但单靠教师讲授是不足的。还要自己去用功才行。用功要得法，单独的与集合的用功，都有优点，可以并行。同学之互相切磋，那是很有益的。自治会的组织，与同学的知能增进，有直接关系。从前我们有读书会，大家选定几本书，每人认一本去读，读了分期摘要报

告，或加以批评，如听了觉得有兴味的，自己再去详读，否则，也就与自己读过无异了。这一类互助的方法很多，对于学问，很有补益的。

第三，以品性修养互相勉励——彼此互相检点，对于不应为的事情，互相告诫；对于应为的事情，互相督促；固然是自治会应有的条件，然完全为命令式的，如“你应该这样”，“你不应该怎样”，有时反引起对方的反感。所以我主张以美术来代替宗教，希望人人都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善意。因为人类所以有不应为而为的事情，大抵起于自私自利的习惯。有时候迫于贪生怕死的成见，那就无所不为了。惟有美术的修养，能使人忘了小己，超然于生死利害之外，若人能有此陶冶，尤论何等境遇，均不失其当为而为，不当为而不为之气概。前十七八年，我长北京大学时，北京还没有一个艺术学校，全国还没有一个音乐学校，所以我在北大内发起音乐研究会、书画研究会，使学生有自由选习的机会。现在艺术的空气已弥漫全国，上海一市，音乐艺术的人才尤为众多，贵自治会如有此等计划，必不难实现了。

贵自治会如能于右列三者，加意准备，则复兴民族的希望，已有端倪，我不能不乐观。

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

（据上海《晨报》1936年7月1日）

告全国文

培等为欢迎袁大总统而来，而备承津、京诸同胞之欢迎，感谢无已。南行在即，不及一一与诸君话别，敬撮记培等近日经过之历史以告诸君，托于临别赠言之义。

（一）欢迎新选大总统袁公之理由　自清帝辞位，大总统孙公辞职于参议院，且推荐袁公为候选大总统。参议院行正式选举，袁公当选，于是孙公代表参议院及临时政府，命培等十人欢迎袁公莅南京就职。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且当专制、共和之过渡时代，当事者苟轻违法理，有以个人凌躐机关之行动，则涉专制时代朕即国家之嫌疑，而足以激起热心共和者之反对。故袁公之就职于南京，准之理论，按之时局，实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者也。

（二）袁公之决心　培等二十七日到北京即见袁公，二十八日又为谈话会，袁公始终无不能南行之语。且于此两日间，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会诸君尚皆谦让未遑，故行期不能骤定也。

（三）京津之舆论　培等自天津而北京，各团体之代表，各军队之长官，及多数政治界之人物，或面谈，或投以函电，大抵于袁公南行就职之举，甚为轻视。或谓之仪

文，或谓之少数人之意见（其间有极离奇者，至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只可一笑置之）。而所谓袁公不可离京之理由，则大率牵合临时政府地点，或且并迁都问题而混入之，如所谓藩属、外交、财政等种种关系是也。其与本问题有直接关系者，惟北方人心未定一义；然以袁公之威望与其旧部将士之忠义，方清摄政王解职及清帝辞位至危疑之时期，尚能镇摄全京，不丧匕鬯，至于今日，复何疑虑？且袁公万能，为北方商民所公认，苟袁公内断于心，定期南下，则其所为布置者，必有足以安京、津之人心，而无庸过虑。故培等一方面以京、津舆论电达南京备参考之资料，而一方面仍静俟袁公之布置。

（四）二月二十九日兵变以后之情形　无何而有二月二十九日夜中之兵变，三月一日之夜又继之，且蔓延保定、天津一带。夫此数日间，袁公未尝离京也，袁公最亲信之将士，在北京自若也；而忽有此意外之变乱，足以证明袁公离京与否，与保持北方秩序，非有密切不可离之关系。然自有此变，而军队之调度，外交之应付，种种困难，急待鳃理，袁公一日万机，势难暂置，于是不得不与南京政府协商一变通之办法。

（五）变通之办法　总统就职于政府，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也；临时统一政府之组织，不可以旦夕缓也；而袁公际此时会，万不能即日南下，则又事实之不可破者也。于是袁公提议，请副总统黎公代赴南京受职。然黎公之不能离武昌，犹袁公之不能离北京也。于是孙公提议于参议院，经参议院议决者，为袁公以电宣誓，而即在北京就职，其办法六条如麻电。由是袁公不必南行，而受职之式不违法理，临时统一政府，又可以速立，对于今日之时局，诚可谓一举而备三善者矣。

（六）培等终局之目的及未来之希望　培等此行，为

欢迎袁公赴南京就职也。袁公未就职，不能组织统一政府；袁公不按法理就职，而苟焉组织政府，是谓形式之统一，而非精神之统一。是故欢迎袁公，我等直接之目的也；谋全国精神上之统一，培等间接之目的也。今也袁公虽不能于就职以前躬赴南京，而以最后之变通办法观之，则袁公之尊重法理，孙公之大公无我，参议院诸公之持大局而破成见，足代表大多数国民，既皆昭揭于天下；其至少数抱猜忌之见，腾离间之口者，皆将为太和所同化，而无复纤翳之留。于是培等直接目的之不达，虽不敢轻告无罪，而间接目的所谓全国精神上之统一者，既以全国同胞心理之孚感而毕达，而培等亦得躬逢其盛，与有幸焉。惟是民国初建，百废俱举，尤望全国同胞永永以统一之精神对待之，则培等敢掬我全国同胞之齐心同愿者以为祝曰：中华民国万岁！

（《民立报》1912 年 3 月 11 日）

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

今日之临时教育会议，即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之中央教育会议。此次会议，关系甚为重大，因有此次会议，而将来之正式中央教育会议，即以此次会议为托始。且中国政体既然更新，即社会上一般思想，亦随之改革；此次教育会议，即是全国教育改革的起点。此次议决事件，如果能件件实行，固为重要关系；即使间有不能实行者，然为本会已经议决之案，将来亦必有影响。诸君有远来者，即或在近处者，亦是拨冗而来，均以此次会议关系重大之故。

民国教育与君主时代之教育，其不同之点何在？君主时代之教育方针，不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用一个人主义或用一部分人主义，利用一种方法，驱使受教育者迁就他之主义。民国教育方针，应从受教育者本体上着想，有如何能力，方能尽如何责任；受如何教育，始能具如何能力。从前瑞士教育家（沛斯泰洛齐）有言：昔之教育，使儿童受教于成人；今之教育，及使成人受教于儿童。何谓成人受教于儿童？谓成人不敢自存成见，立于儿童之地位而体验之，以定教育之方法。民国之教育亦然。君主时代之教育，不外利己主义。君主或少数人结合之政府，以其利己主义为目的物，乃揣摩国民之利己心，以一种方法投合之，引以迁就于君主或政府之主义。如前清时代承科举余习，奖励出身，为驱诱学生之计；而其目的，在使受教育者皆富于服从心、保守心，易受政府驾驭。现在此种主

义，已不合用，须立于国民之地位，而体验其在世界、在社会有何等责任，应受何种教育。

社会逃不出世界，个人逃不出社会。世界尚未大同，社会与世界之利害未能完全一致。国家为社会之最大者，对于国家之责任与对于世界之责任，未必无互相冲突之时，犹之对于家庭之责任与对于国家之责任，不能无冲突也。国家、家庭两种责任，不得兼顾，常牺牲家庭以就国家；则对于国家之责任，自以与对世界之责任无冲突者为范围，可以例而知之。至于人之恒言，辄曰权利、义务。而鄙人所言责任，似偏于义务一方面，则以鄙人对于权利、义务之观念，并非相对的。盖人类上有究竟之义务，所以克尽义务者，是谓权利；或受外界之阻力，而使不克尽其义务，是谓权利之丧失。是权利由义务而生，并非对待关系。而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克尽其种种责任之能力，盖无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亦无可疑也。

当民国成立之始，而教育家欲尽此任务，不外乎五种主义，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是也。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为根本。我国人本以善营业闻于世界。侨寓海外，忍非常之困苦，以致富者常有之，是其一例。所以不免为贫国者，因人民无道德心，不能结合为大事业，以与外国相抗；又不求自立而务侥幸。故欲提倡实利主义，必先养其道德。至于军国民主义之不可以离道德，则更易见。我国从前有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之语。现在军队时生事端，何尝非尚武之人由无道德心以裁制之故耳。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从前言人才教育者，尚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之说，可见教育家必有百世不迁之主义，如公民

道德是。其他因时势之需要，而亦不能不采用，如实利主义及军国民主义是也。吾人会议之时，不可不注意。

又有一层，我中国人向有一弊，即是自大；及其反动，则为自弃。自大者，保守心太重，以为我中国有四千年之文化，为外国所不及，外国之法制皆不足取；及屡经战败，则转而为崇拜外人，事事以外国为标准，有欲行之事，则曰是某某国所有也。遇不敢行之事，则曰某某等国尚未行者，我国又何能行？此等几为议事者之口头禅，是由自大而变为自弃也。普通教育废止读经，大学校废经科，而以经科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是破除自大旧习之一端。

至现在我等教育规程，取法日本者甚多。此并非我等苟且，我等知日本学制本取法欧洲各国。惟欧洲各国学制，多从历史上渐演而成，不甚求其整齐划一，而又含有西洋人特别之习惯；日本则变法时所创设，取西洋各国之制而折衷之，取法于彼，尤为相宜。然日本国体与我不同，不可不兼采欧美相宜之法。即使日本及欧美各国尚未实行，而教育家正在鼓吹者，我等亦可采而行之。我等须从原理上观察，可行则行，不必有先我而为之者。例如十三个月之年历，十二音符之新乐谱，在欧美各国为习惯所限，明知其善而尚未施行，我国亦不妨先取而行之。学制之中，间亦有类此者。

此刻教育部预备之议案，大约有四十余种之多。第一类，是学校系统；第二类，是各学校令及规程；第三类，教育行政之关系；第四类，学校中详细规则；第五类，大概含有社会教育性质。

其中有一大问题，是国语统一办法。现在有人提议：初等小学宜教国语，不宜教国文。既要教国语，非先统一国语不可；然而，中国语言各处不同，若限定以一地方之

语言为标准，则必招各地方之反对，故必有至公平之办法。国语既一，乃可定音标。从前中央教育会虽提出此案，因关系重要，尚未解决。

此外，又有种种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界解决者。如前清学部主张中学以上由中央政府直辖；中学以下，归地方政府管辖。日昨有几位谈及，谓废府以后，中学校应归省立或县立。此等须俟地方官制颁布后，始能规定。现在只能假定一划分之方法，即如中等以上教育，取给于国家税，或以国家产业作基本金；中等以下，取给于地方税，或用地方产业作基本金。亦只能为假定之方法。

诸君此次来京，想亦有许多议案提出。其间与本部及他议员提出之问题略同者，可以合并讨论。此次临时教育会议，时期甚短，而议案至多。若讨论过于繁琐，恐耽误时间，不能尽议。盖诸君多半担任教育事务者，即使延会，恐亦不能过于延长。所以，希望诸君于议案之排列，将重要者提前开议。又每案之中，先摘出重要诸点，详细讨论；其他无关宏旨者，不妨姑略之。鄙人今日所欲言者止此。

（1912年7月10日《教育杂志》第4卷第6号“特别记事”栏）

在临时教育会议谈话会上的谈话

自南京组织临时政府，所谓革命党人居多，革命党即同盟会。南北统一，唐绍仪到宁，时局为之一变。及政府北迁，内阁组织，遂有甲、乙两派，参互其间，甲派即同盟会，乙派即非同盟会。在平时，甲派主张冒险进取，乙派主张和平保守。政见不同，即政策不同。但政见政策必取同一之致，而后收效较大。此时吾即不愿加入内阁。

统一政府既成，甲、乙两派之主张，常致两歧。即如裁兵，甲派主张就全国统计，何兵可留，何兵可裁；乙派主张当就一部分一方面从事。如都督简任，甲派主张由地方取同意后，呈由大总统任命；乙派主张纯由中央选择，而大总统任命之。如借债，甲派主张一面向外国资本团磋商，一面由国民可以募集处设法募集；乙派主张佥以外债为前提。其他不能同一之事，大都类是。以致两三月来，政府毫无大政策发表，朝令暮令，无非琐屑之端，不速挽救，于大局万分危险。

甲派之在国务院者，即倡辞职之议。与其两派混合，致政治不能进行，不如任何一派主持国务，犹得实行其政见。赞成是说者，为唐、王、宋、蔡诸人。旋唐绍仪以借款尚未签字，苟提议辞职，于事有碍，迟待一星期，适王芝祥都督问题发生，唐绍仪不得已而去。是时余等主见，亟当实践，在余等以为，内阁均负连带责任，余等之去，为当然之事。各方面有责谓不以国家为前提者，不知正以

国家为前提，故如是也。

至对于教育部言，总长为政务官，非常务官，总长去留与部务毫无关系。若以个人而论，则今日诸君之盛意，极为感谢。但此次辞职，出于当然，既非闹党见，尤非甘置国家于不问也。愿诸君谅之。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三日

（《民立报》1912年7月21日）

答客问

中华民国元年七月十四日，蔡元培既解教育总长之职，客有就而问之者曰：何子之不以国家为前提，而悻悻然必欲辞职也?

答曰：否，否，我之辞职，正我之不敢不以国家为前提也。

自第一次临时政府建设时，我即与于阁员之列。其时，以同盟会派之大总统组织政府于南京，各部总长，自陆军、外交、教育外，皆以非同盟派之负时望者充之，而次长得与阁议，则大率同盟派，故其时直可谓之同盟会政府，而实含有混合内阁之性质。其结果，则凡非同盟派之各部长，始也，偶一到部，偶一列阁议；继也，遂绝迹不至。内务总长以病不视事，尚承认次长有代行之权；司法总长则携印而去，几使部中不能发一公牍；其他最负时望者，或未辞职，或辞职而尚未得请，率逍遥上海，日伺所谓政府之短，而相与訾警之，甚者以通电宣布之，若自忘其为政府之一员者。我于是时已深信异性分子之集合体，决不能有一致进行之效。故于唐君绍仪在北京为组织第二次临时政府之预备时，我即抱一同盟派均不加入之希望，而请自傀〔隗〕始，则力辞教育总长，荐范君以自代，其后，受各方面之迫促，不得不出而任事，非本意也。

入北京国务院，院中显分二派。我不欲列举事实，以挑起两派间之恶感。姑抽象而言之，甲派主划清大总统及国务院之权限；而乙派则欲事事奉令承教于大总统。甲派

主以国务院为有机之组织；而乙派则常以国务员为单独之行动。甲派主定大计，负责任；而乙派主用阴谋，逞机智。同一谋统一也，甲派主开诚布公，得各方面之同意；而乙派主因利乘便，以一方为牺牲。同一集权中央也，甲派主限制的，而乙派主极端的；甲派主驯致的，而乙派主袭取的。同一借外债也，甲派主欲取姑与，一方面为取给于本国之筹备；而乙派主为单纯之磋商。其他不同之点，大率如此。

夫以一国务院之中，而有此背道而驰之两派，乌得不机关停滞，万事丛脞。欲救其弊，非去一派而全委其权于对待之一派不可。我等甲派之人，自然以甲派为善；然即使尽去甲派而专任乙派，亦必差胜于甲、乙两派之混合也。乙派之去，非我等所能为役。于是，集甲派之人而商退职，皆承诺。且于甲派尽退后，集乙派中何等人才，可以重行组织，亦皆筹议概略，以备大总统之采用。此六月初旬间事也。既定议，由总理请于大总统，大总统不允，总理不敢强。迁延十余日，轇葛之问题益多，我等不能复忍，乃相与商议，谓总理以与大总统有三十年之交谊，既不能划权〈限〉定大计，又不敢决然去职，我等四人宜先提出辞职书，皆承诺。乃告总理，总理曰："甚善！公等辞职后，我亦得借此以辞，然银行团之垫款将签押，恐不免受公等辞职之影响，我辈为大局计，宜稍缓，俟垫款签押后，即提出，何如?"佥曰诺。此唐君未辞职以前，我等四人已决定辞职之事实也。

无何，唐君以特别之原因赴天津，始焉请假，终焉解职。总理既解职，其所组织之国务院，当然解散，我等辞职，遂为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而无何，大总统挽留之问题起。所谓挽留者，非不必辞职之谓，而实下次再加入国务院之谓也。夫对于我等而询加入下次国务院与否，本新

总理之分内事；大总统尚未选定新总理，而先越俎而代之，本为我等所不能承认者，且我等固自有加入与否之条件，决非可空言挽留也。

我等加入与否之条件如何？曰：甲、乙两派同院之害，我等既饫于经验矣；而下次国务院中，必以乙派者占重要之位置，为我等所敢预决，故我等力主不再加入，俾彼等组织一纯粹乙派之国务院，以此提议于同盟会本部之会议，大多数赞成。会员中又有提议者，谓我等不可专持消极主义，如大总统请本会会员组织纯粹之政党内阁，则本会会员不可以不担任，佥曰然。于是又增一积极主义。以此两主义电询各地重要之支部，皆复电赞成。于是，持此消极、积极两主义，以求实现政党内阁之理想，实由我等半年来之经验，及同盟会全体之商榷，确然以国家为前提，熟思审虑而后断定之者。是为吾党神圣不可侵犯之条件。有破坏此条件者，不特吾党之败类，而实民国之罪人也。于是，由同盟派之参议员代表告诸他政党，告诸大总统。而同盟会之所主张，业为全国所公认。

无何，大总统所求同意于参议院，而参议院通过之总理，确非同盟会派。是不啻正告我等以不必加入也，是适合于我等最初提议之条件，我等何为而复加入？

曰：然则外间议论，谓唐君之去以病，故公等之连带去职为无理由者，非欤？曰：非也，观我等去志之决，远在唐君未行之前，可以知之。

曰：外间议论，多以公等之去，为牺牲国家以就党见，亦非欤？曰：亦非也，吾党之所以有此意见，本以国家为前提，熟思审虑而断定之，如前所述。然则我等坚持党见，正我等之以国家为前提也，何牺牲国家之有？

曰：外间纷传，大总统面留公等，曰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而君则亦言元培亦代四万万人辞总统，有之乎？

曰：大总统之言，诚然；我之言，则稍有传闻之误。盖大总统此言，所以表明其挽留之意，非由个人之感情，而实代表人民之公意。我答之曰，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亦所以表明我等对于大总统而辞职，非怼于大总统个人，而实怼于国民全体之代表也。而外间乃传为我亦代表四万万人，我虽不通，亦不至离奇乃尔。

曰：子之对于教育部，则如何？曰：我于教育行政，非所素习。然部中僚友，实有和衷共济之乐，猝然舍去，良用歉然。又如临时教育会议，为半年来所注意之规划，而不能始终其事，尤疚心焉。惟政务一方面既有不可不去之原因，则不能不牺牲事务以就之，盖一部之于一国，其轻重固悬殊也。且吾在教育部，决不敢谓吾所主张者之皆可以实行，而尤希望继我者之所主张，较我为切实也。

曰：教育为今日当务之急，且子在国务院，不过十人中之一人；而在教育部，则独当一面。子于教育部，即无可去之理由，则姑委蛇于国务院，而实行子之所主张于教育部，小诎于彼，而大申于此，不亦可乎？曰：否，否，子之所言，枉尺直寻之说也，孟子與氏既已辞而辟之。且子亦知吾党之特性何在乎？曰有一定之宗旨，曰有责任心，曰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故吾党不必无执拗粗暴之失德，而决无敷衍依阿之恶习。使托于暧昧之爱国谈，而并此特性而牺牲之，则我等在前清时代，早已徘徊阁部，持万世一系之君主立宪说，以自托于当日之爱国者矣。宁待民国成立以后，而始觍然旅进旅退于无方针、无线索之国务院，以充纸糊台阁之片段乎！

客无以难，于其去也，遂记之以告世之不明始末而妄加评议者。

（1912年7月14日《蔡元培答客问》铅印传单）

优美与崇高

在浦东中学演说词

杨锦春先生创此校时，邀上海学界中人与议，当时弟亦在场，即钦佩之。因富豪不肯捐资兴学，而杨先生独能之也。校成，又提出勤、朴二字，以诏职员学生，弟又甚钦佩之。盖勤、朴二字，即彼自己所经历也。彼无资本，何以能创此校乎？彼何以有资本乎？以其勤于工业，故收入甚丰也。然收入虽丰，苟徒逞一身之快乐，则资本又将消耗矣，安有余钱创此校乎？吾故曰，勤、朴二字，实为校主一身得力之处。不惟此而已，浦东中学，即勤、朴之产物，苟非勤、朴，安能产出一浦东中学乎？

吾今又欲提出一字，以补校主所未言，即公字是也。此字虽校主未曾明言，然彼能捐产兴学，不徒自私自利，即其公也。是校主虽未言公字，却能实行公字也。苟非公，又安得有浦东中学乎？校主所以能创此校，由于实行勤、朴、公之三字。此所以为一代伟人，而足以为吾人模范也。

吾人生此民国初建时代，即以奉行此三字为要务；中学生，尤以奉行此三字为要务，何也？国民教育，当遍设小学于国中，养成国民应有之智识技能，似已满足，何故尚须中学乎？盖中学者，（一）为高等普通学，（二）为预备专门学。人必有高等普通学及预备专门学，始能日进不已也。小学教育，授人以应有之智识技能，似已足维持现状矣。然人民不但以对付现状为究竟，尚须求进步也。世

俗之见，或以为指导国民，其责在政府，不免以不肖之心自待矣。或以指导国民，责在学识兼优之学者，此说似较贤。然吾谓实有指导国民之力量者，厥惟中学生，何也？以其受高等普通学，又能进求专门学，故可指导普通国民也。推而广之，虽谓能指导普通人类，亦无不可。故在中学校中之人，即当以此自任。

中学生负指导国民之任，将注意何事乎？共和国最重道德，与从前以官僚居首要之主义，适相反对。从前风俗，以科名为荣耀，自幼即揣摩科举。所以然者，为欲藉考试而得做官也，为做官可得较优之财产，较优之名誉也。故财产、名誉，一归于官僚。盖专制国以君主为最有财产、名誉，以此类推，故小官得小财产，小名誉；大官得大财产，大名誉，故财产、名誉，一归于官僚。今试问，吾国此风已改乎？实未之改也。不但官员未改此风，即议员亦不脱官僚之习。如此旧染污俗，永锢国民之身而不洗除，则吾国将来决难立于世界之上，何也？盖世界强国，决不如此趋向也。政以贿成，决不能强国也。何故政以贿成乎？为官僚贪贿也。官僚所以贪贿者，为不勤也。不勤者无正当之收入，不能以自力自养，必有不正当之收入，庶足以济。欲求不正当之收入，于是乎贪；彼又有不正当之耗费，故又不能不贪。贪，故政以贿成也。夫为农、为工、为商，均须有正当之劳力，始有正当之收入；不勤不朴者，既不能效正当之劳力，即不能有正当之收入，于是，只可求途于官僚，以冀不正当之收入。若国民相率而求不正当之收入，斯其国危矣。

世界优强之国，官吏收入，较诸实业之收入，不如远甚，故国民相率趋实业而避官僚。今欲挽救吾国之弊，亦惟趋重实业而避官僚而已。今年本校添设工业班，正与此义相合，此又愿与诸君劝勉者也。

趋重实业，即可实行勤、朴、公三字，与旧道德不背，亦与新道德相合。旧道德曰义、曰恕、曰仁等，皆足与勤、朴、公三字互相发挥；新道德如自由、平等、权利、义务，亦赖勤、朴、公而圆满。或疑自由、平等与勤、朴不相容，此误解也。欲依赖他人，即不自由；依赖性，即由不勤所养成。即就小节言之，如起身要人伺候，出外要人跟随，若无人伺候跟随，几乎寸步难行，岂非不自由乎？此等不自由，皆由不勤所养成。故勤即自由，自由赖勤而后完全也。赖父、兄家产而生活者，可不自劳动而得衣食，当其任意耗费时，直可谓世界之蠹虫；及其耗费尽而变为穷汉，其苦有不堪言者，此又可见不勤之不自由矣。朴者，衣、食、住不奢侈也。余谓惟朴者最自由，因其无往不宜也。习于奢侈者，非美衣不衣，非美食不食；一旦遇世乱，美衣、美食不可得，遇粗粝不下咽，得布素不温暖，其不自由又何如乎？此即自由赖勤朴而完满之说也。或疑平等与勤朴无关，岂知世界之不平等，即由于有人不勤朴乎。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己之四体不勤，其影响足令他人受饥寒，此不平等之由于不勤者也。奢侈之家，一饮一食，或耗中人十家之产，以一人之不朴，令多数人迫于饥寒，此又不平等之由于不朴者也。不勤不朴，既不自由，又不平等，刻削他人以利己，尚望其尽己之职，兼为他人尽职乎？杨先生建中学于浦东，为地方造福，即尽己之职，兼为他人尽职也。所以能如此者，即由能勤朴也，岂非吾人所当效法者乎？

或又谓有权利始有义务，惟奴隶有义务而无权利。余则谓权利由义务而生，无义务外之权利。优强人种，得在世界上占优强之位置，亦赖无数先哲之尽义务于前耳。亦有人种竟居奴隶之位置，即因该人类之先辈，不知尽应尽之义务，遂牺牲后人之权利耳。故生而为人，有几十年之

生命，即有几十年之义务。当我之幼时，未能为己、为人尽义务，而有教我、养我者，此被养、被教之权利，乃我预支之权利也。他日者，我任教人、养人之责任，即我应偿之义务也。至老年无力尽义务，而不妨享固有之权利，即支用中年所积蓄者而已。故中年之人，为绝对的应尽义务之人，其尽义务，半以偿幼年之预支，半以供老年之享用。故人努力之机会，全在中年，中学生即中年之起步，安可不自勉乎？

人之生命，不可半途丧失。而有半途丧失者，譬如机器中途被毁，未尽其用，岂不可惜乎？人赖衣、食、住而生，故衣、食、住为保命之要务是也。然使但以衣、食、住保命，而更无活动以尽义务，人生亦太无聊矣。譬如机器，须有房屋以藏之，修理以维持之，此亦机器之权利也。然使但藏诸房屋而不尽其用，则机器之为机器，又何足贵乎？人之能力，远非机器之比，果能为人类尽义务，则衣、食、住之权利，不难取得。且本当发挥其良能，以庄严此世界。余故曰，权利由义务而生，无义务外之权利，而勤朴则义务自尽。

或又谓世界文明进步，机械甚多，交通便利，有无须劳动者；且因机械多，交通便，而装饰品增多，似无须尚朴者，此谬论也。机械多，交通便，所以催人勤，而非阻人勤。用机器而物价廉，地无不辟，事无不举，即助人勤之证也。美国人爱迪生，固发明机器，而赞美机器之功，谓世界数十年后，可无贫人，即机器助人勤之说也。至于交通便而装饰品多，乃以装饰普及于人民，非欲个人穷奢极侈也。世界文明进步，无非以向时少数人所独享者，普及于人人而已。即就建筑布置而论，最讲究者，为学堂、博物院、公园，皆为人人可至之地，亦一证也。昔时惟多财者可以远游，而远游一次，须费多数金钱。今则交通便

而旅费廉，远游之举，可普及于人人矣，非教人奢侈也，所以补偏狭之见而渐趋大同也。我国老子，俄儒托尔斯泰所主张，似有反对机器、交通之意，即以机器、交通，似与勤朴主义不合也。余则谓勤朴主义，适与机器、交通相得益彰，似无须过虑。故吾国人今日奉行勤朴主义，不至与世界潮流反对，亦适与自国国情相合。

余又提出一公字。所谓公者，即他人尽不到之义务，吾人为之代尽也。试举一例，即杨先生之捐产兴学是矣。吾人亦当以杨先生之心为心，尽他人未尽之义务，则道德高而旧染除，国日以强矣。

（1913 年 6 月 14 日《浦东中学之盛会》油印本）

养成优美高尚思想

——在上海城东女学演说词

今日蒙杨先生约弟到此，弟以为可听诸教习先生及来宾诸先生之伟论，故欣然而来。讵知杨先生专诚为弟开欢迎会，殊不敢当。今当先向杨先生及在座诸君道谢。演说未曾预备，愧无嘉言可贡。今谨竭所知，就女学一言。

弟从前亦曾担任女学，以为求国富强，人人宜受教育。既欲令人人受教育，自当以女学为最重要之事。何也？人之受教育，当自小儿时起。而小儿受母亲之教，比之受父亲之教为多。所谓习惯者，非必写字、读书，然后谓之教育也。扫地亦有教育，揩台亦有教育，入厨下烧饭亦有教育。总之，一举一动，一哭一笑，无不有教育。而主持此事者，厥惟母亲。与小儿周旋之人，未有比母亲长久而亲热者。苟母亲无学问，则小儿之危险何如乎？此已可见女学之重矣。然犹不止此，推本穷源，则胎教亦不可忽也。吾国古时，颇注意此事。女子当怀孕时，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口不出傲言，立必正，坐必端。何也？如孕时有不正之举动，则小儿受其影响，他年为不正之人，即由于此。苟女子无教育，则小儿在胎内时，为母体所范围，虽欲避免不良之影响，其道末由。当孩提时，又处处受母亲影响，此时染成恶习惯，他时改之最难。然则苟以教育为重要，岂可不以女学为重要乎？

弟有见及此，故亦曾组织女学，名曰“爱国女学校”。因诣力不足，为他事所牵，率不能专诚办女学，常觉抱愧

于心。而白民先生自十年以前，即办女学，维持至今不衰，此弟所钦佩者也。从前曾来参观，有黄任之、刘季平诸先生任教课，崇尚柔术。其后在报上见过，知城东女学有崇尚美术、手工之倾向。今日参观，见许多美术品；听诸君唱歌，益知贵校有崇尚美术之倾向。或疑前后举动何以不一致？然以余观之，正合世界之趋势。何也？七、八年前，吾人在专制政府之下，男子思革命，女子亦思革命，同心协力，振起尚武精神，驱除专制，宜也。然世界趋势，非常常如此。世有强凌弱之事，于是弱者合力以抵抗强者，逮两者之力相等，则抵抗之力无所用，人与人不必相争，当互相协力，各自分工，与人以外之强权抵抗。

人以外之强权何也？如风灾、水灾等皆是也。稻方开花而有暴风，则稻受损矣。棉方成熟而有淫雨，则棉受损矣。或大水冲决，则人民之田庐丧失。或火山爆烈，则一方之民受害。人所以受此种种灾害，毕竟由知识不足故也。使各自分工，研究学理，增加知识，则此种灾害，可渐消除。昔时道路不佳，不力不能行远；今有汽舟、汽车，可以行远，即知识增而灾害渐消之一证也。兄弟二人在家中，有时不免争竞，然外侮来时，自知互相以御外侮，更可知自家争竞之非。人与人同居一世界，犹一家也；自然界之种种灾害，犹外侮也。故人与人不当相争，而当合力以与自然抵抗。节省无益之战斗力，移之以与天然战。近世种种新发明，即由此而产出者也。达尔文初创进化论，谓生存竞争，人类亦不能免，因地上养分不足，故势必至于互争。今知其不然，损人利己，决不能获最后之优胜。故生存竞争云云，已为过去学说。最新之进化学，已不主张此说矣。如赤十字社设为救护队，虽两国相争，而该社专务救济，不论甲国、乙国，均得而救济之，不许强权者侵犯，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此亦可见世界渐

厌战争，共趋博爱之一端矣。

总之，世界须大家分担责任，又须打总算盘。吾国家族制度，父、子、兄、弟等，共居一家，饮食、衣服、房屋均公者，常易起冲突。假如一人穿新衣，一人穿旧衣，则穿旧衣者将不服，以为何厚彼而薄吾。如一人穿新衣，众人皆穿新衣，将不胜其费。如此种种冲突，实起于各人无职〔责〕任，而只知享用。故有提倡分至极小，以自活自养者，然仍不免糜费。例如有一大族，每日须供五十人之食，故须有一极大厨房。以其大也，分为五家，成为十人一家，然糜费仍多，因其间不免有侵欺之事也。如能互相帮助，互不相欺，则分工为之，而百事俱举矣。一家之中，洗衣者常管洗衣，烧饭者常管烧饭，教育者专管教育，虽规模宏大，比之五十人为一家而过之，亦尚不为害。因崇尚强力之主义减退，共同生活之主义扩充也。

又世界将来之趋势，男、女权力为相同。人类初时，男、女权力不能相同者，因男子身体较强也。战争则男子任之，跋涉道途，亦男子任之，他如出外经商，政治上活动，亦均男子任之，因此等事较为劳苦也。女子任家中各事，似较安逸。然因此男子权利较多。由此可见，劳苦多者权利多，劳苦少者权利少，权利由劳苦生，非可舍劳苦而求权利。今之世界，女子职业，可与男子相同，故权利亦可相同。何也？古时相杀之事多，男子因习于战争，故体力不期而然自强。将来男子职业，不必执干戈，遵进化公例，肢体不用则消退，即可知男子体力，未必过去女子，故男、女权利可相等。

然苟趋重实业，分工交易，彼有余衣可以为吾衣，吾有余食可以为彼食，各得丰衣足食，以乐天年，岂不善乎？此身体之快乐也。然但得身体快乐，未可谓满足，因身体要死也。故尚须求精神之快乐。有身体快乐而精神苦

者，似快实苦，终为愚人而已矣。然则精神之快乐如何？曰：亦在求高尚学问而已。许多学问道理考究不尽，加力研究，发现一种新理，常有非常之快乐。如考究星者，常研究星中有何原质，所行轨道如何，太阳系诸恒星如何情形，均有人考究此等事，初似与吾人无关，然苟能研究，甚为有益。考究原质者，初时知最小者为极小之原子，今又考知有更小之物，名曰电子。昔时知原子不变化，今知原子尚有变化。此等研究，有直接有益于人生日用者，有未即有用者。然考道者，不论有用无用，苟未懂至彻底，则精神不快乐也。取譬不远，但举日常授课而言，教员为学生讲解：鸡能生蛋，牛能拖车，人知利用之，取为食物，用以耕田，似已足矣；然执笔按纸，画鸡画牛，有何用乎？更以漆工制成漆鸡漆牛，又何用乎？人当野蛮时代，以木为门，借山洞以居，苟可御风御雨已足，何故不自足，必用长方之玻璃为窗，何故必要美丽之台毯，无他，皆为不满足之一念所驱而已。饥必思食，大人之常情也。然小儿之时，虽体中已饥，竟可不知饥为何事；然其身体内自然有求食之动机，若不得食，则身体即患病，此生理上无可强制者也。吾人之精神亦然，若无科学、美术，则心中成病，精神不快。船之制作，至今世之飞船，殆可谓穷巧极工；然船之最初，不过一根木头，随意摇摇而已。车之简单者，如独力推行之牛角车是也；然一步一步改好，则有火车、电车之美备。划子帆船，比之独木船已好矣，而人心尚以为不足，此即人类进化之秘机也。其要旨，即在分工协力。今试吾人关门为之，必不能成一火轮船。何也？取轮于甲，求舆于乙，均非通工易事不为功也。由此可知，吾欲成一事，必赖许多人帮助；吾做成一事，又可帮助人成事。故吾人用一分力，与全世界人有关系，知吾人之力非枉用。

女子教育，有主张养成贤母良妻者，有不主张养成贤母良妻者。以余论之，贤母良妻，亦甚紧要。有良妻则可令丈夫成好丈夫，有贤母可令子女成贤子女，是贤母良妻亦大有益于世界。若谓贤母良妻为不善，岂不贤不良反为善乎？然必谓女子之事，但以贤母良妻为限，是又不通之论也。人之动作力，如限于一家，常耗费多而成功少，故贤母能教其三孩子者，不必专教三孩子，不妨并他人之孩子而共教之。故余以为，女子当求学之时，即须自己想定专诚学一事，如专诚学教育，专诚学科学、美术、实业均可。吾苟专精一事，自有他人专精他事，吾可与之交换也。据各先进国之经验，则女子之职业，不宜为裁判官，因女子感情易动，近于慈爱，故遇应受罚责之人，亦或以其可怜而赦之。算学、论理学亦不宜。而哲学、文学、美术学最相宜，女子偏重此各科，故此中颇产名人。然历史上名字，尚少于男子。今可察世界之趋势，不必限定，各自分趋，他日所成就，定可与男子同。

余以为自初等小学始，以至中学，即可注重实业、美术，其中可包括文学等。美国人某君，绝对注重实业。谓学堂教育，可以丧失人之能力，当使习为世界上之事，故青年之人，虽不入学堂，或助父，或助母，为一切事，均佳。入学堂者，常自谓学问甚高，是傲也。赖佣人之力以衣、食、住，习于舒服，而厌为劳苦之事，是懒也。傲且懒之习惯，殊不适于生存社会上。衣服须自裁，而彼不能自裁衣服，一切人生应为之事，彼均不能为，岂不可危乎？故某君之教育，不用教科书，不论男、女，均至厨房中烧饭。或谓裁衣为女子之事，某君曰不然，男子亦须学之。或谓解木为器，为男子之事，某君曰不然，女子亦须为之。所为各事，均即有科学寓乎中。菜即植物学也，肉即动物学也。烹调中有化学，有物理。用尺量布及绸，即

为算学。剪刀剪物，亦地理学也。缝衣穿线，有重学、力学寓焉。太古不以铁为釜，将石镂空即为釜，是人类学、历史学也。美洲人之衣、食、住，与亚洲人之衣、食、住不同，是历史、地理均括于内也。我必尽义务，而后得与人共享权利；人享权利，亦必尽义务，自修身教授也。某氏发挥此主义，专著一书，名曰《学校及社会》，实可名之曰《学校及生活》。某氏倡此主义后，赞成之者颇多。近世小学、中学，必有手工、木工、石工、金工，近世之趋势如此，亦以生活教育之重要耳。

手工有日用必须者，有属于美术品者，又有本以供日用、而又加以美术之工夫者。美术似无用，非无用也。人类不自满足之念，实足见美术之不可少。吾见城东女学与世界趋势相同，此最可慰者。非只女学生应重手工、美术，即男学生亦应重手工、美术，此即男、女教育平等之一端也。

（1913年6月广益书局编印《蔡元培言行录》）

正独立之误会

此次民军之起，号曰讨袁，所以不质言革命者，以易言汤武之革命，虽于讨伐独夫之义至为符合，而新承辛亥革命之后，当时所谓革命，实包有改革政体之意，恐闻者以彼例此，而有所误会，故揭讨袁二字以代之。惟直接讨袁，为军人之责。而军人以外，全省之人民官吏，非直接加入讨伐，而又欲举其全省表示赞成之意，则宣布独立之举。独立也者，表其不承认袁氏之命令，而与之断绝关系云尔。

善夫江苏都督、民政长之通电各属也，曰此次独立，与辛亥起义时不同。辛亥起义时，立法、行政各机关之组织，自中央政府以迄地方，皆从根本上推翻，而从新建造；今也国体犹是民主政体，犹是共和，其所以独立相号召者，以欲言讨袁，则不得不与袁政府断绝关系，而与袁政府断绝关系，即不得不以独立名。又曰今之独立，仅对袁世凯而言，对袁世凯私人机关之政府而言，国体、政体并不变更。前经参议院通过之法律，依然适用，则所有各机关组织之情形与其统系，自相沿不变，与未独立时相同。此诚宣布独立各省之人民官吏所当心知其意者矣。

一省既宣布独立，则全省各县自然同此主义，而无待别为宣布。乃闻独立省各县间，有特别宣告独立者，其意志实表赞成，而行为乃同纷更，实由误会独立之义而起。至或改置知事，扣留公款，则全违本省独立之初意，而行政统系遂为之紊乱矣。军事机关深以紊乱秩序为虑，于是

严滥招兵丁、擅募饷糈之禁令，乃于行政界中自生紊乱，可不悬为严禁乎！

间有一二省，因省会当道固执拥护中央之成见，而外县迫不及待，遂以一部分先揭独立之帜者，其事虽视前述一例较有不同，然地方秩序之维持，尤当加慎矣。

（《公论》1913 年 7 月 26 日）

成　见

迩者，我国言论家有一成见也，即所谓中华民国第一期总统非以袁世凯任之不可，是也。

是语也，解剖而观之，实隐然以总统负责任为前提。虽然，中华民国果宜用总统制、而使总统负责任乎？是大不然。记曰："孙可以为王父尸，子不可以为父尸"，所以别嫌也。美以新造之国，而用总统制；法以君主国而改为民主国，则用内阁制，一无嫌，一有嫌也。

中国之为君主国也，四千有余年矣。今一旦改为民主国而用总统制，则易生近于皇帝之嫌，而国基虑其不固。且内阁制之精神，乃转与君主时代之历史隐相贯通，其推行也，乃视总统制尤为圆活。周以上之制，嗣君亮闇，三年不言，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汉制，日食，免三公。商太甲不德，伊尹放之而自听政。周成王幼，公旦居摄。宰相之代元首而负责任也，盖常有此等惯例矣。且如历史中君主之差强人意者，率皆得力于贤相。齐桓之霸也以管仲，郑穆之治也以子产，秦孝公之强以商鞅，始皇之一统以李斯。其他若汉高之有萧何，汉宣之有魏相、丙吉，蜀昭烈之有诸葛亮，东晋之有王导、谢安，苻秦之于王猛，唐太宗之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玄宗之有姚崇、宋璟，德宗之有陆贽，敬宗之有裴度，武宗之有李德裕，宋太祖之有赵普，真宗之有寇准，仁宗之有韩琦、富弼、范仲淹、欧阳修，哲宗之有司马光，明太祖之有刘基，神宗之有张居正，皆其著例。且齐桓用管仲而霸，用开方而败；

唐玄宗用姚、宋而兴，用李林甫而乱，历史家习言之，尤为元首不必负责任之美证。夫君主时代，犹有内阁制之美意；岂总统时代行之而反有窒碍乎？然则中华民国之宜于用内阁制也甚明。

夫民国之宜用内阁制也既如是，而约法中且已采用之。则宜于总统之人，固不必如阿猫亦可、阿狗亦可之容易，而要之其途颇宽。苟其人之德行，颇足为全国矜式，而又有知人之明，能择一适当之总理者，皆足以任之。而如非某某不可云云之论调，即无自而发生矣。

（《民立报》1913年7月27日）

孰仁孰忍孰诚孰伪

自江西讨袁军起，而参、众两院发生两团体：甲曰鄂赣两省两院议员联合会，乙曰鄂赣皖苏四省议员联合会。甲会以鄂、赣二省之议员为限，发电时署名者郑江浩等三十七人；乙会益之以皖、苏两省，而署名者乃仅汤化龙等五十二人。甲会所发之电，已见各报者，致黎副总统，致江西李前督、欧阳护军使暨各军官，致李司令纯暨军官；乙会则一通电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护军使、民政长、省议会、各政党、各报馆。足以见甲会树一鹄的以进行，乙会则泛泛然表明其所主张。

此两会之电文，有一共同之表明，即其爱故乡、爱祖国之观念是也。甲会致黎电曰：战端既启，胜败无论属于何方，而同室操戈，岂惟鄂、赣人受影响，即南北各省，直接间接亦当受莫大之损害；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云云。其致江西军云：兹因南北误会，兄弟阋墙，民国前途，岂堪设想！况光复以来，鄂、赣两省，疮痍未复，伏莽孔多；加以水旱频仍，流离载道，抚绥安辑，犹虑不遑；若重以兵争，继续开战，人民之生命财产，国家之经济人材，同罹浩劫，岂公所愿。其致李司令纯等云：战端既启，终局猝难，当此外患频仍、国基未固之际，以干城之兵，为同室之斗，鹬蚌相持，同归于尽；况光复以来，鄂、赣两省，疮痍未复，伏莽犹多；加以水旱连年，流离载道，此即抚绥安辑，犹虑未遑；若重以兵争，或继续开战，必求以武力为最后之解决，恐未底

终局，而两省数千万人之生命财产，已沦浩劫，无可挽回云云。其语重心长如此。乙会之电有云：疮痍未复，弗堪再惊，祸乱相寻，将召外侮。虽下语颇简，而其意固与前述甲会诸电文相仿佛也。

至其言解决方法，则两会之主张乃大相反：则甲会主双方停战，而乙会主锄除民军是也。甲会致黎电曰：为大局计，自应以先息战争、徐图善后为宜。请我公出为仲裁，电劝双方停战。致江西军云：同人多数议决，一面在中央设法补救，一面请黎副总统出而维持，必有正当之解决。请两方暂行停战，顾全大局。致李司令纯等云：诸君偶以干戈相见，并非如敌国异种有不共戴天之仇。同人等忝为代表，不忍两省生灵一再涂炭。除一面陈请大总统、兼电副总统，请其为国曲全，不使战事蔓延糜烂外，合先电吁诸君即行停战，再俟双方调处，俾得和平解决。诸君具有仁心，未忘旧痛，所望念数年来胜兵败匪之灾，勿好为煮豆燃萁之事，鄂、赣幸甚！天下幸甚！其言之悱恻、诚恳者如是。乙会之电文则曰：民国大运，实系公等一身，当此千钧一发之时，望怀同舟共济之义，力护中央，遏绝蜚语，速筹方略，协扫妖氛云云。若惟恐战祸之不炽，而从而鼓煽之也者。呜呼，孰仁而孰忍？读者自能辨之。

甲会不涉党派一语，而与会者隶属国民、共和两党。乙党声言无关党派之竞争，而与会者大率进步党人。呜呼，孰诚而孰伪？读者自能辨之。

使仁者、诚者而能达其目的，其影响于国家者如何？使忍者、伪者之所主张而实行，其影响于国家者如何？此尤读者所能辨也。

吾今胪列两会署名者之姓名如下，而并得其籍贯，俾读者得以为多寡之比较，且略究各人之品性及历史，而得其仁、忍、诚、伪之所由来也。

（甲）鄂赣两省两院议员联合会

其中鄂省参议员三人：郑江浩、韩至宸、蒋羲明；众议员十一人：郑万瞻、张大析、胡鄂公、胡祖舜、吴崐、骆继汉、寥宗北、张伯烈、邱国翰、范熙壬、陈邦燮。赣省参议员五人：汤漪、朱念祖、符鼎升、萧辉锦、刘濂；众议员十八人：吴宗慈、王恒、戴书云、黄攻素、辛际唐、欧阳沂、王侃、徐秀钧、贺赞元、邱冠棻、罗家衡、曾干桢、邓元、程铎、曾有澜、刘景烈、葛庄、黄象熙。

（乙）鄂赣皖苏四省议员联合会

其中鄂省参议员一人：董昆瀛；众议员七人：汤化龙、覃寿恭、汪秽鸾、王笃成、彭介石、范熙壬、邱国翰。赣省众议员十人：郭同、黄裳吉、梅光远、李国珍、黄懋熙、潘学海、曾有澜、刘景烈、黄象熙、葛庄。皖省众议员十二人：汪彭年、王赓、张国溶、吴日法、许植材、唐理淮、江谦、吴徕、戴声教、杨士聪、王多辅、陈光谱。苏省参议员二人：蓝公武、郑斗南；众议员十八人：孟森、汪荣宝、董增儒、张鹤第、孔光圻、朱继之、谢翼之、汪秉忠、杨润、蒋凤梧、陈义、曹汝霖、夏寅官、姚文楠、陈文中、金还、邵鼎镕、陈士髦。未详籍贯者二人：陶镕、陆大坊。其中兼入两会者，鄂二人：范熙壬、邱国翰。赣四人：黄象熙、曾有澜、刘景烈、葛庄。

由是观之，自兼入两会之六人以外，甲会鄂省十二人，而乙会则仅六人；甲会赣省十九人，而乙会则只六人。乙会之所以能成立者，赖有皖省之十二人、苏省之二十人耳。夫袁系本多皖人，而此会乃以苏人为最多，读者试合程德全、应德闳近日反复无常之历史观之，可以得其故矣。

（《公论》1913年7月29日）

袁氏不能辞激成战祸之咎

讨袁军之起，固由东南各省刺激于袁氏之失政，原因至为复杂。而其导火线，则为派赴江西及江南制造局之北兵。

南、北军队，猝然相遇，必不免于冲突，袁氏所稔知也。去岁北京兵变，说者咸疑为袁氏嗾使。然袁派力欲为袁明心迹，则言是日之变兵，昌言欲杀袁世凯，谓彼欲赴南方为总统，弃我等如遗，我等仇之。并言其卫队亦有变意。其所居外务部院中，亦有枪声。袁氏受左右之劝，避入地窖，大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观。我等急电南京，派兵赴援；以告袁氏，袁氏谓南兵北来，北兵疑其来剿，必大变，宜即电阻，从之。及国务院、参议院之北徙也，惩于京津兵变，恐有危险，拟以南军为卫队，偕同北行。是时袁氏斥北京为臭虫窠，拟设政府于南苑，且预定南军屯驻之所。其后忽变初议，谓南军万不可往，遂止。唐君绍仪为国务总理时，尝建调和南、北军队之策，谓宜使互易驻所，如移南军万人于北方，则移北军于南方，数亦如之。袁氏又期期以为不可。盖彼之意见，以为南、北军队接触，必有不可避之危险也。

然则袁氏之派兵于江西及上海也，何居？宁、赣二省，固有可派之军队，何以皆不信任，而必临以北兵？是明表其猜疑南军之意见，且亦明知其不免于冲突，而悍然为之，是则处心积虑，抱定周自齐所揭之铲除主义，而苦无机会，特出此最后之手段，以激成之耳。呜呼，司马昭

之心，路人皆知之矣。

自袁氏任总统以来，大言裁兵，并于借外债时，以裁兵费为大宗。然而南方裁兵，北方则增兵，其意乃在裁尽南兵，而悉以北军代之。不观湖北乎，其初兵号八镇，今则旧兵几无孑遗，所谓鄂军者，皆由北方派来者耳。彼欲使东南各省，皆为今日之湖北，而从江西，江苏入手。此岂能以一手掩尽南方军人之目者乎？

且湖北之派兵也，犹授意鄂督，使之电请。至于江西、江苏，则并未经两省都督之请；而派遣时，亦并不预先关照。即曰陈霆训、陈棍曾密请之，然二陈固非两省之代表也。是蔑视都督，蔑视省议会，即蔑视全省军民也。全省军民，乌得不与之决裂乎！

今厌乱之人，无不疾首痛心于此次之战祸。当知罪魁祸首，实维袁氏。不必繁称失德，即此派兵激变一端，已足以证明之矣。

（《民立报》1913年7月29日）

野心欤，约法欤，让德欤

《新闻报》所得之京讯，曰：袁项城对于江西乱事，早已布置，此次命令虽云极主严厉，仍寓和平之意，实则深幸值此事机，得以武力平乱，促进专制之命运，巩固总统之地位也。外间不察，谓项城软弱，专以敷衍了事，不知此即郑庄公待叔段之故智，盖袁之辣手，如下棋者在最终一着，以制人之死命，云云。足以见袁氏处心积虑，激成战祸，虽中立者亦不能为之讳。其七月二十二日之命令曰：本大总统昔以仁柔姑息，延兹厉阶，今当以勇猛精力，赎彼前愆。其踌躇满志之状，可想见也。

尝闻袁氏处心积虑，欲堕落议员风习，破坏议院声誉，以为他日倒共和而行专制之预备。此次命令，仿从前君主之罪己诏，而事事归咎于议院。于用人，则曰：遵据约法，须求同意于议院，议院果清白乃心，和衷共济，则物色一国最高之才，使荷一国最重之任。乃自党见既兴，意存掣肘，提出否认，至再至三，云云。于财政，则曰：利用感情之弱点，侈为无责之游谈，国税则屡征而屡抗，外债则旋赞而旋否，以党略为前提，置国命于孤注，云云。于法令，则云：国会纷争，议案丛杂，累日不能决一条，经月不能颁一律，律文既缺，何所遵依，而国家作用，一日不能停滞，政府措施，触处动成违法，云云。皆以受制议院，为失政之干盾，其居心可知矣。

袁氏擅杀张、方，擅布未经参议院通过之法令，私借外款，擅设军事执法处，素不知所谓约法及戒严法也。今

复唐君等之电曰：鄙人甚愿与公等同作平民，顾为约法所阻，非正式总统举定，不能违法弃职。又曰：鄙人受父老委托之重，不敢不终，惟有确守神圣之约法以从事。其二十二日之命〈令〉则曰：用人实行政之所出，遵据约法，须求同意于议院。又有一令曰：用兵定乱，为行使约法上之统治权。又有一令曰：查约法第三十六条载，大总统得依法律宣告戒严，如戒严法第一条，云云。一若一切举动，不敢不依据约法也者。是何以故？曰：讨袁军已起。故讨袁军发起以来，冒弹刃之险，受叛徒贼匪之谤，而其所以为民国尽力者，其效力固已稍稍可见。呜呼，对于凭借武力之野心家，又安得不出武力以为保障欤？

袁氏复唐君等三人之电，曰：鄙人髦矣，甚愿与公等同作平民，享自由之幸福。当国会成立之日，鄙人即咨请迅速选正式总统；而党见纷歧，迄今尚未举定，正日殷盼望，云云。其二十二日之长令，亦曰：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观治化，庶遂初志。若甚愿退职也者。其指斥反对者，曰竞权争利。若自表其并无竞争权利之心也者。呜呼，袁氏果能不食其言乎？

（《民立报》1913 年 7 月 30 日）

折衷派

哲学家海该儿求得世界进化之公例，曰：有甲之正，必有乙之负，以与之对待；由此对待之甲、乙而折衷之，是谓丙；由丙之正而得丁之负，是谓戊；循此例以进行，而无穷，是世界之历史也。我国古代哲学，见于《易》者为阴、阳二元论，而说之以互相消长之理，故后儒遂有扶阳抑阴之说，一若非消彼必不足以长此者，胶执此种思想，而生心害政，遂常有两派激剧之抗争，而折衷派之势力，无由而建立。

古代之朋党史无论矣。政党之帜既揭，而其最昭著者，常为保守与进取之对待，或附和政府与反对政府之对待。如国民党成立时，本尚有共和、民主、统一各党，未几则合为进步党矣。自新共和党一分出，始又有折衷派性质焉。

今日之战，甲曰讨罪，乙曰平乱。若极端反对，非屈彼一必无以伸此一也者。然而折衷之说，固已有先觉者，如李石曾君所主张，使甲、乙两方涉嫌疑之分子，悉宣告五年内不与闻政治，是也。而闻者顾不甚注意，殆拘于阴阳消长之成见而然。近闻武昌首事被逮诸君，尝公草一电，遍告海内外，大致在调和南、北两方面，请国会速行正式选举，袁、孙、黄、李诸公以外，别求候选总统，以免竞争仇杀之祸。与李君之说大略相同。甚愿吾全国同胞，勿固执对待之成见，而于此等折衷派之说，三致意焉。

（《公论》1913年7月30日）

悔 祸

善莫大于改过，罪莫大于怙恶，修己且然，而况救国。二十六日，袁氏又有一令，缕叙南、北分界之害，不知何所见而云。然其结语有曰：人人皆有悔祸之心，国家庶有自存之道。吾读之，而不能不叹为至言。盖悔祸者，不咎既往而责以将来，为人人所易行，而初非不负责任之言也。

今如讨袁者之言，则违法杀人，派兵激变，战祸之至，实由袁氏。袁氏期期不承认之。虽然，此所以罪袁氏者，皆就已往之袁氏言之。夫使对于其已往之罪状，而欲为相当之处罚，则诚非袁氏所能从；然而讨袁者之言，固未尝欲处置之，如路易之断头、夏桀之流放也。观南京将帅复袁氏电曰：公若乘时而退，仆等此后必遁迹人间，云云。然则如讨袁者之见，袁氏而果悔祸也者，第表明其退位之决心而已足，此至易易者也。

又如袁氏之言，则以讨袁者为不逞之徒，为野心家，为竞权争利。讨袁者亦期期不承认之。然此皆世所谓诛心之谈耳。其具体之攻击，则曰一若深憾国家之统一，而必从而离之，惟恐人民之协和，而故从而间之，诚不解彼辈何仇于宗国，乃必欲裂之、毁之而为快。是即以各省之宣布独立为罪耳。夫使袁氏既以是罪讨袁者，而持周自齐之所谓铲除主义，则不能不以武力为最终之解决。然而袁氏之令曰：所最痛心者，当此国家多难之时，乃更有此不祥之事，就令指顾之间，廓清底定，而人民生命财产，所损

几何；国家财政负担，增痛安极，言念及此，无泪可挥。又曰：受事之日，父老既以此完全统一之国家，托诸藐躬；受代之时，藐躬义当以此完全统一之国家，还诸父老。然则袁氏既无渎武之成心，亦有受代之预备，所最悬念者，宗国之不能完全统一耳。苟讨袁者而果悔祸也者，取消其独立而已足，此亦至易易者也。

夫两方面所互相要求者，其简单若此。其所以不能解决者，互相猜疑，莫肯先发耳。使吾侪立第三地位者，一扫其单方挑拨之恶意，而以公平诚实之方法，对于两方，各为保证其所求，则战祸可以立弭。是即吾第三者悔祸之道，而不可不速尽其责者也。

（《民立报》1913年8月3日）

世界观与人生观

世界无涯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尺之地位；世界无终始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数十年之寿命；世界之迁流，如是其繁变也，而吾人乃于其中占有少许之历史。以吾人之一生较之世界，其大小久暂之相去，既不可以数量计；而吾人一生，又决不能有几微遁出于世界以外。则吾人非先有一世界观，决无所容喙于人生观。

虽然，吾人既为世界之一分子，决不能超出世界以外，而考察一客观之世界，则所谓完全之世界观，何自而得之乎？曰：凡分子必具有全体之本性；而既为分子，则因其所值之时地而发生种种特性；排去各分子之特性，而得一通性，则即全体之本性矣。吾人为世界一分子，凡吾人意识所能接触者，无一非世界之分子。研究吾人之意识，而求其最后之原素，为物质及形式。物质及形式，犹相对待也。超物质形式之畛域而自在者，惟有意志。于是吾人得以意志为世界各分子之通性，而即以是为世界之本性。

本体世界之意志，无所谓鹄的也。何则？一有鹄的，则悬之有其所，达之有其时，而不得不循因果律以为达之之方法，是仍落于形式之中，含有各分子之特性，而不足以为本体。故说者以本体世界为黑暗之意志，或谓之盲瞽之意志，皆所以形容其异于现象世界各各之意志也。现象世界各各之意志，则以回向本体为最后之大鹄的。其间接以达于此大鹄的者，又有无量数之小鹄的。各以其间接于

最后大鹄的之远近，为其大小之差。

最后之大鹄的何在？曰：合世界之各分子，息息相关，无复有彼此之差别，达于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相交之一点是也。自宗教家言之，吾人固未尝不可于一瞬间，超轶现象世界种种差别之关系，而完全成立为本体世界之大我。然吾人于此时期，既尚有语言文字之交通，则已受范于渐法之中，而不以顿法，于是不得不有所谓种种间接之作用，缀辑此等间接作用，使厘然有系统可寻者，进化史也。

统大地之进化史而观之，无机物之各质点，自自然引力外，殆无特别相互之关系。进而为有机之植物，则能以质点集合之机关，共同操作，以行其延年传种之作用。进而为动物，则又于同种类间为亲子朋友之关系，而其分职通功之例，视植物为繁。及进而为人类，则由家庭而宗族、而社会、而国家、而国际。其互相关系之形式，既日趋于博大，而成绩所留，随举一端，皆有自阂而通、自别而同之趋势。例如昔之工艺，自造之而自用之耳。今则一人之所享受，不知经若干人之手而后成。一人之所操作，不知供若干人之利用。昔之知识，取材于乡土志耳。今则自然界之记录，无远弗届。远之星体之运行，小之原子之变化，皆为科学所管领。由考古学、人类学之互证，而知开明人之祖先，与未开化人无异。由进化学之研究，而知人类之祖先与动物无异。是以语言、风俗、宗教、美术之属，无不合大地之人类以相比较。而动物心理、动物言语之属，亦渐为学者所注意。昔之同情，及最近者而止耳。是以同一人类，或状貌稍异，即痛痒不复相关，而甚至于相食。其次则死之，奴之。今则四海兄弟之观念，为人类所公认。而肉食之戒，虐待动物之禁，以渐流布。所谓仁民而爱物者，已成为常识焉。夫已往之世界，经其各分子

之经营而进步者，其成绩固已如此。过此以往，不亦可比例而知之欤。

道家之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又曰："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此皆以目前之幸福言之也。自进化史考之，则人类精神之趋势，乃适与相反。人满之患，虽自昔借为口实，而自昔探险新地者，率生于好奇心，而非为饥寒所迫。南北极苦寒之所，未必于吾侪生活有直接利用之资料，而冒险探极者踵相接。由推轮而大辂，由桴槎而方舟，足以济不通矣；乃必进而为汽车、汽船及自动车之属。近则飞艇、飞机，更为竞争之的。其构造之初，必有若干之试验者供其牺牲，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及利用而生悔。文学家、美术家最高尚之著作，被崇拜者或在死后，而初不以及身之不得信用而辍业。用以知：为将来牺牲现在者，又人类之通性也。

人生之初，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谋生之事，至为繁重，无暇为高尚之思想。自机械发明，交通迅速，资生之具，日超〔趋〕于便利。循是以往，必有菽粟如水火之一日，使人类不复为口腹所累，而得专致力于精神之修养。今虽尚非其时，而纯理之科学，高尚之美术，笃嗜者固已有甚于饥渴，是即他日普及之朕兆也。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致于光明。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性。人类精神之趋向，既毗于是，则其所到达之点，盖可知矣。

然则进化史所以诏吾人者：人类之义务，为群伦不为小己，为将来不为现在，为精神之愉快而非为体魄之享受，固已彰明而较著矣。而世之误读进化史者，乃以人类

之大鹄的，为不外乎其一身与种姓之生存，而遂以强者权利为无上之道德。夫使人类果以一身之生存为最大之鹄的，则将神仙家所主张，而又何有于种姓？如曰人类固以绵延其种姓为最后之鹄的，则必以保持其单纯之种姓为第一义，而同姓相婚，其生不蕃。古今开明民族，往往有几许之混合者。是两者何足以为究竟之鹄的乎？孔子曰："生无所息"。庄子曰："造物劳我以生"。诸葛孔明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吾身之所以欲生存也。北山愚公之言曰："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何若而不平。"是种姓之所以欲生存也。人类以在此世界有当尽之义务，不得不生存其身体；又以此义务者非数十年之寿命所能竣，而不得不谋其种姓之生存；以图其身体若种姓之生存，而不能不有所资以营养，于是有吸收之权利。又或吾人所以尽义务之身体若种姓，及夫所资以生存之具，无端受外界之侵害，将坐是而失其所以尽义务之自由，于是有抵抗之权利。此正负两式之权利，皆由义务而演出者也。今曰：吾人无所谓义务，而权利则可以无限。是犹同舟共济，非合力不足以达彼岸，乃强有力者以进行为多事，而劫他人所持之棹楫以为己有，岂非颠倒之尤者乎。

昔之哲人，有见于大鹄的之所在，而于其他无量数之小鹄的，又准其距离于大鹄的之远近，以为大小之差。于其常也，大小鹄的并行而不悖。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曰："好乐，好色，好货，与人同之。"是其义也。于其变也，绌小以申大。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禹治洪水，十年不窥其家。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墨子摩

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曰：“生与义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范文正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 。”是其义也。循是以往，则所谓人生者，始合于世界进化之公例，而有真正之价值。否则庄生所谓天地之委形委蜕已耳，何足选也。

一九一二年冬

（巴黎《民德杂志》创刊号“社说二”）

杨笃生先生蹈海记

先生以革命为唯一之宗旨，以制造炸弹为唯一之事业。留学日本时，尝与同志五人在横滨僻地赁一室研究炸弹，延一日本人为导师。既毕业，先生偕二友乘日本某汽船赴天津，欲由此进北京，设一秘密制造炸弹所，以行暗杀。时日俄战事未毕，中途同舟日本人忽疑先生等为露探，诘问不休。一友怒，与之斗，舟中日本人众，群起絷之，众口皆指为露探。先生等以为必被害，而不甘受露探之污名以死，乃索纸笔详书志行以告之。大略谓："我等非贪生者，诸君欲杀我等，请杀；惟死而受露探之污名，则深耻之。我等非露探而实支那之革命党。"因详告以企图革命之事实，及此行之目的。并述横滨研究弹药之住所及教授者以为证，以为如是则虽死而无憾矣。然日本人由是信为非露探，则释之。

先生等遂赴北京，欲赁一屋，觅铺保不可得，不克赁(北京习惯非有一店铺作保证不能赁屋)，废然赴上海。在上海尝组织制造弹药之所数次。其时适有万君福华之狱，警察颇严，而先生之意，以为"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暗杀必在北京，必就地制造，始能应用不穷，而免于开津检验之累。适都中有以教授编书等事相延者，遂慨然赴之。常于深夜制弹药，其时无机械不能精制，则仿为粗制之俄国军用品。成后，欲狙伏于自北京至颐和园之中途，以有所袭击。先携弹匿道旁一土墙空围中，欲乘间跃出至大道以伺。然道中车马彻夜不绝，竟不得间，遂露宿一夜

而归。其时曾至保定，交桐城吴先生樾及其诸同志。吴先生在车站所发之炸弹，即先生所制也。先生表面虽深自隐秘，而激烈之气，往往于无意中流露。有其时曾在某学堂受先生教授者言：先生讲授国文，有关民族主义者，常激昂异常。学生课卷有稍合革命主义者，虽文词草率，辄奖励之；有颂扬君后而抬头书写者，必勒抹而痛斥之。出行则戴大笠，骑驴而观书，意者，先生不忍见北京恶浊之社会故耶。当吴案未发以前，先生炼药小炸，微伤眉际。案发，居于对室之一满人大疑先生，日伺察之，虽未为所持，而先生坐是不能再有所预备矣。遂借他故出北京。

其后，逗留上海一二年，乃赴英伦。未久，遂留于苏格兰之扼堡淀，习英文，自言欲以拉丁字母造中国新字，又言欲研究社会主义，然于研究炸弹之初志，仍持之不懈。两月前，贻书于一同志，略言："观上海报纸所记广州革命党事，所用炸弹，似已改良，恐尚有未善处，吾欲作一小册，君能为我转致之乎?"逾三周，寄图说一小册。至其词气间若曰：吾蓄此久矣，今毕乃事以了吾愿云云。由今日思之，其时若已萌死志者。其将蹈海时，与友人诀别书言：往格兰斯哥观博览会机器馆，益感愤于科学根柢之不可追补。又致一友书言：存款百一十镑，系拟归国后为开一小小炸药厂之起点者。盖先生于炸弹制造之研究，洵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乌呼，岂不毅哉!

至先生所以迫而自杀之原因，则亦于诀别书中自道之。其略曰：弟患急性脑炎，原因由于年长失学，好作繁思，感触时事，脑病时发，贪食磷酸补品，日来毒发，脑炎狂炽，偏体沸热不可耐。前礼拜往格兰斯哥观所谓博览会者，以该地为一大制造口岸，会中机器馆必有可供研究触发之事，乃徘徊其中，得益绝少。感愤于科学根柢不可追补，在寓彻夜不成眠。欲得一手枪归国，因英语不佳，

人地又生，不得而行。返扼后，益郁闷不可制，于昨日买车票来利物浦，欲趁便船归国，寻一、二满贼，死之。然海天万里，非旦夕可达，而吾脑闷愤不可解，惨不乐生，恨而之死，决投海中自毕；今日即弟命尽之日矣。国事大难，君等勉之，为将来自爱。自经沟渎，贤哲所羞，然弟欲求从速解脱形神束缚，与他人无关，亦复不计是非嘲骂也云云。乌呼！眼光心力，面面俱到，从容如此，超脱如此，读者皆将敬服不遑，宁尚有拟议是非之余地耶？

（1911 年 8 月 20 日影印手迹）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近日在教育部与诸同人新草学校法令，以为征集高等教育会议之预备，颇承同志饷以说论。顾关于教育方针者殊寡，辄先述鄙见以为喤引，幸海内教育家是正之。

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专制时代（兼立宪而含专制性质者言之），教育家循政府之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清之季世，隶属政治之教育，腾于教育家之口者，曰军国民教育。夫军国民教育者，与社会主义僢驰，在他国已有道消之兆。然在我国，则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且军人革命以后，难保无军人执政之一时期，非行举国皆兵之制，将使军人社会，永为全国中特别之阶级，而无以平均其势力。则如所谓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

虽然，今之世界，所恃以竞争者，不仅在武力，而尤在财力。且武力之半，亦由财力而孳乳。于是有第二之隶属政治者，曰实利主义之教育，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其主张最力者，至以普通学术，悉寓于树艺、烹饪、裁缝及金、木、土工之中。此其说创于美洲，而近亦盛行于欧陆。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亦当务之急者也。

是二者，所谓强兵富国之主义也。顾兵可强也，然或

溢而为私斗，为侵略，则奈何？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绝，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旨，尽于是矣。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义。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毋加诸人。《礼·大学记》曰：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平等之谓也。古者盖谓之恕。自由者，就主观而言之也。然我欲自由，则亦当尊人之自由，故通于客观。平等者，就客观而言之也。然我不以不平等遇人，则亦不容人之以不平等遇我，故通于主观。二者相对而实相成，要皆由消极一方面言之。苟不进之以积极之道德，则夫吾同胞中，固有因生禀之不齐，境遇之所迫，企自由而不遂，求与人平等而不能者。将一切 恝置之，而所谓自由若平等之量，仍不能无缺陷。孟子曰：鳏寡孤独，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张子曰：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伊尹思天下之人，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亲爱之谓也。古者盖谓之仁。三者诚一切道德之根源，而公民道德教育之所有事者也。

教育而至于公民道德，宜若可为最终之鹄的矣。曰未也。公民道德之教育，犹未能超轶乎政治者也。世所谓最良政治者，不外乎以最大多数之最大幸福为鹄的。最大多数者，积最少数之一人而成者也。一人之幸福，丰衣足食也，无灾无害也，不外乎现世之幸福。积一人幸福而为最

大多数，其鹄的犹是。立法部之所评议，行政部之所执行，司法部之所保护，如是而已矣。即进而达礼运之所谓大道为公，社会主义家所谓未来之黄金时代，人各尽所能，而各得其所需要，要亦不外乎现世之幸福。盖政治之鹄的，如是而已矣。一切隶属政治之教育，充其量亦如是而已矣。

虽然，人不能有生而无死。现世之幸福，临死而消灭。人而仅仅以临死消灭之幸福为鹄的，则所谓人生者有何等价值乎？国不能有存而无亡，世界不能有成而无毁，全国之民，全世界之人类，世世相传，以此不能不消灭之幸福为鹄的，则所谓国民若人类者，有何等价值乎？且如是，则就一人而言之，杀身成仁也，舍生取义也，舍己而为群也，有何等意义乎？就一社会而言之，与我以自由乎，否则与我以死，争一民族之自由，不至沥全民族最后之一滴血不已，不至全国为一大冢不已，有何等意义乎？且人既无一死生破利害之观念，则必无冒险之精神，无远大之计划，见小利，急近功，则又能保其不为失节堕行身败名裂之人乎？谚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非有出世间之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吾人即仅仅以现世幸福为鹄的，犹不可无超轶现世之观念，况鹄的不止于此者乎？

以现世幸福为鹄的者，政治家也；教育家则否。盖世界有二方面，如一纸之有表里：一为现象，一为实体。现象世界之事为政治，故以造成现世幸福为鹄的；实体世界之事为宗教，故以摆脱现世幸福为作用。而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

然则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区别何在耶？曰：前者相对，而后者绝对；前者范围于因果律，而后者超轶乎因果

律；前者与空间时间有不可离之关系，而后者无空间时间之可言；前者可以经验，而后者全恃直观。故实体世界者，不可名言者也。然而既以是为观念之一种矣，则不得不强为之名，是以或谓之道，或谓之太极，或谓之神，或谓之黑暗之意识，或谓之无识之意志。其名可以万殊，而观念则一。虽哲学之流派不同，宗教家之仪式不同，而其所到达之最高观念皆如是。（最浅薄之唯物论哲学，及最幼稚之宗教祈长生求福利者，不在此例。）

然则，教育家何以不结合于宗教，而必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作用？曰：世固有厌世派之宗教若哲学，以提撕实体世界观念之故，而排斥现象世界。因以现象世界之文明为罪恶之源，而一切排斥之者。吾以为不然。现象实体，仅一世界之两方面，非截然为互相冲突之两世界。吾人之感觉，既托于现象世界，则所谓实体者，即在现象之中，而非必灭乙而后生甲。其现象世界间所以为实体世界之障碍者，不外二种意识：一、人我之差别，二、幸福之营求是也。人以自卫力不平等而生强弱，人以自存力不平等而生贫富。有强弱贫富，而彼我差别之意识起。弱者贫者，苦于幸福之不足，而营求之意识起。有人我，则于现象中有种种之界画，而与实体违。有营求则当其未遂，为无已之苦痛。及其既遂，为过量之要索。循环于现象之中，而与实体隔。能剂其平，则肉体之享受，纯任自然，而意识界之营求泯，人我之见亦化。合现象世界各别之意识为浑同，而得与实体吻合焉。故现世幸福，为不幸福之人类到达于实体世界之一种作用，盖无可疑者。军国民、实利两主义，所以补自卫自存之力之不足。道德教育，则所以使之互相卫互相存，皆所以泯营求而忘人我者也。由是而进以提撕实体观念之教育。

提撕实体观念之方法如何？曰：消极方面，使对于现

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积极方面，使对于实体世界，非常渴慕而渐进于领悟。循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公例，不以一流派之哲学一宗门之教义梏其心，而惟时时悬一无方体无始终之世界观以为鹄。如是之教育，吾无以名之，名之曰世界观教育。

虽然，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以枯槁单简之言说袭而取之也。然则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此为康德所创造，而嗣后哲学家未有反对之者也。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自美感以外，一无杂念。例如采莲煮豆，饮食之事也，而一入诗歌，则别成兴趣。火山赤舌，大风破舟，可骇可怖之景也，而一入图画，则转堪展玩。是则对于现象世界，无厌弃而亦无执著也。人既脱离一切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即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之观念矣。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五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军国民主义，实利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吾国古代之道德教育，则间有兼涉世界观者，当分别论之。）世界观、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

以中国古代之教育证之，虞之时，夔典乐而教胄子以九德，德育与美育之教育也。周官以卿三物教万民，六德六行，德育也。六艺之射御，军国民主义也。书数，实利主义也。礼为德育；而乐为美育。以西洋之教育证之，希腊人之教育为体操与美术，即军国民主义与美育也。欧洲近世教育家，如海尔巴脱氏纯持美育主义。今日美洲之杜

威派，则纯持实利主义者也。

以心理学各方面衡之，军国民主义毗于意志；实利主义毗于知识；德育兼意志情感二方面；美育毗于情感；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以教育界之分言三育者衡之，军国民主义为体育；实利主义为智育；公民道德及美育皆毗于德育；而世界观则统三者而一之。

以教育家之方法衡之，军国民主义，世界观，美育，皆为形式主义；实利主义为实质主义；德育则二者兼之。

譬之人身：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以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以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

本此五主义而分配于各教科，则视各教科性质之不同，而各主义所占之分数，亦随之而异。国语国文之形式，其依准文法者属于实利，而依准美词学者，属于美感。其内容则军国民主义当占百分之十，实利主义当占其四十，德育当占其二十，美育当占其二十五，而世界观则占其五。

修身，德育也，而以美育及世界观参之。

历史、地理，实利主义也。其所叙述，得并存各主义。历史之英雄，地理之险要及战绩，军国民主义也；记美术家及美术沿革，写各地风景及所出美术品，美育也；记圣贤，述风俗，德育也；因历史之有时期，而推之于无终始，因地理之有涯涘，而推之于无方体，及夫烈士、哲人、宗教家之故事及遗迹，皆可以为世界观之导线也。

算学，实利主义也，而数为纯然抽象者。希腊哲人毕达哥拉士以数为万物之原，是亦世界观之一方面；而几何

学各种线体，可以资美育。

物理化学，实利主义也。原子电子，小莫能破，爱耐而儿（Energy），范围万有，而莫知其所由来，莫穷其所究竟，皆世界观之导线也；视官听官之所触，可以资美感者尤多。

博物学，在应用一方面，为实利主义；而在观感一方面，多为美感。研究进化之阶段，可以养道德，体验造物之万能，可以导世界观。

图画，美育也，而其内容得包含各种主义：如实物画之于实利主义，历史画之于德育是也。其至美丽至尊严之对象，则可以得世界观。

唱歌，美育也，而其内容，亦可以包含种种主义。

手工，实利主义也，亦可以兴美感。

游戏，美育也；兵式体操，军国民主义也；普通体操，则兼美育与军国民主义二者。

上之所著，仅具辜较，神而明之，在心知其意者。

满清时代，有所谓钦定教育宗旨者，曰忠君，曰尊孔，曰尚公，曰尚武，曰尚实。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后世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兹不赘），可以不论。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尚实，即实利主义也。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而鄙人尤所注重，故特疏通而证明之，以质于当代教育家，幸教育家平心而讨论焉。

（1912年2月11日《临时政府公报》第13号）

社会改良会宣言

自吾人企画共和政体以来，外人之觇吾国者，动曰程度不及。今共和政体定矣，吾人之程度果及与否，立将昭揭于世界。人之多言，于吾无加损也，而吾人不可以不自省。盖所谓共和国民之程度，固不必有一定之级数，而共和思想之要素，则不可以不具。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而无所谓骄谄，意志自由，而无所谓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人所当自勉者也。我国素以道德为教义，故风俗之厚，轶于殊域，而数千年君权、神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同人以此建设兹会，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条举若干事，互相策励，期以保持共和国民之人格，而力求进步，以渐达于大道为公之盛，则斯会其嚆矢矣。

民国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下略）

（1912 年 2 月 22 日铅印原件）

致寿孝天函

（前略）蔬食主义，先生之论，实获我心，盖吾两人之性质，实最相近者也。亚兄之言，则以论理学之法相绳，亦持之有故。但此主义，乃情感上之问题（弟前函言感觉，似不如情感为妥），而非知识上之问题；即兼知识言之，亦进化论之范围，而非目的论之范围。

现在人类之知识，尚不能有确定之目的论，即将来之人类，亦恐终无从而确定。至于进化论，则已有公例可循。而蔬食主义者，于进化论之公例，实为不悖。盖人类文化愈浅，则其所牺他以自益者，愈与己近似；而文化渐进，则所牺者以渐疏远。最显之例，其始以人异人，如我国及日本之肩舆及人力车，稍进则用马车，更进则用油用电。其理由有二：一以知识进步，利用之术渐精；二则情感进步，恻隐之心渐广也。野蛮人能食人，而开化之民族则不能，以野蛮人尚无人类同等之观念，其视异种之人，犹开化人之视禽兽也。自达尔文进化论发行后，人兽同祖之说，积渐为人类所公认，而动物心理及动物教育之成迹〔绩〕，日渐进步，于是人兽同等之观念，日渐萌茁于普通人之脑中，而蔬食主义渐行矣。

现在动植物之关系，尚无确定之进化论，他日自当有发见之一日；及其时，则人类或并可不食植物而专食无机物，亦未可知。友人自法京贻书告我，谓西欧卫生学者，于饮食一门，谓当以化学制造品代自然生物。近日热心研究者颇多。窃意彼等所研究者，自必先取资于植物。然由

此进化，必可由植物而蜕为无机物，盖可悬揣也。

人体中消化机，几占大部分，使腰不能细，不合于普通人审美之观念，致有矫揉以为之者。而排泄物尤为讨厌。若他日食物，由固体而嬗为液体，又渐由液体而嬗为气体；于是即以发血管及回血管专有营养、排泄之作用。而腹中之消化机、排泄机，因无用之故，以渐缩小，终至消灭，殆亦一快〔快〕事；然此事不知在若干万年之后。近人所公认者，尚只有达尔文派之生物进化论，则只能为肉食主义、蔬食主义交换时代之起点，而其他，则不能不让之后人也。

人之所具，为物理的身体，而其所生活者，为物理的世界，则皆范围于进化论，而不能绳之以目的论。一切举动，皆为比较的，而非绝对的。如蔬食主义者，不特植物亦有生命，与戒杀之名不合；即姑加戒杀以不杀动物之界说，而一叶之蔬，一勺之水，固亦有无数之小动物生活其间，然则蔬食者，固仍不可谓达其戒杀之目的也。

至于弟之从此主义，则为间接而又间接之受动的；且亦动于情感，而非动于理论。去年阳历三月间，同学齐君游巴黎而归，为言高阳李君，日以蔬食主义劝同国人，而从之者甚少甚少。李君者，字石曾，研究农学，尝在法国卫生学会演说中国豆腐可以代外国牛酪之理，而大受该学会之赞成，因而集股设豆腐公司于巴黎者也。彼既实行蔬食主义，且日以其理论聒于人，而从之者究竟甚少甚少。盖世界实行之事，大抵动于情感，而非动于理论者也。弟迩时闻齐君之言，而忽有所感动；又闻此地有蔬食馆数处，遂试验之，觉于吾之口及胃，均无甚不适，而于吾心则甚惬，遂立意久持之。且因此而欲寻其理论，则所得德文之书皆小册。其关于此主义之起源及沿革者，竟不可得。论其关于卫生之原理者，亦甚略，盖此主义本不创自

德人，而弟所得者，又皆近出之书，所记皆不过短时之演说若杂志之论说故也。中有一小册，曰《托尔斯泰及蔬食主义》，托氏本俄国之释迦，尝演说屠肆及猎场之惨状，此小册译述之，亦弟所深受其刺戟者也。

（1910年4月浙江旅沪学会《会刊》第13期）

支那之专制政体

支那自中华民国元年以前，上溯至有史之始，以至神话时代，皆为君主政体。然其为绝对的中央集权制者，惟秦世，仅十五年耳。其他时代，皆为有限的集权制。其故有二：（一）君主常对于人民而负责任；（二）中央政府常以其一部分之权，分之于诸侯、或地方大吏。

君主对于人民而负责任，儒家学说之结果也。盖支那之政治学说，发生于周季，其中，最有影响于后世者，凡三家：一曰法家，始于管子，成于韩非子，以法学为根据；二曰道家，始于老子，成于庄子，以形上学为根据；三曰儒家，始于孔子，成于孟子，以伦理学为根据。

法家之言，以国家为目的，以人民为作用。君主代表国家，有无限之威权以对于臣民；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皆集于君主。惟既立之法，君主亦受其范围。其于君位相承，以世袭为正，谓其可以泯争也。道家之言，以个人为本体，以国家为历史上偶然演成之形式，以君主为偶然之职分；故君主之权，苟有可以减杀者，务减杀之。其本意实以无政府为目的。儒家之言，则在法家、道家之间，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体，君主为人民而设，有教养人民之责任；而尤在自修其德，以开化人民，使同趋于为善，故必以一国中道德最高者充之。如君主不德，则人民得别推有德者以代之，故以选举之君主为原则。

秦始皇帝统一支那，用法家之言，绝对专制；不及十年，而平民发难，又五年而秦亡。后世称之曰暴秦，悬为

鉴戒，无敢复行之者。汉世，矫秦之弊，用道家言，后稍稍参用法家。及西历纪元前百三十六年，定用儒家学说，为立国根本，历代因之。故君主于官吏之不称职者，常深自引咎，以为不善用人，不称为民父母之职。国有大故，则下诏罪己，以告国民，此为二千年来历史中所数见不鲜者也。

至中央政府，所以分权于诸侯或地方大吏者，则以地广人众，虽欲行绝对的集权制，而有所不能。自秦以前，粹然为封建之制。其所自起，以唐代文豪柳宗元之说，为最近于事实。其言曰：人之初，与万物皆生，不能搏噬，而又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必假物以为用；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惩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一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天子。

唐虞之际，天子由诸侯选举。自夏以后，天子世袭，而王畿不过千里。其余国土，皆为侯国所占有。至秦，始统一之。汉兴，又众建诸侯，侯国屡叛。纪元前百五十三年，始定制，诸侯不得自治其民；朝廷为置内史，治民事。嗣后历朝，虽无不分封子弟，而皆无治民之权。然诸侯既有分土，则往往擅执赋权、兵权，以与中央政府竞争，如晋之八王，明之燕王及宸濠等，是也。自汉之初，侯国与郡县并立。凡郡县，皆以官吏治之；及诸侯不治民

事，则全国民事，皆掌于地方官吏。幅员既广，习俗互殊，中央政府不能事事干涉，亦不能绳以固定之法；法制上虽未尝予地方官吏以便宜行事之权，而事实常所不免。故相承有有治人无治法之语；而循吏、酷吏之目，常揭于史乘。自十二纪以后，地方大吏分治之权，遂成为公例矣。

以上皆通四千年之君主政体而论之也。若截取一节，以与欧洲中古时代相较，则以唐世为适宜。唐之时，天子亦屡有引罪之文。其最著者，为西历［千］七百八十四年所颁，是合于前述第一因。自［千］七百五十四年以后，藩镇擅权，及起兵者相继，历百五十年以至于唐之亡，合于第二因。故亦为有限的集权制，而非绝对的集权制。至其法制所定，则厘然有系统，区全国为千五百五十一县，县治以令。一县之中，授田、收税、导风化、断狱讼，皆由县令率其佐贰而治之。统县者曰州，曰府，凡三百五十二，治以刺史、或都护。统州、府者曰道，凡十，治以都督，专理兵事。凡令、刺史、都护及都督，任命之权，皆在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之职官，分理全国大政者，曰六部：一曰吏部，掌官吏之选任及考课；二曰户部，掌财赋之出入；三曰礼部，掌教育宗教；四曰兵部，掌兵事；五曰刑部，掌刑法；六曰工部，掌工程。又有御史台，为司法之官，掌纠察官吏，平谳冤狱；并有监察御史，分巡各州县。其组织，以周礼为模范；惟周为封建之世，故对于各地方之干涉，远不如唐世之周密也。

（1922 年蔡元培手稿）

关于宗教问题的谈话

将来的人类，当然没有拘牵仪式、倚赖鬼神的宗教。替代他的，当为哲学上各种主义的信仰。这种哲学主义的信仰，乃完全自由，因人不同，随时进化，必定是多数的对立，不像过去和现在的只为数大宗教所垄断，所以宗教只是人类进程中间一时的产物，并没有永存的本性。

中国自来在历史上便与宗教没有甚么深切的关系，也未尝感非有宗教不可的必要。将来的中国，当然是向新的和完美的方面进行，各人有一种哲学主义的信仰。在这个时候，与宗教的关系，当然更是薄弱，或竟至无宗教的存在。所以将来的中国，也是同将来的人类一样，是没有宗教存在的余地的。

少年中国学会是一种创造新中国的学术团体。在这个过渡时期，对于宗教，似乎不能不有此一种规定，亦如十余年前法国的 Mission naïque 一样的要经过一番无宗教的运动才有今日。

我个人对于宗教的意见，曾于十年前出版的《哲学要领》中详细说过，至今我的见解，还是未尝变更，始终认为宗教上的信仰，必为哲学主义所替代。

有人以为宗教具有与美术、文学相同的慰情作用，对于困苦的人生，不无存在的价值。其实这种说法，反足以证实文学、美术之可以替代宗教，及宗教之不能不日就衰亡。因为美术、文学乃人为的慰藉，随时代思潮而进化，并且种类杂多，可任人自由选择。其亲切活泼，实在远过

于宗教之执着而强制。至有因美术、文学多采用宗教上的材料，因而疑宗教是不可废的，不知这是历史上一时的现象。因为当在宗教极盛的时候，无往而非宗教，美术、文学，自然也不免取材于此。不特是美术、文学，就是后来与宗教为敌的科学，在西洋中古时代，又何尝不隶属于基督教？彼此的关系，又何尝不深？自文艺中兴时代，用时代的人物及风俗写宗教的事迹，宗教的兴味，已渐渐薄弱。后来采取历史风俗的材料渐多，大多数文学、美术与宗教毫无关系，而且反对宗教之作品，亦日出不穷，其慰藉吾人之作用，仍然存在。因此知道文学、美术与宗教的关系，也将如科学一样，与宗教无关，或竟代去宗教。我曾主张“美育代宗教”便是此意。

（1921 年 8 月 1 日《少年中国》第 3 卷第 1 期）

孔子之精神生活

精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对待的名词。孔子尚中庸，并没有绝对的排斥物质生活，如墨子以自苦为极，如佛教的一切惟心造；例如《论语》所记：“失饪不食，不时不食”，“狐貉之厚以居”，谓“卫公子荆善居室”，“从大夫之后，不可以徒行”，对于衣食住行，大抵持一种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的态度。但使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在不可兼得的时候，孔子一定偏重精神方面。例如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他的精神生活，是决不为物质生活所摇动的。今请把他的精神生活分三方面来观察。

第一，在智的方面。孔子是一个爱智的人，尝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又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又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可以见他的爱智，是毫不含糊，决非强不知为知的。他教子弟通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又为分设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彼劝人学诗，在心理上指出“兴”、“观”、“群”、“怨”，在伦理上指出“事父”、“事君”，在生物上指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如《国语》说：孔子识肃慎氏之石砮，防风氏骨节，是考古学；《家语》说：孔子知萍实，知商羊，是生物学；但都不甚可信。）可以见知力范围的广大。至于知力的最高点，是道，就是最后的目

的，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何等的高尚！

第二，在仁的方面。从亲爱起点，"泛爱众，而亲仁"，便是仁的出发点。他的进行的方法用恕字，消极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他的普遍的要求，是"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他的最高点，是"伯夷、叔齐，古之贤人也，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人〔身〕以成仁。"这是何等伟大！

第三，在勇的方面。消极的以见义不为为无勇；积极的以童汪踦能执干戈卫社稷可无殇。但孔子对于勇，却不同仁、智的无限推进，而时加以节制。例如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欤？""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暴虎凭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焉，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这又是何等的谨慎！

孔子的精神生活，除上列三方面观察外，尚有两特点：一是毫无宗教的迷信，二是利用美术的陶养。孔子也言天，也言命，照孟子的解释，莫之为而为是天，莫之致而至是命，等于数学上的未知数，毫无宗教的气味。凡宗教不是多神，便是一神；孔子不语神，敬鬼神而远之，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完全置鬼神于存而不论之列。凡宗教总有一种死后的世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为也"；毫不能用天堂地狱等说来附会他。凡宗教总有一种祈祷的效验，孔子说："丘之祷久矣"，"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毫不觉得祈祷的必要。所以孔子的精神上，毫无宗教的分子。

孔子的时代，建筑、雕刻、图画等美术，虽然有一点

萌芽，还算是实用与装饰的工具，而不认为独立的美术；那时候认为纯粹美术的是音乐。孔子以乐为六艺之一，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对于音乐的美感，是后人所不及的。

孔子所处的环境与二千年后的今日，很有差别；我们不能说孔子的语言到今日还是句句有价值，也不敢说孔子的行为到今日还是样样可以做模范。但是抽象的提出他精神生活的概略，以智、仁、勇为范围，无宗教的迷信而有音乐的陶养，这是完全可以为师法的。

（1936年8月17日《江苏教育》月刊第5卷第9期）

辛亥那一年

辛亥是我留德的第五年。我于丁未五月间经西伯里亚往德国。到柏林后，始知有徐伯荪先烈刺恩铭于安庆，及秋竞雄先烈等在绍兴遇害之事。上海报戴〔载〕问官说："汝受孙文指使么?"（大意如此）徐先烈说："我运动革命，已二十年，还要受别人指使么?"驻德孙慕韩公使读到此，有点寒心，乃强作解嘲语说："革命党真是大言不惭。"

自丁未到辛亥五年间，差不多年年都有惊人的大事。例如丁未七月间，孙先生有钦廉之役。十一月，又有镇南关之役。戊申三月，在河口之役。是年十月，有熊成基先生在安庆起义。庚戌，有汪精卫先生刺载沣之事。至于辛亥三月间，温生才先生刺杀孚琦，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于是促成八月十九日之起义，而告一大结束。我也于是年回国了。

辛亥八月中旬（阳历十月初旬），德国大学的暑假尚未完，而中学已开课。我因几位德国朋友的介绍，往维铿斯多中学参观。这中学是私立的，是较为革新的，在课程上，重推悟不重记诵；在训育上，尚感化不尚拘束，于会食前，诵一条世界名人格言，以代宗教式祈祷；注重音乐，除平时练习外，每星期必有一次盛大的演奏；学生得举行茶会，邀教员及男、女同学谈话。我寄住在此校教员宿舍中，历一星期，觉得他们合理化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我在此校住了一星期，忽见德国报纸上，载有武汉起

义的消息，有一德国朋友问我：这一次的革命，是否可以成功？我答以必可成功，因为革命党预备已很久了。不久，又接到吴稚晖先生一函（自伦敦来，或自巴黎来，我此时记不清了。）以武汉消息告我，并言或者是一大转机，我辈均当尽力助成（大意如此）。我于是先到柏林，每日总往同学会，与诸同学购报传观，或集资发电，大家都很热烈的希望各省响应就是了。同学中，有一位刘庆恩君，稍稍做了一点可资谈助的事：同学会中，本有两面小龙旗，插在案上花瓶中。有一日，刘君把这龙旗扯破了，他去备了两面五色旗来替他。又有一日，来了一位使馆的秘书，带笑带说道："袁宫保出来了，革命军势孤了！"仿佛很得意的样子。刘君骂道："放屁！"就打他一个耳光，别人赶紧劝开，那秘书也只好悄悄的去了。

我在柏林住了一个月光景，接陈英士先生电报，催我回国，我就从西伯里亚回来。到上海，正是黄克强先生由汉口来上海的时候，孙先生还没有到。有一日，说是有一个省代表会，将于第二日举大元帅，大约举黎宋卿先生的多一点。我因为听说黎先生本来不是赞成起义的，又那时候很有与北军妥协的消息，觉得举黎不妥。特地到汤蛰仙先生处，同他磋商，适章太炎先生亦在座，详细讨论，彼等亦赞成我举黄的提议。但汤先生不肯于第二日直接举黄，而要求我亦到会，于会中推我为代表而投票举黄，不知何以要有如此曲折，我那时也不求甚解而允之。第二日，开选举会，依汤先生所定之手续，我投票举黄，章先生及其他有选举权者，皆举黄，盖事前受章、汤两先生疏通了。大元帅举定后，章先生忽起立，垂涕而道，大意说："黎先生究系首难的人物，不可辜负他，现在大元帅既选定，请设一副元帅，并举黎先生任之。"全体赞成。

那时候，又有一段新闻，关于辜汤生先生的事。自武

昌起义以后，望平街各报馆每日发好几次传单，并在馆门口用大字誊写，借示行人，于是望平街有人山人海之状。辜先生那时正在南洋公学充教员，乃撰一英文论说，送某报，责问公共租界工部局，谓："望平街交通阻滞，何以不取缔？"南洋公学学生阅之，认辜先生含有反革命意，乃于辜来校时，包围而诘责之。辜说："言论本可自由，汝等不佩服我，我辞职。"学生鼓掌而散，辜亦遂不复到校。此为我回国以后所闻，未知确否。

（1936年8月21日《越风》杂志第20期）

记鲁迅先生轶事

鲁迅先生去世，是现代文学界大损失，不但我国人这样说，就是日本与苏联的文学家也这样说，可说是异口同声了。鲁迅先生的事迹，除自传外，各报发表的也不少，无取乎复述。我现在记他的几件轶事。

三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觉得学德语的困难，与留学东京之堂弟国亲通信时，谈到这一点。国亲后来书，说与周豫才、岂明昆弟谈及，都说“最要紧的是有一部好字典”。这是我领教于先生的第一次。后来，国亲又寄给我《或外小说集》一部，这是先生与岂明合译的，大都是北欧的短篇小说，译笔古奥，比林琴南君所译的，还要古奥，只要看书名“域外”写作“或外”，就可知先生那时候于小学的热心了。

先生进教育部以后，我们始常常见面。在南京时，先生于办公之暇，常与许君季茀影抄一种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先生所发表的有校订本魏中散大夫《嵇康集》等书，想就是那时期工作之一斑了。

先生于文学外，尤注意美术，但不喜音乐。我记得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教育部废去洪宪的国歌，而恢复《卿云歌》时，曾将两份歌谱，付北平中学练习后，在教育部礼堂唱奏，除本部职员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细听，选择一份。先生与我均在座，先生对我说：“余完全不懂音乐。”我不知道他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否把“懂”字看得太切实，以为非学过音乐不可；还是对教育部这种办法，

不以为然，而表示反抗？我后来没有机会问他。

我知道他对于图画很有兴会，他在北平时已经搜罗汉碑图案的拓本。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注意。先生特别搜辑，已获得数百种。我们见面时，总商量到付印的问题，因印费太昂，终无成议。这种稿本，恐在先生家中，深望周夫人能检出来，设法印行，于中国艺术史上很有关系。先生晚年提倡版画，印有凯绥珂勒惠支及E蒙克版画选集等，又与郑君振铎合选北平南纸铺雅驯的信笺印行数函，这都与搜辑汉碑图案的动机相等的。

先生在教育部时，同事中有高阳齐君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先生职后，齐君就声明辞职，与先生同退。齐君为人豪爽，与先生的沉毅不同；留德习法政，并不喜欢文学，但崇拜先生如此，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1936年11月16日《宇宙风》第29期）

《鲁迅全集》序

“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象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但彼既博览而又虚衷，对于世界文学家之作品，有所见略同者，尽量的迻译，理论的有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之《艺术论》等；写实的有阿尔志跋绥夫之《工人绥惠略夫》、果戈理之《死魂灵》等；描写理想的有爱罗先珂及其他作者之童话等，占全集之半，真是谦而勤了。

“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虽也痛快，但人心

不同如其面，环境的触发，时间的经过，必有种种蕴积的思想，不能得到一种相当的译本，可以发舒的，于是有创作。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体除小说三种、散文诗一种、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多许的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

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然欤否欤，质诸读者。民国二十七年六月一日

蔡元培

（1938年6月1日影印手迹）

告北大同学诸君

北京大学同学诸君鉴：

仆深信诸君本月四日之举，纯出于爱国之热诚。仆亦国民之一，岂有不满于诸君之理！惟在校言校，为国立大学校长者，当然引咎辞职。仆所以不于五日即提出辞呈者，以有少数学生被拘警署，不得不立于校长之地位，以为之尽力也。今幸承教育总长、警察总监之主持，及他校校长之援助，被拘诸生，均经保释。仆所能尽之责，止于此矣。如不辞职，更待何时？至一面提出辞呈，一面出京，且不以行踪告人者，所以避挽留之虚套，而促继任者之早于发表，无他意也。北京大学之教授会，已有成效，教务处亦已组成，校长一人之去留，决无妨于校务。惟恐诸君或不见谅，以仆之去职，为有不满于诸君之意，故特在途中匆促书此，以求谅于诸君。

十日　蔡元培启

（《北京大学日刊号外》1919 年 5 月 11 日）

由天津车站南下时的谈话

本埠确实消息：蔡孑民已于十日乘津浦车南下。登车时，适有一素居天津之友人往站送他客。遇蔡君，大诧异曰：君何以亦南行？

蔡君曰：我已辞职。

友曰：辞职当然，但何以如此坚决？

蔡曰：我不得不然。当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即有人频频来告，谓政府方面之观察，于四日之举，全在于蔡，蔡某不去，难犹未已。于是有焚烧大学、暗杀校长之计划。我虽闻之，犹不以为意也。八日午后，有一平日甚有交谊、而与政府接近之人又致一警告，谓：君何以尚不出京！岂不闻焚烧大学、暗杀校长等消息乎？我曰：诚闻之，然我以为此等不过反对党恫吓之词，可置不理也。其人曰：不然，君不去，将大不利于学生。在政府方面，以为君一去，则学生实无能为，故此时以去君为第一义。君不闻此案已送检察厅、明日即将传讯乎？彼等决定，如君不去，则将严办此等学生，以陷君于极痛心之境，终不能不去。如君早去，则彼等料学生当无能为，将表示宽大之意敷衍之，或者不复追究也。我闻此语大有理。好在辞呈早已预备，故即于是晚分头送去，而明晨速即离校，以保全此等无辜之学生。

询以此后作何计划？

蔡曰：我将先回故乡视舍弟，并觅一幽僻之处，杜门谢客，温习德、法文，并学英语。以一半时力，译最详明

之西洋美术史一部，最著名之美学若干部。此即我此后报国之道也。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

（《益世报》1919 年 5 月 17 日）

致徐世昌等电

大总统、总理、教育总长钧鉴：奉大总统指令慰留，不胜愧悚。学生举动，逾越常轨，元培当任其咎。政府果曲谅学生爱国愚诚，宽其既往，以慰舆情；元培亦何敢不勉任维持，共图补救。谨陈下悃，伫候明示。元培。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益世报》1919年5月21日）

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作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而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

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

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附：爱蔡孑民者启

右宣言（指上文）闻尚是蔡君初出京时所草，到上海后，本拟即行宣布，后因北京挽留之电，有友人劝其婉复，免致以个人去留问题与学生所争政治问题，永结不解之缘，故有以有条件的允任维持之电，后来又有卧病不行之电，均未将真意说出。闻其意，无论如何，决不回校也。鄙人抄得此宣言书，觉与北京各报所载启事，及津浦车站告友之言，均相符合，必是蔡君本意。个人意志自由，本不可以多数压制之，且为社会上留此一个干净人，使不与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亦是好事。故特为宣布，以备挽留蔡君者之参考焉。

爱蔡孑民者启

（1919年6月15日蔡元培手稿）

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

北京大学学生诸君并请全国学生联合会诸君公鉴：

诸君自五月四日以来，为唤醒全国国民爱国心起见，不惜牺牲神圣之学术，以从事于救国之运动。全国国民，既动于诸君之热诚，而不敢自外，急起直追，各尽其一分子之责任。即当局亦了然于爱国心之可以救国，而容纳国民之要求。在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社会上感于诸君唤醒之力，不能为筌蹄之忘，于是开会发电，无在不愿与诸君为连带之关系，此人情之常，无可非难。然诸君自身，岂亦愿永羁于此等连带关系之中，而忘其所牺牲之重任乎？世界进化，实由分功，凡事之成，必资预备。即以提倡国货而言，贩卖固其要务，然必有制造货品之工厂，与培植原料之农场，以开其源。若驱工厂农场之人材，而悉从事于贩卖，其破产也，可立而待。诸君自思，在培植制造时代乎？抑在贩卖时代乎？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且有研究纯粹科学之机会，所以树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为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

抑诸君或以唤醒同胞之任务，尚未可认为完成，不能不再为若干日之经营，此亦非无理由。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若令为永久之觉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自大学之平民讲演，夜班教授，以至于小学之童子军，及其他学生界种种对于社会之服务，固常为一般国民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尽力矣。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怠，影响所及，未可限量。而其要点，尤在注意自己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使有左右逢源之学力，而养成模范人物之资格，则推寻本始，仍不能不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也。

且政治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至重要矣，进而求之，犹有重要于此者。自甲而乙，又自乙而丙丁，以至癸子等等，互相关联。故政客生涯，死而后已。今诸君有见于甲乙之相联，以为毕甲不足，毕乙而后可，岂知乙以下之相联而起者，曾无已时。若与之上下驰逐，则夸父逐日，愚公移山，永无踌躇满志之一日，可以断言。此次世界大战，德法诸国，均有存亡关系，罄全国胜兵之人，为最后之奋斗，平日男子职业，大多数已由妇女补充，而自小学以至大学，维持如故。学生已及兵役年限者，间或提前数月毕业，而未闻全国学生，均告奋勇，舍其学业，而从事于军队，若职业之补充，岂彼等爱国心不及诸君耶？愿诸君思之。

仆自出京，预备杜门译书，重以卧病，遂屏外缘。乃近有“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之呼声，各方面遂纷加责备，迫以复出，仆遂不能不加以考虑。夫所谓“教育原状”者，宁有外于诸君专研学术之状况乎？使诸君果已抱有恢复原状之决心，则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仆为教育前途起见，虽力疾从公，亦义不容辞。读诸君十日三电，均

以“力学报国”为言，勤勤恳恳，实获我心。自今以后，愿与诸君共同尽瘁学术，使大学为最高文化中心，定吾国文明前途百年大计。诸君与仆等，当共负其责焉。

（1919年7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第421号）

哲学与科学

哲学与科学，同为有系统之学说。其所异者，科学偏重归纳法，故亦谓之自下而上之学；哲学偏重演绎法，故亦谓之自上而下之学。古代演绎法盛行之时，但有哲学之名；今之所谓科学者，悉包于哲学之中焉。

盖人智之萌芽，本为神话，拜物之习，拟人之神，雷公电母，迎虎祭猫，皆自然科学之对象也。世界原始之谈，人类生死之解，中国之盘古及感生帝，印度之梵天及轮回说，《旧约》之《上帝创造世界记》，皆哲学之对象也。然以偏于科学对象者为多。本此等神话而组成不完全之系统，引以切近人事，于是有宗教。中国之丧祭等礼，印度之婆罗门，波斯之火教，犹太人之《旧约》皆是也。其理论亦大抵包有近世科学之对象，而关于哲学者为多。其后人类又迫于科学思想之冲动，不餍于此等独断之宗教，乃各以观察所得者立说，是为哲学之始。如中国之八卦说、五行说，印度之六派哲学（数论胜论等），希腊之宇宙论，皆毗于自然界之独断论也。及其说为时人所厌，而怀疑派之哲学，继之而起，于是有中国之少正卯一流。（《荀子·宥坐》篇："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众；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非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正与希腊诡辩派相类），印度之六师外道，希腊之诡辩派；此等怀疑之论，不足以久维人

心，于是有道德论之哲学继之。如中国之孔子，印度之佛，希腊之苏格拉底是也。佛氏以宗教之形式，阐揭玄学；其后循此发展，永为宗教性之哲学，遂与科学无何等之关系。孔子之后有庄子，苏格拉底之后有柏拉图，皆偏于玄学者也。孔子同时有墨子，苏格拉底之后有雅里士多德，则皆兼治科学者也。庄子之哲学，为神仙家所依托，而有道教；柏拉图之哲学，为基督教所攀援，而立新柏拉图派，则又由哲学而转为宗教矣。中国墨学中绝，故以后科学永不发展；而宗仰孔子之儒家，自汉以来，不能出烦琐哲学之范围。西洋之宗教，引雅里士多德学派以自振，故中古之烦琐哲学，虽为人智之障碍，而科学之脉未绝。及文艺中兴以后，思想界以渐革新，自然科学，次第成立。于是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缘之而起焉。

其在古代，所谓哲学者，常兼今日之所谓科学而言之。如柏拉图分哲学为三大类：一曰辨学，二曰物理，三曰伦理，而以辨学为纲。雅里士多德则分哲学为理论、实际二大类，其属于理论者，为分析术（论理学）、玄学、数学、物理学、心理学；其属于实际者，为伦理学、政治学、辩论学、诗学。此等观念，至近世哲学家，如培根、特嘉尔辈，亦尚仍之。培根分学术为三大类：一曰记忆之学，史学是也；二曰想象之学，诗学是也；三曰思想之学，哲学是也。哲学之中，分为自然宗教学、宇宙论、人类学三纲。于宇宙论中，分为自然学（物理）及自然鹄的论（玄学）二门。又于自然学中，分为自然记述学（具体的物理学）及自然说明学（抽象的物理学，即物理学及化学）。其于人类学中，分为各人及社会二纲。属于各人者，为生理学（其应用为医学）及心理学（包论理学及伦理学）；其属于社会者，为政治学。特嘉尔著《哲学纲要》一书，其第一编为认识论及玄学之概论，第二编为机械的

物理学要旨，第三编为宇宙论，第四编为物理学、化学、生理学之说明。说者谓等于学术丛编焉。而特嘉尔自序谓哲学即人类知识之综合，其主要者：（一）玄学，（二）物理学，（三）机械的科学，包有医学、机械学及伦理学云，皆以哲学之名包一切科学也。

又有以哲学与科学为同义者，如霍布斯分哲学为三部分：曰物理学，曰人类学，曰政治学。又谓不属于哲学者，为神学及历史（自然史及政治学）。何也？以其非科学也。洛克分哲学为二部：一曰物理（亦谓之自然哲学）；二曰应用（如伦理学，论理学等）。一千六百九十六年，英国著名算学家韦里斯（Wallis）于皇家科学会成立式演说曰：本会者，超乎宗教及政治之外，而专为哲学之研究者也。研究之对象：曰物理学，曰解剖术，曰形学，曰天文，曰航海术，曰统计学，曰磁学，曰化学，曰机械学，曰实验之自然科学。我等所讨论者，曰血之流行，曰静脉，曰哥白尼学说，曰彗星及新星之性质，曰木星之卫星，曰远镜之改良，曰空气之重量，曰真空之能否。要之，所谓一切新哲学者，皆包之而已。曰科学，曰哲学，曰新哲学，初未为界别也。伏尔弗（Wolff）者，于十八世纪中，组织通俗哲学者也。分哲学为三部：曰自然神学，曰心理学，曰物理学，此模范科学也，为第一部；曰论理学，曰与心理学相应之实用哲学，曰与物理学相应之机械学，为第二部；曰本体学，为综合一切现象而考定之科学，为第三部。是亦以哲学包科学者也。至康德作《纯粹理性批判》，别人之认识为先天、后天二类：先天者，出于固有，后天者，本于经验；前者为感想，而后者为分析法；前者构成玄学（即哲学），而后者构成科学。于是哲学与科学，始有画然之界限。

然由是而康德以后之理想派哲学家，遂有排斥科学之

说。如非屑脱云:“哲学者,不必顾何等经验,而纯然从事于先天之认识者也。”赛零则又进一步,谓“自然学研究者之方法,盲者也,无理想者也,故哲学破坏于培根;而科学则破坏于波埃尔(Boyle)及牛顿”。至于海该尔为悬想派哲学之完成者,则以科学为不外乎各种零碎知识之集合;而实在之知识,惟有哲学耳。既有此排斥科学之哲学家,而科学发展以后,遂有排斥哲学之科学家。大率谓哲学者,严格言之,本不得为科学,是乃一种之诡辩术,据一种官能或理性之现象以说明一切事物;或为一种之魔术,以深晦之神意,杂入最普遍之概念而宣布之。要皆以震骇庸俗已耳!凡此等互相非薄之言,其非真理,可不待言。惟有一种事实,不可不注意者:则自科学发展以后,哲学之范围,以渐减缩是也。

自十六世纪以后,学术界之观念,渐与中古时代不同。其最著者:(一)培根于论理学极力提倡归纳法,因得凌驾雅里士多德之演绎法,而凡事基础于实地之观察;(二)自一千五百九十年,发明显微镜,千六百零九年,发明远镜,其后寒暑风雨电气等表,次第发明,而实验之具渐备;(三)分工之理大明,渐由博综之哲学,而趋于专精之科学。此皆各种科学特别成立之原因也。哥白尼(Copernicus 1473—1543)唱地动说;加伯尔(Kepler 1571—1630)发见行星绕日之规则;加里勒(Galileo 1564—1642)附加以地球绕日之时间;牛顿(Newton 1642—1727)更发见引力之公例;而天文学成立。自梅斯纳(Mersenne 1588—1648)、斯耐尔(Snell 1591—1628)发明声学、光学之公例;齐贝尔(Gilbert)发见磁学公例;而物理学以渐成立。波爱尔(Robert Boyle 1627—1691)规定原子之概念,而化学以渐成立。哈尔佛(Harvey 1578—1657)发见血液循环之系统,而生理学以渐成立。李耨(Linné 1707—1778)新定植物系统,而植

物学成立。屈维野（Cuvier 1769—1832）创比较解剖学，研求动物自然系统，而动物学成立。凡自然现象，自昔为哲学所包含者，皆已建立为科学矣。而精神现象之学，如心理学者，近已用实验之法，组织为科学，发起于韦贝尔（E. H. Weber 1795—1878），费希纳（Fechner 1801—1887），而成立于冯德（Wundt）。由是而演出者，则有费希纳之归纳法美学，及马曼（Meumann）之实验教育学，亦将离哲学而独立。其他若社会学，若伦理学，若人类学，若比较宗教学，若比较言语学等，凡昔日之附丽于哲学，而以演绎法治之者，至于今日，悉以归纳法治之，而将自成为科学。然则所遗留而为哲学之范围者，何耶？

于是郎革（Albert Lange）以为将来之哲学，有思想的文学而已。而海该尔之徒，则以为将来之哲学，不过哲学史耳。夫文学必含哲理，在今日已为显著之事实。新哲学之发生，必胚胎于思想的历史之总和；不能不以哲学史为哲学之大本营，亦事实也。然哲学之各部分，虽已分演而为各科学，而哲学之任务，则尚不止于前述之二端，约举之有三：一曰各科哲理，如应用数学之公例以言哲理，谓之数理哲学，应用生理学之公例以言哲理，则为生理哲学等是也。二曰综合各种科学，如合各种自然科学之公例而去其龃龉，通其隔阂，以构为哲学者，是为自然哲学。又各以自然科学所得之公例，应用于精神科学，又合自然科学及精神科学之公例，而论定为最高之原理，如孔德（Auguste Comte）之实证哲学，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之综合哲学原理是也。三曰玄学，一方面基础于种种科学所综合之原理，一方面又基础于哲学史所包含之渐进的思想，而对于此方面所未解决之各问题，以新说解答之。如别格逊（Henri Bergson）之创造的进化论其例也。夫各科哲理与综合各种科学，尚介乎科学与哲学之

间，惟玄学始超乎科学之上。然科学发达以后之玄学，与科学幼稚时代之玄学较然不同，是亦可以观哲学与科学之相得而益彰矣。

（1919 年 1 月《北京大学月刊》第 1 卷第 1 号）

《国民杂志》序

《国民杂志》者，北京学生所印行也。学生唯一之义务在求学，胡以牺牲其求学之时间与心力，而从事于普通国民之业务，以营此杂志？曰：迫于爱国之心，不得已也。向使学生而外之国民，均能爱国，而尽力于救国之事业，使为学生者得专心求学，学成而后有以大效于国，诚学生之幸也。而我国大多数之国民，方漠然于吾国之安危，若与己无关。而一部分有力者，乃日以椓丧国家为务。其能知国家主义而竭诚以保护之者，至少数耳。求能助此少数爱国家唤醒无意识之大多数国民，而抵制椓丧国家之行为，非学生而谁？呜呼！学生之牺牲其时间与心力，以营此救国之杂志，诚不得已也。

学生既不得已而出此杂志，则所出杂志之务有以副学生之人格，其要有三：

一曰正确。有一事焉，与吾人之所预期者相迎合，则乍接而辄认为真；又有一事焉，与吾人之所预期者相抗拒，则屡闻尚疑其伪。此心理上普通作用也。言论家往往好凭借此等作用，以造成群众心理，有因数十字之电讯而酿成绝大风潮者，当其时无不成如荼如火之观，及事实大明，而狂热顿熄，言论家之信用荡然矣。故爱国不可不有热诚；而救国之计划，则必持以冷静之头脑，必灼见于事实之不诬而始下判断，则正确之谓也。

二曰纯洁。救国者，艰苦之业也。墨翟生勤而死薄，勾践卧薪而尝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断未有溺情于耳目之娱，侈靡之习，而可以言救国者。近来我国杂志，往往一部分为痛哭流涕长太息之治安策，而一部分则杂以侧艳之诗文，恋爱之小说，是一方面欲增进国民之人格，而一方面则转以陷溺之也。愿《国民杂志》慎勿以无聊之词章充篇幅。

三曰博大。积小群而为大群，小群之利害，必以不与大群之利害相抵触者为标准。家，群之小者也，不能不以国之利害为标准。故有利于家，而又有利于国，或无害于国者，行之。苟有利于家，而有害于国，则绝对不可行。此人人所知也。以一国比于世界，则亦为较小之群。故为国家计，亦当以有利于国，而有利于世界，或无害于世界者，为标准。而所谓国民者，亦同时为全世界人类之一分子。苟倡绝对的国家主义，而置人道主义于不顾，则虽以德意志之强而终不免于失败，况其他乎？愿《国民杂志》勿提倡极端利己的国家主义。

以上三者，皆关于内容者也。至于《国民杂志》社之进行，最所希望者，曰有恒。《国民杂志》之酝酿，已历半年，卒底于成，不能不佩社员之毅力。自此以前，尚为一鼓作气之时期。若前数期出版以后，渐渐弛其责无旁贷之决心，则此后之困难，正不弱于酝酿时期。愿社员永永保此朝气，进行不怠，则于诸君唤醒国民之初心，始为无负也。

（1919年1月《国民杂志》创刊号）

教育之对待的发展

吾人所处之世界，对待的世界也。磁电之流，有阳极则必有阴极；植物之生，上发枝叶，则下茁根荄，非对待的发展乎？初民数学之知识，由一至五而已，及其进步，自五而积之，以至于无穷大，抑亦自一而折之，以至于无穷小，非对待的发展乎？古人所观察之物象，上有日月星辰，下有动植水土而已；及其进步，则大之若日月之组织，恒星之光质，小之若微生植物之活动，原子电子之配置，皆能推测而记录之，非对待的发展乎？

教育之发展也亦然。在家族主义时代所教训者，夫妇、亲子、兄弟间之关系，孝悌亲睦而已。及其进而为家族的国家主义，则益以君臣、朋友二伦，所扩张者犹是人与人之关系。而管仲之制，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幼而习焉，不见异物而迁。李斯之制，焚诗书百家语，欲习法令者，以吏为师。是个人职业教育之自由犹被限制也。进而为立宪的国家，一方面认个人有思想、言论、集会之自由，是为个性的发展；一方面有纳税、当兵之义务，对于国家而非对于君主，是为群性的发展。于是有所谓国民教育者。两方面发展之现象，亦以渐分明。虽然，群性以国家为界，个性以国民为界，适于甲国者，不必适于乙国。于是持军国民主义者，以军人为国民教育之标准；持贵族主义者，以绅士为标准；持教会主义者，以教义为标准；持实利主义者，以资本家为标准。个人所有者，为"民"权而非

“人”权；教育家所行者，为“民权的”教育而非“人格的”教育。自人类智德进步，其群性渐溢乎国家以外，则有所谓世界主义若人道主义；其个性渐超乎国民以上而有所谓人权若人格。

科学研究也，工农集会也，慈善事业之进行也，既皆为国际之组织，推之于一切事业，将无乎不然；而个人思想之自由，则虽临之以君父，监之以帝天，囿之以各种社会之习惯，亦将无所畏葸而一切有以自申。盖群性与个性的发展，相反而适以相成，是今日完全之人格，亦即新教育之标准也。持个人的无政府主义者，不顾群性；持极端的社会主义者，不顾个性；是为偏畸之说，言教育者其慎之。

吾友黄郛君著《欧战之教训及中国之将来》，对于吾国教育之计划，有曰：“立国于二十世纪，非养成国民兼具两种相反对之性质不可：曰个人性与共同性……今次欧战教训，无论其国民对于国家如何忠实，若仅能待命而动，无独立独行之能力者，终不足以担负国家之大事。年前法国教育家钮渥曾著一论，谓‘从前世人尝有一疑问，谓教育之目的，究系为个人乎？抑为社会与国家乎？如为个人也，宜助长个性之发达，是与共同组织有碍也；如为社会与国家也，宜奖励共同性之养成，是阻止个性之发达也。吾今敢确切答复曰：此后国家之生存，必须全体国民同时具备此两面之资格而后可。故此后教育家之任务，在发见一种方法，能使国民内包的个性发达，同时使外延的社会与国家之共同性发达而已矣。’盖惟此二性具备者，方得谓此后国家所需要之完全国民也。”黄君之言，足以证教育对待的发展之义矣。余惜其仅为国民教育言，一间未达，故广其义，以著于篇，备今之言新教育者参考焉。

（1919年2月《新教育》第1卷第1期）

答谢祝寿献屋函

适之、抚五、巽甫……诸先生暨梦麟、太侔、志希……诸同学公鉴：

接二十四年九月七日惠函，拜读以后，惭悚得很！诸君子以元培年近七十，还没有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特以合力新建的房屋相赠；元培固没有送穷的能力，但诸君子也不是席丰履厚的一流；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

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抽象的讲起来，这种对于公尔忘私的奖励，在元培也是极端赞成的。但现在竟以这种奖励加诸元培，在元培能居之不疑么？

但使元培以未能自信的缘故，而决然谢绝，使诸君子善善从长的美意无所藉以表见，不但难逃矫情的责备，而且于赞成奖励之本意，也不免有点冲突。元培现愿为商君时代的徙木者，为燕昭王时代的骏骨，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并勉励子孙，永永铭感，且勉为公尔忘私的人物，以报答诸君子的厚意。谨此申谢。敬祝

诸君子健康

蔡元培敬复

（1936 年 1 月 1 日）

诗韵与人情

为香港元发行主人书对联

遇事虚怀观一是，

与人和气察群言。

鹤庼蔡元培

（1893年8月）

和李慈铭《庭树为风雨所折叹》

叒木东隅旧，平平二百年。拜棠忌鼠器，横草警狼烟。三摘敦瓜苦，越南已折入佛郎西，日本又争朝鲜，藩篱尽撤，能无剥床之惧？孤军瘪叶怜。朝鲜乞援，李傅相遣叶军门志超往，挚兵仅三千，而日兵驻韩已六千余人，来者尚骆驿不绝。将军旌大树，谁似节侯贤。读先生悯雨歌，有感东邻兵事，故云尔。

（1894年7月21日据蔡元培手稿）

偕蒋梦麟游花坞六绝

一

游迹先经松木场，肥缸多许到途旁。湖滨久吸新空气，到此居然忆故乡。绍兴人从前多露列肥缸，闻近已改设公厕，不意于此间又见之。

二

东阳艇子坐珈趺，粗席为篷顶上铺。水涨桥低行不得，几番抽出一边弧。

三

几处桑根漾绿波，稻畦漫漫已成河。舟人为避小桥阻，径自田间放棹过。

四

花坞无人再艺花，道旁茶竹翠交加。逢人尚问坞何在？已入坞中二里赊。

五

茅蓬十八悉成庵，第一庵中我辈探。掘笋烹茶日亭午，一僧庸朴耐闲谈。

六

中途忽遇雨倾盆，已过凉亭不见村。衣履淋漓全透渗，始逢社庙急推门。

（1919 年 7 月 14 日据蔡元培手稿）

送湄莼之江右四绝

海滨洴澼百金方，施手摩天巨刃扬。文字九千经十二，人间何处觅原尝。

晚学纷纷杨子居，南行之沛或相依。鹏蜩各得逍遥旨，谁解南华是僻书。元唱饱食不知农战苦，我生惭对卫鞅书，甚佳。

漫说人间无是非，风涛中占一荒矶。先秦儒墨多名手，赢得众言吕不韦。

曾闻搤臂感曾参，远志当归旨午探。此去鄱阳风信好，先从家问寄丛潭。

（1890 年 7 月 20 日据蔡元培手稿）

和薛大见怀韵二绝

穷大曾闻易失居，卅年日月感慆除。喜君锐志名家学，通故覃覃补礼书。

粤东午夜数南星，怪底年来目不听。《经典释文》引《说文》睽目，不相听也。我信步天先学算，周髀字字映枯萤。

（1896 年 7 月 20 日据蔡元培手稿）

题铁花灯十六绝

如此风神故清绝，雅宜饮酒读离骚。都梁已逐椒蓠化，赢得香名付尔曹。兰

空谷无人自惜芳，惯将露眼荡风光。无端写入隃糜墨，乞与怀香锦帐郎。又

兰膏明爉华灯错，楚些同心感自煎。我爱护花兼护影，珊珊如见藐姑仙。又

昔有从蜻居海上，朝朝暮暮已忘形。近朱近墨与俱化，入空长馨吾德馨。芝兰蜻蜓

酒阑灯灺一枝斜，水欲生波月透斜。我爱梅溪集中句，此花真是铁心花。梅

雪魄冰魂郁古春，画图随例作轮囷。辟千灌万始传出，不数西塍谱喜神。又

好锻嵇生故不慵，风流尚许竹林从。痴心便欲裁为笛，持似廉夫和铁龙。竹

霸桥草折镇年年，一曲阳关思惘然。铁板江东翻别调，荆高豪气挟幽燕。柳

野风宛宛雨丝丝，尽日无人开向谁。道是輣园怀梦草，当涂翩逝未应知。蝴蝶花

江干簇簇蓼花秋，露似珍珠月似钩。消得青衣双拥髻，夜深妮语荡清愁。蓼花蚱蜢

人生识字始生忧，百感茫茫不自由。安得故人贻丹棘，树之襟背永无邮。萱花

秋来细趁野花香，不傍东篱觅宠光。漫道孤芳只自赏，抱枝吟彻络丝孃。野菊络纬

治墙果似日精无，狼尾旁通证子虚。遇物能名掞古谊，不妨尔正注虫鱼。野菊狼尾螳螂

不是将离也断肠，薄罗初试怯新凉。北窗添种蒲�草，何事通明奏绿章。秋海棠

清商凄切沁心脾，恤纬原非次室悲。朝露夕阳皆转晌，闲花野草竟何知。野草络纬

草长江南莺乱飞，暖风竟日酝芳菲。吴侬爱摘宫辞艳，陌上花开缓缓归。野花

（1896 年 7 月 20 日据蔡元培手稿）

游逸门山石宕即事六绝

越中石宕柯岩最，更数曹山与石芊。我爱逸门绝幽倩，架床未展读书堂。

数峰绉瘦俯清泚，赖有泉明拂拭之。万柳桥边堤百丈，游人竞说放生池。

古墓犁田事可哀，荒山丛郭费安排。若闻冠石同鳌戴，恐有甄舒入梦来。

题名半厂太陈陈，诗老当年载月频。东望种山南石匮，我今载得月中人。石壁有杜尺庄先生及卍香和尚诸人题名，称道光□年中秋后一日，自香炉峰载月来游云云。绝壁又有同治四年王叔彝等题名，称载酒来游，乘月返郡城。字大小皆如前，盖学步邯郸者。月中人，指歌者嫦娥。

濠梁之乐我知鱼，潭水深深千尺余。岂必垂纶为贪饵，兰风钓石近何如？胡七、徐五，钓皆不得。

石屋参差如意庵，道南诸阮老尼谙。同舟好事徐元固，买得丛书满一龛。元固，徐坚字。小泾阮氏藏书，寄石龛中，令老尼卖之，尼本阮氏女仆也。以瑟买《知不足斋丛书》。

（1896 年 7 月 28 日据蔡元培手稿）

题沈应南行乐图二绝

若士相期汗漫游，金华冠子吉光裘。豪情不数严夫子，遍历裨瀛大九州。李固与弟圄书，固周观天下，独未见益州耳，昔严夫子常言，经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类此子矣。

灞桥诗思洵清绝，中散琴心况渺然。登彼高山望远海，移情何处觅成连。图中重裘朱月朱制骑驴，奚童担篋，旁悬一琴。

（1896年8月18日据蔡元培手稿）

酬许翰伯赠别韵二律

我欲披云诉玉京，浑河滴泪可能清。买山计已荒充隐，斫地歌犹张酒兵。藜藿岂曾庇猛兽，蒲牢徒见吼长鲸。三君八俊古何物，未必东林果累明。

西笑长安梦未醒，感君高咏托云停。国师问字从杨子，老吏论诗比汉廷。我辈解嘲文尚白，当途惜己眼谁青。迢迢燕越三千里，夜候南天处士星。

（1896 年 11 月 24 日据蔡元培手稿）

代人赠柏广文五言律诗

史有游侠传，或云进奸雄。后书揭独行，儿异心实同。龚生尊任篇，古微始沟通。卓哉柏夫子，应和若球镛。灸眉郭稚行，取罪雷仲公。管中一斑耳，慕义曾何穷。

（1897年11月20日据蔡元培手稿）

读越缦日记感赋

卅年心力此中殚，等子称来字字安。岂许刚肠容芥恶，为培美意结花懽。史评经证翻新义，国故乡闻荟大观。名士当时亦如鲫，先生多病转神完。

（1919年7月23日据蔡元培手稿）

七绝三首

昼观鱼鸟夜观萤，活泼光明总不停。倘使眼前皆死物，更从何处证心灵。

西窗日日许看山，朝暮阴晴现一斑。不是烟霞与渲染，我心匪石也成顽。

寂如止水一湖平，闸泻溪流了不惊。赖有薰风与吹绉，万方活色眼帘呈。

（1919年7月26日据蔡元培手稿）

七绝三首

问舍求田长子孙，先生清福胜乘轩。何须唐突西施者，强与夷齐一队论。

娓娓清谈通绝尘，先生便是六朝民。不烦派到孙黎辈，再向光宣巧效颦。

十年三相渐丰腴，服制纷更悉称躯。尚有峨冠同燕尾，待周六挮补新图。

（1919年8月5日据蔡元培手稿）

题嵊县沈梅清居处

四明削成，绵亘数里，嵊县其四，驱羊之选。梅清广文，癖哉卧游。仰止行止，面东而楼。排闼送青，拄笏挹爽。一览无余，绝顶何让。名以状实，是曰揭䆉。

己亥六月　　蔡元培书

（1899 年 7 月 18 日据蔡元培手稿）

日人中畑君以册徵诗五言三律

星界积天演，危哉吉甫林。病夫宜瓦解，黄种定波沉。卓荦同文国，缠绵先觉心。侠游来几辈，自郐尚怀音。

语学余滋愧，粗知天尔波。导师足旧雨，嘉客此行窝。掷地天台赋，丰碑夏穴摩。多君尤倜傥，小极镇高歌。

闻道瀛洲饯，于今逾一年。南行尽楚粤，北指欲齐燕。社会惭无状，津梁喜有缘。茫茫文野史，百感集成连。

（1897年12月30日据蔡元培手稿）

题《广东文物展览会特刊》（一律）

中国自来富文物，广东特别见精神。殖民历练心光远，革命渊源学说新。事鉴十章张子寿，世称三绝黎简民。管窥耳食吾常愧，眼界从今顿不贫。

（1940 年 2 月 12 日据蔡元培手稿）

题《八一三纪事诗》第二册

世号诗史杜工部，亘古男儿陆渭南。不作楚囚相对态，时闻谔谔展雄谈。

得读仲仁先生《八一三纪事诗》第二册，敬题一绝奉正。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九日

蔡元培

（据香港《大公报》1940年3月24日）

赠王鹤仪一绝

梅子生仁燕护雏，绕檐新叶绿疏疏。朝来酒兴不可奈，买到钓船双鳜鱼。

鹤仪女士正

（1940 年 3 月 2 日）

为任鸿隽书扇面（一律）

忆昔梁州夜枕戈，东归如此壮心何。蹉跎已失邯郸步，悲壮空传敕勒歌。今日扁舟钓烟水，当时重铠渡冰河。自怜一觉寒窗梦，尚想浯溪石可磨。

叔永先生正

一九四〇年　蔡元培

（《少年画报》第30期）

为刘大杰书写二绝

一

剡中山色照清渊，一路常看黄杜鹃。自入新天临路后，映山红映在山泉。

二

省识山人爱植桐，输油欧美挽奇穷。看花也复惊疏秀，素瓣红趺漾晚风。

大杰我兄正

一九四〇　蔡元培

（《宇宙风》半月刊第 90 期）

和周成赏花一绝

诗人随处赋精神，斗室疏花许绝尘。最惜晨游迟一步，未能同赏赵家春。

（1940 年《宇宙风》（乙刊）第 24 期）

七绝一首

诸果般般色相新，柳筐素几净无尘。湛山手折蛇麻草，大好机缘为写真。

（据影印手迹）

为李宗侗书写对联

谟议轩昂开日月；
文章浩渺足波澜。

为余天民书写对联

钓竿欲拂珊瑚树；
诗卷长留天地间。

天民同学兄雅属

（据蔡元培影印手迹）

为陆匡文行书对联

刚日读经，柔日读史；

无酒学佛，有酒学仙。

匡文同学兄雅属

（据蔡元培影印手迹）

为傅斯年书写对联

山平水远苍茫外；
地辟天开指顾中。

孟真学兄

（据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

为李煜瀛书写对联

惜竹不除当路笋；
伐薪教护带巢枝。

（孙常炜编《蔡元培先生全集》）

为刘思谦题扇面

一

烟波深处卧孤篷，宿酒醒时闻断鸿。最是平生会心事，芦花千顷月明中。

二

落雁沙边艇子横，分明清梦上三巴。眼明一点炊烟起，不是渔家即酒家。

谷怀仁兄大人雅正

弟蔡元培

（据影印手迹）

唐孝子祠校赞

人群坚涣，爱力推移。爱无限量，始由亲施。代表百行，惟孝何疑。代表群贤，孝子允宜。盹盹唐子，昔之人师。终身孺慕，全受全归。后有达者，名德所贻。诵芬述德，展墓建祠。非祠而已，庠序在兹，广锡尔类，成人有基。养洁白华，室筑伯夷。笔耕所得，家法可知。岂等崇闳，设自民脂。清风懿德，榻为国维。

蔡元培敬撰并书

（据蔡元培手稿）

哀思与家事

悼夫人王昭文

妇，王荣庭外舅之仲女也。母氏陈。妇无兄弟，姊适薛朗仙，以光绪二十二年卒；妹未嫁而卒。妇年二十四而适于我，光绪十五年三月也。十六年春，余晋京应会试，五月归。十八年春，余应殿试，又进京，八月归。十九年夏，余历游江宁、广东，二十年春归，未几晋京散馆，二十一年冬归，二十二年十一月晋京。二十三年三月，妇携子晋京，二十四年九月，同出京，及今又将二年矣。呜呼！十年之中，余不在家者十之三四；既在家矣，往往饥驱而出。其得欢然聚首者，不过两三年耳。君之病，余适以事往嘉善，得讯而归，不及十日，而君死矣。呜呼，余能为不负君耶！

君有洁癖，坐席、食器、衣巾之属，非与同癖者或触之，则懊憹欲死。睡则先去外衣，次去裙，必以湿巾遍拭发及衣衽，盖十年如一日。其始归也，余恶其繁琐，常与之争。君又尚气，又不受佛逆之词。余好奢，而君持之以俭。余不欲近细事，而君持之以勤。余于时持既嫁从夫之义，时有以制裁之，君虽不能不相让，而心滋不悦，以是得肝疾。

近一二年，余深绎平权之义，自由之界，乃使君一切申其意，而余惟时时以解足缠、去华饰、不惑鬼怪为言，君颇以为然，而将次第实行之，余亦不之强，而俟其深悟而决去也。以是各信谆劝之有趣，而几忘狎媟之为乐。伉俪之爱，视新婚有加焉。呜呼，孰意其不可久耶！

君澹于世荣，自归余，余侥幸入科第，君不以为喜。及官京师，阒然不趋事权要。戊戌九月，决然相与携两儿出都。孑孓道路，辛苦备尝，君不以为怨。今年有试差之考，族戚友朋多以是劝晋都，而余不从，君亦无忤焉。呜呼，以君超俗之识与夫劲直之气，充其量足以偿余所期而无难，而孰意其中道而夭也夫。呜呼！

（1900年6月5日据蔡元培手稿）

哀长女蔡威廉文

近两月来，友人来函中，偶有述及报载威廉不幸之消息者，我于阅报时留意，竟未之见，而文铮来函，均为威廉附笔请安，疑诸友人所述之报误也。日内阅昆明寄来之《益世报》二十六日有女画家蔡威廉昨开追悼会新闻，二十七日有女画家蔡威廉遗作展览新闻，于是知我威廉果已不在人世矣，哀哉！亟以告养友，始知养友早已得此恶消息，且已电汇法币四百于文铮充丧用，饮泣数夜，但恐我伤心，相约秘不让我知耳。

威廉以民元前八年（一九〇三）生于上海。幼年仍随母黄仲玉夫人到绍兴及杭州、新城县等处，时我正游学德国也。民国二〔元〕年，随父母往德国；二年，回国。是年秋，随父母往法国，进天主教小学。五年冬，随父母回国，到北京，进孔德学校。十年，黄夫人去世。十二年，我续娶周养浩夫人。是年，威廉又随父母往比国，进比京美术学校。未几，往里昂，进美术学校，习油画。十五年，我与周夫人回国。威廉留里昂，其弟柏龄正将由比国往巴黎，可互相照料也。十七年，威廉回国，应杭州美术专科学校之聘，任该校教员〔授〕。十八年，与林文铮君结婚。二十七年，杭校奉教育部令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合并，在沅陵改组，威廉因而去职。文铮任杭校教务长十余年，亦于是时去职。威廉曾产四女一男；自沅陵迁昆明后，又产一女。不数日，竟以产后疾溘逝，哀哉！

（1939年7月13日蔡元培手稿）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王者必有拨乱之法以酿仁也。夫天下人人相人偶之谓仁，所谓升平也。王者据乱而作，其必阅世而后能乎。子曰：吾志在春秋。立三世之法，所传闻世，著治起于衰乱之中。所闻世，著治升平。所见世，著治太平。人事浃，王道备。如有用我，举而措之。夫岂不知礼教陵夷，傀焉如不终日，而尚为此迂回哉。创巨者日久，痛深者愈迟，不必究极精微，侈谭文致，而据乱而作，驯致升平，其间旷日需时，固已多矣。

我周之初，治定功成，乃始造为冠昏丧祭乡相见之礼，以体貌情性，形容耆欲。于时宙合之中，灏灏酞酞，苴块既陈，胡辇未彻，憛诡僾忾，如存如生，其况采兰絜养常棣孔怀者乎。沙海所限，象鞮所通，传言呼敕，踪优路仁，其况伯叔甥舅祭祀享贡者乎。国笑虞芮之行，人识限潭之让。於呼，何其仁也！

夷幽失职，镩于平桓，天子微弱，诸侯力政，大夫专国，士专邑，臣弑君，子弑父，孽杀宗，不能统理，更相伐锉以广地，以强相胁，强奄弱，众暴寡，富使贫，并兼无已。逮于今兹二百四十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人伦之变，疆场之事，习贯故常，言堂满堂。於呼，又何其不仁至斯也！于斯而欲规以和亲之书，绾以友任之行，不其难乎。譬犹手足拘挛，血脉夭阏，医家言谓之不仁，攻溃疏瀹，非可祝由而已也。

有王者起，刑乱国用重典，详内而略外，立义以明尊卑之分，强干弱枝以明小大之职，别嫌疑之行以明正世之义，贬纤介之恶以为坊，采毫毛之善以为饵。当世桀才枭思敢于干不韪者，始而知惧，继而知愧，行之数十年，沈浸永久，而后君群、臣坚、父矩、子字、兄况、弟悌、夫扶、妇服、士事、民瞑，互相保有，互相人偶。於呼，不其难乎！

越之霸也，区区小补，犹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况乃大坏之后，纳之规墨，阅世而成，固当为速。而世主方复以汤止沸，以茹鱼去蝇，不流之遏，而反道之。世变澜漫，日兹艰难，余所为渊渊悢悢思新王也。

（1893 年 9 月《蔡太史拟墨》）

长洲王先生（颂蔚）诔

光绪二十有一年七月己亥朔，户部郎中、记名御史候补道长洲王先生卒，乌呼哀哉！

先生讳颂蔚，字芾卿。其先世自汴迁吴，十余世至文恪公鏊枋明政而族始大，世以文学名于吴中。及先生，大振其绪。先生资禀绝人，尤锐于学，凡经史舆地词章金石之属，无不淹贯，且有所述造。吴中老宿，咸歛手焉。既成进士，以翰林院庶吉士改官户部主事，擢员外郎，迁郎中。所理联事，如漕粮捐纳之属，皆为繁剧，复直军机处，若会典方略诸馆，皆与纂修。《北山》之诗曰：从事独贤，先生有焉。公余□□，尤勤铅椠，晨钞瞑写，殆废寝馈。人非金石，能勿剥榷。十年积瘁，渐婴兹□，乌呼哀哉！

先生以文恪公之后世谙明故，于《明史》尤尽心焉。既直枢曹，得《明史》旧稿以较今书，甚有异同，遂钩稽案牍，搜辑当时士大夫所记为之斠绌，属草等身，手自写定。于经，治郑氏礼，尝取周官杜氏及先后郑之说，编为义类而疏通证明之，大要以后郑之说为归。于金石之学，有碑录，条举件繫，多王、严诸家所未发。所为诗古文辞，不自收拾，存于箧者尚如干篇。其考辨各书者为杂缀，如干卷。乌呼，麟笔未绝，龙梦已嗟，弥留真冷，拳拳惟此，宁不憯与。

先生清德迈世，而与物大和，不立崖岸。于门下士，尤循循然有博约善诱之道。如何不吊，梁崩哲萎，鸣呼哀哉！□□等奉手无从，心丧已剧，以为幼不诔长，乃记家之单词，美而不述，实礼堂之阙典。传曰：柳下惠死，门人将诔之，固

知累述德行，其体尚矣。敢援古谊，用抒哀思，为之词曰：

乾嘉百年，章明古学。大江以南，经儒辈作。槃槃词流，剂其华朴。指穷为薪，流风未沫。懿与先生，奋轶其汇。文而又儒，方闻所荟。沈博绝丽，文似相如。孙洪前道，姚刘旁趋。缣直一字，纸贵三都。写礼之庼，实为仪郑。周官三百，分别疏证。异义旁搜，长编未竟。家世多闻，储为史料。讫读中秘，掌故之薮。故书今书，恣意探讨。钺发横云，补苴黎洲。殷礼能言，奇卢琐牟。盛世不讳，奋笔无郎。考史之余，旁采石墨。孤章绝句，年月疆域。比较传记，从颂识职。平津潜研，资为羽翼。我闻汉师，经义致用。断狱春秋，治河禹贡。末世口说，遁于专愚。荆舒新义，口实身符。展矣先生，实事求是。郎潜十年，万事伯始。丮夕臼辰，锲而不已。孤愤郁郁，愿假柱后。帝心简在，羁于曹部。赍志以没，遗书待取。穷而后工，文士所忾。一行作吏，此事遂废。允维先生，乐此不疲。案牍劳形，觚简献疑。百年大期，日不暇给。积瘁之士，寡至四十。我闻此语，病其偏激。嗟嗟先生，竟罹斯厄。在昔经生，类蕲麋寿。伏生申公，褎然称首。如何先生，禀命不偶。周旋贤道，是曰师儒。诸子经师，门别户殊。末季畔涣，朝暮易趋。昌黎作说，大放厥辞。乌维先生，经师人师。牖我梼昧，正我仳离。天胡不惠，夺我范模。郑志待辑，元文夙与。何以雠言，管见瞿瞿。何以述哀，文字区区。文范文通，汉季私谥。敢陈懿行，告之惇史。

（1893年8月蔡元培手稿）

西湖底造闸记

明嘉靖十五年，三江应宿闸成，而山阴、会稽、萧山潮海之水得其槽，关錀湖海既数百年。秋滈沈陵，林𣲰超涌，越潭度堰，万流一闸，需时旷日，以迟其溓，而经由井里，皆水处矣。湖田连曼，鉴湖三百，受田之区，失其强半，旬雨破决，偶违故常，近水民居，已离其祸，诚有由也。先民有作，于其上游建三闸以派之。比年来，姚家步闸、宜桥闸夭阏不畅，而栋树一闸，不能立夔足之功，至乃破塘泄水，以杀其势，权宜应变，难可典常。窃尝相度水地，议立碑闸于西湖底，而未果也。光绪十五年，浙江濒海各州县大水，绍兴八县皆与焉。大吏用树兰议，敬录《会典》兴土功之法，佣饥民而食之，以治八县水利，塘堰碑坝，百废俱举。富察太守遂举行西湖裨闸之议，纂土斤石，基基桥桥。十六年□月毕成。为洞三，广四丈，高二丈有奇，沟其前百丈，以道于江。庙于西隅，以祀其神，以申古者祭防祭水庸之义。以屋启闭者，而时其禀，功坚而虑远，用以云礽应宿，左右栋树，钟泄相当，而夺门横决之祸以息。于以见太守之子民闿怿，造福广远。而官吏之董成，都人士典功作者，皆与有嘉焉。既为题名于闸，复碑于庙，以论其始末，冀后之君子，览其前后中失，造作之所由，有举莫废，相与讲切而增裨之也。

（1895年蔡元培手稿）

《春闱杂咏》跋

自沈既济始志选举，越王定保乃有摭言，而文场盛事之编，贡举故事之作，蹠集踵增，咸在著录。若乃都堂纳卷，别床宣毫，诗人之词，是焉萌芽。国朝作者，若瓯北七言，苕生诗余，遂囊括一切，纸贵三都矣。李君星若，春曹望郎，文章名宿，今兹春试，实司提调，遂以公余，采元韦之遗意，扬赵蒋之余波，作为《春闱杂咏》四十篇，语必泽古，事皆征今，资于掌固，实锁厅之诗史，掇其咫闻，亦朋□之语林。可谓体裁密致、灿若珠贝者也。既获披寻，识其用意，辱承诿诿，縢以芜词，聊抒窥豹之见，庶彰附骥之名云尔。

（1895年蔡元培手稿）

题《明宫杂咏》

诗三百篇，序于国史。国风十五，杂出琐事。由汉迄明，宫词乐府，咏史之篇，咸其支与。国朝词流，大启肇域，南宋金源，文字识职。渊渊饶子，申以十国。欧薛□逸，吴周撷奇，既富隶事，又工摘词，灿若珠贝，凄入肝脾。旃蒙协洽，旦月癸巳。

浙蔡元培读毕题此

（1895 年蔡元培手稿）

越中先贤祠春秋祭文

岩岩栋山，荡荡庆湖。扬州实镇，南江所都。莩清谷异，世嬗贤谞。经论云雷，实维大禹。服教畏神，礼义之府。后王尝胆，任侠竞趋。气节慷慨，是焉权舆。胜朝致命，遂多伟儒。儒林大师，余姚肇祖。千祀不祧，授经图谱。新昌朴学，翼左程朱。良知证人，大启堂庑。文苑之英，盛哉典午。丽笔法言，递传曾矩。都凡学派，前干后喁。先贤作传，典录成书。设祀于社，古谊粲如。翼翼帝京，冠裳云傅。先尼是程，裴回瞻顾。爰启礼堂，并开闳宇。肃奠觚觞，恭澈梪俎。僾忾如闻，献祷有叙。秋菊春兰，无绝终古。

（1895年蔡元培手稿）

服兰室铭

培与朗轩皆服膺番禺陈东塾先生，而朗轩用心尤挚，治经一宗其家法。癸巳，培在粤东，于先生长息孝直许，模遗像以归，朗轩奉之书室三年矣。顷名其室曰“服兰”，属书榀，系以铭曰：

兰甫先生，海南大儒。楬箸家法，汉郑宋朱。声律通考，水道说图。读书所记，饷饫生徒。吾友薛君，孱守知服，私淑先生，好学为福。远抚遗象，永寿书堂，五经庚子，一瓣心香。孙登行障，贾岛铸金，□各之谊，匪今始今。

（1896 年 1 月 18 日蔡元培手稿）

锲斋记

吾闻之吾友薛君，孔子以后，儒派为二，荀、孟而已。孟氏尊德性而归于自得，自宋以来，主静以立极致良知以为天下大本者宗之。荀氏道问学而要之于知止，自汉以来，以经义治事、以威仪通礼意、以即物穷理为致知诚意之本者宗之。孟氏之论学也，曰养曰达，而程其功，则曰扩而充之。荀氏之论学也，曰蜕而积，而程其功，则曰锲而不舍。孟学之徒，尊见而捷悟，其极至于以六经注我，以心之神明为圣，非高明之质，鲜能持其说。而荀氏之徒，沉潜竺实，有坛宇，有阶陛，虽中庸之材，乡曲之士，咸有依据。是以为孟学者，若宋若明，间世而一见。而荀学，则汉之儒林，宋之道学，国朝经史考订之学，皆其家法也。夫经者，所以明道；史者，捭拾事俗之繁变，以证道之赜。为经学者，琐屑于故训，诘屈于物名，牵连于科例，多连博贯，而后识义理之归，其迂回如是。为史学者，校雠于时月之先后，地势之险易，人名、官制之同异，而后有以稽政治之中失，人事之是非，其杂糅如是。呜呼，是皆锲而不已之说也。

上虞陈子级三，勉力经、史之学，而撷荀子语铭“锲”于读书之室，盖审于宗派者。爰推吾友之说，以证成其义。

（1896年11月21日蔡元培手稿）

哀周榕倩三律，有序

得锺生书，道周榕倩同年殁于江西。都中纵迹最密者也，欷歔不已！榕倩名宗彬，会稽人。厥考子翼先生，讳骐，以道光□□科庶吉士，散馆，知山东观城县，卒于任。以亏官帑，籍家产，贫甚。榕倩挈孥就其舅何□于江西，以国子监生己丑顺天乡试中式，壬辰得国史馆誊录，乙未考取宗学教习，求为知县，不果。在江西尝读律，有家法，亦无聘者。自戊子后，居京师，首尾殆十年。余与君深交，自甲午始，时聚于乙斋许，同之者，锺生而已。四人者，语必彻夜，行必同车，棋酒殆无虚日。锺生最慎，乙斋最敏，余最疏懦，榕倩真率，不甚修边幅，而取予不苟，介然不可强以所不欲。其虑事审慎，余与乙斋尝哗笑之，以为迂回有甚于锺生也。然相得欢甚。去年出都，榕倩先余两月，拟取道江西归里，酿酒待我。我归而榕倩留滞江西不得归，遂客死，可悲也！年四十有五。娶于何，生一女，妾生男，七日夭，遂无子，命也夫！诗以哀之：

故人大抵不逢时，客死如君更可悲。五子商瞿年不假，一星张曙谶成诗。读书纵莫微官博，明法仍难俗吏知。九派浔阳长逝水，可能淘尽伴牢辞。

恩纪绸缪甲乙年，余与君有连。欢肠都入帝京篇。同车惯挟胡安国，悬榻惟凭沈下贤。啜茗清谈候不夜，赏花泥酒胆如天。秋中一别长收拾，昔梦沉沉过眼烟。

别时先后数归程，故里相看太瘦生。有约市楼呼定

子，剧谈海国步由庚。约今年同往新嘉坡等埠。穷冬我已倾家酝，江右君胡滞夜行。衣绣夜行。尚冀魂归能识路，大招会看景差成。

（1896年8月31日蔡元培手稿）

《文福轩诗》序

《文福轩诗》者，会稽章履安秀才元配任孺人所作也。孺人适秀才十四年而卒。顺于君姑，睦于叔妹，宜于夫子，家政井然，有《实录》十四册。其卒也，秀才甚悼之，属其女弟钞所作诗为二卷，题词者数十家矣，而征序于余。

余维妇有四行：德、言、功、容。诗者，言之支也。太师所陈国史所录传者，在国风，妇人之作，亦数觏矣。而毛公述孔谓皆有美刺之谊，固知黍叹嫠忧，非圣人所斥也。近古妇学不兴，识字者十不得一焉。有之，则以市井鼓词遣日；而能诗者百不得一焉。有之，则学为浅俗侧艳之词，以得附名于江湖名士之集为大幸。于是惩其弊者，动辄以妇人识字为戒，不尽毁于童昏鄙陋之一涂不止。呜呼，岂不痛哉！

吾读孺人之诗，肫然以诚，蔼然以和，所谓顺于君姑、睦于姑妹而宜于夫子者，诚中形外，按图可索。至于放脚、胎教、演女戒诸篇，陈义甚高，可以悬之国门。《书》曰：诗言志。《易》曰：言有物。孺人之诗，可谓不空作矣。宜亟刻之，以为闺范，毋使贸贸者日以因噎废食之言裂道行也。放脚谣注：康熙中，左都御史王熙《禁女子缠足疏》，首云为臣妻先放大脚事。

（1899 年 1 月 5 日蔡元培手稿）

书姚子移居留别诗后

戊戌之变，元培在京师，历见其终始。而推暨其故，以为天演所趋，盖有不得不变通者，而当事诸君为之而不成，盖亦有操之过蹙者与。国大器也，人质点也。集腐脆之质点以为器，则立坏；集腐脆之人以为国，则必倾。居今日而欲自强，其必自人心风俗始矣。

虽然，有土一撮，惟陶之所为，使既为缶矣，而欲变以为砖，则必俟其既碎既礦以化于土焉而后可。有木一本，惟匠之所为，使既为榱矣，而欲以为栋，则必俟其既腐既散以吸于木焉而后可。此人寿所不及也。

自京师南归，道路所见闻，都会所阅历，求所谓不缶之土，不榱之木，不数数见。于是私心窃计，将去都即鄙舍壮求之望，以行吾志矣。既回里，有以学堂请者，不胜其欲速之意而试为之，为之而未效。有以书院请者，以试于学堂之意试之，又未敢言效。于是稍稍悔夺志矣。

嵊宋生省庵，绍兴学堂高材生也，志之锐，文之遒，自未入学堂已然。叩其师承，则曰吾师姚子之所授也。既来嵊，介宋生以见姚子。姚子之居，面群山，背苍林，占一城胜，而姚子不自安曰：吾畏城市之浇也。吾先世家山阴湖塘，世耕读，以贾迁嵊三世矣，吾欲返故居而不果。吾游嵊南山，背山面溪，仿佛湖塘，而风气朴茂过之。吾将迁焉，以保吾子孙。夫家国之盛衰，以人事为消长，人事之文野，以心术为进退，心术之粹驳，以外物之印象为隐括。南山者，盖不缶之土、不榱之木之所荟与，姚子其

必有以陶之匠之，而后于所谓保子孙者，始无憾焉。呜呼，姚子其先得我心者与。抑以姚子所居之胜，而戚串友朋之阻行之多，而姚子皆不为所夺。以视元培之逐逐于学堂、书院以夺初志者，度量相越，岂不远与。姚子出移居留别诗征和，书此以答，且以讼我过焉。

（1900年10月4日蔡元培手稿）

为宋省庵书屏

社会古义，厥惟五伦。平等相接，爱力弥纶。及其治事，有三纲云。彼民主国，总统莅焉。主辅相系，何碍平权。彼哉狃纲，伦理不宣。慫其专制，夫妇造端。身度解弛，妇学蘙蕴。矫揉涂泽，束缚拘圈。妾媵广置，优伶同论。酿成媚骨，利兹混沌。或激而裂，悍狠纷纭。流弊繁杂，更仆数难。无往不复，渐见倪端。六斋卑议，新会罪言。知行合一，责在时贤。脱习为要，劝学尤先。商量心理，紬绎国闻。齐心同愿，职识分安。道德之爱，团结缠绵。情无旁溢，福不唐捐。亦世济美，进化宜天。国以家称，政以俗旋。改良人种，关睢所关。佳耦日配，相与勉旃。

上文仿箴体，为省庵书屏。

（1901年1月7日蔡元培手稿）

家道论

家道始于夫妇，夫妇之道始于婚，论婚仪第一。

我国自秦以来，男女之防极严。歌舞订约，如欧西国俗，必不能行。虽然，主婚者惟门第之求，惟贸贸然媒妁之决；身与其事者，转不得过而问焉。此夫妇之道所以苦，而淫佚之所以多也。

凡男女十五岁以下不得议婚，学业未定，智慧未发，不知同心否也。俗有以五世同堂之故早婚者，觊虚荣而忘实祸，最为可怪。至以门第之故，自幼订婚，甚且指腹为婚，五年十年，人事未可逆料，其流弊大矣。

男女既达议婚之年，父兄师长当为言夫妇一伦与卫生立业及政俗种族关系之大，且与齐不改从一而终为男女应守之公义，尤不可不慎之于始，当视为极正大极紧要之事，与进学堂，就实业同。凡世俗举以为谐谑、引以为羞耻者，皆蛮野猥鄙之为，不足措意，藉以养其自择配偶之识力。

（1901 年 4 月 10 日蔡元培手稿）

赠许香九文

隐之名旧矣，痼泉石，友鹿豕；屏绝世缘，甘为废物，此以畸隐者也。处众浊之场，不以槁灰其心，持隐括，引绳矩，务挽救之而出之以和光，以无骇于俗，以必达其志为的，其始若无所事事，此以侠隐者也。

余来临安，见越人侨寓者众，城居黠猾，业胥吏，无足齿数。农于乡者，或愿悫可倚任，率不解事，殆无可与深言者。童君省庵，为言许君香九，家北乡高陆，课农圃，授子弟经史，怡然自得，足迹不入城市。余意许君盖隐者。介童君书，与同年生童亦韩孝廉访之。方营新居，占溪山之胜，荷塘柳坞，点缀其间。既见君，淡漠嬾散，略不拘俗士礼法，余意君诚隐者。既而引觞纵谈，数临安当时人物，皆有皮里阳秋。及近世风习之坏，则愀然太息，引为己忧，余然后知君为有心人也。

君曰："律令，征漕米，本色折色惟便民。临安故无仓，一征折色，官吏辄三倍其值以厉民；吾尝与某某诸君集资建置，官吏百计阻挠，鲜终其事，余卒成之，以是耗资无算。"君又曰："临安旧有过江人会馆，经兵事圮矣，吾先人欲复之而位乡贤阳明先生于其中，以振风教，未果；吾必成其志。"君又曰："吾所营室为学塾，将招乡人子弟读书其中，为讲堂，将以月之朔、望讲圣谕广训，以旬之三、八讲经史大义，使乡之中，老弱壮佼皆环而听焉，庶以益于风俗。"

余于是作而叹曰：君诚有心人哉！今天下亟矣。数十

年来，士大夫徇利禄，且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国闻民俗，更相视若秦越。由是庠序以外，不知有伦理；商贾以外，并不知有书算。长不教，幼不学，聋瞽成群，趋嗜欲如鹜。苟自便矣，同类之中，相诳惑，相劫侮，相蚕噬，无所恤。一旦有外侮，挤之则如抟沙，驱之则如扬尘。甲午以来，每进益深，不急营救，无噍类矣。

虽然，救之云乎，其循之有序，其导之有术。物体之积，起于□点；江流之盛，原于滥觞；王道之易，观于一乡，有序之谓也。玻璃之热，骤冷则折；孺子之睡，骤呼则惊；习惯之久，骤革则格，此术之谓也。

余孤愤既久，遇事当意，辄急起径行，往往失之切急，欲速而转不达，吾以是益叹君之从容为不可及也。于时君方督攻木，又两凤鲈壶杂器丛占一室，而高谈转清，心目为之一快。及归，沐甚雨，衣袂淋漓，亦不以为苦。徐健庵曰："迦陵须髯如戟，而吾转觉其妩媚，为其胸中有数万卷书耳。"庄子曰："空谷闻人足音，跫然而喜矣。"呜呼！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既别君，心怦不能已，书此以赠。呜呼！微君，则孰与发余之狂言也与。

（1901年4月12日蔡元培手稿）

题日人结城琢《越游诗草》

唐杜工部诗名空前后，而论者目为诗史，洵哉。诗足以裨史也。族史所载，皆大盗扃闭之术而已。而诗人者，乃盱衡外界，旁薄万汇诸物结晶之体，社会聚散之点，精察而约取之，而出之以微言，使人自悟，洵哉，弥民史之阙陷，而含哲学之意味者也。日本结城君，伉慨有侠士风，而尤喜为诗。今年春，航海游吾国，自福建、上海而浙江，渡江而东，行山阴道中，得诗若干首，抚今吊古，托物兴怀，而于教学之所造，俗尚之所趋，尤三致意。余越人也，读之而国民进化之思想，油然以兴，则洵乎诗之可以裨史也。君渡江时，与余相左；其返也，遇于省会酒楼，见示《越游诗草》，乃识余感情于卷耑以质君。

（1901 年 5 月 2 日蔡元培手稿）

挽夫人王昭联

亡妇忌日，忽忽一年矣。鹿鹿奔走，弃子不教，哀愧交集。忆素帷联语，未留存稿，录于下方：

维新党人，吾所默许，乃不及于难，鹿车南返，鹪巢暂栖，尚有青毡，博得工资同一饱；

自由主义，君始与闻，而未能免俗，天足将完，鬼车渐破，俄焉属纩，不堪遗恨竟终身。

其二曰：

早知君病入膏肓，当屏绝万缘，常相厮守，已矣，如宾十年，竟忘情乃尔耶？

尝与我争持礼俗，问浑圜大地，安置幽冥？嗟乎，有子二人，真灵魂所宅耳。

其三曰：

安知早死非为福；

岂有下愚不及情。

（1910年6月24日蔡元培手稿）

徐锡麟墓表

有明之亡，集义师，凭孤城，以与异族相抗者，于浙为最烈；而文字之狱，亦甲于诸省。故光复之思想，数百年未沫。自晚村以至定盦，其间虽未有伟大之著作为吾人所发见，而要其绵绵不绝之思潮，则人人得而心摹之。

在所见世以言论鼓吹光复者，莫如馀杭章先生炳麟；而实力准备者，莫如山阴徐先生锡麟，及会稽陶先生成章。顾章、陶两先生，皆及见清帝之退位，中华民国之成立；而徐先生乃于前五年赍志以没。其没也，又为光复史中构造一最重大之纪念，此后死者之所以尤凭吊流连而不能自已者也。

徐先生，字伯荪，浙江山阴人也。少时，治算学及天文学，廓然有感于因果之定律，宇宙之溥博而悠久，他日杀身成仁之决心，托始于是矣。其后，为家庭教师，以光复大义授弟子许克丞。继为绍兴中学堂教习，以尚武主义为学生倡，并以时涉历诸暨、嵊诸县，交其健者，以大义运动之。及至上海，由蔡元培、元康昆弟之介绍，而与陶成章合。成章方以嘉兴敖嘉熊、龚国铨诸志士之倾助，而奔走金华、衢、严诸府，运动其秘密会党，有成议。两先生既成交，浙江诸会党有统一之机。于是相率至绍兴，谋以绍兴为根据地，施军事教育，为革命军预备。许克丞愿任经费设武备学堂，格于例不果；乃设大通师范学堂，凡浙东秘密会党诸魁桀，皆以是为交通总机关，各遣其相当之徒属就学焉。公然陈武装，演说革命，乡里窃窃然议

之，而先生善交欢清吏，得无恙；然亦于其间积种种经验，知不惟绍兴，即浙江一隅，亦未足以大举。乃由许克丞出资，为先生及成章、鼎铨、陈子英分别捐道员若知府，相率赴日本，学陆军，定议毕业后捐请分发重要都会，揽其兵柄。无何，试验不及格，均不克入联队。

先生先返，偕克丞以道员赴湖北，以其地占全国形势，而练军亦较他省为精劲，可利用。时湖北适停分发，乃赴安徽。初主陆军小学；逾年，移主巡警学堂。安徽故多会党，即练军亦间有具新思想者。先生既至，颇欲从容布置，谋定而后动；会女侠秋瑾偕嵊县平阳党魁祝兆康、王镜发等驰书促举事；陶成章在日本亦数数相责备；而巡抚恩铭又微露疑先生意；先生乃与同志陈伯平、马家汉谋，乘五月二十八日举行巡警生毕业式，诸大吏毕集，尽杀之，以乱军心；亦檄召浙江诸豪刻期会安庆。无何，恩铭令改期，以二十六日至。先生不及俟援军，及期，出手枪击恩铭，死之；他吏散走。先生率巡警生百余人占军械局，为敌兵所击散，先生被执。清吏搜先生室，得布告，有云："与我同胞，共复旧业，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及被鞫，而宣言则又谓：革命人人可能，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立宪愈快，革命亦愈快。越五年，而其言皆验矣。二十七日，清吏杀先生，刳其心以祭恩铭，而稿葬之。及中华民国成立，先生之弟锡□、锡骥等，始克迎先生之榇以归里。元年九月，葬诸西湖之堧。同里蔡元培，于先生为同志，爰表先生之大节于墓前，以告下马而展谒者，使知吾辈之自由幸福，得诸徐先生之赐者，殊非浅鲜焉。

（1912年9月蔡元培手稿）

闻方君瑛自尽志感

余之识女士也，始于民国二年。是时，余偕眷属寓巴黎左近科仑布之华侨学会，而女士则自蒙达尼来。询知女士为余友方雨亭先生之侄。雨亭先生曩在北京，与余时相过从，恂恂然长者也。及一行作吏莅吾浙，兴利除弊，以干练著，殆所谓寓精明于浑厚者与。余初见女士粹然诚恳婉娩之态度，谭仲逵先生为余言女士留法近况，则于求学以外，抚爱弟妹，且抚爱友人之子女，亦犹是诚恳婉娩之态度也，然而女士之历史，则曾投身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曾投身于刺清摄政王之役，其激烈为何如者！余于是益因女士而返想雨亭先生不置。夫色厉内荏，孔子比之穿箭，其卑劣诚不足道。若乃性有温激，表里如一，则诚不失为君子矣。然而温和之过，或见义而不为；激烈之过，或无的而放矢，则于常变之际，失事机而乱大谋者，良复不鲜，素位而行义之与比，如女士者，可以风矣。

古之妇学，有德言容工诸目，当有专门教授之组织。其后普通女子，率于家庭间转相传授，其涂径较隘，亦偶有读书、吟诗、作书画者，以希为贵，率过自矜异骛声华，致招“无才是德”之诮。自女校渐兴，教育本期普及，而力不能入校者尚多，幸得入校而毕业，则往往蔑视彼不能入校者，曾勿之哀矜而转以长傲，盖犹有往者才子名士之遗习焉。女士在国内受教育甚久，民国纪元以来，留法十一年，研究师范，循序渐进。今年膺执信学校之敦请而归国。汪精卫先生为余言，女士所学甚精进，而常歉

然不自足，有若无，实若虚，如女士者，可以风矣。

乌呼，女士死矣！既束装将由上海赴广州服务于执信学校，乃竟于启行前一日，不胜其厌世之感念而自尽，岂特执信学校之不幸，实全国教育界之不幸也。前一年，女士在法曾于散步中为摩托车所撞而仆地，伤脑甚剧，虽疗治有效，而头痛时作。归国后，常甚苦之。遗书以社会恶浊、力不能挽为自尽之主因，盖当神经衰弱之际，又受环境上种种之刺激，遂绝望而出此也。

昔吾友杨笃生先生，热诚革命，而欲取径于暗杀，乃习制炸弹，既得造药法，而苦于弹壳之不中用，乃自研物理、机械之学，以早年偏攻文学，理科之基础知识不满足，事倍而功半。脑力不赡，则服磷制之补脑药以促之，因而得头痛疾。在英留学，入机械展览会，冀有所得，而不能悉了解，愤愤，头痛益剧，遂自沈于利物浦以死。其遗书言，甚欲归国杀一二满人而以身殉之，然途远病剧，迫不及待，云云。乌呼，女士之迫不及待，其亦犹杨先生与。杨先生愤汉族之陵夷，不及见革命之成而先死；女士愤社会之恶浊，亦不及待改良计划之实施而先死。心理之冲激，半亦生理之压迫致之。我辈后死者，慎无以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之自信力，而致忽于生理哉！

（1923 年 7 月 25 日蔡元培手稿）

自传之一章

余家明末由诸暨迁至山阴，余祖先有营木材业者，因遭同行人妒忌，被斧砍伤，受伤后遂不复理木材业。此余闻祖先轶事之最早者。自此祖又两世，至我曾祖，行四。余曾祖之兄行三者，营绸缎业于广东，因偷关被捕，将处极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免于一死。

余祖父营典当业，为当铺经理。遂在笔飞坊自置一房，坐北朝南，有大厅三楹。生我父兄弟七人。先三叔好武艺，外出，不知所往，亦不知所终。留在家同居者只六子耳。六叔、七叔年最幼，长子及二、四、五子均已结婚。先祖又在屋后加盖五楼五底，以备大家庭合住之用。余等为大房，住一楼一底之外，尚多一骑楼，骑楼虽多只一间，亦意存优待于长子也。

余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八）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时，初言十八日子时，后改正为十七日亥时。其时无钟表，计时亦难准确。

余同胞兄弟四人，四弟早殇，实为兄弟三人，即余有一兄一弟。

余有两姊，均未出阁，均在二十左右病故；有一幼妹，亦早殇。

先父面方，肤色颇黄，先母面椭圆，肤色白皙。余兄弟姊妹七人，凡居单数者均像母，居双数者均像父，余行二，故像父亲。

先父为钱庄经理，二叔为绸缎店经理，四叔亦经营钱

庄，五叔、七叔为某庄副经理，全家经商，惟六叔读书。

余家至我六叔，始考试入学（秀才）。后并补廪（廪生）。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

余幼时，先父延聘教师在家教读。年十一，先父见背，家中不克复延教师，即附学他处。先父之丧为夏六月，是年下半年起，余即寄居姨母家附近读一年。十二岁、十三岁，又在一李先生家附读两年。十四岁，始从王子庄先生学作八股文，王先生其时八股文名家也。余从王先生学至十七岁，余入学游泮矣（秀才）。

十八岁、十九岁余自设馆教书。

自二十岁起，不复授徒。余在徐家校书矣。绍兴有徐家，藏书甚富，又喜校书印书，喜以文会友，故亦延聘及我。余自此不复作八股，改作辞章考据之学。

二十一、二、三、四岁四年中，均校书徐家，多得读书之益。

二十四岁，己丑年，（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余入乡闱中式（举人）。

此后成进士及殿试，《言行录》等处已说及，不必赘述矣。述其未说及者一二如次：

余入同盟会在乙巳年（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为同盟会成立之年，或其次年，介绍入会者，何海樵也。

次年，黄克强持孙先生手书来。派余为上海支部部长，是年余返绍兴故乡一行。

又次年丁未，余随孙宝琦赴德，彼任钦差，余往留学，由西比利亚行，同行者有齐寿山。（作者按：为齐如山之弟，后蔡先生任教育总长时，寿山任秘书。）

寿山告余，李石曾先生吃素，及其理由，余以为然，因亦吃素。直吃至民国十年腿病不能行走，医生感觉病时素食不易调理，为简便计，劝我恢复肉食，我从之，实仍

偏重素食，惟不如以前之严格耳。

戊申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我始游巴黎。

辛亥革命，余在德国，得陈英士电，促即回国，余乃取道西伯利亚东归。归后，命我任教育总长。此后诸事，知者更多矣。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萧瑜笔记）

（《传记文学》杂志第10卷第1期，1967年1月1日台北出版）

自写年谱

一岁　前清同治六年丁卯十二月十七日亥时，我生于浙江省山阴县城中笔飞衖故宅。

丁卯为纪元前四十五年，西历一八六七年，但丁卯之十二月十七日，实为西历一八六八年之一月十四日。

那时候，山阴县属绍兴府。绍兴府有八县，山阴、会稽两县署与府署同城，自废府以后，乃合山阴、会稽两县为绍兴县。笔飞衖是笔飞坊中的一衖。相近有笔架山、笔架桥、题扇桥，王右军舍宅为寺的戒珠寺，王家山（即蕺山）。相传右军在此的时候，一老妪常求题扇，有一日，右军不胜其烦，怒掷笔，笔飞去，这就是笔飞名坊的缘故。此说虽近于神话，但戒珠寺山门内有右军塑像，舍宅为寺的话，大约是可靠的。

笔飞衖的房子是我的祖父所经营的。分两进：前进是一堂两厅，有园有井，是买的。后进是五楼五底，是造的。我父与第二、第四、第五的三位叔父住后进，第六、第七的两位住前进，也是祖父分配的。

我第三叔父，因出去从军，多年不归，也没有消息，所以没有替他备住宅。

二岁　纪元前四十四年，西历一八六八——一八六九年，清同治七年戊辰。乳母陈氏抚我。

三岁　纪元前四十三年，西历一八六九——一八七〇年，清同治八年己巳。

四岁　纪元前四十二年，西历一八七〇——一八七一

年，清同治九年庚午。

五岁　纪元前四十一年，西历一八七一——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年辛未。

六岁　纪元前四十年，西历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年，清同治十一年壬申。

是年，我始进家塾，塾师是一位周先生。那时候初入塾的幼童，本有两种读书法：其一是先读《诗经》，取其句短而有韵，易于上口。《诗经》读毕，即接读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其一、是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千家诗》等书，然后接读四书。我们的周先生是用第二法的。但我记得只读过《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三种。那时候塾中以读书为主要工课，先生坐着，学生立在先生之旁，〈先生〉先读，学生循声仿读，然后学生回自己坐位，高声读起来。读书以外，止有两种工课，一是习字，一是对课。

习字，先用描红法，即购得红印范本，用墨笔描写。先由先生把住学生的手，依样描写，连笔画的先后也指示了。进一步摹写，是墨印的或先生写的范本，叫作影格，用纸蒙着上面，照样摹写，与现在用考贝纸的样子。再进一步临写，是选取名人帖子，看熟了，在别纸仿写出来。

对课，是与现在的造句相近，大约由一字到四字。先生出上联，学生想出下联来。不但名词要对名词，静词要对静词，动词要对动词；而且每一种词里面，又要取其品性相近的。例如先生出一山字是名词，就要用水字、海字来对他，因为都是地理的名词。又如出桃红二字，就要用柳绿、薇紫等词来对他。第一字都用植物的名词，第二字都用颜色的静词。别的可以类推。这一种工课，不但是作文的开始，并且也是作诗的基础。所以对到四字课的时

候，先生还用圈发的法子，指示平仄的相对。平声字圈在左下方，上声左上方，去声右上方，入声右下方。学生作对子时，必要用平声对仄声（仄声包上、去、入三声），仄声对平声。等到四字对作得合格了，就可以学五言诗，不要再作对子了。

是年八月廿六日，我的祖父去世。祖父讳廷桢，字佳木。我家先世是明季由诸暨迁至山阴的。山阴的始祖是恭政公，在画像上方巾蓝衫，是明代生员的样子。再传而至佐臣公，以造林售薪为业，重然诺，好施与，时谓之蔡善人。为同业所忌，或以斧斫其肩，因是辍业。又两传而至我高祖必达公，命诸子贩绸至广州，颇获利。因漏税，我第三曾伯祖为关吏所拘，将处死刑，倾家营救，获免，但家境从此中落。相传我祖父夏夜读书，无法得辟蚊烟，置两胫于瓮中，勤学可想。我祖父在一典当中习业，渐升至经理，以俭省，稍有积蓄，所以为祖宗置祭田，为子孙购地造屋，做成小康的家庭。

七岁　纪元前三十九年，西历一八七三——一八七四，清同治十二年癸酉。

八岁　纪元前三十八年，西历一八七四——一八七五，清同治十三年甲戌。

九岁　纪元前三十七年，西历一八七五——一八七六，清光绪元年乙亥。

十岁　纪元前三十六年，西历一八七六——一八七七，清光绪二年丙子。

十一岁　纪元前三十五年，西历一八七七——一八七八，清光绪三年丁丑。

是年六月廿三日，我的父亲去世。父亲讳宝煜、字曜山。任钱庄经理。去世后，家中并没有积蓄。我的大哥仅十三岁，我十一岁，我的三弟九岁。亲友中有提议集款以

充遗孤教养费者，我母亲力辞之。父亲平日待友厚，友之借贷者不必有券，但去世后，诸友皆自动来还，说是良心上不能负好人。母亲凭藉这些还款，又把首饰售去了，很节俭的度日，我们弟兄始能生存。我父亲的好友章叔翰先生挽联说："若有几许精神，持己接人，都要到极好处。"

我父亲在世时，四叔父也任钱庄经理，五叔父及七叔父均任钱庄的二夥（即副经理之意），二叔父任绸庄经理，六叔父在田氏塾师，都有职业。我的外祖父家周氏，大姨母家范氏，四叔母的母家王氏，都住在笔飞衖，而且家境都还好，亲戚往来，总是很高兴的，我们小孩儿，从不看到愁苦的样子。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这一房，固然陷于困苦，而不多几年，二叔父、五叔父、七叔父先后失业，即同住一衖的亲戚家，也渐渐衰败起来。我那时候年纪虽小，但是听我母亲与诸长辈的谈论，也稍稍明了由盛而衰的缘故，引起感想，所以至今还没有忘掉。

十二岁　纪元前三十四年，西历一八七八——一八七九，清光绪四年戊寅。

因父亲见背，无力再聘塾师，我就在我家对门李申甫先生所设的私塾读书了。李先生的教授法，每日上新书一课，先朗读一遍，令学生循声照读，然后让学生回自己位置上复读，到能背诵止，余时温习已读各书。在上课以前，把读过的书统统送到先生的桌上，背先生而立，先生在每一本上撮一句，令学生背诵下去，如不能诵或有错误，就责手心十下退去，俟别的学生上课后再轮到，再背诵，如又有不能诵或错误，就责手心二十下。每次倍加。我记得有一次背诵《易经》，屡次错误，被责手心几百下。其他同学当然也有这种状况。

十三岁　纪元前三十三年，西历一八七九——一八八〇，清光绪五年己卯。

是年始试作制艺，就是俗称八股文的。那时候试作制艺的方法，先作破题，止两句，是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分作六比或八比，每两比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但起讲、承题、破题，都是全篇的雏形。那时候作承题时仍有破题，作起讲时仍有破题、承题，作全篇时仍有破题、承题、起讲，实在是重床叠架了。

十四岁　纪元前三十二年，西历一八八〇——一八八一，清光绪六年庚辰。

是年始就学于王子庄先生，先生讳懋修，设馆于探花桥，离我家不过半里。我与三弟朝就塾，晚归家，在塾午餐，每月送米若干，每日自携下饭之菜。其他同学有回家午餐的，有宿于先生所备之宿舍的。是时我已读过四书及诗、书、易三经，又已读删去丧礼之小戴记（那时候读经，专为应试起见，考试例不出丧礼题，所以不读丧礼），正读《春秋左氏传》。先生为我等习小题文（未入学的，考试时文题多简短，叫做小题；乡、会试的题较长，叫做大题），不可用四书五经以外的典故与词藻，所以禁看杂书。有一日，我从一位同学借一部《三国演义》看，先生说看不得，将来进学后，可看陈寿的《三国志》。有一日，我借得一部《战国策》，先生也说看不得。但王先生自记〔己〕却不是束书不观的。他因为详研制艺源流，对于制艺名家的轶事，时喜称道，如金正希声黄陶庵淳耀的忠义，项水心煜的失节等等。又喜说吕晚村，深不平于曾靖一案。又常看宋明理学家的著作，对于朱陆异同，有折衷的批判。对于乡先生王阳明固所佩服，而尤崇拜刘蕺山，

自号其居曰仰蕺山房。所以我自十四年至十七年，受教四年，虽注重练习制艺，而所得常识亦复不少。

那时候，在王先生塾中的同学，不下三十人，与我最要好的是薛君朗轩。薛君长于我两岁，住大路，他每晚回家，必经过笔飞衖口，所以我们每日回家时必同行，路上无所不谈，到笔飞衖口始告别。

那时候，我所做的八股文，有不对的地方，王先生并不就改，往往指出错误，叫我自改。昼间不能完卷，晚间回家后，于灯下构思，倦了就不免睡着，我母亲常常陪我，也不去睡。有一次，母亲觉得夜太深了，人太倦了，思路不能开展了，叫我索性睡了，黎明即促我起，我尔时竟一挥而就。我终身觉得熬夜不如起早，是被母亲养成的。

十五岁　纪元前三十一年，西历一八八一——一八八二，清光绪七年辛巳。

十六岁　纪元前三十年，西历一八八二——一八八三，清光绪八年壬午。

十七岁　纪元前二十九年，西历一八八三——一八八四，清光绪九年癸未。

这三年里边，我记得考过小考两次。那时候小考分作县考、府考、道考三级。县考正试一场，复试五场。府考正试一场，复试三场。道考由提学使主持，旧称提学道，所以叫作道考，正试一场，复试一场。每次考试的点名，总在黎明以前。我母亲于夜半即起煮饭，饭熟乃促我起，六叔父亦来共饭，并送我进考场。所以为我的考试，我母亲也辛苦了多少次。直到我十七岁，才进了学。那一期的提学使是广东潘峄琴先生，讳衍桐，广东番禺人。

十八岁　纪元前二十八年，西历一八八四——一八八五，清光绪十年甲申。

是年我到姚氏充塾师，学生三人。

十九岁　纪元前二十七年，西历一八八五——一八八六年，清光绪十一年乙酉。

我在单氏充塾师，学生四人。

我母亲素有胃疾，到这一年，痛得很剧，医生总说是肝气，服药亦未见效。我记得少时听长辈说：我祖母曾大病一次，七叔父秘密封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祖母服之而愈，相传可延寿十二年云云。我想母亲病得不得了，我要试一试这个法子，于是把左臂上的肉割了一小片，放在药罐里面，母亲的药，本来是我煎的，所以没有别的人知道。后来左臂的用力与右臂不平均，给我大哥看出，全家的人都知道了。大家都希望我母亲可以延年，但是下一年，我母亲竟去世了。当弥留时，我三弟元坚，又割臂肉一片，和药以进，终于无效。我家还有一种迷信，说封臂事必须给服药人知道，若不知道，灵魂见阎王时，阎王问是否吃过人肉，一定说没有吃过，那就算犯了欺诳的罪。所以我母亲弥〈留〉时，我四叔母特地把三弟封臂告知，不管我母亲是否尚能听懂。

是年八月初旬，我第一次随六叔父往杭州，应乡试。启行这一日，照六叔父成例，祭祖告别。晚餐后上乌蓬船，船行一夜，到西兴渡钱塘江，到杭州。初八日黎明进考场，作四书文三篇，五言八韵诗一首，初九日出场。十一日第二次进场，作五经文五篇，十二日出场。十四日第三次进场，对策问五道，十五日出场。杭州与萧山止隔一江，故萧山人应试者常回家赏中秋。凡第一场、第二场试卷上有犯规的，如烧毁或不合格式等，辄于蓝纸上写号数，揭之考场照壁，俗称上蓝榜。我虽初次观场，幸而未上蓝榜。

乡试卷不但编号糊名，并须由官派誊录用朱笔誊写一

份，使考官不能认识考生的笔迹。但誊录往往潦草塞责，使考官不能卒读，因此有一部分誊录，先期与考生接洽，于首行若干字内，插用某某等三字，以便检出，特别慎写，藉以取得特别酬资。

每次留场二日，饮食须自备，考生自携白米及冷肴、汤料等。每号有一勤务兵，时称号军，所携之米，本可付号军代煮，但号军多不良，所以我等都自携紫铜炊具，叫作五更饥的，用火酒炊饭。

每号之末间即厕所，坐近末间，每闻恶臭。又登厕时亦常苦呼吸为难，则携艾绳进场以避秽。

集万余人于考场，偶有神经错乱，于试卷上乱写情诗或漫画杂事，甚而至于自杀的。闻者每附会事因，认为报应，并且说点名将毕时，有官役举一黑旗，大呼“有恩报恩，有冤报冤”云云，皆无稽之谈，但那时候常常听人道及的。

乡试后举人例游西湖，那时候游湖的都出涌金门，门外有茶馆数处，忆其一名三雅园。由此地呼舟可游彭公祠（即三潭印月）、左公祠（左宗棠）、蒋公祠（蒋益澧）、刘公祠（刘典）等处，都是满清功臣，所以辛亥后都废，止有三潭印月，至今尚存，但也没有人再提彭公祠的名了。别墅忆止有高庄与俞楼。

杭州人喜用主试的姓作俏皮的对子，是年主考为白、潘二君，杭人就用《白蛇传》同《金瓶梅》作对，是“精灵犹恋金山寺，魂魄长依紫石街”。

二十岁　纪元前二十六年，西历一八八六——一八八七，清光绪十二年丙戌。

正月廿二日，我母亲病故，年五十岁。我母亲是精明而又慈爱的，我所受的母教比父教为多，因父亲去世时，我年纪还小。我本有姊妹三人，兄弟三人，大姊、大哥、

三弟、三妹面椭圆，肤白，类母亲、二姊、四弟与我，面方，肤黄，类父亲。就是七人中第一、第三、第五、第七（奇数）类母，第二、第四、第六（偶数）类父。但大姊十九岁去世，二姊十八岁去世，四弟六岁殇，七妹二岁殇。所以受母教的时期，大哥、三弟与我三个人最长久。我母亲最慎于言语，将见一亲友，必先揣度彼将怎样说，我将怎样对。别后，又追想他是这样说，我是这样对，我错了没有。且时时择我们所能了解的，讲给我们听，为我们养成慎言的习惯。我母亲为我们理发时，与我们共饭时常指出我们的缺点，督促我们的用工。我们如有错误，我母亲从不怒骂，但说明理由，令我们改过。若屡诫不改，我母亲就于清晨我们未起时，掀开被头，用一束竹筱打股臀等处，历数各种过失，待我们服罪认改而后已。选用竹筱，因为着肤虽痛，而不至伤骨。又不打头面上，恐有痕迹，为见者所笑。我母亲的仁慈而恳切，影响于我们的品性甚大。

是年我以田春农先生的介绍，往徐氏为徐君以愻（名维则）伴读，并为校勘所刻《绍兴先正遗书》、《铸史斋丛书》等。

我自十七岁以后，因不再受王子庄先生之拘束，放胆阅书。六叔父茗珊先生所有之书，许我随意翻阅，如《说文通训定声》、《章氏遗书》、《日知录》、《困学纪闻》、《湖海诗传》、《国朝骈体正宗》、《绝妙好词笺》等，都是那时候最喜读的书。于是就学作散文与骈文，每有所作，春农先生必大加奖励，认为可以造就，所以介绍我到徐氏，一方面固为徐君择友，一方面为给我以读书的机会，真是我生平第一个知己。

田氏、徐氏，藏书都很多。我到徐氏后，不但有读书之乐，亦且有求友的方便。王君寄庼（名佐）为以愻弟硕

君之师，熟于清代先正事略等书，持论严正。以悉之师朱君茀卿，人甚豪爽，善为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魏君铁珊（名彧）有拳勇，能为诗古文辞，书法秀劲，皆尔时所识。以悉之伯父仲凡先生（名树兰）搜罗碑版甚富。那时候，年辈相同的朋友，如薛君朗轩、马君湄莼、何君阆仙等，都时来徐氏，看书谈天。曾相约分编大部的书，如《廿四史索引》、《经籍纂诂补正》等，但往往过几个月就改变工作。这种计划，都是由我提出，但改变的缘故，也总是由我提出，所以同人每以我的多计划而无恒心为苦。徐君以悉尝评我为"无物不贪，无事不偏"。

廿一岁　纪元前二十五年，西历一八八七——一八八八，清光绪十三年丁亥。

是年留徐氏。

廿二岁　纪元前二十四年，西历一八八八——一八八九，清光绪十四年戊子。

是年留徐氏。秋，往杭州应乡试，未中式。

廿三岁　纪元前二十三年，西历一八八九——一八九〇，清光绪十五年己丑。

是年留徐氏。

大哥为我订婚于王氏，二月间结婚。所娶王夫人名昭，是薛君阆仙的姨妹，由阆仙介绍的。

结婚后七日，我去应科试，列第一名。

是年有恩科。秋，复往杭州应乡试，与王君寄庼、徐君以悉同中式，主试为李仲约（讳文田）、陈伯商（讳鼎）两先生。

廿四岁　纪元前二十二年，西历一八九〇——一八九一，清光绪十六年庚寅。

是年春，往北京应会试，偕徐君以悉行。先至杭州，因雨滞留数日，向某公司借小汽船拖无锡快至上海，因那

时候还没有小轮船公司的缘故。到上海后，寓北京路某茶栈，徐氏有股份的。有人请吃番菜，看戏，听唱书，游徐园、张园，那时候张园称作味莼园，左近房屋不多。愚园正在布置。由上海乘招商局轮船到天津，换乘内河船到通州，换乘骡车到北京。

那时候，我们同乡京官有鲍敦甫、吴解唐、王止轩诸翰林，李莼客、娄炳衡诸部曹。莼客先生是我在徐氏的时候常常读他的诗文与尺牍的，又常听杨宁斋先生讲他的轶事，所以到京后，最崇拜的自然是他了。

会试后，我中试，房师为王㽘卿先生（讳颂蔚），是很有学问而且怜才的。座师虽有四位，而我的卷子却在孙峡山先生（讳毓筠）手中。是年会试题为“子贡曰夫子之文章至惟恐有闻”。我的文中有“耳也者心之译，躬之督也及顺译道张督权而已矣”等语，有人问孙先生：“督躬有来头么?”孙先生说：“这何必有来头。”这一年的殿试，文韵阁写□间阎而□□一句，误落阎字，乃改而为面，又写一而字，预备倩友人代为挖补，仓卒间不及改，即缴卷。阅卷时，有人疑间面误写，翁叔平知是文君，特为解释说：“此有所本，我们年轻时，尝用间面对檐牙。”遂以第二名及第。当时北京流传一对子：“间面居然登榜眼，督躬何必有来头。”

因殿试朝考的名次均以字为标准，我自量写得不好，留俟下科殿试，仍偕徐君出京。此行往返，均由徐氏请一酒商张湘文氏作伴照料，张君对我很关切，甚可感。

是年，上虞县设修志馆，朱㽘卿氏为馆长，王寄庼氏为编纂，聘我为总纂。我为拟访事例：以山水、都里、土产为各乡取录之例，以道里、山、水、祠庙、院塾、先正遗事、忠义、列女遗事、节烈、书籍、家谱、碑碣等为各里分录之例。又为拟志目，分地篇、吏篇、户篇、礼篇、

刑篇、工篇、学篇、书篇、碑篇、列传、士女篇、杂篇、文征等篇，大抵本章实斋氏之说而酌为变通，名目既不同旧志，而说明又多用古字、古句法。同事多骇异之，喧传于馆外，引为笑谈。我作《罪言》一篇，取万历本及嘉庆本上虞旧志之目与我所拟者作一表，并说明或因或革之故，然彼等攻击如故，我遂辞职回家。

自是年霜降至辛卯小暑有《知服堂日记》一本，不著年月而以节气为标识，所记多读经读史时之札记。

廿五岁　纪元前二十一年，西历一八九一——一八九二，清光绪十七年辛卯。

九月廿七日，先师王子庄先生卒。是年仍馆徐氏。

廿六岁　纪元前二十年，西历一八九二——一八九三，清光绪十八年壬辰。

是年我又往北京，补应殿试朝考。向来电〔展〕试卷是专讲格式，不重内容的，止听说张香涛氏应殿试时不拘格式，被取一甲第三名。我那时候也没有拘格式，而且这两年中也并没有习字，仍是随便一写，但结果被取为二甲进士。闻为汪柳门先生（讳鸣銮）所赏识。有一位阅卷大臣，说此卷的字不是馆阁体。汪说：他是学黄山谷的。于是大家都在卷子后面圈了一个圈，就放在二甲了。朝考后充庶吉士。是年回绍兴。

廿七岁　纪元前十九年，西历一八九三——一八九四，清光绪十九年癸巳。

四月十八日出游，由宁波至上海，又乘长江船往南京、镇江、扬州及靖江县，七月到广州，寓清鹾总局，陈孝兰先生陔所招待也。陶心云先生濬宣适在广雅书局，常取廖季平氏之新说，作子所雅言至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等制艺数篇，我亦戏取是年广东乡试题《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作一篇，陶先生自作一评，并为征求朱蓉生山长、

徐花农学使、吴梦蜚孝廉等各缀一评而印行之，题为《蔡太史拟墨》，其意至可感也。陶先生为我言，廖季平氏在广雅时，常言诸经古文本出周公，今文本出孔子，孔子所记古制，皆托词，非实录，例如禹时代，洪水初平，扬州定是荒地，禹贡乃言贡丝，自是孔子照自身所处时代写之耳。其他新说，类此甚多。然廖氏除印行关于今古文之证明外，最新之说并不著之书。南海康长素氏祖贻闻其说而好之，作《新学伪经考》，时人多非笑之，惟石□□茂才称许康氏，说此人不凡云云。我于是得廖、康二氏已印行的著作，置行箧中。

冬，由广州至潮州，以同年李雪岩君之介绍，寓澄海林君冠生处。李君能说北京话及苏州话，林君甚诚笃，又有陈君爱南时偕谈燕，喜说梁节庵、康长素诸人琐事。汕头海关绍兴沈雪帆君与其子步洲，招待甚周。

廿八岁　纪元前十八年，西历一八九四——一八九五，清光绪二十年甲午。

是年有六月朔至九月晦《知服堂日记》一册。大抵校订史籍及其他读书时之札记。

是年春，由潮州回绍兴，又进京。应散馆考试，充编修。李莼客先生请我为塾师，讲其嗣子承侯，并为代阅天津问津书院课卷。塾课每日讲《春秋左氏传》十余行，每十日课试帖诗一首。

六月间，日本兵侵入朝鲜，京官多激昂。我正与黄鹿泉、王书衡、吴雁厂、胡鍾生诸君为诗钟之会，亦尝赋诗寄愤，但未尝参加松筠庵联名主战的宣言。

冬十一月二十四日，莼客先生病故，承侯辍读，我移居南关截胡同之山会邑馆。

廿九岁　纪元前十七年，西历一八九五——一八九六，清光绪廿一年乙未。

赴南京访张香涛氏，适康长素氏之房师余诚格氏亦在座。张氏盛称康氏才高，学博，胆大，识精，许为杰出的人才。是时南京有三多的谑语，就是驴子、板鸭、候补道。闻钱念劬氏遇乞丐，就说：你为什么不去做候补道？冬，回绍兴。

三十岁　纪元前十六年，西历一八九六——一八九七，清光绪廿二年。丙申。

是年有正月至十月日记，日记中有七绝廿八首、七律七首。阅《电学纲目》、《电学启蒙》、《光学》、《声学》、《梅氏丛书》、《代数难题》、华若汀《算草丛存》及《日本史略》（冈本监甫著）、《俄游汇编》等书。

四月十二日，外舅王荣庭先生卒。

误闻周蓉倩死耗，挽以七律四首七月廿三日。

八月十六日大姨卒（朗轩之夫人）。

十月九日　王夫人产一子，命名曰根。

因王夫人于十一月九日始满月，而天津已于十月卅日封口，余又希望于十二月杪抵北京，乃决计陆行。先由上海往清江浦，乃换乘骡车北上。自清江浦至北京，称为十八站，而我欲速到，乃破站走，预计十五日可到，于是有几夜不得不宿在打尖的地方。记有一次炕下即为猪栏，有一次没有炕，在泥地上铺麦杆，我只好坐了一夜。十二月末日到宛平，旅馆不接客，不得已访县长，蒙其款待，宿署中。此行闻见特新，作诗颇多，可惜捡不到记录。

三十一岁　纪元前十五年，西历一八九七——一八九八，清光绪廿三日〔年〕丁酉。

有《知服堂日记》，自一月至九月。

正月初一日到北京，住南半截胡同，与沈乙斋同寓。

正月十日，何松僧丈招饮，大醉骂座。我父亲善饮，我母亲亦能饮，我自幼不知有酒戒。忆十岁时，为范氏表

兄所激，曾大醉一次，酣睡一日余始醒。长辈咎表兄，彼以“将酒劝人并无恶意”的成语替自己辩护，这是我第一次醉。后来馆徐宅，时参加宴会，猜拳行令，时时醉。到北京，京官以饮食征逐为常，尤时时醉。然醉后从不胡闹，同人恒以愈醉愈温克目我。此次忽大骂同座（其原因已不记得），以后遂不免屡犯。

三月，眷属来京，我于十四日晨乘骡车至黄村，登小火车，无舱，晚到廊房，换车，坐二等舱，夜半到天津。廿二日眷属至，廿五日由水道进京。是夜舟泊杨村，廿六日泊河西务。廿七日泊马头。廿八日午至通州。廿九日雇骡轿一、骡车九进京，午尖于双桥，晚到京。计此行出京乘火车，费一日半；进京乘舟及骡车，费五日。

四月十四日，进内城，寓方略馆。十五日，诣保和殿应试，题为“经正则庶民兴（孟子），三曰举贤四曰使能”（《礼记·大传》），赋得方流涵玉润，得方字。傍晚缴卷出城。此试为各省主考学政及会试同考官之人选而设。

十五日日记中有一节云：“访长沙徐侍郎，知我卷在李苾园侍郎手，诧为怪物，长沙闻之，索阅，极倾倒，李不能持前说，但以诗中用潇湘为疑。长沙又力争之，曰若疑者，任于吾处择一佳卷相易，在吾手中，非第一无位置处。既互易，李思前语，又舍不得，仍易以去，置第四。”盖我自戊戌〔子〕以后，任意作文，即在考试时，亦毫无得失之见，仍以常人不易了解之文应之。丙申九月十三日日记一条，有关此事，附录于下：

“得应桂轩同年书并金陵赠别序一篇。序之大意，以余文有意为奇涩，不类余为人，因勉以至平至易之轨。桂轩固喜为方、姚诸家文者故其言如此。然切直之言，洞中余病，不可忘也。余自戊己来，读定盦先生文，喜而学之，又厕以九经诸子假借之字，倒句互

文之法，观者辄讶为奇僻。己丑乡试，房官宦汝梅先生得余卷，疑为老儒久困场屋者。庚寅会试，王黻卿先生得余卷，疑为跅弛不羁之士。及见余，年少朴僿，不能为大言，皆爽然失。桂仙之意盖亦如是。

三十二岁　纪元年〔前〕十四年，西历一八九八——一八九九，清光绪廿四年戊戌。

三月，六叔父来京应会试，我先期请回避，因恐我或被派作帘官，六叔父就不能进场。

是月九日，王夫人又产一男，命名曰煦。

是年，张君菊生设通艺学堂于琉璃厂，专修英语，而刘君葆良则设一习日文之馆于内城。我那时还没有习西文之决心，推想日文可速成，遂加入刘君馆中，不肯学日语，但学得"天尔远波"等读法，硬看日文书。

是年，梁启超氏有"公车上书"的运动，康有为氏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诸氏被任用，励行新政。我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我与梁氏虽为乡试同年，但亦未与见面。及八月间，谭、杨、刘、林及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康、梁二氏被通缉，我甚为愤懑，遂于九月间携眷回绍兴。虽有人说我是康党，我也不与辩。

那时候，绍兴已经有一所中西学堂，是徐君以悉的伯母〔父〕仲凡先生所主持的。徐先生向知府筹得公款，办此学堂，自任督办（即今所谓校董），而别聘一人任总理（即今所谓校长），我回里后，被聘为该学堂总理。

三十三岁　纪元前十三年，西历一八九九——一九〇〇，清光绪廿五年己亥。

我任绍兴学堂总理。该学堂学生，依年龄及国学程度，分为三斋，略如今日高小、初中、高中的一年级（数学及外国语例外）。今之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君与北大地

质学教授王烈君，都是那时第一斋的小学生。今之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祼光君，浙江省教育厅科员沈光烈君，都是那时第三斋的高才生。堂中外国语旧有英、法两种任学生选修。我到后，又添了一种日本文。教员中授哲学、文学、史学的有马湄莼、薛朗轩、马水臣诸君，授数学理科的有杜亚泉、寿孝天诸君，主持训育的有胡鍾生君。在那时候的绍兴，可谓极一时之选。但教员中颇有新旧派别，新一点的，笃信进化论，对于旧日尊君卑民、重男轻女的习惯，随时有所纠正；旧一点的不以为然。讨论的机会，总是在午餐与晚餐时。因为餐室是一大厅，列许多方桌，每桌教员一人、学生六人，凡不与学生同桌之教员与总理，同坐中间圆桌。随意谈天，总不免涉及政治上、风俗上的问题，所见不同，互相驳辩，新的口众，旧的往往见诎。此种情形，为众学生所共闻，旧的引以为辱。而我与新派的教员却并不想到这一点。

三十四岁　纪元前十二年，西历一九〇〇——一九〇一，清光绪廿六年庚子。

旧派的教员，既有此观念，不能复忍，乃诉诸督办。督办是老辈，当然赞成旧派教员的意见，但又不愿公开的干涉。适《申报》载本月二十一日有一正人心的上谕，彼就送这个上谕来，请总理恭录而悬诸学堂。我复书痛诋，并辞职。后经多人调停，我允暂留。

是年四月间，我为宁绍会馆事往嘉善。二十六日，得薛朗轩函，言王夫人有疾，促早归，我遂于二十九日启行，五月二日到家。九日，王夫人卒。我为文哀之，词如下：

> 王夫人，荣庭外舅之仲女也。母氏陈。夫人无兄弟。有一姊，适薛君朗轩，以光绪二十二年卒。有一妹，未嫁而卒。夫人年二十四而归于我，光绪十五年

三月也。十六年春，余晋京，应会试，五月归。十八年春，余应殿试，又晋京，八月归。十九年夏，余历游江苏、广东，二十年春归。未几，晋京散馆。二十一年冬归。二十二年十一月晋京。二十三年三月，夫人携子到京，二十四年九月同出京，迄今居故乡将二年矣。乌呼！十年之中，余在家者十之三四。既在家矣，往往饥驱而出，其得欢然聚首者，不过两三年耳。夫人病，余适以事往嘉善，得讯而归，不及十日而夫人卒矣。乌呼！余能为不负夫人耶？

夫人有洁癖，坐席、食器、衣巾之属，非与同癖者，或触之，则懊恨欲死。睡则先去外衣，次长裙，乃以湿巾遍拭其发及衣衽。盖十年如一日。其始来归也，余恶其繁琐，常与之争。夫人又尚气，不能受怫逆之词。余用钱颇宽，而夫人持之以俭；余不欲亲细事，而夫人持之以勤。余于时方持妇人既嫁从夫之义，时有以裁制之，夫人虽不能不相让，而心滋不悦，以是得肝疾。

近年，余深绎平权之义，自由之界，乃使夫人得一切申其意。而余亦时以解足缠，去华饰，不惑鬼怪为言，夫人颇以为然，而将次第实行之，余亦不之强，而俟其自悟而决去也。以是各信谅劝之有趣，而几忘狎媟之为乐，伉俪之爱，视新昏有加焉。乌呼！孰意其不可久耶？

夫人澹于世荣，归余后，余即得科第，而夫人不以为喜。余官京师，阒然不趋事权要，戊戌九月，决然相与携两儿出都，跋涉长途，辛苦备尝，夫人不以为苦。今年，有试差之考，族戚友朋，多以是劝晋京，而余不从，夫人亦无忤焉。乌呼！以夫人超俗之识与夫劲直之气，充其量，盖足以偿余所期而无难，

而孰意其中道而摧折也夫，呜呼！

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十八岁　充姚氏塾师（清光绪十年甲申）
十九岁　充单氏塾师（十一年乙酉）
廿八岁　充李氏塾师（二十年甲午）
卅二岁　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廿四年戊戌）
卅三岁　同上（廿五年己亥）
卅五岁　充南洋公学特班教员【廿六年庚子】（廿七年辛丑）
卅六岁　爱国学社教员、女学经理（廿八年壬寅）
卅七岁　爱国女学经理（廿九年癸卯）
卅八岁　同上（三十年甲辰）
卅九岁　同上（卅一年乙巳）
四十岁　回绍兴充学务公所经理
进北京，任译学馆教员（卅二年丙午）
四六岁　充教育总长（民国元年）
五一岁至五七岁　任北大校长（六年至十二年）
六二岁至六三岁　任大学院院长（十七年至十八年）
共廿二年

在绍兴中西学堂时，主要的人物有四，为记他们的事略如下：

（一）马君用锡　居为我的表弟，名用锡，自号眉八，时人多误八为人，因此改号湄莼，会稽县人。读书极敏捷，真有“一目十行”的样子。与我共治小学及经学，偏嗜刘申受、张皋文、龚定盦等著作，所著诗词，均为我所不及。到中西学堂时，君已醉心于进化论，博览日文译本，均取大例，用以说明社会的一切。力持民权女权的重

要。所以我受反对时，君亦为最受攻讦的一人，君因此离学堂。不久以肺病卒。卒时年不过三十余岁。有一子复，毕业于北京大学。

（二）杜君亚泉　君初名子□，名秋帆，后自号亚泉，自言亚为氩的省文，泉为线的省文。氩为最无力的气体，线为无面无线的几何形，亚泉的号，自认是无力量不体面的人罢了。会稽县人。君先治数学，进而治理化，亦喜研究哲理，对于革新政治、改良社会诸问题，常主急进，所以那时候与马君同受攻讦。君离学堂后，到上海，编印《亚泉杂志》，以提倡科学。曾任南浔镇私立南浔公学监督。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同他的好友寿孝天、他的侄杜就用等编订理科教书甚久。卒于民国二十一年，年六十一岁。著有《人生哲学》，是根据进化论公例，说明他个人的人生观的。

（三）薛君炳　君名炳，字阆仙，山阴县人。少时与我同受业于王子庄先生，那时君年十六岁，我十四岁。我原配王昭夫人，即君之姨妹，所以君与我为僚婿。君好书好客，我于书肆中见有好的书，无力购买，一告君，君就往购，与我共读，我很受君的益。君治经，守家法，治《毛诗传》，《治礼义疏》，详读数次，用红笔点勘，一句一字不放过。治《荀子》，钩考甚勤，说《性恶篇》非荀子自作，是其徒所附益的；非十二篇中之子思、孟子，乃是阴阳家邹衍、邹奭的别号，不是孔伋、孟轲，虽不免有牵强傅会之处，但用力是很勤的。君不甚赞同革新的理想，绍兴中西学堂中，反对我及马君的，实自君始。民国七年，我以北大校长兼任国史馆长，曾聘君任国史馆编纂，然不久君即辞去。君卒于民国□□年，年□□□岁。

（四）胡君道南　君名道南，字鍾生，会稽县人。与我同举于乡，始相识，对我非常恳挚，凡力所能及的，无

不竭诚相助。我任绍兴中西学堂总理，君愿任监学，不支俸给，于大门之左辟一室，设高座，得于窗中监学生出入，诚笃如此。君善为文，豪于饮，私德粹美，负乡里重望。戊戌，君曾与童亦韩、章太炎诸君办《经世报》于杭州。革新的主张，并不后人，但对于革命的进行，不敢助长，不免为青年所不满。秋竞雄女士一案，有疑君与闻的，君以是遇害，时民元前□□年也，年六十有□。有子孟乐，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

当我离绍兴中西学堂以前，嵊县官绅聘我为剡山书院院长。照旧例，每月除官课由知县主持外，举行师课一次，由院长出《四书》文题、试帖诗题各一，为评定甲乙就算了。院长到院与否，都无关系。我觉得此种办法，实太无聊，到院后，曾演讲数次，说科学的有用，劝院生就性所近，分别考求；但书院经费有限，不能改进，我担任一年，就辞职了。

那时候，诸暨有丽泽书院，亦聘我为院长，我未能到院，一年后，我力劝改为学校了。

那时候，留居嘉善县的宁波、绍兴两府同乡建立宁绍会馆，聘我为馆中董事。因为嘉善同嘉兴等县，自太平天国事变以后，本地人经兵与疫的两次扫除，地旷人稀，农田尽成荒地。先有湖南人领地垦荒，绍兴人继之。绍兴离嘉善较近，往垦的更多；日久，遂有购数百亩、数千亩的地主，招佃代种，于是关系渐趋复杂。而宁波、绍兴的商人，来此地开设钱庄、杂货铺的，也与年俱增。又宁波人的习惯，客死者必须归葬，力不能归柩时，须有一停柩的地方。宁绍会馆的设立，一方面用以调解地主与佃户，或农人与农人间的纠纷；一方面用以改良旧日停柩的公所。因地主中有单君继香者是我旧日学生，提议请我，经其他发起人赞同，所以有此聘书。但我虽去过好几次，也不过

对于立案、定章等事稍有帮助，没有多大的贡献。

当我在嘉善的时候，我见县衙门的告示，禁止安吉、孝丰人来此养蜂。推原其故，安、孝居民善养蜂（当然是旧式的），常用木桶袋蜂群，分寄于邻近各县民居的窗前，给小费，托照料，定期来割蜜，本是两利的事业。不意嘉善等县人忽扬言蜂采蜜，于谷有害，禀官禁止，自此遂沿为成例。其实蜂为植物界虫媒之一种，于果谷是有益的；但积非成是，一时竟无术纠正。

庚子，北京有义和团之变。义和团之起因，一方为北方人对于天主教徒压迫的反抗，一方是满洲保守党对于戊戌政变的反动。历年教案，地方官常受严重处分，畏教士如虎；倘有教徒与非教徒争执的案，经教士请托，教徒没有不胜的。于是非教徒嫉教士，常想有报复的机会。戊戌政变而后，后党嫉维新派，以为康有为、梁启超等所以能幸逃法网，全靠洋人保护。洋人都是小国，人数有限，倘能杀尽侨居中国的洋人，便可杀尽维新派，天下太平了。但是这两类人，都仇洋人，却都怕洋人枪炮，常想只要有御枪炮的方法，就不怕洋人了。恰巧有白莲教的余孽忘（妄）说催眠以后，有物凭身，枪炮的弹子也不能入。于是载漪、刚毅、铁良、徐桐、毓贤等等没有知识的人，纷纷信以为真，令围攻交民巷使馆区，酿成八国联军进京之丑历史。但自此以后，教徒压迫良民之事为之减少；而列强对于中华民族之有此等抵抗力，瓜分的论调，也渐守缄默，不能不说是不幸中之小幸了。

我在绍兴学堂时，偶往杭州，得识许君秋帆沅。许君以丹徒人宦游杭州，设一方言学社，教授英文，曾至绍兴学堂参观。曾为我等述吴君稚晖在南洋公学训练学生的成效，我始注意于吴君之为人。

我自离绍兴学堂后，曾与童君亦韩同往杭州，筹办师

范学校。是时杭州著名的学堂有二：一为高等学堂，用求是学堂改组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高中。一是养正书塾，是私立的，其程度约如今日的初中。养正书塾的教员，如陈介石、林少泉、陈叔通诸君，监学邵伯絅君，均时相过从。学生中如汤尔和、杜杰峰、马夷初诸君，均杰出之才。林、陈诸君出一白话报；林君后改号白水，以犀利的白话文著名，实于是时开始练习之。高等学堂所聘的教员，有宋君燕生恕，博览，广交游，善清谈。著有《六斋卑议》，反对洛闽理学，颇多新思想。但虑患特深，特喜作反语，自称著有十种《鸣冤录》，如《汉学鸣冤录》等等，中有一种是《满洲鸣冤录》。又尝为驻防营的桂翰香作诗集序，汤、马诸君深不以为然。

我与章太炎君相识，亦始于此时。我与童君亦韩自杭州往临安，为绍兴同乡组织小学校，路过余杭，访章君于其家。童君与章君本相识，故为我介绍。章君本名炳麟，字枚叔，但是时以提倡排满之故，自比于明遗老顾亭林、黄梨洲两先生，因改名为绛（亭林名），而字太炎（取于黄太冲、顾炎武）。是时所发表的是第一版的《訄书》。此书汉人虽读之感痛快，但畏祸，不敢多为传布；而杭州驻防金梁，乃购数十部分赠满人之识字者，说："汉人已如此，我们还可不振作吗?"金君倒真是章君的知己了。

我的原配王夫人之卒，已过了一年，友朋多劝我续娶，并为我介绍相当之女子；我那时提出五条件：（一）天足者；（二）识字者；（三）男子不得娶妾；（四）夫妇意见不合时，可以解约；（五）夫死后，妻可以再嫁。同乡的人，对于（一）、（二）两条，竟不易合格；而对于（四）条又不免恐慌，因而久不得当。有林君为言都昌黄尔轩先生之次女天足，善书画。黄先生方携眷属需次杭州，可托人探询。我适与童君又往临安，抵余杭，薄暮，

童君识余杭某局长叶祖芗君，往投宿。叶君设宴相款，我大醉，叶君谅我真率。晚餐后，叶君导观大厅中所悬之图画，均极精细之工笔画，款署黄世振，字亦秀劲。叶君说，这是我同乡黄君尔轩之女，甚孝，尝封臂疗父疾，工书画。童君就告以我有求婚的意思，叶君慨然以媒介自任。后来借叶君之力，我得与黄女士订婚，己丑 □月结婚于杭州。

我是年常到上海，时相往还者有蒋观云、叶浩吾、清漪昆弟、王小徐、汪允宗、方青箱诸君。蒋君方主持《选报》；王、汪、方三君办理金粟斋。

金粟斋为蒯君礼卿光典出资所设立，其任务在为严君幼陵刻所译之书。是时严译《天演论》已盛行，而严君尤注意于穆勒氏之《名学》，但译稿不能受迫促，仅刻成《名学》二册，后遂停办。

蒋君之《选报》，由赵君□□出资印行，销行颇广，因为蒋君选辑精严，编次亦有条理，便于检阅。自撰之评论及选录之诗，均足以感人。但后来杭州之养正书塾，因陈君介石反对林君少泉之故，陈君率高材生汤、马诸君离塾赴上海，编《世界学报》，亦拟由赵君承印，蒋君反对，蒋、赵几至绝交，于是《选报》停刊，而《世界学报》出了不多期，也停了。

澄衷学堂成立。此学堂为叶澄忠之诸子遵其父之遗命而设立者。监督为武进刘君葆良。七月间，刘君曾邀我相助；不过一月余，刘君又介绍我于南洋公学。

这时候的南洋公学，除盛君杏荪自任督办外，监督为沈子培君，教务长为伍昭扆君。公学本分为上院、中院两部，上院拟设路、矿、电等专科，中院办中学，又附设小学。尔时还没有中学毕业生可以进专科的，所以上院尚未开办。中院自国文及本国地理、历史外，均用英文教科

书，有英美教员数人。沈君到学后，提议设特班，聘我为教员（特班于八月朔开课）（特班事别有记）。

在南洋公学时，曾于暑假中往日本游历一次，与高君梦旦同船，到东京后，亦同寓一旅馆。是时，桐城吴挚甫君汝纶新任京师大学堂监督，到日本考察，日人以"清国大儒"称之，宴会无虚日，盖吴君任直隶莲池书院甚久，以桐城派古文授诸生，为日人所素识，且尔时日人正以助中国推行教育自任，对于此惟一国立的大学，自然特别注意了。我本预备逗留一个月，忽逢吴君稚晖被日警逮解出境的案，遂陪吴君回国。

吴君自前几年游日一次后，称日本教育进步，劝亲友送子弟赴日留学，自愿任监护之役，所以第二次赴日，从往者颇多。其中年龄长一点、志气高一点的，都想学陆军，吴君率以往使馆，请公使介绍；是时中国驻日公使蔡钧，揣摩政府意志，不轻送汉人受军事教育。见吴君所率诸生意气颇激昂，愈不敢转请于政府，托词拒绝，屡去屡拒。最后一次，吴君与诸生留使馆不归，必待公使允许始离馆。使馆招日本警役入馆，拘留吴君于警署，遣散学生。第二日早晨，留日学生开会，商营救吴君及责问公使的办法。我与高君亦共商吴挚甫君，请营救吴君。后探知日方将递解吴君出境，留学生陆君世芬等愿任沿途照料的责任，但至远到神户为止。有人说：蔡钧老羞成怒，说不定一面向政府报告，诬吴君为康党；一面与日人密商，送吴君往天津，引渡于津吏，直送北京；倘非有人能同往天津，随时援救，则甚为危险。询有无谙悉北方情形，并愿同往者；我自认有此资格，遂偕行。及上船后，日警即不过问，而所乘船又直赴上海，我遂与吴君同抵上海。

那时候，我国留日学生，竞唱各省分途革新的方策，各省留学生分出杂志，如《浙江潮》、《新湖南》等等。

《浙江潮》的主笔，是海宁蒋君百里与诸暨蒋君伯器（蒋观云之子），同学陆军，成绩优异，有“浙江二蒋”之称。

吾国侨日商人，与留学生关系较密的，有东京的王锡三与神户的孙实甫，均宁波人。浙江第一次派遣学生留日，为章宗祥、陆世芬，吴世欺，陆宗舆（?）四人，均由王君招呼。孙君对于吴君事，甚尽力，我等到神户时，即宿于其寓。

南洋公学退学事。

爱国女学及爱国学社。

《苏报》案。《外交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

我在爱国学社时，我的长兄与至友汤蛰仙、沈乙斋、徐显民诸君均愿我离学社，我不得已允之，但以筹款往德国学陆军为条件；汤、徐诸君约与我关切者十人，每年各出五百元，为我学费。及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冲突后，我离社，往德的计划将实现。徐君从陈敬如君处探听，据言红海太热，夏季通过不相宜，不如先往青岛习德语，俟秋间再赴德。于是决计赴青岛。陈君梦坡为我致介绍于李幼阐君。李君广东人，能说普通话，谙德语，在青岛承办工程方面事业，设有《胶州报》，其主笔为广东易季圭君。李君初于馆中辟一室以居我，我租得一楼面后，乃迁居，自理饮食。日到李君处习德语，后李君无暇，荐一德国教士教我。不到两个月，我的长兄来一电报，说：“家中有事速归。”我即回沪，始知家兄〔中〕并无何等特殊之事。汤、徐诸君以爱国学社既停办，我无甚危险，遂取消集款助学之约，而属我长兄留我于上海，谋生计。于是我不能再往青岛，而德语亦中辍。

我回上海后，有甘肃陈镜泉君，自山东某县知县卸任后，来上海，稍有积蓄，愿意办一点有助于革命的事业，与中国教育会商，决办一日报，名为《俄事警闻》，因是

时俄国驻兵东三省，我方正要求撤退，情势颇紧张，人人注意，故表面借俄事为名，而本意则仍在提倡革命。以翻译俄国虚无党之事实为主要部分。论说预列数十目，如告学生、告工人、告军人之类。每日载两篇，一文言，一白话。推王君小徐主编辑及译英文电，我与汪君允宗任论说及译日文报。及日俄开战，我国转守中立，我等没有面目再对俄事发言，乃改名《警钟》，王君主张不直接谈革命，以避干涉，及王君他去，我与汪君迭任编辑，遂不免放手，蹈《苏报》覆辙。我与王、汪诸君皆不支薪俸，印刷费由陈君任之。后来陈君又办一镜泉书局，他的资本为经理所乾没，陈君不能再任此报印刷费，则由我等随时由各方面募集小款，勉强支持。我等到不能支持时，乃由刘申叔、林少泉诸君接办，直至□年□月，始被封停办。

我在《警钟》报馆时，曾再任爱国女学校长，那时候，我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各教员中，与闻此事的，以从弟国亲及龚君未生为最多。龚君本随陶君焕卿成章，属往金、衢、严、处等地，运动会党，劝他们联合起来，待时起事。而绍兴又有一派秘密党，则为嵊县王君金发、祝君绍康所统率，而主动的是徐君伯荪（锡麟）。此两派各不相谋，而陶、徐两君均与我相识；我就约二君到爱国女学，商联络的方法，浙东两派的革命党，由此合作，后来遂成立光复会。

徐君是一个最有权变的人，最初在绍兴富户许氏充塾师，甚为其学生许□卿所悦服，已与密订共同运动革命的策略。其后，徐君为府立中学堂监督，就拜知府熊某为老师，博其信任，不特学堂中施行各种军事教育，均以体育为保护色，无人訾议；而且向知府请拨正式步枪四十管，令学生作实弹射击的练习，亦无人过问。此等学生，一部分由徐君拔为干部员，直至参加枪毙恩铭案为止；一部分

转入大通学校，助秋竞雄女士组党，因秋案而死伤的亦不少。

徐君既与陶君合作，乃密商进行方策，主张先混入官场，攫取军权或警权，始可起事；但欲取军、警权，又非有一种资格不可。于是由许君出资，为徐君、陶君捐道员（许君自身亦道员）及知府不等。又往日本习陆军，徐君以手段圆滑，得政府认可；到日后，验体格，均因近视眼或其他生理上的缺陷，不能进军校，乃同习警政。但陶君等未能入官，滞留东京，偶往南洋各埠活动，或密赴内地接洽。惟徐君以候补道到安徽，管警政，遂有枪毙恩铭的大举。

在东京之同盟会成立以后，会员杨笃生、苏凤初等六人，在某山上请一日本化学教授为导师，习制炸药；此为同盟会中的秘密小组。前任爱国学社军事教员何海秋君自东京来上海，以秘密形式介绍我入同盟会，并介绍入小组，并言苏君将来沪传习，委我预为安排。我于爱国女学左近租屋一幢，并介绍物理学家王君小徐及化学家鍾宪鬯先生加入小组。苏君到后，约我等愿习者开会，以一纸书黄帝神位等字，供于上方，杀一鸡，滴血于酒中，我等都跪而宣誓，并饮鸡血酒，苏君乃开始教授。仪器及药品，皆鍾先生自科学仪器馆携来者。若干日而毕业。苏君率同志数人往湖南。我等仍继续筹制炸弹，炸药易制，而王君小徐遍访上海五金店，未有能代制精便的弹壳者。黄君克强及蒯君若木自东京来，均携有弹壳若干，装药后，由孙君少侯密送南京，于僻处试掷之，竟不炸。我等所组织的秘密机关，不能不解散；仍以爱国女学为接洽之所。杨君笃生来上海，知无可凭藉，乃往北京。过保定时，遇吴君樾，极相投契，吴君并表示为国牺牲之决心，索工具于杨君。杨君抵北京，任译学馆教员，乃密制炸药，装诸纸烟

罐，以药线导火。吴君携以赴考宪五大臣车上，既发火，未及掷出而已炸，遂殉国。

杨君恨制弹不精，累吴君空自牺牲，决计再出国研习；而一方似已被人监视，不能骤离译学馆；遂驰函来告，我等商营救之策，孙君少侯慨然愿以捐职办引见之名义往北京，相机行事。孙君抵北京后，与杨君密谈后，知其详，乃运动李君木斋延杨君至天津，其后杨君随留欧学生监督蒯君礼卿往欧洲，遂留学英伦，仍专研物理学。□□年□月，忽自沈于某河。他的遗书说：自恨少年未习普通学，今欲有所制造，辄感不足，彻夜补习，脑力不济，辄服补脑药，积久中毒，患头痛甚剧。此次闻利物浦开工艺展览会，往观，冀有所参考，竟茫无头绪，头痛欲裂，虽欲急回国，杀一二满人以博死刑，而迫不及待，死于此耳。对于东京的秘密小组，惟杨君一人，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我在爱国女学，从弟国亲相助数年，我已为介绍入同盟会。国亲回绍兴，参与女学、报馆等事，又为王子余、裘吉生、王叔梅、俞英厓诸君介绍入会。秋竞雄女士在东京时已与徐伯荪、陶焕卿诸君订为同志，回国后，即在绍兴运动。嵊县姚茂甫君迁居绍兴。爱国学社旧同志敖梦姜君亦时来绍兴。那时候，绍兴一个小地方，革命的空气颇为浓厚，但均守秘密，普通人士认为新党罢了。诸同志建议办一绍兴学务公所，用以促进绍属八县的教育事业，推我为所长，促我回里，我于是回绍兴，办学务公所，邀裘吉生、杜海生诸君相助。先办一师范传习所，讲授各种教育上需要的科学。要办一师范学校，筹款辄为人所阻挠，我愤而辞职。

我那时候预备离开绍兴，适北京友人来信，说政府要派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留日、留欧，由本人自择，劝速

往北京登记。我自离青岛后，本时时作游学计划，得此消息，不能不心动，遂往北京。适同乡章君一山梫长译学馆，请我为教授，任乙班的国文及西洋史。我本拟在北京度岁，静候派遣消息；不意从弟国亲忽来一电：家中有事，速归”，我遂惘惘然走平汉路南下，因天津口已冻了。回家后，始知家中实无甚要事，彼闻有不利于我的传说，特促我南避。北京的朋友，知道家中的电，亦认为必有他故，章君恐为我所累，特来一电，解教授之约。然我欲不为所阻，度岁后，我仍往北京。

我到京后，承陈君仲骞相招，寄住赣南馆，盖陈君所娶，为黄夫人的第四妹，君与我为僚婿。到北京后，始知编检志愿游学的人数太少，政府遂搁置不办。适得孙君慕韩宝琦使德的消息，乃托他的兄弟仲玙宝瑄及叶君浩吾为我关说，愿在使馆中任一职员，以便留学；我亦自访孙君，承孙君美意，允每月津贴银三十两，不必任何种职务。一方面与商务印书馆商量，在海外为编教科书，得相当的报酬，以供家用。我遂于是年五月间随孙使由西伯利亚铁路赴德。

孙使率参赞、随员十余人，所能记忆的，有王君钦尧夫妇、项君致中、李君、张君等，我以外，又有赴德留学的三人，为齐君寿山宗颐、钱君轶裴方度及福建许君。

到柏林后，我与齐、钱二君同寓，齐君本通德语，钱君善英语，我得两君助力不少。齐君本译学馆学生，他的同学顾君孟余兆熊留德已数年，诸事熟悉，我等所请的德语教员，均顾君所代选代订。又由顾君而认识薛先生仙舟颂瀛、宾君敏陔步程。

薛先生爱国好学，自奉甚俭，携他的甥女韦增瑛女士留学，常自购蔬菜，借房东厨房自烹。最恶同学中的游荡者，对于娶西妇的人，尤时时痛骂，闵我初学德语的艰

苦，排日为我讲德语的文法，而属我为彼讲中国古文，作为交换条件，我得益不少。

宾君是豪爽的人，留德较久，于各方面情形，甚熟悉，初到德国的同学，赖他帮忙的很多。中山先生到德国建设同盟会时，即在宾君寓所开会，然我在德时，宾君从未谈及，直至回国后十余年，宾君为其母夫人征寿序，始为我述此事。

同时留学柏林的，尚有马君武、夏浮筠元瑮诸君，亦时相过从；夏君每日于大学课程听完后，常到我寓，同往旅馆晚餐，或觅别种消遣。（各人自付钱，不必相请。）

孙使恐我旅费不足，适唐君少川之姪宝书、宝潮、宝□、宝□等，来柏林留学，均不过十余岁，国学尚浅，因令于预备德语外，请我授国学，每月报酬德币百马克。

我在柏林一年，每日若干时习德语，若干时教国学，若干时为商务编书，若干时应酬同学，实苦应接不暇。德语进步甚缓，若长此因循，一无所得而归国，岂不可惜！适同学齐君宗颐持使馆介绍函向柏林大学报名，该大学非送验中学毕业证不可，遂改往来比锡（Leipzig）进大学。那时候，中国学生留学来比锡的，还只有张君仲苏谨一人，且与齐君同籍直隶，同在译学馆肄业，与齐君甚相得。我接齐君报告后，遂向孙使声明，而于戊申暑假中往来比锡。

来比锡属撒克逊王国，在他的都城特来斯顿邻近。特来斯顿山水著名，来比锡风景平常。但德意志最高法院在此，又每年有一次市集，各方货物辐辏；他的大学自设立以来，已历五百年。

该大学设有中国文史研究所，主持的教授为孔好古氏（August Conraty），彼甚愿招待中国学生，我由彼介绍进大学，毫无留难。

我所听的讲义，是冯德（Wilhelm Wundt）的心理学或哲学史（彼是甲年讲心理，乙年讲哲学史，每周四时，两种间一年讲的）；福恺尔（Vokelt）的哲学；兰普来西（Lemprechs）的文明史；司马罗（Schmalso）的美术史；其他尚听文学史及某某文学等。我一面听讲，一面请教师练德语，一面请一位将毕业的学生弗赖野氏（Freyer）摘讲冯德所讲之哲学史，藉以补充讲堂上不甚明了的地方。

冯德是一位最博学的学者，德国大学本只有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近年始有增设经济学等科的）；而冯德先得医学博士学位，又修哲学及法学，均得博士；所余为神学，是彼所不屑要的了。他出身医学，所以对于生理的心理学有极大的贡献。所著《生理的心理学》一书，为实验心理学名著。世界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即彼在来比锡大学所创设的。又著民族心理学、论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此书叙哲学史较详），没有一本不是原原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

兰普来西氏是史学界的革新者，他分历史为五个阶段：（一）符号时代，（二）雏型时代，（三）沿习时代，（四）个性时代，（五）主观时代。符号时代，是人类意识最蒙昧，几没有多大的分别。如中国文字上一二三亖等指事的文，又如各民族图画上的几何形。人与人的关系，就是共同生活，饥了就食，倦了就寝，并没有何等有机的社会组织。雏型时代，就进一步，有一种类别的意识。如中国或埃及的象形文，鸟、兽、虫、鱼，各就他们一类中共有的特点表现出来。在社会上，自图腾以至于宗法，自渔猎以至于农工商业，渐成分工的组织。沿习时代，是一种停滞的意识，承雏型时代的习惯，变本加厉，不求其所以

然。如中国文学由小篆变为楷书，诗文上的拟古，图画上的摩仿。在社会上，贵族与平民，公民与奴隶，男与女，资本家与工人，都不考求他们的成立的因由，而确认为天然不平等的阶级，没有改变的可能。个性时代，就又进一步。如图画上之写真，每一个人的面目，不能移到别一人。人人有"人各自由"之观念，人人有自尊人格的气概；平民与贵族争，有法国的革命；奴隶与公民争，有林肯的放黑奴；女子与男子争，有各种妇女运动；工人与资本家争，有社会主义；无一非"人权"的意识所表现。主观时代，为我见的扩大。是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的我，非希德"我与非我"的哲学的我，并非为小己的竞争生存着想，而以全体人类为一大我。"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伊尹乐尧舜之道，思天下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诸沟中。""人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鳏寡废疾皆有所养。""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这是社会主义者理想的世界，将要待人类文化更进时始能实现的。（因兰氏所举例证，我已记不清楚，箧中又无书可检，用己意说明，不知道失了兰氏本意没有）兰氏依此主张，著《德意志史》，那时候已出二十余本，尚未到现代，兰氏旋于一九一四年逝世。

兰氏所创设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除兰氏外，尚有史学教授六七人，学生在三四年级被允许入所研究者，那时约四百人。我以外国学生，不拘年级，亦允入所并在兰氏所指导的一门中练习。他的练习法，是每一学期中，提出有系统的问题一组，每一问题，指定甲、乙二生为主任，每两星期集会一次，导师主席；甲为说明的，乙为反驳的或补充的，其他丙、丁等为乙以后的补充者。最后由导师作结论。进所诸生，除参加此类练习班外，或自由研究，或预备博士论文，都随便。

兰氏讲史，最注重美术，尤其造形养术，如雕刻、图画等。彼言史前人类的语言、音乐均失传；惟造形美术尚可于洞穴中得之，由一隅反三隅，可窥见文化大概。研究所中搜集各地方儿童图画甚多，不但可考察儿童心理，且可与未开化人对照。

孔氏所主持的中国文史研究所，也有练习班，我也参加。孔氏曾任我国译学馆教员，通梵文，常用印度寓言与中国古书相对照，颇有新义。

来比锡大学礼堂中正面的壁画，为本地美术家克林该所绘。左部画一裸体而披蓝衫的少女，有各民族雏型的人物环拱着，这是希腊全部文化的象征。中部画多数学者、而以伯拉图及雅里士多德为中坚，伯氏着玄衣而以一手指天，为富于理想的象征。雅氏着白衣而以一手指地，为创设实证科学的象征。右部画亚力山大率群臣向左迈进，为希腊人权威的象征。克氏又采选意大利各种有色的文石雕一音乐大家贝多汶坐象，设在美术馆庭中。

此地美术馆，以图画为主，当然不及柏林、明兴等处美术馆的富有，但自文艺复兴以后的诸大家，差不多都有一点代表作品，尤其尔时最著名的印象派作家李勃曼，因曾寓此城，所陈列作品较多。其第三层将各国美术馆所收藏之名画，购其最精的照片，依时代陈列，阅者的印象虽不及目睹原本的深刻，然慰情聊胜无。我常想，我们将来设美术馆，于本国古今大家作品而外，不能不兼收外国名家作品；但近代作品，或可购得，而古代作品之已入美术馆的，无法得之，参用陈列照片的方法，未尝不可采用。

美术馆外尚有一民族学博物馆，馆长符来氏(Wöller)，即在大学讲民族学者，我亦曾往听讲，其中所搜非洲人材料较多且精，因符来氏曾到该地。中、日亦列入，我亦曾助馆员说明中国物品。

有一花园名曰椰园（Palmgarten），因园中有一玻璃房，专培养热带植物。有一演奏厅，于星期日午后及晚间奏音乐，我常偕同学往听。德国音乐名家最多，普通人多能奏钢琴或提琴者，我也受他们的音〔影〕响，曾学钢琴，亦曾习提琴，然均不久而中辍。

有一戏院，每日演话剧或小歌剧。小歌剧轻松婉丽，同学张君仲苏最所爱听，我亦偶与同往。话剧多古今文学家作品，寄托遥深。又德国舞台科白，为标准德语，听戏亦为练习语言的一法。大学体谅学生，每日于门房中留有中等座位的折价券若干张，备学生购取。报纸则于星期日揭载七日戏目。我等愿于某日观某剧，如未曾读过剧本，可先购一本，于观剧以前读完他，更易得益。（来比锡为德国印刷业集中地点，有一雷克拉谟书店（Recram）印行小本，版权满期的文学书或科学书，每号价不过二十生丁。）

德国最大文学家哥德氏（Goethe）曾在来比锡大学肄业，于其最著名剧本《弗斯脱》中，描写大学生生活，即在来比锡的奥爱摆赫酒肆中（Auerbach），此酒肆为一地底室，有弗斯脱博士骑啤酒的壁画，我与诸同学亦常小饮于该肆。（及民国十年，我偕林宰平君重到来比锡，再访该肆，则已改造为美轮美奂的饭馆了。）普通演《弗斯脱》剧本的，都只演第一本，即法国人所译编的歌剧，也只有第一本。第二本节目太繁，布景不易，鲜有照演的。惟来比锡因系哥德就学之所，而弗斯德于芬斯脱节（Fenste）之夜，正欲服毒，闻教堂之歌舞而中止，所以来城剧院于五月芬斯脱节前后，特排日连演第一、第二之两本。我在来城三年，每年届期必往观。

我于讲堂上既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讲〈演〉，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知不觉的渐集中心

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重于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德国学者所著美学的书甚多，而我所最喜读的，为栗丕斯（T. Lipps）的《造形美术的根本义》（Grnndlage der Bildende Kunst），因为他所说明的感入主义，是我所认为美学上较合于我意之一说，而他的文笔简明流利，引起我屡读不厌的兴趣。

那时候冯德一派的学者摩曼教授（Meumann），适也在这大学。他是应用心理学的实验法于教育学及美学。所著《实验教育学讲义》，是在瑞士大学的讲稿。又著《现代美学》及《实验美学》两书，虽篇幅不多，而门径分明。我想照他的方法，在美学上做一点实验的工作。于是取黑色的硬纸，剪成圆圈，又匀截为五片，请人摆成认为最美的形式。又把黑色硬纸剪成各种几何形，请人随意选取，列为认为最美的形式。此等形式，我都用白纸双钩而存之，并注明这个人的年龄与地位，将俟搜罗较富后，比较统计，求得普通点与特殊点，以推求原始美术的公例。但试验不及百人，归国期迫，后来竟未能继续工作。

我在来比锡三年，暑假中常出去旅行。德国境内，曾到过特莱斯顿（Dresden）、明兴（Munchen）、野拿（Jana）、都绥多弗（Düsserdorf）等城市。德国境外，仅到过瑞士。往瑞士时，我本欲直向卢舍安（Lucean），但于旅行指南中，见百舍尔（Basel）博物馆目录中，有博克令（Böcklin）图画，遂先于百舍尔下车，留两日，畅观博氏画二十余幅，为生平快事之一。博氏之画，其用意常含有神秘性，而设色则以沉着与明快相对照，我笃好之。

在文明史研究中，与但采尔（Teodos Wilherm Danzel）相识。但氏汉堡人，面微黄，颇心折东方文化，治民族学，其毕业论文之题曰《象形字》，其中中国象形

字一节，我代为选译。我又因但氏而识其妹婿野该尔氏（George Yäger），野氏亦汉堡人，任中学教员，好文学。辛亥九月间，野氏在维坎斯多弗（Wickersdorf）之一新式中学任教员，邀我往游。此校重在启发学生，使能自动的研求。于训育特别注重。午、晚餐师生共聚一堂，由一人读世界名人格言一则，以代宗教中之祈祷；每星期至少演奏音乐一次；学生得在校中约所喜之男女同学开茶话会。我住此校方一星期，正阳历十月十日左右，忽见德国报纸载武昌起义消息；野氏亦留心中国时事者，询我："中国革命军，有成功希望否？"我说："可成，因运动已很久了。"我又接吴君稚晖一函（自巴黎来，抑自伦敦来，现在记不清楚了"，亦以武昌起义事见告，并谓"大家应竭力促成此举"。我于是往柏林。

到柏林后，见留德同学每日聚集同学会中，竞购晨、午、晚各报，探取中国革命消息，互相谈；或临时集款发电于某某等省当局，促其响应。同学刘君庆恩最兴奋，会中旧有小黄龙旗两面，刘君折而弃之。有一日，使馆中一职员项君来，笑而言："现在革命党势孤了，袁宫保出来了！"刘君大怒，批其颊；旁人婉劝项君去。

我在柏林住了十余日，就从西伯利亚回国，同行者有俞君省羞及其夫人。于□月□日到上海。

是时，黄君克强已到上海。上海名流，如张季直、汤蛰仙、赵竹君、章太炎诸君，正代表江浙诸省，拟推举大元帅，多数拟推黎宋卿君，而陈英士君则倾向黄克强君。我权衡两者间，因黎君颇有与袁世凯部下妥协之倾向，举黎后，恐于革命军的进行有障碍，乃于推举之前一夜，访汤、章诸君，告以利害，诸君皆勉强从我说，汤君并约我到会。翌日，在会场，汤君特声明请我代表而先退席。及投票，黄君占多数，乃定为大元帅。章君垂涕而道："黎

公首义有功，虽不能任大元帅，但不可不以副元帅位置之。”全体赞同，于是定黎为副元帅。

中山先生自海外归来，到上海，诸名流当然欢迎，但彼等所最希望的，是孙先生借到了一笔很大的外债，可以充军费。不意孙先生到后，他们问及款项，孙先生说：“我带了精神来，并没有带什么款来！”他们不了解“革命精神”为何物的，当然很失望了。

那时候，有十七省代表十七人齐集南京，将开会公举中华民国总统；这被举的当然是孙先生了。但是浙军的将领，因与光复会有关系，而又自恃是攻南京有功的，对于选举问题颇有异议。章君太炎时在黄浦滩某号屋中，挂了一个统一党的招牌，有其弟子十余人左右之，其一即汪君旭东，并邀我寓其中。章君对于浙军将领的主张，甚注意，特属我往南京，与各省代表接洽，劝展缓选举。我到南京后，晤几位代表，除湖南代表谭君石屏外，都主张举孙先生，也不赞成展缓的办法。我归而报告，章君语我：“如孙果被举，组织政府时，我浙人最好不加入。”我那时候空空洞洞的漫应之。后来孙先生果以十六票被举为总统（湖南代表独举黄兴），欲组织临时政府，命薛仙舟先生来招我，将以任教育总长，我力辞之；薛先生说：此次组阁，除君与王君亮畴外，各部均以名流任总长，而同盟会老同志居次长的地位；但诸名流尚观望不前，君等万不可推却。我今日还须约陈君兰生同去，备任财长，如君不去，陈更无望了。”我不得已而允之，即回寓取行装，章君引浙人不入阁之约以相难，扣我行装，我告以不能不一去，去而面辞，如得当，无问题；否则我当于报纸上宣布我背约之罪以谢君。章君之诸弟子，亦劝其师勿固执，乃容我往。我到南京后，见孙先生，面辞，不见许，乃拟一广告稿，寄章君之弟子，请其呈师订正，备发表。未几，

其弟子来一函，说章君不愿发表云。

我那时候，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据清季学部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宗旨而加以修正，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前三项与尚武、尚实、尚公相等；而第四、第五两项却完全不同。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所以删去。至提出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以打破二千年来墨守孔学的旧习。提出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顾忌，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对于公民道德的纲领，揭法国革命时代所标举的自由、平等、友爱三项，以古义证明说："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

我既任教育总长，次长为景君大昭，乃邀鍾宪鬯先生及蒋竹庄、王小徐、周豫才、许季茀，胡诗庐诸君同为筹备员，从事于本部组织、学制改革、学校登记等事。景君未尝推举一人，亦不问部事，惟有时与我谈话而已，盖景君是一不羁的文学家，又热心党务，对于簿书期会等事，殊不耐烦。但是我到北京后，景君代理，景君忽开数十人名单，加以参事、司长、科长、秘书等名义，而请总统府发委任状，除旧有各员外，大抵皆文学家而非教育家。在景君之意，为彼等先占一地位，庶北迁时不致见遗。但蒋、鍾诸君深不以为然，我归南京，联名辞职。乃开一会议，我声明次长此举，固是美意，但不为其他教育行政的专家留若干地位，使继任的长官为难。又多人既被委任，而或为后任长官所淘汰，则反使本人难堪，不如乘此尚未

正式发表之时，取消他。多数赞同我说，景君亦不反对，遂将几十张委任状送还总统府。闻秘书长胡君汉民深怪我此等举动，对于本党老同志不肯特别提拔。故政府北迁时，有人请胡君介绍，入教育部，胡君对以“别部则可，教育部不能”。我那时候只有能者在职的一个念头，竟毫没有顾到老同志的缺望，到正式组织时，部员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所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却都没有注意到党派的关系。

孙先生将被举为总统的时候，诸名流的观察，袁世凯实有推翻满洲政府的力量，然即使赞同共和政体，亦非自任总统不可。若南京举孙先生为总统，袁成失望，以武力压迫革军，革军或不免失败，故要求孙先生表示“与人为善”之乐，于被举后声明，若袁氏果能推翻清廷，我即让位，而推袁氏为总统之唯一候补者。孙先生赞同而施行之，故清廷退位后，孙先生辞临时总统，而推袁世凯，袁世凯遂被举为总统。但孙先生及同盟会同志以为，袁世凯既被举为总统，应来南京就职，表示接受革命政府之系统，而避免清帝禅位之嫌，叠电催促，殊无来意，于是有派员之举，而所派者是我。

我的朋友说：这是一种“倒霉的差使，以辞去为是。”我以为我不去，总须有人去，畏难推诿，殊不成话，乃决意北行。此行同去者，有汪精卫、宋渔父、钮惕生、唐少川及其余诸君，凡三十余人，包定招商局“新裕”轮船。船中尽是同志，而且对时局都是乐观派，指天画地，无所不谈。我还能记得的是迁都问题，这是在南京各报已辩得甚嚣尘上的了。大约同盟会同志主张南迁的多，但在船中谈到这个问题，宋君渔父独主张不迁，最大的理由是南迁以后，恐不能控制蒙古。他的不苟同的精神，我也觉得可

佩服的。船驶至天津左近，忽遇雾，停泊数日，在船中更多余暇，组织了两个会：一是六不会，一是社会改良会。

六不会是从进德会改造的。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诸君，以革命后旧同志或均将由野而朝，不免有染着官场习气的；又革命党既改成政党，则亦难保无官吏议员之竞争；欲提倡一种清净而恬淡的美德，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为基本条件（已娶之妾听之），凡入会的均当恪守，进一步则有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不作官吏、不作议员六〔五〕条，如不能全守，可先选几条守之。同船的人，除汪君外，大都抱改革政治的希望，宋居尤认政治为生命，所以提议删去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条，而名此通俗化之进德会为六不会，以别于原有之进德会。

社会改良会是唐君少川所发起，而各人都有提议的。对于家庭市乡、礼仪习尚、慈善迷信，或应排斥，或应改良，或应增设，都有所论列。删去重复，忆有五十余条。同人签名发起，共三十三人，首列的是我的姓名蔡元培，最后的是江苏蔡培，亦是凑巧之一端。此会条文及发起人名单，忆曾付印，但今已无从寻检了。

到北京时，在前门欢迎的，当然非常之多，有官吏，有商人，有学生，而我所特别注意的，乃是龙泉孤儿院的学生，特与其最前的一位握手，而且演说几句。后来，我要离北京时，特偕同人往孤儿院参观一回，并于所携公款中提出千元捐助该院，这也是此行的一种特殊纪念。

袁世凯方面，以梅酢胡同之法政学堂校舍为招待所，大约是一所停办的学校，所以不见有一点学校的设备。除唐君自有住宅、汪君住在他处外，同行的人都住在招待所。与袁见面，谈南行就职事，渠表示愿行，说肯想一脱离这个臭虫窝〈的方法〉，惟军队须有人弹压，如芝泉（段祺瑞）肯负责，我即束装。但袁派要人见面的，都力

持袁不能南下之说。我的任务是迎袁，不能不力说南下之无害，相持了数日，□日晚餐后，我在钮君室闲谈，适汪君亦来，正谈笑间，忽闻拍拍的声音，有说是爆竹的声音，但钮君惕生说："我是军人，听得出是排枪声，恐有变。"用电话到陆军部问，说的是第三师兵变。大门口亦有枪声，有人来报告，卫兵已不知去向了。于是大家主张由后面出去。有一人知道后墙对面，是一个青年会西人的住宅，先与接洽借住一夜。我等十余人觅后门不得，乃从小屋上逾墙而出，在西人客座中兀坐至翌晨，始改寓六国饭店。

第二日，孙慕韩最先来慰问，说："昨夜我正在总统处，总统闻兵变，即传令须切实保护梅酢胡同，并说：'人家不带一兵，袒然而来，我们不能保护，怎样对得住？'后来变兵闹得凶起来，左右请总统进地下密室，总统初不允，我等苦劝之，彼遂进密室，而我亦暂避六国饭店来了。"这一番话是否靠得住，也就无从证明。

闻变兵口号："袁宫保自己要到南京做总统去，不要我们了！我们还是各人抢一点，回老家去！"所以这一夜没有杀人放火，就是抢劫；抢到的就往乡间逃。而兵变的夜间，统兵的将领，不敢派未变之兵出去弹压。第二日，始派兵巡查，变兵渐渐绝迹了。而直隶等省，有几处闻风而起，也闹着兵变。

于是袁派的更振振有词了：袁总统尚未离北京，已经闹到这个样子，若真离去，恐酿大乱；这些话是人人的口头禅了。我们到北京迎袁的人，当然不敢擅主，请示于孙先生，往返磋商，结果准袁世凯在北京就总统职，在□月□□日举行就职典礼。我们变相的使节就此完毕，而回南京。

当我们将离北京以前，唐君少川商拟一内阁名单，得

袁同意，仍以我为教育总长，我力辞之，乃易为范君静生。到南京后，范君闻此消息，忽出京，不知所之；又有人散布谣言，谓以范易察，乃因蔡迎袁无效而受惩。以此种种原因，孙先生及唐君等定要我继续任职。我托人询范君以可否屈任次长，渠慨然愿任，我于是仍为教育总长之候补者，提出于参议院而通过。

那时候唐君所提出之阁员名单，除外交陆君子欣、陆军段君芝泉、内政赵君智庵、财政熊君秉三、交通施君植之外，司法王君亮畴、农林宋君渔父、工商陈君英士与我皆同盟会会员，唐君少川亦已入会，会员与非会员各得五人。到北京组织政府，陆君尚未回国，外交由唐君兼任，陈君英士不到，由次长王君儒堂代理。施君因常受同盟会会员不得意者之诘责，谓："汝有何功于革命而据此高位?"表示消息〔极〕，不常到国务会议。国务会议中，显然分为两派，袁派要用总统制，同盟会派要用责任内阁制，袁则用责任内阁之名而行总统制之实，军政、财政及任免名单，皆由总统府决定而后交政府发表。熊君、赵君常常不参加会议，袁派惟段君一人来敷衍，事事以迎合总统为要点。我那时尚是书生，常与争执，其实皆无关紧要的支节问题。两方所集中致力的只有借款，一方由熊君出面，一方由唐君出面，各以捷足先得为快，然皆不成。有一次，熊君借成一小款，用英文合同送国务会议求承认，唐君与二王君指出有一二字用得不妥，然为总统所已决之办法，亦无法反对。

于是宋君忍不住了，以为政府已成立若干日，而尚无大政方针发表，殊不成话，愿任起草，同事当然赞成，草定后，在会议中传观一次，宋君亦有说明，都表示同意；盖宋君为同盟会中惟一之政治家，与进步党之汤济武、林宗孟诸议员有交情，提出后可望通过。但尔时惟一之难关

是财政，故文中亦以财政为重要部分，虽用总理名义提出议会，而临时非财长加以说明不可；于是知照议会，定期全体阁员到会，有重要报告。在熊君方面，习惯于总统独断独行之方便，且对于农林总长之越俎代庖，尤为不快，于是在出席议会之前一日晚间，突借黄君克强为国民捐问题攻讦财长之电，驰函辞职，派员慰留，避匿不见。第二日出席议会，不能提出政策，仅报告政府困难情形，全体议员都有点诧异。有一进步党议员就责问总理，谓闻总理曾借到比款一千万，用途如何？何以不能报告？……这真是亡国总理。唐君愤愤，几不能置答。宋君要求代为说明，而议员又不许，遂空空洞洞的退席。

唐君已洞悉袁氏对于己之不信任，欲借议会中“亡国总理”之丑诋而辞职。各方面都慰留他，他亦无法决去，又敷衍了好几日。我也忍不住了，有一夜，我约了唐、宋、王、王四居密谈。我说目前情形，政府中显分两派，互相牵掣，无一事可以进行。若欲排斥袁派，使吾党同志握有实权，量力审势，决无希望。不如我辈尽行退出，使袁派组成“清一色”的政府，免使吾辈为人分谤，同归于尽。尔时宋君不甚以为然，但亦没有较善的办法可以打破僵局的。于是决定，俟有适当机会时，吾党同志全体去职。

唐君担任组阁时，孙先生方面本也有几种条件：一是唐君必先加入同盟会，一是广东都督胡汉民、江西都督李烈钧必须维持外，须以王铁珊为直隶都督等等。在征袁同意时，袁亦含糊答应，唐君以为不成问题。不意唐君进同盟会一举，既引起袁派老同事的排挤，而直隶都督问题，又迟迟不肯发表；促之，则袁派用“釜底抽薪”法，劝王君铁珊离京，表示不任直督之决心；王君见风使帆，飘然而去。唐君一方面惧受吾党之诘责；一方面窥见袁氏对于

同盟会、对于唐君个人已表示不再敷衍之端倪。而且他与袁共事多年，知道袁对于一个人有疑忌了，不管有交情无交情，必置之死地而后快。若公然辞职，危险殊甚。乃于□月□□日夜间与一西妇同车，赴车站，乘火车往天津。到天津寓所后，始电请辞职。照例慰留，唐君决不肯回，而陆君子欣适已回国，乃由陆君以外交总长代理总理，国务会议乃照常开会。我与二王及宋君亦联带辞职，袁派认为“拆台”，竭力挽留，梁君燕孙奔走最勤，宋君颇不以我等显然反袁为然。然我因有□日夜间之决议，持之甚坚，卒于同时去职。

我在国务院中做了几个月尸位的阁员，然在教育部方面，因范君静生及其他诸同事的相助，颇有可以记录的事情。

学部旧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两司，我为提倡补习教育、民众教育起见，于教育部中增设社会教育司，以防致牵涉孔教，特请研究宗教问题之夏君穗卿任司长。不意我与范君离部以后，汪君伯棠代理教育总长时，夏君竟提议社会教育有提倡社会主义的嫌疑，须改名云云，我闻之甚为诧异。

我与范君常持相对的循环论。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

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又鉴于高等师范学校之科学程度太低，规定逐渐停办；而中学师资，以大学毕业生再修教育学的充之（仿德国制）。又以国立大学太少，规定于北京外，再在南京、汉口、成都、广州，各设大学一所。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见一个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这个缺点，直到后来各省竞设大学时，才算补救过来。

清季的学制，于大学上有一通儒院，为大学毕业生研究之所。我于《大学令》中改名为大学院，即在大学中分设各种研究所，并规定大学高级生必须入所研究，俟所研究问题解决后，始能毕业（仿德国大学制），但是各大学未易实行。北京大学曾设一国学研究所，清华、交通等大学继之，最近始由教育部规定各国立大学所应设之科目。

清季学制，大学中仿各国神学科的例，于文科外，又设经科。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书》、三礼、《大戴记》、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

我认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两科。所以于《大学令》中规定：设法、商等科而不设文科者，不得为大学；设医、工、农等科而不设理科者，亦不得为大学。但此制未曾实行。而我于任北大校长时，又觉得文理二科之划分甚为勉强；一则科学中如地理、心理等等，兼涉文理；二则习文科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所以北大的编制，但分十四系，废止文、理、法等科别。

我长教育部的时候，兰普来西氏曾来一函，请教育部派〈学〉生二人，往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相助，我已于

部中规定公费额二名，备择人派往，人选未定，而我去职。南归后，预料政治上的纠纷方兴未艾，非我辈书生所能挽救，不如仍往德国求学；适顾君孟余亦有此意；我遂函商范君静生，告以与顾君同往德国之计划，请以前所规定之公费额二名，分给我与顾君二人，范君复函批准。我遂于□月□□日偕黄夫人及威廉、柏龄启行，顾君亦偕其夫人同行。记得所乘之船为奥国的“Africa”。偕妇孺作远游，尚是第一次，幸有顾君及顾夫人助为照料，得减除许多困难。

到德国后，仍住来比锡。兰普来西要求我供给中国文明史材料，我允之。拟由我起中文稿，由顾君译成德文。但顾君因肺疾，与来比锡之空气不相宜，医院的设备亦不完，不得已而迁柏林。译事用通讯，亦无妨。

国内忽有宋君渔父被刺案，孙先生力主与袁世凯决裂，招我等回国，陈君英士自上海来电催促，遂与汪君精卫约期，由西伯利亚回国。到大连后，从弟国亲来接。国亲于同盟会初成立的时候，在本党尽力不少；留学日本以后，渐接近于稳健一派，此次来接，实欲阻我入国。由国亲观察，国民党（同盟会已改组为国民党）恐将为袁世凯所消灭，不如不卷入旋涡为妙。但我既有回国的决心，万不能到大连而折回，遂由大连到上海。

宋君之所以遇害，因同盟会改组国民党以后，吸收了许多进步党的人物，在议会中占绝对多数，宋君挟这些势力要挟袁世凯，要求袁于被选为总统后，必依照宋君所计划的责任内阁。袁不能从。宋君改而运动黎君宋卿，预备以黎易袁。这就是袁派所以暗杀宋君的原因。宋君遇害以后，由凶手武士英而求出应桂馨，又由应所保留的电报而求出洪述祖、赵秉钧以至袁世凯，公认为无疑的铁案了。

孙先生正游日本，闻宋案，即回国，力主兴师讨袁。

然国民党所能调动的军队，除江西、广东两省外，均归黄君克强节制，黄君知实力不足，迟疑不敢发难。黄君部下，以第八师为最精锐，其两旅长，一为福建王君用功，一为湖南黄君开第，均为黄君克强至好，而师长则为冯国璋之女婿，借作保护色，使不为袁派所忌。其中马队、炮队等设备，尚未完全，正拟逐渐增置，以为南方之模范师，不欲轻动。其他各师，亦均视第八师之动静为标准。故主战派以运动第八师为第一着。适李君协和自江西来，亦主战，主往南京运动第八师，以我与王君在爱国学社中相识，约同去。到达后，王君方卧病，在床边与之熟商，王君以为毫无把握，遂废然而反。是时赵君竹君约我与汪君精卫往谈，称北京方面愿与黄君筹妥协的办法，于是我与汪君日往来于黄赵之间，磋商条件。有一日，忽得南京电，第八师决动员，招汪君与我往，起通电草。我等两人遂同往，盖第八师下级军官均受主战派运动，跃跃欲试，旅长无法阻止也。于是战端起。不久而国民军的军队在南京、江西、广东各地者均失败。

国民党军事失败，要人他去。上海尚有许多反袁的人，分省推代表，运动岑君西林出来，那时候推我为浙江代表之一，蒋观云、章太炎诸君都在场，蒋君最为起劲，然终无何等结果。

□月间，我又拟出国了，本欲仍往德国，适吴君稚晖将往法国，约我同往，我于是携了眷属，乘日本邮船三等舱行。到马赛后，我等登陆，而吴君则乘原船往英国。我等自马赛到巴黎，有华法教育会李君石曾等招待，暂寓于巴黎附近之科隆布镇华法教育会办事处，午、晚餐则包与豆腐公司。

豆腐公司为李君石曾所创立。李君提创素食，以豆类食品与乳类有同等滋养，故募集资本，设公司于科隆布，

用小机器制豆乳及豆腐等出售。然法国人吃不惯，销路不好。欧战期间，以豆腐干及豆制饼干充军队干粮，以绿豆芽充生菜，销售较多，然终不能持久，于□□年停办。

我那时候也是素食，这是民元前二年在来比锡时受李君感化的。同学齐君寿山与李君有世谊（齐君之父，即李君之师），应李君之招而游巴黎，回柏林后，告我等：李君提倡素食甚力，常说动物于死时全体强直，发一种毒质，食者必受其害。我闻此，适［柏］来比锡有素食馆数处，往试食，并得几本提倡素食之书，其所言有三益：一、卫生，如李君所言；二、戒杀，不肉食则屠杀渔猎等业皆取消，能因不忍杀动物之心，而增进不忍杀人之心，战争可免。三、节省，一方牧场，能以所畜牛羊等供一人一岁之食者，若改艺蔬谷，可供给十人以上。李君不但讲卫生，而且为尽力于和平运动的一人，故有此主张。我亦深信之，素食十二年，至民元〔国〕十年，在北京，因足疾，被医生劝告而又肉食，深愧不如李君的坚定。

我等在科隆布住了几个月，后来因在巴黎左近寻得一家可以分租而包饭的房子。那时候，大的男孩子无忌往嫩夷进一个法国学堂去了，我偕黄夫人携一个九岁的女孩子威廉、七岁的男孩子柏龄住在那里。那时候同住的还有一位瑞士人，一位英国人。忽然奥塞的交涉决裂了，瑞士人于午餐时说："不得了，已经宣战了！我立刻要回国，加入队伍。"英国人说："和平长久了，有了战争，可以把污浊的渣滓扫荡一回。"我们的房东是个法兰西银行送现款的工役，平日间穿了制服，戴了制帽，拿了皮夹，怀了手枪，很得意的样子。此次被征入伍了，女房东哭得很伤心。房东去了两三日，来一信，说是疲乏得很，军队中所发的皮靴太宽大了，走路很费劲。

李君石曾在蒙泰祺租了房子，住他的家眷。我们同汪

君精卫一帮人，也常常到那里去开会的。到风声紧急的时候，法国政府由巴黎迁往巴多，留法俭学会的学生，留在巴黎近郊的也觉不稳当了。李君把自住的房子腾出了，给学生住，而自己及家眷迁到乡间去，并劝我们同去，邀我们到蒙泰祺会齐，然后同往乡间□村暂住。此地全是旧式农家的样子，道路上常有牛马粪等。李君把最好的一间楼房给我们。食物则牛乳、面包、乳油、鸡蛋等，应有尽有。最不便的是厕所，设在后园中，上装木架子，可容两人并坐。我的最小的孩子柏龄，承女房东特许，可在房间的铅桶上排泄，余人非往园中不可。李君备竹戠一支，一面写"有人在此"等字，一面空白，挂在园门上，以便进出的人随时可做记号。但有些人不能注意于此，李太太登厕时，常恐有别一个男人进去，占其旁位，乃请李君陪往并坐。这真是那时候一种特殊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住了不久，就迁到相近的一个小镇圣多耐去。这地方出赁的房子比较多一点，我们与李君等就分住了。我们住的是一家帽店的楼上，房东是一位半老的寡妇，同一位二十余岁的女儿。女儿能制帽饰，曾与一中国学生为友，该学生回国后，不通消息，托我们代为探听。

我们住圣多耐不久，又迁都鲁士。都鲁士是法国南方的一都会，有大学，记得李君圣章、谭君仲逵、王君馥清均曾在该大学肄业。小孩子们都进学校，我同黄夫人也学一点法语。

民国四年的暑假，李君发起，大家往南方海浴场罗埃上（Royan）避暑。我们所住的是一所别墅，房东愿全年出租，李君劝我们留住，所以暑假后，李君等到别处去了，而我们一家还住在这里。

我们在这个时间，学法语，常常是欧思东君教的。欧君是比国人，长于音乐，欲改五线谱为三线谱，常素食，

反对宗教，主张恋爱自由，与李君交契多年。彼教我等法文，不用读本及文法，选一本文学书，选出几节，我们抄出来，有不解的辞句记出来，请其解释，有时候讲讲文学史，所以我们的法语学得不切实。

那时候李君所招呼的学生有两种：一种是留法俭学会的学生，每年家中还能备国币六百元的学费，由华法教育会替他安排，用得很省。又一种是勤工俭学会的学生，是只备赴法川资及一年旅费，到法后，第一年练习法语，第二年以后，就可进工厂作工，自给有余，晚间还可就学。欧战开始以后，我国亦为参战国之一，但没有军队可以相助，于是派遣工人，助后方工作，到法国的也有数千人。李君为使这些工人便于工余就学起见，特编一种成人教育的教科书。派给我编的，是关于行为方面与关于美术方面的。关于行为方面的，李君还出了几个举例的题目给我，是偏重于辨别疑似的，如理信与迷信，俭约与吝啬之类，我所编的都照此式。其关于美术的，则有建筑、图书〔画〕、音乐等篇。后来印入《蔡孑民言行录》中，称为《华工学校讲义》。

我在留德、留法时期，尝抽空编书，所编如《中国伦理学史》、《哲学概说〔论〕》等，均售稿于商务印书馆。惟《石头记索隐》，用租赁版权办法。

《石头记索隐》，是我读陈康祺《燕下乡胜谈〔录〕》，见有其师徐时栋（?）之说，以《石头记》之妙玉与薛宝钗为姜湛园、高江村之影子，因而依例推求，考得林黛玉影朱竹垞，探春影徐健庵，惜春影严藕渔（?），王熙凤影余国柱，宝玉影允礽，爱红就是爱汉化，均有事实可以比附。最难得的是第□□回之“刚去了巡山太岁，又来了探海夜叉”一谣，从“去了余秦桧，来了徐严嵩”化出来；第□□回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东海少了白

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之谣，从“四方宝物归东海，万国金珠贡澹人”化出来。所以我自信这本索隐，决不是牵强附会的。

《中国伦理学史》，虽仍用日本远藤隆吉氏《支那思想史》之三时期分叙法，叙述的材料，亦多取给于此书，而详其所略、略其所详的却不少。其中如六朝人的人生观与清代黄梨洲、戴东原、俞理初三氏之编入，为我最注意之点。

《哲学概论》，以几本德国哲学家的门径书为蓝本，而据韩非子解老中道与理之界说，说哲学在吾国本应名为道学。又说明古代只有宗教，凡后来哲学、科学之任务，皆包于其中。其后哲学独立，科学尚包于哲学之中，而宗教之范围，特别减缩。及科学次第独立，而哲学的范围，亦渐渐减缩。又说：“哲学有科学的与超科学的之别。每一种科学的，如数理哲学之类是；有包括自然科学的，如自然哲学是；有包含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如斯宾塞尔综合哲学原理、孔德实证哲学是。至于超科学的哲学，则所谓形而上学者是。”又关于美学一方面，特别注意，亦受德国学派的影响。

民国五年，帝政取消，袁世凯死，范君静生任教育部〈总〉长，电促我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我遂偕眷属于冬间回国。到上海后，有多数友人，劝不可就职，说北大太腐败，恐整顿不了，反把自己的名誉毁掉了。也有少数劝驾的，说腐败的总要有人整顿，不妨试一试。我从少数友人的劝，往北京。

北京大学，在清季本名京师大学堂，分设仕学、师范等馆，所收的学生，都是京官。后来虽逐渐演变，而官僚的习气不能洗尽。学生对于专任的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独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

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亦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所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讲堂以外，又没有高尚的娱乐与自动的组织，遂不得不于学校以外，竞为不正当的消遣，这就是著名腐败的总因。我于第一次对学生演说时，即揭破“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云云。于是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求学问的兴会；提倡进德会，以挽奔竞及游荡的旧习；助成体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以供正当的消遣；助成消费公社、学生银行、校役夜班、平民学校、平民讲演团与《新潮》等杂志，以发扬学生自动的精神，养成服务社会的能力。

我到北大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四科及预科。设备都不完全，而又无增加经费的希望，于是提议，并工科于北洋大学之工科，而以所省经费供其他各科增加设备之需要，为教育部及北洋大学所赞同而实行之。

教学上的整顿，自文科始。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润章诸君来任教授后，内容始以渐充实。北大旧日的法科本最离奇，因本国尚无成文之公私法，乃讲外国法，分为三组：一曰德日法，习德文、日文的听讲；二曰英国法，习英文的听讲；三曰法国法，习法文的听讲。我深不以为然，主张授比较法。而那时教员中，能授比较法的，只有王亮畴、罗钧任二君，二君均服务司法部，只能任讲师，不能任教授，所以通盘改革，甚为不易。直到王雪艇、周鲠生诸君来任教授后，始

组成正式的法科，而学生亦渐去猎官的陋见，引起求学的兴会。

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亦列为选科。

那时候，林君琴南来一函，对于北大一部分教员表示不满。我复函驳之，今抄来往两函于下：

八年四五月间，因巴黎和约允许日本得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舆论主张我国全权代表不签字于该约；而政府中亲日派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不赞成。五月四日，北京大学学生联合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为此问题示威游行，到曹汝霖宅前，破门而入，适见有火油一箱，遂试纵火。偶然有一人出，群以为即汝霖，攒殴之，后始知为宗祥。未几，巡警至，大捕学生，学生被捕的数十人。我与各校长往警察总监处具保，始释放。但学生以目的未达，仍派队分途演讲，巡警又捕学生。而未被捕的学生仍四出演讲，且人数日益加多。巡警捕拘不已，拘留所不能容，乃以北大之第三院在北河沿者为临时拘留所。拘学生无数，于是各地方均设学生联合会，各校均罢课。而留法学生也组织敢死队，包围我国的全权代表，要求不签字于和约。政府亦知众怒难犯，不能不让步，于是不签字的要求，终于达到了。但是学生尚有一种要求，是罢免曹、陆、章。政府迟迟不肯发表；学生仍罢课，仍演讲，北平〔京〕、天津、上海等工商界也为学生所感动，而继起要

求，如政府再不执行，将有罢市、罢工之举。于是罢免曹、陆、章之令乃下。这就是五四运动的大概。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政府的办理不善，深可慨叹；一方面是学生的热诚与勇敢，很可佩服。有人疑从此以后，学生将遇事生风，不复用功了，而结果乃与之相反。盖学生在此次运动中，得了两种经验：一是进行的时候，遇着艰难，非思想较高、学问较深的同学，不能解决，于是人人感力学的必要。二是专靠学生运动，政府还是不怕，直到工商界加入，而学生所要求的，始能完全做到。觉得为救国起见，非启发群众不可。所以五四以后，学生一方面加紧用功；一方面各以课余办平民夜校、星期演讲及刊布通俗刊物；这真是五四运动的收获。

在我呢，居校长的地位，即使十二分赞助学生，而在校言校，不能不引咎辞职；所以于五日即递辞呈。八日，闻政府已允我辞职，别任马君其昶为校长。我深恐发表以后，学生有拒马之举，致涉把持地位之嫌疑，故于九日赴天津，广告于《晨报》称："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至〔止〕，迄可小休，我欲少休矣；北京大学校长，已正式辞去"等语，表示我之去京，实为平日苦于应接不暇之烦忙，而亟思休息也。

不意政府任命马君之事并未实现；而谋攫取北大校长之地位的是胡君仁源。胡君曾为南洋公学特班生，有哲学思想，文笔工雅，我甚器重之。后来留学英国，习工科，以性近文哲的学生肯习工艺，尤为难得。民国五年，任北大工科学长，并代理校长。余到北大后，仍请任工科学长，而彼不愿，遂改聘他人。以曾经代理校长的人来任校长，资格恰好。但推戴胡君的人，手段太不高明。他们一方面运动少数北大学生，欢迎胡君；一方又发表所谓燃犀录，捏造故事，丑诋我及沈尹默、夏浮筠诸君，于是激起

大多数北大学生的公愤，公言拒胡，并查明少数迎胡之同学而裁制之；胡君固不敢来，而政府亦不愿再任他人，乃徇北大教职员及学生之请而留我。

我自出京后，寓天津数日，即赴杭州，寓从弟国亲家，后又借寓西湖杨庄，满拟于读书之暇，徜徉湖山。奈北大纠纷未已，代表叠来，函电纷至，非迫我〈回〉京不可。经多次磋商，乃于七月十四日，与蒋君梦麟面商，请其代表到校办事。蒋君于十六日赴北京。又经函电商讨，我直至九月十日启行，十二日到北京，重进北大。

我回北大后，于教职员及学生欢迎会中声明，略谓：五月间为国权问题而运动，牺牲学业，尚算值得。后来为校长问题，又纷扰了一两个月，实为可惜。德国的大学，每年换一校长，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的教授轮值，从来不生问题。我们鉴于此次校长问题的纠纷，也要做到教授治校的方式。拟设评议会，由各系教授推出评议员组织之。”这就是北大评议会的缘起。

九年，西历一九二〇年，我五十四岁。

暑假中，湖南学者周鲠生、杨端六诸君乘杜威留京、罗素新自英来的机会，发起长沙讲演会；北京各校著名的教授都被邀，我也参与。那时谭君组庵任湖南省长，招待我们。我讲了四次，都是关乎美学的，我曾把演〈说〉稿整理一过，载在《北京大学日刊》。

这时候，张作霖、曹岷〔锟〕等深不以我为然，尤对于北大男女同学一点，引为口实。李君石曾为缓和此种摩擦起见，运动政府，派我往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研究机关状况。适罗君钧任正由政府派往欧美考察司法情形，遂约定同行。遂于十一月下旬赴上海，乘一法国邮船于十二月下旬到法国。

十年，西历一九二一年，我五十五岁。

一月，我方从法国到瑞士日内瓦，接蒋梦麟、谭仲逵二君电，痛悉黄夫人仲玉已于一月一日去世，哀哉！溯我从湖南回北京的时候，夫人已病，延法国医生诊疗，渐瘥，并为我整理行装。我行后，在船中曾以无线电询病状，亦得“渐瘥”的复电，不意到欧不数日而得此恶耗，我心甚痛，作祭文一首。

这一年的一月十八日赴法国，往来巴黎、里昂间。二月十二日到比利时。十六日又到法国。三月十三日到德国。二十八日到奥国。四月一日到匈牙利。五日复到瑞士。十日复到法国。十三日往意大利。二十四日复到法国。二十九日到荷兰。五月三日到英国。十七日复到法国。六月一日到美国。十日到加拿大。十四日又到美国。三十日上船。八月六日到檀香山，受教育部委托，参加太平洋教育［协］会〈议〉。二十九日上船，九月九日到日本。十四日到上海。十八日回北京。

我在意大利时，八〔四〕月十九日，得里昂转来宋汉章君电，知从弟国亲去世。国亲比我小十四岁，甚有才干；我的区动革命，推行教育，得他的助力很多。曾在司法界服务，现已入金融界，前途甚有希望；竟不永年，可惜可哀！

（1940年2月蔡元培手稿）

蔡元培生平大事年表

1868 年 1 月 11 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城内笔飞弄 9 号。1 岁。

1872 年 5 岁。入家塾，读《百家姓》、《千字文》及《神童诗》等。

1877 年 10 岁。父宝煜病逝。无力再延聘塾师，下半年起，附学于他处。

1879 年 12 岁。受业于同县秀才王懋修（子庄），学作八股文。受王影响，20 岁前崇拜宋儒。

1883 年 16 岁。考中秀才后不再往王懋修处受业，而自由读书；向叔父铭恩借阅各种书。

1884 年 17 岁。17 岁至 18 岁，在当地设馆教书。

1886 年 19 岁。被邀至徐树兰家“古越藏书楼”校订所刻图书。自 1886 至 1889 年均在徐家读书校书，遂得以博览群书，学乃大进。母周氏病故。

1889 年 22 岁。中举人。和王昭结婚。

1890 年 23 岁。去北京应会试，告捷。

1892 年 25 岁。去北京应保和殿殿试，被取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

1894 年 27 岁。应散馆考试，授职翰林院编修。从本年起到 1898 年为止，开始涉猎译自外文的书报刊物。冬，充李慈铭京寓中塾师。李病逝，为其校勘《越缦堂日记》。

1895 年 28 岁。对中国《马关条约》表示悲愤。

1898 年 31 岁。开始考证《石头记》。感到清廷政治改革无望，携眷出京。冬，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

1899 年 32 岁。在中西学堂中支持新派，校董嘱抄“正人心”上谕，愤而辞职。

1900 年 33 岁。夫人王昭病逝。贴出征婚启事，主张男女婚姻，必须绝对平等。

1901 年 34 岁。任上海澄衷学堂代理监督。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与张元济等创办《外交报》于上海。与黄世振（仲玉）结婚。

1902 年 35 岁。与叶瀚（浩吾）、蒋智由（观云）等创办“中国教育会”，被举为事务长（会长）。被推为爱国学社总理。继蒋智由为爱国女学总理。编选《文变》一书。

1903 年 36 岁。参加张园演说、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去青岛。《苏报》案后回沪。办《俄事警闻》日报。

1904 年 37 岁。在《俄事警闻》上发表小说《新年梦》，主张人一律平等，没有君臣父子夫妇等名目。改《俄事警闻》为《警钟日报》。参加暗杀团。冬，把暗杀团扩大为光复会，任会长。

1905 年 38 岁。为邹容筹办葬事。学制炸弹。

1906 年 39 岁。迎接章炳麟出狱。秋，为出国去北京等候，被译学馆馆长章梫（一山）聘为教习。

1907 年 40 岁。去德国留学，在柏林学德语，兼任唐绍仪子侄之家庭教师。

1908 年 41 岁。秋，迁往莱比锡，进莱比锡大学听课及研究，到 1911 年为止。

1909 年 42 岁。著《中学修身教科书》，署名“蔡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0年 43岁。著《中国伦理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1年 44岁。辛亥革命发生，经西伯利亚回国。在上海，与黄兴、张謇、汤寿潜、章炳麟等参加筹建中华民国各省代表会议。到南京见孙中山。

1912年 45岁。1月3日，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聘周树人（鲁迅）、夏曾佑等为部员。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任迎袁世凯南下专使。3月13日发表《告全国文》，说明迎袁失败经过。任唐绍仪新内阁教育总长，不久，辞去总长。偕夫人黄仲玉、长女威廉、三子柏龄出国；冬，在莱比锡大学听课。

1913年 46岁。继续在莱比锡听讲。回国参加"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再赴欧洲。

1914年 47岁。在科隆布及巴黎居住，学法语，从事著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迁至法国西南的都鲁士及罗埃。

1915年 48岁。与李煜瀛（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编译《哲学大纲》一书。

1916年 49岁。任华法教育会会长（华方）、《旅欧杂志》半月刊主编。12月26日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 50岁。1月4日，到北京大学就任校长。2月，发表《文明之消化》。8月，在《新青年》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他在欧洲时所著《石头记索引》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18年 51岁。8月3日，为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11月16日，发表《劳工神圣》一题的演说。12月10日，为《北京大学月刊》撰发

刊词。

1919年 52岁。1月，为《国民杂志》撰序。3月21日，发表《复张谬子君函》。4月1日，发表《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5月3日，告诉学生，徐世昌政府命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签字，把德国在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五四运动爆发。5月5日、6日，去教育部及警察厅，要求释放被捕学生。5月9日，留"启事"一纸，辞去北大校长，经天津、上海到杭州。7月9日，五四运动取得胜利后，表示放弃辞职。9月20日，在北大全体学生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宣布组织评议会、各门教授会、行政会议及各种委员会，使学校内部组织完备，不致因校长更替而影响正常秩序。10月12日，在杜威博士六十生日晚餐会上发表演说。

1920年 53岁。1月15日，在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发表《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演说。4月1日，发表《洪水与猛兽》一文。暑期，北大正式招收女生。10月，新潮社编出《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一书。

1921年 54岁。1月，撰《祭亡妻黄仲玉》文。在欧美考察教育文化；冬，经日本回北京。在北京大学讲授《美学》。

1922年 55岁。3月，发表《教育独立议》。4月25日，与李大钊、陶行知、陶孟和、高一涵、胡适、张慰慈等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要求有一个"好人政府"。8月，为毛泽东同志所办《湖南自修大学》题词，并撰《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一文。发表《汉字改革说》，主张"直接

改用拉丁字母”。

1923 年 56 岁。因“金佛朗案”罗文干被捕，刊登“不再到校办事”启事，准备出国。7 月，与周峻（养浩）结婚，随即出国。在法国著《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一文，在《申报》出版的《最近五十年》巨册中发表。

1924 年 57 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从本年到次年，都在德国汉堡大学学习。

1925 年 58 岁。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逝世，撰挽联，撰祭孙中山文。

1926 年 59 岁。2 月，回国。5 月，在上海参加皖苏浙三省联合会，为响应国民军北代进行工作。

1927 年 60 岁。4 月 2 日，参加蒋介石操纵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工作，参与蒋介石“清党”运动。10 月 1 日，就任大学院院长。聘鲁迅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

1928 年 61 岁。4 月以后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

1929 年 62 岁。8 月，获准辞去监察院院长职。9 月，北京大学恢复校名，又被任命为校长。11 月，为《马克思传》作序。

1930 年 63 岁。9 月，被批准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名义。10 月，联名营救杨开慧。

1931 年 64 岁。6 月，作《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一文。

旧作《记绍兴志学会的三大志愿》，被收入《蔡元培言行录》。三大志愿是“一、愿天下无穷人。二、愿天下无病人。三、愿天下无恶人。”

1932年 65岁。2月1日，联名致电国际联盟，要求制止日军暴行。12月17日，与宋庆龄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宋为主席，蔡为副主席。31日，《申报》载蔡《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招待中外记者致词》。

1933年 66岁。3月14日，与陶行知、李公朴、陈望道、叶恭绰等发起马克思逝世50周年纪念会。发表《科学的社会主义概论》讲座第一讲。6月18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杏佛）被暗杀，为其主持丧葬。

1934年 67岁。1月1日，发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5月，参订《俞理初先生年谱》一书，作跋。

1935年 68岁。4月10日，发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5月，发表《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一文。10月，发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瞿秋白2月被捕，6月被害。蔡元培多方营救，与戴季陶对立，力主勿杀，无效。

1936年 69岁。7月18日，参加章炳麟追悼会。8月，为刘师培撰事略。10月20日，与宋庆龄等组织鲁迅治丧委员会，亲为执绋送殡。

1937年 70岁。12月，所撰《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开始刊载于《宇宙风》杂志。年底，由上海迁居香港。养病。

1938年 71岁。4月23日，吴玉章由欧洲经香港回国，与蔡元培晤谈；蔡认为国共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6月5日，作《鲁迅全集》序。

1939年 72岁。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用

“满江红”词调。

1940年 73岁。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正式举行成立大会，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3月5日晨9时45分逝世。灵柩安葬于香港仔山巅之公墓。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同志致电哀悼。张继代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致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丘桑主编.
(民国奇才奇文系列:蔡元培卷)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6
ISBN 7-5060-1111-5
Ⅰ.黑…
Ⅱ.丘…
Ⅲ.蔡元培-文集
Ⅳ.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982 号

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HEI AN YU GUANG MING DE XIAO ZHANG
丘　桑　主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南方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305 千字　印张:13.75
ISBN 7-5060-1111-5/Z·88
定价:24.60 元

策　　划　　严　平
　　　　　　许剑秋
主　　持　　黎　松
特约编辑　　夏　青
责任编辑　　吴玉萍
装帧设计　　李颖明



○○○

年文传
表粹记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史最动荡的年代，也是新与旧的交替、中与西的碰撞最为激烈的时代。因而孕育出了一大批通古博今、学贯中西的奇才人杰。本丛书选取其中性情独特、才智超群者凡十三人。寻其传记、自传，选其文章精粹，编其大事年表汇为一册。使读者通过一本书既可知其生平业绩，亦可涉其学术思想。十三人中大多不仅是学者文人，也是政治上的行动家。所以不仅他们的文章反映了时代风貌，影响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他们个人的生平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轨迹。通观全书，整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尽收眼底。



ISBN7-5060-1111-5/Z·88

定价：24.60元